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重庆市一级期刊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ISSN 2096-3378



2024/5

统一战线学研究
二〇二四年第五期（总第四十二期第八卷）

《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本刊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2023年10月修订）反映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敬请作者在投稿前仔细阅读、对照处理，以使稿件经制度化流程得到更高效率的办理。

一、常设专题

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

二、选稿标准

秉持“以专业视角研究统一战线，以统一战线视角研究中国、探析世界”办刊理念，提倡宽视角、学理化、多学科、多方法、多层次研究统一战线。倾向选用从宏观和中观层次研究统一战线的稿件，坚持“以题审文、按质取文”。

三、具体要求

（一）导向。稿件须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用学术讲政治。注意防范具体表述、引用注释或参考文献、图表中的话语歧义与隐形意识形态风险。我刊在审编校全程中对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的稿件实行“一票否决”。

（二）选题。立足宽广时空视野，及时回应党和国家战略关注，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角度新颖、力求前沿，坚持大统战视角，立足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对统一战线议题作出使读者有较大启发的研究，避免“就统战谈统战”。

（三）立论。立论基础坚实，问题提出部分应包含研究背景陈述、文献述评、创新点阐述等内容。要有精到的文献综述，开门见山地指出所研究问题、理论价值和政策依据、现实意义。重视援引前沿成果（含正文论述），且实际引用了大量的期刊前沿文献。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30条，其中引用近3年期刊论文不少于10条，同时注意回溯三年以上的代表性论文。

（四）论证。论证中注意材料支撑，使用丰富、可信、有说服力的论据，避免泛泛而谈。题目、摘要、关键词、图表应做到规范、简洁、清晰。

（五）文字。提倡简洁、清晰、准确、顺畅、朴素的文风。表述符合文法规范，主谓宾结构清晰，无病句，无文字差错，无逻辑错误。请逐一仔细核对原文，如发现问题较多、学术态度不端正的，特别是如在编校中发现文字硬伤、低级文字错漏情形，即使已经审理录用的稿件也将作退稿处理。

（六）注释与参考文献。注释使用尾注体例。引用各类文献时务必核实原文，确保准确性。参考文献体例详见《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https://mp.weixin.qq.com/s/kv8cyCnRcp7QbkYXlJeX0g>。

（七）篇幅。不少于12 000字，论述深入的优秀论文篇幅可达1 5000~20 000字左右。

（八）学术诚信。论文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文字重合率一般不高于15%。作者在投稿前应明确作者顺序（依据作者的实际贡献），投稿后不接受对作者署名及顺序、基金项目等基础信息的更改。

（九）审稿周期。审稿周期为一个月。来稿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本刊返修意见或有关回复的，作者可自行撤稿。审稿流程：一审→二审（含专家外审）→三审。

（十）其他约定。对契合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的稿件，优先录用、优先刊发，优稿优酬（税前）、特稿特酬（税前）。

（十一）投稿方式。采取邮箱投稿，投稿邮箱：ysyxb@vip.163.com。

（十二）联系方式。电话：（023）62874725；微信公众号：[tyzxxxyj](https://mp.weixin.qq.com/s/RXpUuqE7ivLXv5qv54MYEQ)；开放获取：<https://cqsy.net.cn/?Tongyi/Zhanxian/>。

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详版请见本刊微信公众号相关推送：<https://mp.weixin.qq.com/s/RXpUuqE7ivLXv5qv54MYEQ>。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4 年第 5 期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协办单位：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一战线历史重庆研究基地

编 委：王 浩 王英津 王浩宇 田飞龙
吕 鹏 刘福军 齐鹏飞 李 俊
李 捷 杨 恕 肖存良 汪仕凯
汪曙申 宋 俭 张 建 张献生
陈 纪 陈 兵 陈奕平 陈家刚
相德宝 袁 征 钱再见 徐理响
郭永虎 黄天柱 蒋 锐
韩云波 薛庆超
(按姓氏笔画排列)

社 长：夏晓华

主 编：王 鸿

执行主编：林华山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4 年第 5 期（总第 47 期）
双月刊 2017 年创刊 第 8 卷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

制度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 01 论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耦合共生 / 汪仕凯
- 15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的统一战线：治理功能、制度结构与实践
路径 / 陈家刚 赵佳豪
- 28 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历史演进、鲜明特征与实践
价值 / 钟德涛 付 瑀
- 43 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驱动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 / 陈 欣
- 52 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及制度建设主线
——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 张艳娥
- 64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重要论述 / 柯增金 侯 勇
- 78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脉络、辩证联系与实践进路
/ 刘宗灵 张雨桐
- 90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三个更加注重”的思想意蕴与实
践要求 / 樊士博
- 104 六维驱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要素与作用机理
/ 邓海龙 牛宝琨

- ◎ CSSCI (2023—2024) 扩展版来源期刊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入库期刊
- ◎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引文数据库
- ◎ 重庆市一级期刊
-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
-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 ◎ 龙源期刊网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 ◎ 博看期刊数据库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专题

反分裂反干涉反制裁研究

- 115 美国歪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历程、表现与本质
/ 伍俐斌 张 骏
- 128 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档案进场及其实现：以“迁
台记忆”档案为例 / 郑容坤
- 141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全球的“民主”干涉行动及其危害
/ 周文星
- 158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基本样态、内在逻辑与应对策略
/ 郑志康

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专题

全球超级选举年与世界政党政治新动向研究

- 171 美国政党政治结构转型及其对2024年大选的影响 / 李奕昕 王 浩
- 184 “莫迪3.0”时代印度政党政治走势的成因及影响
/ 戴永红 刘知乐 韩瑞萌

- 封二 《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 封三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Bimonthly)

2024 No.5(Sum No.47) Vol.8

- 01 On the Coupling Symbiosis between the United Front and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Wang Shikai
- 15 The United Front in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tic Practice: Governance Function,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Practical Path Chen Jiagang&Zhao Jiahao
- 28 On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ew Party System Historical Evolution,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al Value Zhong Detao&Fu Yu
- 43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Driven by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hen Xin
- 52 The Underlying Logic and Main Line of System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Learning the Spiri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Zhang Yane
- 64 Taking Institution Building as Our Main Task: 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 Zengjin&Hou Yong
- 78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s an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istorical Context, Dialectical Connection and Practical Approach Liu Zongling&Zhang Yutong
- 90 The Methodology of Further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s: the Ideological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Three More Attentions" Fan Shibo
- 104 Six-Dimensional Driving : the Dynamic Elements and Mechanism of Promot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Deng Hailong&Niu Baokun
- 115 The United States Distorts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Process, Performance and Essence Wu Libin&Zhang Jun
- 128 The Entry and Implementation of Archives to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mong Taiwan Compatriots: Taking the "Memory of Relocation to Taiwan" Archives as an Example Zheng Rongkun
- 141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s Global "Democracy" Intervention Actions and Their Harm Zhou Wenxing
- 158 Historical Nihilism Distorts the "Four Histories": Basic Forms, Internal Logic,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Zheng Zhikang
- 171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arty Politics and Its Impact on the General Election of 2024 Li Yixin&Wang Hao
- 184 The Causes and Influence of the Political Trends of Indian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Modi 3.0" Era Dai Yonghong&Liu Zhile&Han Ruimeng



论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耦合共生

汪仕凯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存在着耦合共生关系，一方面两者在内容上相互包容，另一方面两者在实践中互为条件。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相互给予、共同发展的耦合共生关系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建构的结果。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起源于统一战线与民主的联系，形成于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的耦合共生，最终成熟于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耦合共生。团结和民主的同构是两者之间耦合共生关系的内在结构。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事务的公共性、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民主的发展性，共同构成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耦合共生关系的基本条件。

关键词：统一战线；全过程人民民主；耦合共生；党的领导；团结；民主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5-0001-14

统一战线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耦合共生在一起的，民主和团结的深度同构就是统一战线和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耦合共生关系的集中表达。这种耦合共生关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中进一步发展演化。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关系，起源于统一战线与民主的联系，形成于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的耦合共生，最终成熟于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耦合共生。

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是一种耦合共生关系。具体而言，耦合共生关系有着两层含义：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5.001

作者简介：汪仕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统一战线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作用研究”（ZK20230227）

引用格式：汪仕凯. 论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耦合共生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1-14.

一方面是两者在内容上相互包含，统一战线包含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容，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包含着统一战线的内容。这就是说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内容上是大同小异、高度同构的。另一方面是两者在实践中互为条件，全过程人民民主以统一战线为资源和实践形式，在将人民民主提升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统一战线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统一战线则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内在规定，全过程人民民主打开了统一战线的发展空间、提高了统一战线的运转效能。人民是统一战线和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耦合关系的基础。进言之，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将人民塑造出来、并且以人民为革命的动力、在革命胜利之后以人民为基础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统一战线和全过程人民民主才形成了耦合共生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一开始尚没有对统一战线和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形成完全的自觉意识。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经验的丰富，中国共产党在将人民民主提升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同时，充分认识到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明确“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建设任务时，就将“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和“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作为其基本内容，并且明确指出“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进而要求“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就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包括“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有赖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入实践，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入实践则必须从统一战线汲取资源、以统一战线为重要内容。

一、耦合共生的形成

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相互给予、共同发展的耦合共生关系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建构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国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这种耦合共生关系，并且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建构和发展这种耦合共生关系。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最初表现为统一战线与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统一战线与革命建国的关系，统一战线与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由此播下种子。中国共产党在此后的革命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直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统一战线与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形成。

1922 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主要内容是：明确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目标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要实现革命的目标就必须以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为动力，同时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唯有如此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2]。民主革命纲领不是一般地提出在革命中要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而是从两个层面将统一战线与民主联系起来。一方面是从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必须经过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建立人民主权的现代政治。另一方面是从革命的动力，只有建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中倾向于革命的部分共同组成的统一战线，才能凝聚足以战胜敌人的强大革命力量。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此时对于统一战线的

理论思考和革命实践还不够成熟,但是将统一战线与民主联系起来的思路始终引导着统一战线发展,进而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

国体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认为“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中国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就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3]。

“各革命阶级联合”其实就是统一战线,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统一战线就从同一般意义上的民主相联系深入到同国家政权的性质即国体相联系。更明确地说,由于统一战线直接关系到国家权力来自于谁、归谁所有、为谁服务等根本问题,也就是直接同人民主权联系起来,因而统一战线不再是一种革命策略而是一种革命战略。与此同时,统一战线深深嵌入国家政权之中,作为国体的一种构成要素而存在。统一战线与民主之间的联系在国家政权中发展为统一战线与民主的耦合共生。

在统一战线与民主之间耦合共生关系形成的过程中,统一战线应该包含哪些社会阶级,即人民的构成范围是什么,成为中国共产党需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自然成为领导统一战线的力量,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以农民战争为主要形式的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途径,工农联盟由此成为统一战线的基础。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样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3] 641},因此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从中国共产党思考和实践统一战线的历史过程来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始终是统一战线的范围,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是否属于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在何种条件下构成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则是中国共产党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比较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在反思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解,另一方面取决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所发生的重要变化。

1935年,由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日益迫近,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障碍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统一战线上采取的“关门主义”政策,必须扩大统一战线范围,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会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3] 151}统一战线的扩大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同国民党政权一直有矛盾,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民族资产阶级将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个是其他社会阶级中可以争取的力量,包括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大资产阶级中同英美有联系而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部分人以及地方实力派等。

统一战线的范围得到扩大,构成革命力量的阶级更加多元和复杂,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政权纲领也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人民共和国”此时被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也就是除了代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还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分子^[4]。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中,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权纲领得到了实践,其具体的形态是“三三制”。“三三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人员分配原则,共产党员占政权全部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人士占政权全部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政权全部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三三制”体现了广

泛的政治代表性，贯彻了统一战线的原则。“三三制”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3] 741}。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内阶级矛盾取代民族矛盾再次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统一战线的范围据此发生进一步调整，定型为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体现在国家政权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民主联合政府。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相对于“三三制”政权而言，“民主联合政府”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力量的领导权得到完全确立^[6]，二是不允许存在中间力量和中间道路，国家政权的性质只能是人民民主专政。

其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同否定中间势力、中间路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各党派、各团体，只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必然要放弃中间路线；而如果要坚持走中间路线，则必然抵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在积极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同时特别指出：“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了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7]就其利益而言，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参加革命的动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纲领中明确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国家政权中需要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发挥重要作用，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是否放弃中间路线、是否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方面的自主选择同样至关重要。事实上，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美国正在“加紧扶植‘第三势力’，企图在爱国民主阵营中间制造分裂，拉出一些自由主义人物，在国共两党之间成立所谓的‘中间政党’”^[8]。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意味着统一战线发生了深刻的内在变化，统一战线不再单纯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整体性质的政治力量，人民是这个整体性质的政治力量的名称。人民的形成为统一战线与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1949 年 9 月 21 至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它标志着统一战线取得伟大的成功，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根据这个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代表它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9]得到确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统一战线完成了团结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从而塑造人民的巨大历史任务。在以人民为根基建立国家政权的同时，统一战线深深嵌入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中，这标志着统一战线同人民民主的耦合共生关系形成。李维汉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统一战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都进到统一战线中来了，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地方实力派也过来了。各民主党派公开宣言抛弃中间路线，拥护新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以中共为首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拥护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和平民主阵营，在国内和国际关系上都形成了一面倒的形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及其所产生的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最集中并最完备地表现了统一战线的这种历史性的变化。”^[10]绝大多数中

国民众都进入统一战线, 各种政治力量都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在统一战线的作用下, 围绕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整体性质的政治力量的人民形成了。人民是共和国的根基, 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在共和国实现当家作主。

总结来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标志着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之间耦合关系的形成。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关系是在中国共产党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革命过程中, 统一战线的每一次变化都同国家政权纲领的变化密切联系。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关系是以人民为基础、嵌入国家政权之中的。这种耦合共生关系必然随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而演进。

二、耦合共生的演化

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国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演化。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人民民主提升为全过程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演化为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这个演化过程突出体现在人民力量的发展、民主党派性质的变化、新型政党制度的定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上面。人民力量的发展有着基础性作用, 民主党派性质的变化和新型政党制度的定型是关键, 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是重点。

人民是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耦合共生关系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将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塑造成人民, 人民作为整体性质的政治力量掌握国家权力、实现当家作主。由此, 团结和民主实现了深度同构, 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得以形成。这就是说, 人民力量的发展变化毫无疑问将对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毛泽东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人民力量的变化对人民民主的影响。民主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 人民力量的扩大意味着民主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 他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认为: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 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 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 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 在抗日战争时期, 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 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 都是人民的敌人; 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 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 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 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 都是人民的敌人。”^[1] 在社会主义社会, 人民力量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更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成员成为人民的一分子, 而且体现在人民力量得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保障, 构成人民的阶级、阶层以及社会成员是在经济基础决定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广泛的团结的, 在此基础上民主和团结的同构更加深入。

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我国经济基础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因而人民力量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江泽民指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12] 这就意味着，人民力量已经发展成由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社会主义爱国者构成的范围前所未有广大的整体性质的政治力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人民力量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特点：组成人民的每一个人的利益主体意识和权利主体意识都大大增强，获得主体意识的个人就是现实的个人，是对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进行意见表达有着强烈需求的公民。因此，人民力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必然反应到民主扩大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则是其集大成者。

在人民力量的发展过程中，民主党派的性质也经历着深刻变化。民主党派是统一战线中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爱国人士以及其他劳动者的政治代表。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计划体制时期的中国社会简化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这就是说，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已经改变，民主党派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毛泽东对此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1] 34} 既然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那么民主党派的性质就必须重新定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性质作出明确解释：“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13] 从主要代表资产阶级的党派转化成代表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不仅使民主党派在性质上能够同社会主义相一致，而且使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获得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民主党派性质的转化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格局的深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其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实践的自然产物。根据相关研究，第一次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连在一起讲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十三大报告在定稿前曾经送邓小平审阅，而邓小平最后对报告稿少数几个地方做了修改，其中一处就是在原报告稿中‘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多党合作’后加上了‘和协商’。后来，就是根据十三大报告的这个提法，在中共中央有关这项制度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1989 年 14 号文件中，正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把它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4] 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认识的发展促进政治实践的深入，而政治实践的深入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江泽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内涵作出深刻解释：“这项制度，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成果，也是中国人民政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在于：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重大问题上进行民

主协商、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和参政党建设的加强。”^{[12] 144}简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核心内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说它是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15]统一战线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长的土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是统一战线的重大成果。它不仅意味着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得到了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保障，而且意味着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创造的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构成要素。

民主党派性质的转化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实际上蕴藏着一种十分关键的政治资源即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深深嵌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16]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是在人民力量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之间耦合共生关系演化的水到渠成的结果。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升级版，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关于如何将人民主权具体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战略规划、理论概括和目标指导^[17]。

习近平总书记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有非常深入和系统的论述。他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我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形成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全体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18]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同样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谛^{[18] 31}。商量就是协商，更进一步地说，就是根源于、发展于、成熟于统一战线的政治协商。商量或者说协商，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谛，不仅意味着协商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构成要素、技术手段、发展资源，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协商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质。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商量或者说协商为真谛，能够充分证明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统一战线之间存在耦合共生关系。这种耦合共生关系最初起源于统一战线与民主的关系，形成于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的耦合共生关系。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是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演化的结果，是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之间耦合共生关系的成熟形态。毫无疑问，全过程人民民主以统一战线的发展成就为重要基础，全过程人民民主为统一战线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将体现为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

三、耦合共生的结构

纵观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耦合共生关系的演化过程，我们发现其中蕴藏着一种深层结构。这个内在于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中的深层结构就是团结与民主的同构。由于这个深层结构的存在，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才能形成耦合共生关系并不断演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在总纲中规定：团结和民主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两大主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也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因此，团结和民主实际上就是统一战线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共同的核心要素。更为重要的是，团结和民主不是相互分离，而是同构在一起的。要实现团结就必须同时实行民主，而实行民主必然以团结为归宿。

团结和民主的同构，表达的是一种团结和民主之间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过程。首先，团结是指在最大程度上将民众聚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性质的政治力量，而民主是指团结起来的政治力量同样由组成政治力量的绝大多数民众掌握和行使。其次，团结是民主的基础，如果不能在最大程度上将民众聚合起来，就缺乏民主的主体力量，故而不可能实行民主。再次，民主是达成团结的核心方式，不实行民主、不以民主的方式，就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团结。只有依靠民主才能使最大范围内的民众聚合成整体性质的政治力量，从而创造出民主的主体力量。最后，团结是民主的根本归宿，实行民主是为了实现团结，而非在民众之间造成分裂，能否巩固和发展民众的团结是判断民主优劣的根本标准之一。因此，团结不仅为民主创造主体力量，而且为民主设定了价值标准，进而升华了民主的内涵。概而论之，团结和民主的同构意味着团结和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了，即在很大程度上团结就是民主、民主就是团结。

当然，团结和民主的同构并不是一种想象的产物，而由中国现代政治的历史过程决定，是复杂的实践过程的结果。在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前，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据优势地位的古代国家，农业经济的分散性和精耕细作的生产特征使得民众主要依靠血缘邻里关系组织起来。梁漱溟认为，中国古代国家是分散化的，缺乏集团生活，故而难以团结起来^[19]。同时，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地方差异很大，民族构成也十分复杂。因此，如果仅仅从中国社会本身着眼，是不可能找到能够将民众团结起来的力量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依靠的正是以皇权为中心的郡县制，一旦这种组织方式出现危机，中国就会分裂、动荡。中国在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后，以皇权为中心的郡县制无法满足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要求，因而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持续打击下日益腐朽，最终失去了组织中国社会、凝聚广大民众的作用。随之而来的严重政治后果就是中国在事实上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四分五裂的国家是不可

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 在不断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 如果中国社会不能凝聚起来就只能走向彻底毁灭, 完全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

为此, 中国的先进分子苦苦寻找答案。从孙中山开始, 民主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初步认识到, 要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下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 必须实行民主。孙中山在创建兴中会时就提出建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 待成立同盟会时则进一步提出了由民族、民权、民生组成的三民主义纲领。孙中山认为: “至于民权主义, 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将来民族革命实行以后, 现在的恶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扫而尽, 却是还有那恶劣政治的根本, 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 这种政体, 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 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20] 民权主义的主体是普罗大众, 只有普罗大众才能进行政治革命, “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 建国民政府”^{[20] 88}。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 却未实现民主。作为中国实现“旧邦新命”的方向, 民主始终被中国先进分子坚持探索。

新文化运动将“民主”和“科学”作为旗帜, 五四运动则将民主的内涵进一步拓深。集中而论, 民主不是仅靠政治革命就能实现的, 因为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事, 只有绝大多数人参与其中, 才能实现民主。而要使绝大多数人参与其中, 就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绝大多数人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他们被旧的枷锁限制住, 不进行社会革命就不能解放他们, 也就不可能实行民主。金冲及认为: “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 如果不到他们中间去, 不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 而把他们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 只停留在少数学者和知识青年的狭小圈子里活动, 那么, 不管议论如何激烈, 甚至也可以争得某些成果, 仍然只是一部分甚至少数人的民主, 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21] 当然, 工人和农民只是革命阶级的主体部分, 要在中国民众中形成绝大多数, 工人和农民必须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同样重要的是, 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组成的绝大多数, 不能只是一个松散的革命阶级联盟, 而必须是一个整体性质的政治力量。由此, 团结和民主开始同构在一起。

团结内在于民主之中并且对民主的内涵进行了拓展。一方面民主只能是绝大多数共同享有的人民民主, 另一方面构成绝大多数的民众本身必须是民主性质的, 即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在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时,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对新政协与旧政协进行比较, 指出民主和团结的同构关系。一方面, 新政协“是民主方面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自己相互商量‘国是’, 取得一个协议, 只是‘和衷共济’而不是妥协”。另一方面, 反民主或者伪民主的力量不能进入新政协, “怎样是民主党派的标准? 我敢简单地说我个人的意见: 无疑地是一贯主张民主, 而且有工作的表现, 有群众的拥护, 可以代表全国性的政治团体”^{[8] 19}。

同样, 民主也规定了团结的性质。一方面, 凡是民主性质的力量都必须团结起来, 而不应该有丝毫忽略, 只有如此才能形成绝大多数。周恩来在解释新政协的代表构成时就指出: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以工人阶级为领导”是重点, “有了重点, 同时又照顾到了各个方面。在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中, 除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外, 还有妇女代表、青年代表、学生代表、文艺工作者代表、新闻界代表、工商界代表、教育工作者代表、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我们也照顾到还不能立刻组织团体的方面, 如自由职业者代表。我们还照顾到海外华侨和少数民族”^[22]。另一方面, 团结起来的目的是实行民主, 民众也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实行民主, 将绝大多数人凝聚成整体性

质的人民，将人民力量转化为国家权力，由人民掌握权力、行使权力。

团结是民主的目的，民主是达成团结的手段。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实行民主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此过程中，当然会出现一个意见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充分呈现、政策主张充分争论的阶段。这个阶段是整个民主过程的“分歧”阶段。“分歧”阶段必须走向“整合”阶段，即民众围绕共同利益达成一致。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达成团结，实行民主最终是要在民众中实现团结。制造分裂而无法达成团结的民主是劣质化的民主，甚至是同民主本质相背离的。当然，团结并非抹杀、否认分歧。团结是绝大多数人的团结，绝大多数人显然是有着具体利益的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因此要在绝大多数人中间达成团结，只能通过民主的方法。毛泽东指出：“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11] 210}团结作为一种价值，贯穿民主过程始终，构成实行民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民主和团结的同构有着鲜明的政治文化取向。

团结和民主的同构归根结底在于人民。人民是由绝大多数中国民众构成的整体性质的政治力量，但人民形成不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进行塑造的政治过程。在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将绝大多数民众塑造成人民力量的过程中，不仅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之间形成了耦合共生关系，团结和民主也同构在一起。团结和民主的同构作为一种深层结构，规定着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之间耦合共生关系的演化。因此，人民力量的发展将不断巩固团结和民主的同构，而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之间耦合共生关系的演化，既从人民力量的发展中获得动力，又受到团结和民主之间同构的制约。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就沿着团结和民主同构的轨道不断演化，最终定型于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耦合共生。

四、耦合共生的条件

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是在政治实践中形成和演化的，既需要可靠的社会基础，又需要政治力量的意识自觉以及有意识地塑造，否则这种耦合共生关系难以形成，即使形成也不可能巩固和发展。进言之，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建立在一系列条件支持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事务的公共性、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民主的发展性，共同构成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耦合共生关系的基本条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则是最为重要的支持条件。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在革命胜利之后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16] 16}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全面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3]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领导核心，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在将绝大多数民众凝聚成人民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首先通过政治动员和组织成为人民之中的领导核心，然后以人民为根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进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24]。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过程和理论逻辑来看，无论是统一战线还是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共产党领导都作为一个核心要素而在其中。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会有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没有根本政治保障。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将统一战线和全过程人民民主联系起来的关键，也是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耦合共生关系的枢纽。李维汉对其中的关节有很好的论述：“革命必须依靠一定的社会力量。组成统一战线，团结和壮大革命力量，孤立和瓦解敌人，这是任何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根本条件。自从鸦片战争的时候起，先进的中国人在反对外敌侵略和国内封建压迫的斗争中，都在寻找、团结同盟者，壮大革命力量，并且曾经多次地在某种范围内结成了革命统一战线。但是，直到五四运动为止，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样的统一战线，显然不能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党来组织和领导……孙中山是伟大的，在晚年，他曾经在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唤起民众’的口号。但是，谁去‘唤起’和‘扶助’呢？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孙中山的意思仍然是由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去‘唤起’和‘扶助’。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事实上，当时的工农运动是由共产党领导和发动起来。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是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根本路线，只有共产党才能提出和贯彻执行这个路线。正是因为这样，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要到五四运动以后，才能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10] 357}由此可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会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时，统一战线正式定名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集中表达出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更明确地说，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所以中国的民主就只能是绝大多数人享有的人民民主，而绝大多数人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才能出现在政治生活中并凝聚成人民。在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形成，并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形式确定下来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途径，使其在耦合共生关系中的关键地位和枢纽作用不断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建构和发展的结果。因此，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就不可能有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

国家事务的公共性质是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耦合共生关系的重要条件。国家事务就是政治，政治不是一个人或者少数人的事务，而是公共事务即众人之事。将国家事务视为公共事务，是中国古代国家中已形成的一种政治精神。虽然自三代以后中国进入君主专制的家天下时期，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仍然是激励中国人关心国家命运、参与国家事务、承担政治责任的深厚精神动力。近代以来，伸张民权、积极参与国家事务、挽救民族危亡，更是中国先进分子的基本主张。孙中山在解释民权主义时就说：“近世各国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25]既然国家事务是公共事务，绝大多数民众都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那么以革命建立新国家的过程同样是一个必须

由绝大多数人共同参与的过程。由绝大多数人共同创建的国家，只能是由绝大多数人享有民主权利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要言之，国家事务的公共性质在中国革命中得到彰显，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国家事务的公共性质为资源发展出耦合共生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向全党号召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时，是从国家事务的公共性质出发立论的，建立统一战线是“天下国家道理”^[26]。在建立和领导统一战线以及抗日根据地政权时，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公共性质，以及从这个性质出发而形成的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都有着清楚认识。毛泽东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院中好好实行起来。我想，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样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参议院中受到很好的锻炼，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27]国家事务是公共事务，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国家事务就必须通过统一战线开放给绝大多数民众。这体现在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来处理国家事务，同时也具体地形成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要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在政治实践中推动耦合共生不断演化，还必须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统一战线是由绝大多数人构成的，现实的个人分属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因此绝大多数人只能是多样性的。但是，统一战线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多样性之中又有一致性，组成统一战线的绝大多数人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和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就是统一战线中的“一”，而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则是统一战线中的“多”。费孝通对“一”与“多”的关系有过精妙的分析：“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含有一个基本的意思，就体现在我常说的闻一多同志的名字中，就是‘一’与‘多’的关系。我这么想，我们这个国家在整个世界格局中是比较弱的，处于落后地位，知识比较少，工业不发达，必须要以比人家快的速度才能赶上人家，否则要出大问题，这就需要一批人带头。孙中山讲先觉觉后觉，那么谁来领导，谁是先进的？在这个世纪就是工人阶级先进，它的先进分子组成共产党。党来指出方向，他们要走在前面，要纯，要有纪律，要有高度威信，所以共产党是‘一’。光有‘一’是不行的，有‘一’就有‘多’，有纯就有杂。这个‘多’是在‘一’领导下的。社会上有许多不同利益，民主党派要代表不同利益，通过民主党派把各种意见、看法都反映到领导上去。所以民主党派要‘多’，不能纯。民主党派要能讨论问题，能改正思想，包容性要强。这就是‘一’与‘多’的关系。”^[28]由此可见，“一”与“多”的统一，实际上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就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凝聚绝大多数民众，从而发展人民力量。它关系到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耦合共生关系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只有一致性、没有多样性，或者只有多样性、没有一致性，都不能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1] 357}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关键是求同存异，“一

方面要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包括巩固已有共识、推动形成新的共识, 这是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 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1] 358}。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创造的新型政党制度。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 就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新型政党制度的有效运转, 为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提供基本制度保障。

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同样需要以民主的发展性为条件, 也就是从人民民主提升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获取资源。民主是不断发展的。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一般经验表明, 民主的主体是不断扩大的、民主的制度体系是不断完善的、民主的规范程序是不断革新的、民主的价值观念是不断深化的、民主的质量和绩效是不断提升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探索和实践经历了从人民民主专政到人民民主、将人民民主提升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过程。其中, 协商作为政治资源和民主技术发挥着关键作用。“协商是统一战线的内在机制”^[29], 从统一战线中孕育出来的协商, 也是统一战线实践的基本机制。随着协商展现出巨大的政治效能以及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 协商进一步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 意味着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在实践机制上获得了支持。也就是说, 协商民主的发展就是不断再生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耦合共生关系的过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历程中, 协商民主占据突出位置。“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 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 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18] 31} 因为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的真谛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故而人民民主发展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面发展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协商机制, 更好地深化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1-33.
-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 (1921—1949): 第1卷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79.
- [3]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76-677.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12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531-551.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25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83.
- [6] 汪仕凯. 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历史政治学分析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0 (1): 28-38.
- [7] 毛泽东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375.
- [8] 杨胜群, 陈晋. 亲历者的回忆: 协商建国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10.
- [9]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 一 [G].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5: 78.
- [10] 李维汉. 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57.
- [11] 毛泽东文集: 第7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05.

- [12]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39-540.
- [13]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6.
- [14] 陈惠丰. 从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到协商民主：上 [M]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322.
- [15] 习近平. 论人民当家作主 [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29-230.
-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 [M]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94.
- [17] 汪仕凯.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知识脉络与历史经纬 [J] . 天津社会科学，2023（1）：11-18.
- [18]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31-532.
- [19]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83.
- [20] 孙中山选集：上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87.
- [21] 金冲及. 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 [M] . 增订版.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217.
- [22]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2.
- [2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 [M]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85.
- [24] 汪仕凯. 将人民带回中国政治研究 [J] . 政治学研究，2023（2）：129-139+172.
- [25] 孙中山选集：下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615-616.
- [26]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5.
- [27]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9-810.
- [28] 陈惠丰. 从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到协商民主：下 [M]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583.
- [29] 林尚立，赵宇峰. 中国协商民主的逻辑 [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5.

责任编辑：龚静阳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的统一战线： 治理功能、制度结构与实践路径

陈家刚 赵佳豪

（中国人民大学 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统一战线是一种政治联盟形式。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对统一战线的领导，通过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统一战线具有凝聚共识与汇聚力量、权力监督与决策优化、完善治理与促进发展的功能。统一战线拓展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广度和深度。统一战线治理功能的凸显，具有坚实的制度支撑。这种制度结构是以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和协商民主制度为构成要素的体系化形式。新时代新征程更好发挥统一战线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互动、坚持战略与制度的结合、坚持现实性与前瞻性的统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全过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协商民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5-0015-13

实践是民主之源，民主是否更加真实、广泛和有效，取决于民主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力，取决于抽

DOI: 10.13946/j.cnki.jcquis.2024.05.002

作者简介：陈家刚，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政党理论北京研究基地研究员；赵佳豪，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一般项目“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2023JZDZ009）

引用格式：陈家刚，赵佳豪．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的统一战线：治理功能、制度结构与实践路径[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5）：15-27．

象的民主价值和民主理念能否通过不同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机制转化为具体的治理行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立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心任务，明确指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1]全会对“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作出系统部署，从加强制度建设和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的角度，对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等提出了改革任务。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进一步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激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功能，强化民主实践的制度支撑，完善民主运行的规范体系，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统一战线是一种政治联盟的策略和形式，以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团结和联合不同政治力量为主要内容，在党的历史中起到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作用。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讲，统一战线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明确指出，统一战线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民主的政治基础，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的战略高度，进一步强调了统一战线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作出系统部署，为更好发挥统一战线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围绕统一战线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系，学界从各个维度、各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其一，探讨两者的内在逻辑，有学者认为两者存在紧密的价值契合性，在团结与民主的辩证实践中相互贯通、相互促进^[2]。其二，梳理两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有学者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整体把握两者生成的共生性、发展的同构性、功能的互进性^[3]。其三，关注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结合的载体支撑，学界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如何更好发挥人民政协^[4]、民主党派^[5]等不同行动主体的职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总体来说，现有文献更多从抽象理论层面把握两者的关系，较少从民主实践层面展开研究；更多着眼于两者结合的历史梳理和经验总结，较少关注当下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统一战线呈现出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路径创新。

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则，突出问题导向、顺应实践发展才能更好推进制度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探讨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联系，需要坚持大历史观，从党的历史中理解和把握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同程同构、同源同向的内在联系，深入思考统一战线在民主实践中的基本功能；需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结合民主的形式和内容，探讨统一战线如何将民主价值和理念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

一、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的内在联系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人民民主的旗帜，成立初期就确立了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观察党的历史可以发现，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有着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从一开始就围绕人心所向和

力量对比的根本问题, 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对民主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探索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

人民民主是统一战线的核心要义。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统一战线都蕴含了人民民主的精神内核。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 党就提出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1922年6月,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明确提出要邀请民主的革命派和民主的革命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6]。同年7月, 党的二大制定《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在全党层面肯定了“民主联合战线”的政治主张, 并制定了配套的行动方案来进一步扩大这一主张^{[6] 140}。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动员农民群众发动土地革命, 提出了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反对封建压迫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强调, 人民的民主自由是战争动员和国内团结的基础, 只有争取民主才能建立“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7]。抗战胜利后, 中国共产党根据新形势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 组织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不仅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还动员了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当中实现了新的发展。改革开放后, 中国共产党发展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进一步发扬统一战线范围内的民主, 适应了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和利益关系调整。进入新时代,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挥出了凝聚人心和汇聚力量的巨大政治优势, 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全面性和系统性的制度支撑, 成为党领导人民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之一。

统一战线是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力量。“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 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8] 首先, 统一战线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性。广泛性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前提。列宁曾深刻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制度虚伪性, 指出其少数人民主的实质; 不仅如此, 资产阶级害怕觉悟的无产阶级会通过民主反对资本的压迫, 而对无产阶级来说, “完全而彻底地实现民主主义”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9]。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把各种政治力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并通过人民政协等多种制度形式扩大统一战线多元主体的政治参与, 充分保证了人民民主的广泛性。其次, 统一战线深化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性。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性不仅体现在制度的设计中, 更体现在制度实施落地的参与实践中。新型政党制度是统一战线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典型安排。在这一制度框架内, 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 扎实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基本职能。例如, 中共中央在重要会议召开前会专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在每年年底也会召开关于经济问题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再次, 统一战线增进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性。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回应人民现实需求和解决人民现实问题的过程不断发展完善的, 在这一过程中, 统一战线扩大了民主参与的渠道和机会, 保障了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 通过协商民主的形式平衡和协调了利益关系, 不仅巩固了党的群众基础, 还确保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施更加顺畅有效。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坚持统一战线和发展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 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后发现代化国家是否具有能够领导整个国家与社会的主体力量, 决定着政治体系转型的成功与失败, 决定着国家能否顺利推进现代化的进程。近代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革命家等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却都以失败告终。其根源在于未能深刻认识到, 中国需

要坚强的领导核心来整合“一盘散沙”的社会力量，使其凝聚成为一个整体^[10]。中国共产党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动员凝聚了全社会的革命力量，最终领导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11]事实表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引领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的正确方向，实现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的有机统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供根本政治保障。

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同程同构、同源同向，共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民主政治的实践创新，领导人民探索出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新的民主发展路径。统一战线激活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活力与创造力，实现了人民民主的规范秩序与发展活力的内在统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了共识、汇聚了力量。

二、统一战线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基本功能

统一战线涵盖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拓展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具有独特的治理功能，凸显出凝心聚力的政治优势。

（一）凝聚共识与汇聚力量

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样、社会阶层更加多样、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样”，各种利益诉求相互交织，全过程人民民主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形势更加严峻^[12]。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整合协调各方力量的机制，统一战线适应了工作范围不断拓展的时代要求，发挥着凝聚共识和汇聚力量的重要功能。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广泛团结和联合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的群众，形成共同的政治目标和价值追求，实现了思想政治基础的一致性和利益、思想多样性的有机统一，保障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统一战线能够凝聚政治共识、强化政治认同。能否凝聚共识是检验和衡量一种民主制度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对一种民主制度的共识检验可以从基本共识、程序共识、政策共识三个维度展开。首先，基本共识是指共同体持有的基本信条，“决定着既定社会是否从整体上分享同样的价值信仰和价值目标”^[13]。统一战线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阶段不断发展和强化“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共识，它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转中得到进一步深化，保障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方向。其次，程序共识是指对规则的共识。统一战线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积累了丰富的制度存量，能有效拓展不同群体的制度性政治参与。最后，政策共识则是指对分歧的民主保护。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保证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容纳和超越分歧，找出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画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大同心圆^[14]。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仅鼓励统一战线成员开展调研、提出意见建议，还通过党外人士座谈会和政协提案等多种形式保障高质量的意见建议转化为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统一战线能够通过组织动员和资源整合汇聚政治合力。首先，统一战线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在各个历史时期，在爱国主义情感的感召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将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级（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的群众聚合在一起，形成了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强大

合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当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时, 中国共产党发布召开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 得到了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的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积极筹备召开新政协, 与广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成员协商建国, 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写入《共同纲领》中^[15]。其次, 统一战线在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中, 还注重发挥各方的优势, 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 充分激发民主政治的内在活力。中国共产党鼓励统一战线成员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和优势, 为民主实践贡献自己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 针对党内存在的民主党派“任务已尽”“一根头发的功劳”的观点, 毛泽东认为民主党派联系广泛、作用重大, 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 “从长远和整体看, 必须要民主党派”^[16]。1952年, 中国共产党结合各个党派的历史情况, 帮助各个党派确立了活动范围和发展重点, 使其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 各民主党派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深入开展考察调研、积极进行政党协商, 积极投入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当中, 在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发挥了独特优势, 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 权力监督与决策优化

统一战线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还具有权力监督和决策优化的功能。作为一种民主参与和监督机制, 统一战线为各方提供了表达利益诉求以及监督党和政府工作的平台。通过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方式, 统一战线能够及时发现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与不足, 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 推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首先, 统一战线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广泛而真实的参与政治生活的平台。1950年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 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统一战线广泛集合各地域、各阶级、各民族等各种政治力量的政治优势。他提到,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统一战线便广泛活跃在土地改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上, 通过“多研究”和“多商量”等形式, 实现了“打通思想”和“整齐步伐”。统一战线内部“批评和自我批判”的方法实现了广泛而充分的运用, 不仅有利于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 “集中广泛的意见, 检查过去的工作, 决定今后的方针”, 而且有利于巩固统一战线, 扩大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基础^[17]。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范围内广泛发扬民主, 不仅高度重视统一战线成员提出的意见建议, 还完善了统一战线成员参与民主监督的体制机制, 为加强党的领导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 统一战线能够有效提升民主监督的质量。在统一战线的框架内, 各阶层、各团体、各民族的人民群众都能对公权力的运行进行民主监督, 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一方面, 党中央高度重视民主监督工作的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共中央制定《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2022年)、《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2017年)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 明确了统一战线参与民主监督的工作形式、体制机制等主要内容, 提高了民主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增强了民主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 党中央结合中心工作大局与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 不断开辟专项监督等新的监督领域和新的监督形式。专项监督的目的是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将发现、研究、解决问题贯穿到监督全过程,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式监督。2016—2021年, 中共中央专门委托民主党派中央就脱贫攻坚工作开展对口专项监督, 各民主党派深入基层开展调研, 积极发挥自身优势, 为脱贫攻坚贡献了统战力量。如民盟中央

深入走访调研河南省的 51 个贫困县，形成 500 多条意见建议^[18]；台盟中央开展 50 次专题调研，覆盖甘肃 190 余个贫困村、900 余个贫困户，形成 40 份调研报告，提出问题建议 300 余条^[19]；民进中央开展调研 70 余次，覆盖湖南 51 个贫困县，提出问题线索 200 多条^[20]。2021 年 6 月，中共中央批准组织开展为期 5 年的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并将监督主体扩大到无党派人士。各民主党派中央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采取了“面上分析与点上剖析相结合、公开察看与暗中查访相结合、实时监测与适时回访相结合”的监督方式，截至 2022 年 4 月，共组织实地调研 45 次，其中民主党派中央领导班子成员带队调研 18 次，向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反馈意见建议 250 余条，形成“直通车”专报 6 份^[21]。实施专项监督充分立足于统一战线的内在优势，凝聚了治理贫困问题与环保问题的合力，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集思广益谋大事、相互监督成大事”的独特优势。

最后，统一战线具有网络式、多层次、广覆盖的组织优势，人才荟萃、知识密集的专业优势，能够为党和政府科学制定决策提供有力支撑。其一，统一战线成员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具有与人民群众联系广泛的天然组织优势。统一战线网络式的覆盖范围使其能够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反映人民群众的诉求和关切。其多层次的组织结构则能够汇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形成多元化的决策参与机制。这些优势能够为党和政府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提供丰富的信息参考。其二，统一战线还具备人才荟萃、知识密集的专业优势。统一战线成员往往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独特的洞察力。这种专业优势使得统一战线能够在政策制定、决策咨询、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能够为党和政府提供专业化的咨询和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优势，他在福建工作期间，积极发挥统一战线在山海联动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组织召开多种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邀请统一战线的专家进行决策可行性论证，并通过统一战线的宣传为山海联动发展营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22]。

（三）完善治理与促进发展

统一战线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具有完善治理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充分彰显了中国之治的特色、格局与效果。

首先，统一战线坚持人民性的治理本质。人民性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属性，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也是党执政最深厚的根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如今的成就，正是因为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造福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神圣职责。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建设民主、发展民主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造福人民的历史。统一战线不是去搞“盆景式”创新，不是做样子，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统一战线创新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真正为人民群众谋幸福。

其次，统一战线体现共治性的治理格局。民主就是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办。统一战线是有序参与、多元共治的实践过程，真实地体现了多元参与、协商共治的治理格局。共治体现集体智慧。人民群众是自己利益最好的代言人。共治的过程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展开。统一战线贴近群众、了解群众、理解群众，广泛开展走访调研，能够摸清和吃透民意，可以提供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意见建议。同时，统一战线深入群众，还可以帮助党和政府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完成宣传和组织群众的任务。统一战线以特定群众为中心的工作方式，不仅体现了

陈家刚, 赵佳豪.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的统一战线: 治理功能、制度结构与实践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15-27.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也符合党的群众路线的精神实质。共治体现共同责任。民主既是共同的责任, 也是个体的责任。统一战线在维护群众权益的同时, 也是在推动群众养成自己的责任意识。共治体现成果共享。统一战线推动实现繁荣的经济、稳定的社会秩序、美丽的生活环境。这些都是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成果, 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共享成果。

再次, 统一战线彰显统一性的治理原则。集中和统一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统一性的维护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发展, 也是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基石。集中和统一对于大国治理更为关键, 落实到统一战线方面, 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统一战线作为我们党凝心聚力和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确保统一战线工作的正确方向, 避免出现偏离轨道的情况。同时,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还能够协调各方利益, 化解矛盾冲突, 促进统一战线内部的和谐稳定。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体现在对统战工作的组织领导、思想引领和制度建设的全方位加强。同时, 对统一战线的全面领导也极大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安排, 提升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三、统一战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结构

制度是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 中国之治是制度之治。中国的民主制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 符合具体的实际情况, 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是科学管用的制度。以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和协商民主制度为构成要素的体系化形式, 保障了统一战线的有效运转和治理功能的充分实现。统一战线蕴藏的“中国之制”要素, 奠定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基石。在制度的轨道之中, 统一战线有效实现了“共商共建”集民意、“群策群力”通民心。坚持和巩固制度, 完善和发展制度, 遵守和执行制度, 是促进统一战线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路径。

(一) 领导制度: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 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是统一战线在人民民主实践中保持正确方向、发挥最大作用的根本保证。

首先, 党对统一战线的思想引领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政治保障。其一, 党对统一战线的思想引领源自党的先进性。统一战线的出发点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但是从统一战线的性质出发, 这种领导不是强迫, 而是通过党的先进性和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深刻把握, 实现对统一战线的思想引领。毛泽东指出, 领导权“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 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 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23]。其二, 党对统一战线的思想引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新型政党制度为例, 在这一制度框架下,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着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 双方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 新型政党制度的精神内核是合作、协商、包容、团结与活力, 实现了民主和治理的复合统一, 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内部轮流坐庄、相互争斗、彼此攻击的弊端。“民主和协商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通过发扬民主、广泛协商, 可以使统一战线广大成员更加普遍地认同党的主张, 更加自觉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跟党走。”^[24]

其次, 关于统战工作的党内法规为巩固和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全面领导提供了法治保障。党内

法规是党的建设的基础性制度支撑，是中国共产党主体自觉和问题意识的集中体现。统战工作的党内法规不仅明确了统战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任务目标，还为统战工作的具体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约束，使得统战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新时代以来，统战工作法规化、体系化进程进一步加快。2015 年，党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奠定了统战工作制度建设的“上位法”，不仅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怎么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等重大理论问题，而且使统战工作的组织领导、责任归属、工作对象等基本问题都有章可循、有规可依。2020 年，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发布。《条例》总结了新情况新经验新做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总体部署，确保了统战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是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行动指南。

最后，党对统战工作的组织领导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责任保障。推动统战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效能，关键在于要理顺统战工作的责任权限、工作关系、组织领导等体制问题。其一，正确处理好统一战线中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巩固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同心圆中的“圆心”地位，要不断完善“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2015 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召开后，党中央成立了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确保了统战工作的统一部署，压实了“齐抓共管”的主体责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制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等多个方面对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作出系统性部署，保障了统一战线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中的规范运作。其二，要更好发挥统战部的参谋、组织、协调、督促等重要作用。2020 年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新增了“统战部门自身建设”一章，进一步理顺了统战部门的职能与责任，为解决统战部门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统战部门自身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条例》还根据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的变化，规定“乡（镇、街道）党组织应当有人员负责统一战线工作”，规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也需要明确统战工作的职责归属^[25]。

（二）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运作方式。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政党政治的制度化 and 规范化，体现国家的政党历史传统和社会历史发展情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且是体现中国智慧、中国创造的新型政党制度。

新型政党制度诞生和发展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通力合作、共同推进人民民主的历史进程中。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了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1945 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当中明确提出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26]。1948 年，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五一口号”得到了民主党派的积极回应，标志着各民主党派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正式确立。1956 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首次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党的八大充分肯定了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开展民主监督和改进工作的积极意义。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要不断发展完善民主制度，“巩固一切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巩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关系”^[27]。改革开放新时期，

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28]。党中央颁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89年）、《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5年）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多党合作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发展完善。

新时代，新型政党制度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程度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关于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意见》等一系列党内规范性文件，将多党合作实践中的经验做法转化成为制度性安排，完善了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运作机制，保障了多党合作的秩序建构，激发了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治理的内在活力。新型政党制度中政党合作的程序链条成功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链条当中，在国家治理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三）协商制度：推动协商民主的全面发展

作为一种民主实践的形式，同时也是实践民主的体制，协商民主强调理性的政治参与、平等的政治讨论以及充分的政治共识。“我们准备解决各种问题的方针、政策、计划、方案等，拿到大家面前，让大家明了、研究、考虑，经过反复酝酿，广泛地交换意见，充分协商而后决定。”^[29]这样就能在协商合作中形成正确的主张，增强统一战线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协商民主是统一战线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实现了广泛的协商对话、充分的意愿表达以及切实的民主参与，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管用性，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首先，要不断发展完善协商民主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30]。协商民主体系化、法治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保障了协商民主的有法可依。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要求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201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七种渠道，并且对如何更好发挥不同协商渠道的优势以及做好不同渠道的衔接配合提供了政策和工作依据^[31]。2015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进一步明确了政党协商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全国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有关重要文件；宪法的修改建议，有关重要法律的制定、修改建议，有关重要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修改建议；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建议人选；关系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重大问题。2022年，党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加强了党对政治协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规范了政治协商的对象、内容，细化了政治协商活动的筹备与开展等事项，规定了协商成果转化运用和监督保障的程序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创新了协商民主机制，提出“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机制”“健全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完善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机制”^[1]。这一系列党内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进一步总结了新时代协商民主实践的重要经验，为协商民主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实践指导，提高了协商民主的制度化、科学化水平，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促进科学化决策、合理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彰显出了巨大的政治优势。

其次，要进一步发挥好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32] 第一，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回顾人民政协的发展历程，正是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才能够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重要作用，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同时，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坚持党的领导更是人民政协应对挑战、促进发展的根本保证。第二，人民政协要发挥好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政治优势。人民政协是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具有爱国统一战线广泛性、代表性、丰富性的特点，具体体现为界别的制度设计和界别的优化调整。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使用的是“单位”的概念，会议由党派、军队、团体等不同类别的 45 个单位构成。此后，伴随着经济社会变迁，统一战线组成也发生了变化，人民政协逐渐形成了由界别组成的特色。李瑞环强调：“人民政协只有突出界别的特点，发挥界别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履行职能，使各项工作生动活泼、富有成效。”^[33] 自 1993 年第八届全国政协以来，全国政协一直由 34 个界别组成。2023 年，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增设“环境资源界”，将共青团和全国青联两个界别合二为一。界别的设置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大团结大联合的内在要求，也反映了人民政协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聚焦党和国家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既规范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参与，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了共识、汇聚了力量。

四、统一战线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路径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解决诸多重大、复杂问题的战略支撑和关键力量。“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11] 352} 新征程上，统一战线顺应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要继续发挥好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

（一）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

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凝心聚力的重要机制，统一战线需要把握好原则性和灵活性、固守圆心与扩大共识、领导核心和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实现两者的平衡是坚持统一战线的重要原则^[34]。一方面，统一战线的一致性指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大局，不断扩大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党的领导的形式和方法，实现党的统一领导的全面覆盖，确保党的统战工作与民主政治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统一战线的多样性指的是开展统战工作必须面对和处理的多元利益诉求和复杂的利益关系。统一战线本质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好国家与社会、党内与党外的关系问题，体现了推进党的事业中心力量与支持力量的结构化关系。因此，要一体推进、贯通融合，不断拓展统一战线参与民主政治的制度化途径，实现对不同政治力量尤其是新阶层政治吸纳的体制化；不断发展完善利益协调与利益整合的体

制机制, 统筹各方利益, 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 提高统一战线防范、抵御、化解风险的能力。

（二）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互动

民主既蕴含着深厚的理论内涵, 也扎根于现实实践的土壤。激发民主的内在活力, 既要丰富民主的理论建构, 也要不断总结民主实践经验, 将多样化的民主实践探索加以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 促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互动。一方面, 应当立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 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指导, 通过项目研究、基地研究、国情考察等形式, 充分挖掘、利用统一战线实践的丰富资源,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 更好引领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另一方面, 总结统一战线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 探索民主创新的新模式。人民政协积极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探索了双周协商座谈会、专题协商会、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等协商机制, 开创了泉城“商量”“有事好商量”“秦商量”“请你来协商”“桂在协商”等协商平台, 为民主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系统地梳理全国各地的创新做法, 深入研究创新实践的基本规律、内在逻辑、共性特征, 有利于在已有经验基础上, 形成具有一般性指导意义的规范模式, 增强民主理论的说理力和吸引力。

（三）坚持战略与制度的结合

统一战线是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其他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战略问题, 在党的历史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发挥好统一战线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必须注重战略与制度的有机结合, 推动统一战线和民主政治建设, 实现稳定性和有效性的内在统一。一方面, 要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推进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马列主义战略策略原则的具体运用, 它的本质就是团结大多数, 孤立敌人。”^[35]要根据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 不断调整和完善统一战线的战略部署, 明确统一战线的目标任务、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 为人民民主和国家治理开拓新的空间。另一方面, 完善统一战线的制度设计, 强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根基, 及时将新时代统一战线实践的优秀经验总结提炼成为制度规范, 促进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以及党内规范性文件的衔接协调。同时, 优化统一战线的制度设计, 增强统一战线制度建设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 形成更加科学、精密、完整的民主程序。例如, 完善信息通报、公开、分析、反馈制度, 建立健全统一战线的民主监督制度, 推动形成民主合规性与稳定性内在统一的统一战线制度体系。

（四）坚持现实性与前瞻性的统一

统一战线既要立足当前实际, 聚焦现实问题, 又要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谋划长远发展。一方面, 要不断增强统一战线的制度动能, 在生态环境保护、美丽乡村建设、推进共同富裕、老龄化社会治理等国家重大战略安排与部署方面, 通过统一战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预防化解各类风险矛盾、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通过民主的形式和方式来凝聚社会共识。另一方面, 要积极回应信息时代社会的新变化, 探索技术赋能民主的机制, 实现传统场域与新型场域相结合的全域统战^[36]。进入新时代, 组织结构、组织方式、主体力量、行为模式、价值观念都呈现出新的变化, 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也在重塑群众的行为模式和交往状态。统一战线要适应新的社会变化, 发展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要重视对新媒体工作者和网络意见人士等新生网络群体的统战工作, 了解其利益诉求, 帮助其塑造正确的政治观点, 培育对主流价值观的政治认同, 加强网络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在数字时代, 要做好网络统战工作, 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

广泛凝聚网络正能量。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2024-07-22（1）.
- [2] 樊士博，徐敏. 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团结与民主的辩证实践[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1）：78-85.
- [3] 张艳娥. 共生、同构、互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与发展的统一战线机理[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4）：38-50.
- [4] 马雪松，陈虎. 人民政协凝聚全过程共识的民主意蕴、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J]. 理论探讨，2022（6）：30-36.
- [5] 黄天柱. 民主党派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作用与提升空间——以中国政策过程为视角[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1）：44-56.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98.
- [7]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6.
- [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7.
- [9] 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57.
- [10] 林尚立. 协商民主对中国国家建设的价值[J]. 红旗文稿，2015（9）：4-9.
- [1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57.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28.
- [13] 乔万尼·萨托利. 民主新论[M]. 冯克利，阎克文，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06.
- [14] 贾双跃. 迈向“新集体行动的逻辑”：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基层公共事务治理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J]. 政治学研究，2022（6）：86-98+159.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61.
- [16]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 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6.
- [1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一九五〇年三月—一九五〇年八月）[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325-327.
- [18] 民盟中央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举行 丁仲礼讲话 陈晓光主持[N]. 人民政协报，2021-06-04（1）.
- [19] 为了陇原大地的美好明天——台盟中央对口甘肃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综述[N]. 人民政协报，2021-08-06（8）.
- [20] 为湖南脱贫攻坚注入民主监督之力——民进中央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总结会综述[N]. 人民政协报，2021-11-10（12）.
- [21] 姜洁. 为保护中华民族母亲河贡献智慧和力量——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

陈家刚, 赵佳豪.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的统一战线: 治理功能、制度结构与实践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15-27.

监督工作综述 [N]. 人民日报, 2022-04-01 (6).

- [22] 习近平, 等. 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研究: 展山海宏图创世纪辉煌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 433-436.
- [23]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42.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558.
- [25]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1.
- [26] 毛泽东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29.
-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9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316-317.
- [28]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86.
- [29] 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仲勋论统一战线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55.
- [30]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2年11月8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6.
- [31]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5.
- [32]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63.
- [33] 李瑞环. 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二〇〇一年三月十二日) [N]. 人民日报, 2001-03-13 (2).
- [34] 陈家刚, 赵佳豪. 坚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2): 1-13.
- [35] 邓小平文选: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55.
- [36] 林华山, 龚静阳, 刘涓菡. 多维团结: 面向强国目标的统一战线历史方位与发展形态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4): 12-25.

责任编辑: 王京菁



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 历史演进、鲜明特征与实践价值

钟德涛 付瑀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制度性建设即制度体系、实践操作与运行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是制度建设的关键环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完善，本身是制度性建设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局部到全面的演进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逐渐步入确定性、稳定性、现代性的发展轨道，即制度性建设阶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经历了关联演进历程：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 1987 年党的十三大的召开为基础奠定阶段，1987 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后至 1997 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前为开局起步阶段，1997 年党的十五大的召开至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为不断拓展阶段，2012 年党的十八大的召开至今为日臻完善定型阶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体现出建设体系由点到面、建设内容由表及里、建设内核由浅入深、建设理念由粗向细的鲜明发展特征。在长期实践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实现了快速发展与长期稳定的有机结合、政党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以及权威、民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创生出诸多发展成果，彰显出重要实践价值。展望未来，应在制度主体、体

DOI: 10.13946/j.cnki.jcqi.2024.05.003

作者简介：钟德涛，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党的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付瑀，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新阶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研究”（21ZDA125）；华中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教育创新资助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研究”（2024CXZZ110）

引用格式：钟德涛，付瑀. 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历史演进、鲜明特征与实践价值[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5）：28-42.

钟德涛,付瑀.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历史演进、鲜明特征与实践价值[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5):28-42.

制机制与制度文化三个层面进一步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使之有效激发制度效能、积聚制度资源、凝聚制度力量,最终实现全面发展,更好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动力和保障。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制度性建设; 多党合作; 政治协商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2024)05-0028-15

一、问题的提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有力制度保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具有利益代表广泛、奋斗目标一致、决策施策科学、国家治理有效的显著优势^[1],有利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1] 35},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制度保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实现制度“有力”,进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要求“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2],提出“发挥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优势”^{[2] 39}的任务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站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贯彻“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3]等原则,同时在政党制度建设层面强调了“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3] 29}的时代要求,为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锚定了前进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高度重视,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为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是制度建设的关键环节。从结构层面来说,制度建设旨在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与创新,使制度适应客观环境变化,最终实现稳定与快速发展。制度建设有赖于制度化。制度化是将制度的组织方式通过合法步骤明确固定,使政治行为主体广泛接受并形成稳定预期的过程。制度化为制度提供了体制框架,是确保制度权威的基础硬性条件。不过,制度化无法全然涉及制度运转中的具体操作与程序公正等问题。一方面,人是制度的执行者及执行效果的责任主体,必须制定符合制度发展要求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与指导行为主体的具体实践与操作;另一方面,“从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要求来说,作出决策的‘程序规范’是其基础性要求”^[5],为确保决策过程的公平正义,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程序机制。可见,制度建设不仅要注重制度化,也要通过规范化与程序化进行规章与机制供给。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构成了推动制度建设的关联系统,有利于增强制度结构的权威性、提升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以及保障制度运行的稳定性,这标志着一项制度形成确定性发展状态。本文将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统称为“制度性建设”,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是制度性建设的内涵和外在体现^[6]。

党的二十大报告有三处提及制度性建设,并全部涵盖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论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2] 9};“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2] 25};“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

构作用，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2] 38}。其中，第一处高度概括了制度性建设在过去十年取得的成就；第二处为进一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指明了方向；第三处为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建设提出了相关要求。由是观之，中国共产党高度注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性建设，并将之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亦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尚未完全步入制度化轨道。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建章立制与机制创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逐渐步入确定性、稳定性与现代性的发展轨道，朝着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的方向不断迈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孕育于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形成于协商筹建新中国的伟大实践，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完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本身是制度性建设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局部到全面的演进过程。根据笔者上文界定，从严格意义上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始于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是中国政党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与之相应，学界形成了一些成果，研究内容包括内涵要义^[7]、实践成就^[8]、发展要素^[9]、完善路径^[10]等。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奠定了学术基础。不过，自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这一重大论断至今，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整体性上仍有待深入。比如，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宏观演进的研究较多，而细致探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演进历程及其特征的研究较少；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实践成果的归纳性研究较多，而探讨其在国家发展中产生何种实践价值的研究较少；对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水平的动态研究较多，而动静结合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力图从历史演进、主要特征、实践价值这三个方面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并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提出研究展望，以期形成整体认识。

二、历史演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逐步走向成熟定型

从历时性角度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有利于厘清发展过程，洞悉主要特征，把握事物前进趋势。关于该问题，有学者以中共中央颁布实施的相关重要文件为依据对应划分了若干阶段。比如，于小英以 1989 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简称 1989 年《意见》）、2005 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简称 2005 年《意见》）、2006 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和 2012 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这四个文件对应划分了四个阶段^[11]。有学者采用中共中央全会以及相关重要文件相结合的方式对应划分了若干阶段。比如，可玥以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89 年《意见》和 2005 年《意见》为节点划分出“发起—开展—深化”三个阶段^[12]。这些观点虽有差异，但存在一个共识，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始于改革开放之后。本文亦赞同这一观点。2021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也指出：“1989 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走上了制度化轨道。”^{[1] 12-13}同时，本文认为相关中

钟德涛,付瑀.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历史演进、鲜明特征与实践价值[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5):28-42.

共中央文件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制度性建设中形成的重要文本成果,而中共中央重要会议作出的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则代表着党和国家今后的主要发展方向,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理应成为划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历史阶段的重要参考。基于此,本文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一）基础奠定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7年党的十三大的召开

制度性建设标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完全步入确定性、稳定性、现代性的发展轨道,是制度建设层面“质的跃升”。质变由量变引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的开启必然要进行“量的积累”,奠定建设基础。基于此,本文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三大的召开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的奠基阶段。这期间,中共中央立足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发展需要,明确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相关要求,为制度性建设的顺利开启奠定了政治、法律与理论基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即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的“左”倾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组织与政治路线。与此同时,全会公报首次提出制度性建设的相关要求:“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13]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分别召开了全国政协会议与统战工作会议,形成的相关文件、具体政策及政治实践打开了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奠定了坚实政治基础。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会议重申了制度性建设要求,即“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4]。党的十二大报告还明确将“长期共存、相互监督”与“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联结在一起。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十六字”方针正式确立,并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同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首次被写入宪法,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概念,明确了完善这一制度的原则、方向与目标,并将这一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列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之中。可见,党的十三大报告已将多党合作制度的若干发展问题上升到制度化层面,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的正式起步奠定了扎实理论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各民主党派与工商联分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今后工作重点并在实践中主动作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开局起步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后至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前

党的十三大报告作出的关于多党合作制度的新论述,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沿着更高层次的制度性建设方向得到了推进,在一定意义上也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探索性建设”时期的结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是对应“探索性建设”而言的,但是,在奠定其制度性建设基础过程中,探索性建设时期仍未结束,直到党的十三大的召开^[6]。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水到渠成般地进入了崭新的“制度性建设”时期^[15],这也标志着制度性建设正式进入起步阶段。

这一阶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最重要的成果是1989年12月颁布实施的《中共中

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89 年《意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行了规范化阐述：一是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二是首次提出“参政党”概念，并对其属性与定位进行了科学界定；三是首次提出民主党派的“参政”和“监督”职能，并明确了参政的基本点和监督的总原则；四是对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机关之中合作共事的各项安排进行了系统规定；五是对相关合作与协商形式加以制度化与规范化。1989 年《意见》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完全走上制度化轨道，从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上升到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建设高度，具有里程碑意义。

1989 年《意见》颁布实施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稳步推进。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写入党章，确保了这一制度在贯彻与执行中的连续性。1993 年 3 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16]，这使多党合作制度拥有了明确宪法依据。1995 年 1 月，全国政协八届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制定了专门委员会通则等工作制度，使政协工作实现制度化与规范化发展。中共中央对这一文件十分重视并发出《通知》，明确规定相关问题要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要求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实施。这实际上是把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职能纳入了国家和地方决策程序，推动了政治协商的程序化发展^{[15] 234}。总体观之，这一阶段多党合作事业万象更新、稳步推进。

（三）不断拓展阶段：1997 年党的十五大的召开至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

1997 年 9 月，党的十五大召开。这次会议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具有重要影响。会议的最大贡献，就是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继续前进的旗帜和道路。会议第一次鲜明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在政党制度建设方面，会议不仅把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列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还将之列为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任务，并首次强调要“继续推进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范化、制度化”^[17]。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来说，邓小平理论指明了发展方向，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确立了发展方针，为其他规范化要求明确了发展着力点，系统回答了为何推进、如何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以党的十五大的召开为标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扎实推进，步入不断拓展阶段。

2002 年 11 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18]，并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提出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的一系列要求。整体上来说，党的十五大为进一步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下一步要发展什么、拓展什么；党的十六大则拓宽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程序化维度，维度的拓展自然以明确“向什么方向拓展”“要拓展什么”为基础。

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积极探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的有效方法。1999 年，各民主党派中央联合制定印发《关于加强自身建设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纪要》明确了组织发展的原则方针，提出加强自身建设的主要任务等目标。中共中央于 2004 年颁布实施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钟德涛,付瑀.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历史演进、鲜明特征与实践价值[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5):28-42.

制度列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各主体的共同努力下,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理论不断丰富,制度效能显著提高。

为进一步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水平,中共中央于2005年2月颁布实施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5年《意见》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其突出作用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拓展了各民主党派性质的表述,发展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并对参政党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明确规范了无党派人士的性质;三是明确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并对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与程序作出更为科学的总结与规范;四是对如何发挥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与民主监督的作用提出了相关原则与要求;五是系统总结了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与实践成果,概括了一系列重要准则。这一文件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一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的重要标志,富有指导意义。2005年《意见》颁布后,中共中央立足顶层设计与具体实践,继续颁布实施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等文件。中央统战部也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民主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加速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进程。

(四) 日臻完善定型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的召开至今

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同时,会议还将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作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明确,并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19] 21}等制度建设目标。这些部署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成为步入日臻完善定型阶段的节点。整体上说,这一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作出了一系列新论述、新规定、新部署和新举措,通过颁布实施一系列中央文件与党内法规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理论创新以及具体化以往的原则性规定,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不断向前迈进。

理论层面实现新发展。第一,聚焦我国政党制度概念与内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论断,并将之内涵、特色与优势高度概括为“三个新”和“三个有效避免”,此后通过修订政协章程、实施相关文件与法规,以制度形式将这一概念明确与规范。第二,聚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主体建设。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方略,大力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并取得重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认知更为科学,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时代论断,并将“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列为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各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对其提出“四新”与“三好”以及提高“五种”能力建设的要求。同时,中共中央通过颁布实施《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加强参政党建设的目标与原则,在整体上推动参政党建设理论体系不断丰富。第三,聚焦政治协商议题。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与属性,规范阐述了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义、原则、程序等内容,要求“继续加强政党协商”和“进一步完善政协协商”。2022年发布施行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将政党协商与人民政协政治协商作为政治协商的基本方式予以明确规范。第四,聚焦民主监督议题。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将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形式规定为会议监督、视察监督、提案监督、专项监督和其他监督五种形式。

制度层面实现新发展。第一，聚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宏观体系构建。中共中央通过颁布实施相关文件与党内法规，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涉及国家发展的关键领域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搭建起顶层设计框架；另一方面对政党建设、政协工作、政治教育等关于政党制度建设的各方面议题进行制度化规范，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搭建起牢固体制框架。第二，聚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构建。中共中央建立了重点考察调研工作机制，创新实施了民主党派直通车机制和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机制等。全国政协创新实施了双周协商座谈会机制，完善了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机制和委员会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等。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创新实施了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工作机制等，共同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构建了系统的运行机制。第三，聚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参与渠道创新。中共中央与全国政协创新建立了如调研建议直通车、双周协商座谈会、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等多样化、有效化与科学化的参与渠道。地方也纷纷进行参与渠道创新，比如湖北省政协搭建“协商在一线”平台，重庆市政协打造“渝事好商量”协商平台等，并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逐渐成熟定型，参与渠道日益多样丰富。

2024 年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会议站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部署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要求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这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将不断向纵深迈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强大的动力和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主要特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具有鲜明时代特色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基础，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政治保证，以党际合作为实践方式，以团结、民主、和谐为精神内核，科学回答与有效解决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若干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不断健全完善，在历史演进中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制度性建设体系由点到面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即政党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只有实现三者协同并进，才能构成制度性建设的系统集成。党的十三大召开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党外人士协商制定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对民主党派职能、政协职能、政治协商形式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制度化安排与规范化要求。但是，这一阶段无论是规章内容抑或实践操作，皆以制度化与规范化建设为主线，对程序化建设的重视程度略显不足。随着民主发展进程的加快，加强程序化建设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20]。基于此，中共中央不断探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程序化建设内容：一是党的十六大与党的十七大在纲领与原则层面明确提出了社会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程序化要求；二是 2005 年《意见》从顶层设计层面明确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并对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如

钟德涛,付瑀.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历史演进、鲜明特征与实践价值[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5):28-42.

何发挥参政议政与民主监督职能进行程序化设计,使“三化”实现协调发展。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实体层面的制度建设绩效,也十分关注制度运行过程是否民主与科学,逐步构建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的完整体系。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高度指明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方向。基于此,由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规章总体涵盖了政党关系、政党建设、协商民主、政协工作、统一战线等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各方面,并对各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逐步构建起相互联通、默契配合、互为补充的机制集群,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呈现出系统性与全面性的发展特征。

（二）制度性建设内容由表及里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涉及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这两个主要方面。就多党合作而言,建设内容包括对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性质与职能的规范化界定。一方面,各民主党派的性质经历了“参政党”概念的提出到“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三次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依据社会形势变化,进一步认识各民主党派内在特质的科学总结,将民主党派的使命责任、社会基础、职能作用等内容汇聚为一体,赋予民主党派丰富时代内涵。无党派人士的性质首次在2005年《意见》中得到规范化阐述,即“指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21]。此后,2015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对无党派人士的性质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有参政议政愿望和能力”的表述,着重突出其政治性、代表性与党派性。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经历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向“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22]这三项基本职能的发展,无党派人士参照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就此拓宽了二者作用发挥的实践场域。就政治协商而言,政治协商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起步阶段经历了协商内容与协商形式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发展。此后,中共中央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规章,先是在原有基础上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之后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政治协商与人民政协工作进行全方位规范,并通过微观机制建构以及具体程序设计推动政治协商向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方向全面发展,呈现出由表及里与循序渐进的发展特征。

（三）制度性建设内核由浅入深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以政治现代化为内核。一方面,民主是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3];另一方面,现代意义上的法制是民主的体现与保证,“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23] 146}。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民主与法制是贯穿制度性建设的永恒议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作为一种创新性实践,在开局起步与不断拓展阶段,无论是各项规章的形成过程,还是各重要文件的核心要义,抑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载入宪法,都彰显着民主与法制理念。此后,中共中央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即法治发展目标。法治是法律正当嵌入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体现,也是法制的深层次表达。至此,以法制化为基础的法治化,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中的一条重要脉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民主建设层面,中共中央首先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上升为国家具体制度,之后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概括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并明确制度性建设目标,为有效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拓展了空间。在法治建设层面,中共中央高度注重依规治党,将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与根本之策,先后通过三次修订党章,施行若干准则、

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践目标，以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的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为实践蓝图，以法规化为实践形式，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及相关主体提出了严格的法治要求，实现了民主与法治更为深远的发展（见表 1）。

表 1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历程

维度	基础奠定阶段	开局起步阶段	不断拓展阶段	日臻完善阶段
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
法制 ^①	法律化	法律化	法治化	法治化
				法规化

（四）制度性建设理念由粗向细

理念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基于较为宏观的建设理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在初期阶段解决了诸多基础性议题，包括秩序供给、政党性质、政党关系等，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锚定了基础框架，建构了运行机制与执行机制。不过，这一阶段其制度性建设存在大而不精、广而不准的不足，比如对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程序都未有明确规定。步入下一阶段，建设理念仍较为宏观。不过，中共中央通过建章立制的方式精细化处理了诸多问题，比如对重大问题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已形成制度、明确规范无党派人士性质、进一步拓宽民主监督渠道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的复合特质对治理工作提出了更为精细的要求。对此，中共中央将原先较为粗放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进行精细化设计，一改之前较为宏观的建设理念，转变为宏观、中观与微观并举推进的综合思路。宏观层面表现为中共中央从全面从严治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擘画了发展蓝图。中观层面一方面表现为中共中央对协商民主、统一战线、政治教育等具体工作进行理论建构，另一方面表现为健全了诸如合作共事、参政议政、沟通反馈等运行机制，有效保障了制度的合理运行与有效执行。微观层面主要表现在政党协商渠道的规范化建设，比如对调研建议直通车机制的内容、程序、保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规范，同时要求“加强各协商渠道协同配合”^{〔3〕28}。此外，中共中央兼顾地方政党制度实践，进一步规范地方党委、统战部门、政协党组在政治协商之中的工作要求，以全面系统的方式使之愈发有效与完善。

四、实践价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为国家发展凝聚奋进伟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在长期实践中取得丰硕成果，成就斐然。具体来说，其实现了快速发展与长期稳定的有机结合、政党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以及权威、民主与法治的有机结

① “法制”一栏中的“化”是指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不同阶段对法制发展状态的全面性与确定性概括。比如在“不断拓展阶段”，中共中央也颁布实施过相关党内法规，但对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尚未进行系统规范，因此这一时期未能实现全面的法规化。

钟德涛,付瑀.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历史演进、鲜明特征与实践价值[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5):28-42.

合,从而激发了巨大发展潜能、积聚了深厚发展资源、凝聚了强大发展力量,有效提升了“制度硬实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凝聚了奋进伟力。

(一) 实现了快速发展与长期稳定的有机结合

中国式现代化是后发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决定了各领域的发展是相互叠加的,也决定了这一过程会喷涌出大量利益诉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行制度性建设,有效提高了政治体系的参与吸纳力,有利于妥善处理现代化进程中快速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

吸纳政治参与的力量与制度获得支持的广度息息相关^[24]。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性建设使支持广度得到了质的提升。首先,稳固的结构是提升支持广度的基本前提。制度性建设以制定、实施政策规章与约束、强化政治行为的方式加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整体框架,即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一体多元”结构。这种结构可以使不同主体将利益诉求有效输入到政治系统之中,进而转化为推进国家高效发展的惠民政策,为容纳大量社会活动提供了有效保证。其次,吸纳不断涌现的新社会阶层是制度获得支持的重要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性建设将新社会阶层纳入统一战线范畴,有效扩充了社会基础。比如,2015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明确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列为统战工作对象,并在此后对相关工作进行系统规范。如此不仅扩充了制度体系容纳社会活动的范围,也有效激发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再次,政治制度获得支持的现实手段是参与渠道的拓展与创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制度性建设进程中,通过对宏观、中观、微观制度机制与中央、地方层面参与渠道的创新与拓展,为各阶层、各群体有序参与政治提供了可靠路径,为保持政治稳定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秩序保障。

政治制度的吸纳力量和参与的有序性呈正相关^[25]。保障参与的有序性,对于协调好发展速度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制度信任作为一种认知与情感,意味着主体成员明确这一制度的基本思想,“如果这种思想对人们完全合理,它就会激发人们对制度的支持和对规则的顺从”^[26]。制度信任可以通过信任产生的规约性保障参与的有序性,增强制度吸纳力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过程,也是培育、增进和深化各主体信任这一制度的过程。通过合作、参与、协商精神的深度嵌入以及团结、民主、和谐属性的充分彰显,为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参与党和国家的决策过程提供了专门性渠道以及支持保障机制,在此过程中各主体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认知水平大幅提升、情感不断加深,并有效转化为促进制度发展的实际行动。比如从2018年至2021年6月,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围绕重点协商议题开展联合调研22次,共同举办协商活动24场^{[1] 34};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按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要求积极履职尽责,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迅速推进提供了有力智识支持。这表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各主体根据制度安排,通过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展联合行动,彰显出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充分信任,在实践中有效提高了政治参与的效度、广度与深度,实现了快速发展与长期稳定的有机结合。

(二) 实现了政党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

属性问题是政党政治的“元问题”。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与“纽带”,具有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政党政治性与政党社会性是有机结合的,政治性在于执掌国家政权与整合社会力量,社会性在于反映社会与服务社会,这种“一体两面”的属性特征缺一不可^[27]。然而在政治生活中,

实现两种属性的有机结合是较为困难的。比如 2016 年的美国大选中，共和党与民主党为获取选举胜利抛开整合功能，通过刺激族群对立不计后果地拉选票，最终导致否决政治猖獗、社会撕裂严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制度性建设中，通过完善政治协商制度以及衔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实现了政党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

政治协商是多党合作的核心机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完善政治协商机制，实现了政党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一方面，通过明确规定政治协商的对象与内容、流程与形式、成果运用与反馈保障机制等，推动政治协商的体系日益完善、机制日益健全、方式日益丰富，在实践中有效整合了社会各界力量与各类资源，形成了同频共振的合力机制，以智慧凝聚、力量凝聚、资源凝聚的方式为国家发展集智增效。另一方面，在政治协商中，中国共产党认真听取各方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使“每个参与者完全可以陈述其利益，提出理论并加以论证，不断修正参与者最初的偏好，以趋向于政治共识的达成”^[28]，而后将吸纳的广泛民意与理性意见嵌入到决策形成、执行与反馈的全过程。如此既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又提升了社会参与的广泛性，确保政策制定符合社会需求并服务于社会。以政党协商为例，据统计，党的十八大至 2022 年 7 月底，政党协商会议共计召开 185 次，中共中央就重大问题同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党外人士坦诚交流，诸多反映民意的意见和建议有效转化为党和国家决策^[29]，充分彰显出政党与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

治理是发挥政党政治性与社会性的主要实践场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系统衔接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实现了政党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2019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也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具体任务，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系统衔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30]因此从根本上讲，在治理过程中，党的领导及相关领导体制是政党政治性的鲜明体现，方式是党的组织和工作全面覆盖治理实践。和西方国家政党“脱嵌”社会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供给的相关机制，使中国共产党不仅全面嵌入国家，更能够深度嵌入社会，方式是党组织逐步向基层延伸，通过扎根基层引领社会治理。这一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逐步推动治理思维转换，通过和各参与主体协同共治，有效解决了传统治理因科层制导致的横纵沟通性障碍，以高治理绩效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与深切认同，充分彰显了社会属性。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三项基本职能，以勤监督、广协商、深调研等方式在国家治理中主动作为。三项基本职能也是民主党派的政治职能，是其在政治层面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有效彰显了政治属性。与此同时，各民主党派在社会治理中也踊跃发挥社会服务职能，实现了政党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

（三）实现了权威、民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2]³⁷党的领导即权威，人民当家作主即民主，依法治国即法治，三者有机结合、层层递进，构成了我国政治发展的主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制度性建设中实现了权威、民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制度性建设中，通过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水平实现了权威、民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通过制定、修订《中国共产党章程》，为执政党的建设与政党权威的

钟德涛,付瑀.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历史演进、鲜明特征与实践价值[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5):28-42.

强化指明了方向。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以党章为根本遵循,颁布实施了一系列中央文件与党内法规,内容涵盖党的建设各方面,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显著提升,执政能力与领导能力不断增强。同时,党内民主作为人民当家作主宏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民民主具有示范与带动作用。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中,作为核心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一方面,通过坚持与健全民主集中制,增进了政治的可靠性与信任度,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意向”与“行动意志”,以集体领导与决策民主的方式维护与加强了中央权威^[28]¹²¹。另一方面,通过印发实施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的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法规化的形式明确与规范了党内民主的法治化发展方向,推动其民主发展与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内政治文化积极健康,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实现了权威、民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制度性建设中,通过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契合互动,实现了权威、民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正如有研究指出:“以党的坚强领导为轴心构建民主,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一方面适应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则保持了推进现代化所需要的基本秩序。”^[31]从生成逻辑角度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践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人民民主的产物。制度性建设所供给的体制机制实现了党的领导体系与各项民主制度的交汇贯通,既能实践党的领导,也能践行人民民主,“既能整合社会各方力量,也能创造各政党、各阶层、各团体平等协商的政治局面”^[32]。从结构功能角度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嵌于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系,“通过一核多元的结构安排、完备的民主机制保障和民主功能发挥将鲜明的民主优势落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效能”^[33]。这一制度的结构功能安排与民主保障机制是通过对体制框架的锚定、对实践操作的规范、对运作程序的完善,即制度性建设达成的,这就使得公共资源能以最正义和最有效的方式进行权威性分配,从而增进民主绩效。同时,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中,中共中央通过颁布实施一系列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相关的文件与法规,使相关机制与工作内容更为具体化与规范化,实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化互动,为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复合结构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系统衔接了权威、民主与法治这三大发展要素。

五、结论与展望

制度性建设是制度建设的关键环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各主体共向发力、主动作为,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行了制度性建设,历经奠定基础、开局起步、不断拓展与日臻完善定型四个阶段,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等制度性要素逐步走向成熟定型,实现了快速发展与长期稳定的有机结合、政党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以及权威、民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创生出诸多发展成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强大动力。在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实践、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日益突显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赓续发展的紧要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34]为此,新时代新征程可以围绕主体、机制与文化

这三个方面，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强大的动力与更为坚实的保障。

第一，强化主体建设。政党是政党制度的主体，加强政党建设并提高政党治理现代化水平是政党制度完善的首要环节。首先，不断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是领导其他主体积极参与政治的根本。要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线，持续、全面、有效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在党内与国家政治体系之中强化“权威—民主—法治”三位一体的结构。其次，加强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履职能力建设是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的关键环节。要以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为方向，着力发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政党整体与队伍整体优势，广泛组织成员参与到调查研究、献策建言、民主监督、社会服务等实践之中。再次，更好发挥无党派人士的作用。“要加强对无党派人士的思想引导和政治引领，支持无党派人士将个体优势和群体智慧结合起来，更好发挥作用。”^[4]当前，参政党建设已形成专门性文件进行规定与保障，但对于无党派人士队伍建设及其履职能力建设的机制仍需深化。比如，全面规范无党派人士的履职内容、形式与流程，完善无党派人士参与渠道。最后，加强廉洁自律能力建设。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同廉“是实现多党合作的共同目标、任务和使命之所需”^[35]。要系统构建同廉的运行机制，打造专业队伍，搭建平台阵地，使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反腐同廉，夯实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根基。

第二，优化体制机制。优化体制机制是推进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的关键层面，是激发制度效能的重要环节。一方面，要优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首先，应构建各项运行机制的共进系统，比如可以有效衔接民主监督、政党协商与人民政协政治协商，实现“机制合作”，进而提升监督与协商效能。其次，以各项规章制度为范本，进一步深化中观与微观的采纳、落实与反馈机制，使之与宏观设计相耦合。另一方面，要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保障机制。首先，各制度主体要通过调查研究及时发现体制机制存在的不足，制定、修订和实施符合党和国家发展要求的政策规章，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其次，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智慧化。现有实践中搭建“智慧党建”“智慧监督”等线上平台，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提供了发展范例。未来应加速构建更为成熟的智慧运行机制，努力消除制度“上中下”结构的数字鸿沟，实现“智慧之治”与“协商之治”的有机结合。

第三，塑造制度文化。制度性建设虽是指向体制机制的目的合理性议题，但背后必然有文化作为精神力量支撑。为此，应塑造并不断深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文化，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营造良好文化氛围。首先，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要义，推动其实现现代转化。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逻辑起点在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长、发展和完善提供了丰厚的历史和文化基础^[36]。与此同时，对待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做到为我所用。其次，要综合打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文化的研究、宣传、交流、实践阵地，并通过各阵地的有机联动凝练有利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的制度文化，一体构建系统完整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37]，提升制度话语权。再次，要加强制度文化教育，比如文化认同教育、制度伦理教育、制度审美教育等，打造系统培训机制，不断创新制度文化教育形式，增进各界对中国

钟德涛,付瑀.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历史演进、鲜明特征与实践价值[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5):28-42.

新型政党制度的了解与认同。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2021年6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8-20.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8.
- [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6.
- [4] 石泰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 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J].求是,2024(17):19-24.
- [5] 桑玉成.如何用民主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关于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一般程序的思考[J].理论月刊,2023(11):5-10.
- [6] 钟德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立发展[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7-17.
- [7] 李金河,郑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关注的20个理论问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33-42.
- [8] 刘维芳.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考察[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3):19-28.
- [9] 孙运军.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化建设中的几个关键要素分析[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5):39-43.
- [10] 钟德涛,付瑀.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J].思想理论战线,2024(1):1-8.
- [11] 于小英.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化规范化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6):48-52.
- [12] 可玥.中国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探索[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6):165-173.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9.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9.
- [15] 钟德涛.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29.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81.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7.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4-25.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
- [20] 赵振宇.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程序化建设[J].社会治理,2017(2):89-95.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75.
- [2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35.
- [2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8.
- [24]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0.
- [25] 雷振文,张小萍.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阐释[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6):15-24.
- [26] 马克·沃伦.民主与信任[M].吴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6.

- [27] 郭静. 政党的政治性分析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38.
- [28] 李建华. 政党伦理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 130.
- [29] 杨昊.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彰显独特优势 [N]. 人民日报, 2022-08-17 (2).
- [3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72.
- [31] 刘远亮. 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机理探赜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4): 52-62.
- [32] 林尚立, 赵宇峰. 中国协商民主的逻辑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52.
- [33] 韩慧, 臧秀玲.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契合互动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2 (4): 27-34.
- [34]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 [N]. 人民日报, 2024-07-22 (1).
- [35] 张献生. 同廉: 新时代坚持发展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命题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6): 29-37.
- [36] 林尚立.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C] // 陈明明. 百年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3: 8-11.
- [37] 林华山. 一体构建系统完整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J]. 团结, 2024 (2): 51-56.

责任编辑: 林华山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 驱动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

陈欣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统一战线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机制，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与共同富裕有着内在联系。其中，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蕴含着统一战线特质，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为实现共同富裕营造了稳定的政治秩序，统一战线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并为共同富裕凝聚了共识。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统一战线以凝聚共识、优化秩序、汇聚人才等作用机理，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助力推进共同富裕。统一战线驱动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挥大统战工作格局的优势作用。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政治秩序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5-0043-09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5.004

作者简介：陈欣，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治边稳藏视野下西藏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路径研究”（20CKS015）

引用格式：陈欣. 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驱动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5）：43-51.

一、问题的提出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1]。党和国家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总体要求，对共同富裕的实现提出了更为具体的阶段性任务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方位，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体现党的初心和使命，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作出部署，明确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3]。

在此背景下，党的统一战线需要解决好人心和力量的问题，不断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在国内促进各种政治社会力量的凝聚，在国际上“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4]，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以驱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党的统一战线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机制，不仅能深入挖掘统一战线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组织优势，汇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还能为共同富裕的实现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就是将各种政治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更有效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其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全体人民既是共同富裕的推动者，也是共同富裕的享受者。

近年来，我国学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驱动共同富裕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主要涉及如下方面。一是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看，有学者认为技术赋能可着力提升统一战线团结力，为新质生产力的优化升级提供全面助力，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5]；也有学者认为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主体，其共同体质量的提升能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质增效^[6]；还有学者明确指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7]。二是从统战成员看，有学者认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一支重要力量，亟需统战部门激发其主体性^[8]；有学者提出共同富裕是新时代高质量做好民族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要通过凝聚各族人民的智慧、汇聚各族人民的合力推进共同富裕^[9]。三是从统一战线的作用看，有学者阐释了以统一战线实践创新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10]；有学者根据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明确其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定位^[11]；还有学者认为统一战线为实现共同富裕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12]，并阐明统一战线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机制，对团结实践、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能动作用^[13]。以往相关研究更多使用“统一战线服务共同富裕”的分析范式，较少深入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机理层次进行本质层面的分析，理论分析深度有待深化。以既有研究成果为基础，本文将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驱动共同富裕的机理及实践路径。

二、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与共同富裕的内在关系

统一战线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机制，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与共同富

裕有着内在联系。其中,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蕴含着统一战线特质, 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为实现共同富裕营造了稳定的政治秩序, 统一战线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并为共同富裕凝聚了共识。

（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蕴含统一战线特质

“统一战线就是为了推进社会革命所建立起来的阶级联盟的行动, 是解决阶级矛盾并推进社会革命的重要战略。”^[14] 新时代,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强大的领导力、动员力、向心力、凝聚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不断得到完善和巩固。百余年来, “中国共产党持续运用统一战线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 塑造团结一体的中国人民”^[15]。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塑造和整合形成团结一体的人民, 团结起来的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致力实现共同富裕等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6]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扎实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从这一意义上看, 统一战线促进共同富裕有了本体基础。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是团结全体人民的统一战线, 也是实现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工作范围与对象有了明显扩展。从国内看,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民族、宗教界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港澳台同胞等多种力量被动员起来, 积极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中。从国外看, 海外侨胞成为向世界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的重要主体。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成果要由全体人民共享, 而全体人民也是统一战线联合与团结的对象, 是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动力源泉。由此, 统一战线通过聚合社会资源、汇聚社会各界人士、凝聚各方智慧力量, 促进生产要素区域间流动、缩小区域差距, 实现区域、城乡、行业之间的均衡发展, 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助力。

（二）统一战线的大团结大联合为共同富裕供给政治秩序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团结为核心价值理念的现代化, 始终坚持为人民谋福祉。为了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统一战线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 广泛凝聚共识, 为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的政治秩序。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实践进程。没有和谐稳定的政治秩序, 共同富裕将难以实现。“巩固自身团结、壮大自身力量是统一战线发挥政治效能的关键。”^[17]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 多元社会思潮给人们的思想政治意识带来巨大冲击, 使其日益呈现多样性、差异性和独立性的特征。这导致部分群体仅从个人利益出发, 狭隘看待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为此, 我们要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作用, 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凝聚思想政治共识。“统一战线的团结和联合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18] 只有不断夯实统一战线的共同政治基础, 才能充分释放统一战线效能, 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2022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做好这项工作, 要把握好“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的关系”“潜绩和显绩的关系”“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团结和斗争的关系”。要保持和谐稳定的政治秩序, 尤其需要处理好团结和斗争的关系。一方面, 争取积极力量、铸牢团结根基是统一战线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 分化敌对势力是统一战线的策略目标, 也是其需要解决的

关键问题。统一战线以团结和斗争两方面举措，不断促进形成和保持和谐稳定的政治秩序。

（三）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为共同富裕凝聚共识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的现代化。“谋求未来社会财富的增长是人类的共识，但在财富的取向与分配方面，则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社会心态和思潮，而能获得广泛共识的莫过于‘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19]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本位实现政治团结的现代化，只有紧紧依靠人民才能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这使得广大人民更加坚持党的领导并衷心拥护党的政策和事业。在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统一战线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达成不同主体在共同富裕目标上的一致性，保障全民积极参与共同富裕建设，共享共同富裕成果。“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20]以共同富裕为价值旨归，有助于形成广泛且深入的社会共识。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每个人的世界历史存在，意味着一切个体的人的主体性的逐步实现，包括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需要的满足。”^[21]在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统一战线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有效凝聚各群体的价值共识、思想共识，促进“五大关系”和谐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

三、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驱动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需要全国上下团结奋斗。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作用。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统一战线以凝聚共识、优化秩序、汇聚人才等作用机理，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

（一）凝聚共识机理：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公约数

统一战线是具有鲜明阶级属性及政治动员力的上层建筑，能够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泛凝聚思想共识。统一战线产生伊始就具有巩固自身团结、壮大自身力量的政治效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有效解决人心和力量问题，推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顺利进行，为驱动共同富裕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1]在这一时期，统一战线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都发生了巨大转变，这就需要统一战线充分发挥凝心聚力的法宝作用，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是统一战线一致性的集中凝练，反映了统一战线的共同目标，是统一战线团结联合的重要条件。”^[12]2023 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以“学思想、强根基、重履职、建新功”为总要求，深入开展“凝心铸魂强根基、团结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这增强了服务团成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陈欣. 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驱动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43-51.

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以汇聚人心、凝聚共识为发展宗旨,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

（二）优化秩序机理：构建和谐“五大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22]人口规模巨大、国外势力的干涉和阻碍等因素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大困难。克服困难,我们需要构建和谐稳定的秩序。统一战线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效引导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实现大团结大联合,构建和谐稳定的秩序。“团结生成秩序,秩序产生效率。”^[15]统一战线要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驱动共同富裕不断优化秩序。

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共同富裕实现了从“低层次到高层次”和“局部到整体”的飞跃,这也是统一战线功能的展现。从政党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截至2023年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政党协商会议201次,围绕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深入考察调研、积极建言献策。2016年以来,各民主党派共3.6万余人次参与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向对口省区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意见建议2400余条,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各类报告80余份,各民主党派为中国减贫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23]。

从民族关系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鲜明主线。“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各族群众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宗教关系来看,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发展方向,贯彻落实《宗教事务条例》,按照“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有效化解了宗教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按照“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要求,加大了对宗教人才的培养力度,促进宗教关系日益健康和谐。

从阶层关系来看,统一战线不断激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积极性,激励他们主动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例如2022年“新阶层·心向党”公益捐步活动,启动仪式当天各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已组建576支小队、31898人参加公益捐步。除此之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还为实体经济发展谋实策,在开展社会服务上见实效,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关系团结稳定。从海内外同胞关系来看,统一战线为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创造了越来越多融入国家发展的机会。比如“前海方案”“横琴方案”,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24]。海外侨胞也为祖国繁荣作出巨大贡献。广大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为国内社会公益事业捐赠累计已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涉及教育、医疗、扶贫、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都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25]。统一战线“五大关系”和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驱动共同富裕营造出和谐稳定的环境。

（三）汇聚人才机理：夯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人才作为实现民族复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4]，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26]。根据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数据，中国人才竞争力总体排名第八^[27]。这体现出我国人才资源在国际竞争中具有重要潜力，也激励统一战线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汇聚更广泛的人才。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统一战线着力抓好队伍建设，发挥智力密集、人才荟萃的优势，为驱动共同富裕提供人才支撑。

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充分发挥广泛凝聚各类人才的优势，紧紧围绕人才的思想引领、教育培养、作用发挥等重点环节，践行“四个着力”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据统计，近年来我国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达到 33.5%，比 2010 年上升 6.9 个百分点^[28]，日益彰显出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促进作用。在人才队伍储备方面，统一战线坚持建设各类人才资源库，依托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工商联、宗教界、侨联等团体，引导“两新”组织及新兴领域的工作人员进入人才资源库。在人才队伍教育培养方面，统一战线坚持把思想政治引领作为核心环节，以丰富的活动形式开展教育培养，切实推动广大统战成员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在人才队伍服务平台建设方面，统一战线持续完善人才服务制度体系，为各类人才效能的发挥提供制度保障，帮助解决人才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系列问题，使人才队伍无后顾之忧投入国家建设当中。在人才队伍作用发挥方面，我国不断提升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协调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领域优秀人才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贡献自身的力量。由此，统一战线通过发挥汇聚人才、凝聚智慧的优势，组织和引领广大成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助力。

四、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驱动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决定》要求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一系列配套性改革举措，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为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更加坚实有力的制度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助力推进共同富裕。统一战线驱动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挥大统战工作格局的优势作用。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要确保党对统战工作全面领导。”^[29] 领导权问题作为统一战线最根本的问题，决定着统一战线发展的方向与命运。统一战线本身包含着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宗教信仰等各界人士，要想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作用，就必须拥有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形成全党上下一齐动手、有关方面协同联动的工作局面。”^[20]¹⁶ 只有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全面领导，才能协调好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间的工作，促进“五

大关系”和谐发展。一方面，坚持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30]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实践表明，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顺党心、合民意，是我们党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坚持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具体来看，一是发挥党的政治引领功能，确保统一战线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二是发挥党的思想引领功能，广泛凝聚政治共识，构建稳固的政治联盟；三是发挥党的组织引领功能，有效动员各种政治社会主体，充分释放统一战线工作效能。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全面领导，为统一战线明确性质、指明方向，最终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二）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31]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优势和推动力。当前，我国所有制形式多样、社会阶层多元、多种思潮交织，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既尊重各群体的多样性，更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不断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是要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断提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履职能力，激活他们建言资政的内在动力，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二是要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三是保障我国宗教中国化发展。四是完善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引领机制。五是完善港澳台和侨务工作机制。统一战线助力共同富裕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效果。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托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一带一路”建设、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等治理工作，民族地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2013年至2020年的8年间，主要包括民族八省区在内的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5086万人，减贫人口占全国减贫人口的51.4%，年均减少636万人。特别是作为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最多的广西，实现了5379个贫困村全部出列，54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这些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取得，为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重要前提基础^[32]。

（三）充分发挥大统战工作格局的优势作用

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国要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发挥其优势作用，为实现共同富裕助力。首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方面面，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统战干部要先学一步、学深一步，进而引导统战成员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学习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其次，政策举措要落地落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推动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确保党中央关于统战工作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结合统战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明确统战工作责任清单和任务清单，提升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整体效能。最后，提高统战

工作能力。要不断提升统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充分调动各方积极因素、解决各类矛盾问题，促进实现共同富裕。

五、结语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显著特征^[33]。统一战线以凝聚共识、优化秩序、汇聚人才等机理，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成为驱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党的统一战线具有内在契合性，二者均指向公共政治价值及社会发展目标。当前，我国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仍存在一定风险挑战，如城乡、地区、居民间分配结构不协调，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相统一的思想认识还比较薄弱，数字经济带来新挑战和新冲击等^[34]。走向共同富裕包含深刻的政治逻辑：“实现共同富裕当然要以社会生产力的更大发展为基础，但是物质基础的丰富并不能自动带来共同富裕的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有赖于政治上层建筑的关键作用，这就是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改善利益整合过程，提高政策保障公民福利的效果。”^[35]为此，统一战线要充分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作用，集聚人才资源、智力资源、政治资源等优势，不断调节“五大关系”，防范化解风险挑战，以大团结大联合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 [1]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 中央政治局主持全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 2024-07-19 (1).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人民出版社, 2022: 22.
- [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 2024-07-22 (1).
- [4] 中共中央举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必须继续深入学习运用邓小平理论, 把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蔡奇主持[N]. 人民日报, 2024-08-23 (1).
- [5] 曹楚楚. 新质生产力视野下统一战线团结力的内涵结构、逻辑机理与价值图景[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3): 13-25.
- [6] 徐敏, 汪语桐, 刘靖北.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效能提升与图景拓展[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3): 1-12.
- [7] 刘庆莹, 张莹. 面向共同富裕的新质生产力: 理论演绎与培育路向[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3): 77-87.
- [8] 郭红霞, 王珊.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助力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与政策建议[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1): 136-147.
- [9] 何锡辉, 黄永鹏. 共同富裕视域下“一个民族不能少”的话语嬗变[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1): 42-50+182-183.
- [10] 卢雪艳. 面向共同富裕的统一战线[J]. 社会科学家, 2024 (2): 190-196.
- [11] 张峰. 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新走势[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 (2): 5-15.

陈欣. 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驱动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43-51.

- [12] 林华山. 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战略定位与发展图景——从“爱国统一战线”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 (1): 19-26.
- [13] 林华山, 龚静阳. 从统战话语到话语统战: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融通构建与图景展望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26-144.
- [14] 陈明明, 杨东光. 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12.
- [15] 林华山, 龚静阳, 刘涪菡. 多维团结: 面向强国目标的统一战线历史方位与发展形态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4): 12-25.
-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142.
- [17] 郭道久, 郝若雯. 统一战线: 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人心基础的强大法宝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4-24.
- [18] 张献生. 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统一战线百年历史的根本经验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1): 1-15.
- [19] 刘新庚, 肖瑞建, 刘邦捷. 论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变革与现代创新 [J]. 思想教育研究, 2016 (8): 47-52.
- [20] 本书编写组.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学习问答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7.
- [21] 徐宁.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哲学研究 [M]. 上海: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20: 145-146.
- [2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M]. 学习出版社, 2023: 58.
- [23] 何云葵.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实践及启示——以农工党中央对口云南省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和农工党云南省委开展抚仙湖、星云湖保护治理民主监督实践为例 [J]. 社会主义论坛, 2023 (9): 7-9.
- [24] 赵安琪. 多措并举促港澳青年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N]. 中国青年报, 2024-03-14 (2).
- [25] 林胜. 如何促进海外侨胞融通中外? [EB/OL]. (2023-06-05) [2024-08-27]. <https://www.chinanews.com.cn/hr/2023/06-05/10019642.shtml>.
- [26] 教育部课题组.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204.
- [27] 《全球人才流动趋势与发展报告 (2022)》: 聚焦 38 国人才竞争力水平, 推动国际竞争比较优势形成 [EB/OL]. [2024-08-27]. <http://www.ccg.org.cn/archives/72236>.
- [28] 全国人才资源统计结果显示 我国提速迈向人才强国 [EB/OL]. (2017-08-31) [2024-08-27]. https://www.mohrss.gov.cn/zynljss/gzjl/201708/t20170831_276631.html.
- [29]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608.
- [3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 [M].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44.
- [3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1年7月1日) [N]. 人民日报, 2021-07-02 (2).
- [32] 高永久, 杨龙文.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内涵要素和实践路径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4 (2): 106-114.
- [33] 蒋英州, 王创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主要内涵与使命追求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2): 1-13.
- [34] 蒋永穆, 何媛. 扎实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时代要求、难点挑战和路径安排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1 (11): 4-12.
- [35] 汪仕凯. 走向共同富裕: 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内涵 [J]. 探索, 2019 (3): 21-27.

责任编辑: 龚静阳



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及制度建设主线

——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张艳娥

（西安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系统谋划了保障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制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问题。深刻把握全会精神，需要立足制度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契合互进的底层逻辑，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和核心要求是保持国家自主性、发展人民性和体现文明的超越性。这是由后发外源型现代化的时空境遇、人口规模巨大的半边缘状态以及社会主义的方向选择决定的。这一底层逻辑内在决定着制度建构的走向和格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其鲜明特质和显著优势，集中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坚强核心；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体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体现和保证人民主体地位；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制度巩固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统合秩序与活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要更突出制度建设的主线和牵引作用，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强大制度保障。

关键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建设；全面深化改革；自主性；人

DOI: 10.13946/j.cnki.jcqi.2024.05.005

作者简介：张艳娥，西安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陕西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基地副主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思政课研究专项“制度自信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研究”（21VSZ065）；教育部思政课专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教学研究”（23JDSZK098）；陕西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基地重点课题（xctz202302）

引用格式：张艳娥. 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及制度建设主线——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5）：52-63.

民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图分类号: D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5-0052-12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决定》突出制度建设的主线作用, 立足“三个更加注重”, 着力“七个聚焦”, 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党的建设等方面系统部署改革, 明确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开启了以改革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党的十八大做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十八大的战略部署拉开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将制度建设放在前面, 注重各领域改革的系统集成, 实现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经过十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接续推进, 我们总体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 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 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并取得明显成效。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 整体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 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认为“要把这些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 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1]。

从历史脉络看,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 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1] 14}。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2],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生发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3], 改革主线始终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整个历史进程之中^[4], 两者互为一体、不可分割。从理论逻辑看, 制度建设是改革的主线和主要内容。改革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支撑作用主要是调整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使它们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此, “制度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容”^[5], “制度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要素”^[6], 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根本依据”^[7]。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体系建立、健全和发展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和底蕴”^[8], “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支撑作用”^[9]。其中,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10], 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则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核心要义”^[11]。

总体来看, 学界围绕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一体性、制度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关联互进的相关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提供了多维度的观点。立足现实, 笔者认为相关基础性问题的研究有待深入: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间“规定”与“呈现”关系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中国式现代化对制度建设有何核心要求, 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下把握中国之治的特质与优势。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清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机理, 更深入地领会和把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求推动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1] 3}。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及制度要求

现代化在广义上一般被表述为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发展导致的社会生产方式大变革以及整个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包含器物、价值观念和制度结构变迁发展的综合体系。制度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处于关键地位，制度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的载体和桥梁，对一个社会有机体的其他文明构成具有统摄性和贯穿性作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由各种因素互动作用“合力”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开启使中国的社会演变格局由渐进的“积累性变迁”转变为急剧的“传导性变迁”^[12]，这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所在。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效果直接决定着其民族和国家生存。“启动并持续推进现代化建设，摆脱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被殖民化和边缘化的境遇”^[13]，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核心利益。以现代化为导向的国家意志在中西之争、古今之变的文化和利益格局大变动中整合形成，国家制度体系推动和保障国家意志的实现，并完成现代化动力由“外源”到“内生”的转换。这是决定后发国家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中国的现代化在特定境遇形成的底层逻辑，内在决定着国家制度体系建构的走向和格局。

（一）实现国家的自主性

在早期阶段，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呈现“冲击—回应”的反应模式。后发外源型为主的现代化怎样才能避免盲目回应“先行国”的冲击而落入完全照搬模式的境地，如何依据本国国情挖掘内生性力量实施诱致和强制相结合的制度变迁，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形成国家自主性。从理论上讲，国家自主性是处在现代化边缘地位的国家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状态、实现完全国家主权和发展权的表现形式。其对内体现为能自主地制定和实施内外政策，引领国家的发展方向，促进国家整体利益的实现；对外体现为独立完整的国家主权和民族解放。类似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其现代化的开端大多面临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社会整合等前置性任务，其关键是实现独立自主。这一前提也决定了这些国家难以沿袭英、美的“社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如果沿袭西方那种民间资本主导的现代化路径，仅聚焦技术层面的工业化或未基于基本国情以合适的方式促成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演进，则极有可能遭遇挫折，沦为西方大国的“附庸”。自主现代化是那些既希望实现现代化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后发国家的不二选择。要实现国家自主性，首先需要完成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其后要始终保持国家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的独立自主。在现代化建设上始终保持方向道路的自觉、动力机制的自立和思想引领的自主。这一状态的实现尤其需要强有力政党动员组织民众，形成广泛社会力量的支持。如果政党制度功能弱、结构涣散，便无法成为推动现代化变革的坚定政治力量。同时，实现和保障国家自主性，也对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质量有很高要求。构建一个利益包容、效能强大、深孚众望、回应廉洁的“好政府”，才能有效化解转型社会“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内在矛盾^[14]。实现和始终保证国家自主的底层逻辑，决定了现代国家建构、先进性政党、民主共和、统一战线、人民政府等因素在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构中必然居于重要位置。

（二）保障发展的人民性

作为一个规模巨大的后发国家,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长期掠夺造成的一穷二白情况下开启的, 满足超大规模人口的基本生存要求成为现代化进程的首要任务。巨大的人口规模与相对有限的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 决定了中国无法复制西方发达国家那种以大规模消耗全球资源为代价的所谓现代生活方式, 而是要在保障十几亿人口基本生存基础上走共建共享的现代化道路。“如何以有限的资源解决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问题, 既是推动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前提, 也是现代国家得以存续和发展的重要基础。”^[15] 民生问题的破解之道以及获得独立自主现代化的诉求, 内在决定着社会主义方向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 这一点并不是政党基于特定政治理念强加给国家的取向, 而是基于超大规模后发国家强化国家组织动员功能、赢得自主现代化资格、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客观现实需要。更好地保障现代化发展的人民性, 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建构起人民主体的力量动员与权利共享机制, 通过党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奋斗来赢得自主现代化资格、推进现代化的可持续性发展”^[16]。人民性应然地成为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最核心的价值和最高的原则, 应体现和贯穿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之中。这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始终坚守人民立场, 坚守人民中心的发展理念, 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社会、生态等权利; 在民主政治建设上,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真正实现和保障人民主权, 实行广泛而真实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在文化和社会发展上, 着眼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三) 体现文明的超越性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文明超越性的可能与必然。这一判断基于两点依据: 其一, 由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质内在决定; 其二, 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事业的领导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在早期阶段,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通过学习和比附西方已有的文明形态而展开, 而资本主义文明固有的“反文明”倾向和中国已然所处的边缘性地位, 决定了这种完全的模式比附之路行不通。“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 是世界所少见的”^[17], 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必须经由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奠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这场社会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自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联系”^[1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让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真正“由被动转入主动”^[19], 也让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更加成熟, 沿着“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清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脉络。更重要的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突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等结构性要素限制, 带来一种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使中国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 亦即在使之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同时, 正积极地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20]。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同时, 也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新文明形态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 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21]。“两个结合”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 实现其“从民本到民主, 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 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22]的转变, 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以来改革的全面深化, 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现代化的普遍特征, 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从

人口规模、发展目的、文明协调、人与自然、和平发展等方面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等方面总结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这表明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规律的认识上升到新高度，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保持国家的自主性、发展的人民性和体现文明的超越性等底层逻辑有了更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历史主动。思想认识和理论创新的成果只有被提升和规范为制度和制度体系，才能获得更持久、更稳定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非常重视国家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作为党领导人民探索制度创新和建设的伟大成就，高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和本质要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可靠的制度支撑。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和核心要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和国家制度建设打下了地基，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体系根本框架。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探索，我国形成和发展了党的全面领导和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的制度体系。新时代以来，国家制度治理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和取得明显成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得到全面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2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概括和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优势和特质，将其显著优势概括为“十三个方面”^{[23] 3-4}。这些方面涉及自主现代化实践中的领导与参与、秩序与活力、治理与发展、公平与效率、一体与多元、民主与法治、发展与安全等诸多层面，都是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要解决好的关键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以其鲜明特质和显著优势集中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和制度要求，对保持国家自主、人民至上以及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引领人类文明发展前景等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坚强核心

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由党的领导地位确立和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其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和保证国家自主性的关键。大量现代化转型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需要强有力政党的政治动员来凝结共识凝聚力量。实现这一任务的政党应该是“由崇高的使命引领与强烈的责任担当所塑造”^[24]，而非以扩大选民支持赢得公职选举为主要目标。只有摆脱自身特殊利益、超越特定社会阶层和小集团利益裹挟的使命型政党，才可以避免后发国家沦为“汲取型政府”和“脆弱的行政机器”。其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保障发展人民性的根本。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and 人民利益的最忠实代表，它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不同的利益。人民性是社会主义的最核心逻辑，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以人民为政治基础而建立的，是作为整体的人民掌握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

产党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25],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建共享的高质量发展、人民民主权利的全过程实践、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物质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方面的要求, 都必须依托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其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超越的可能。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产物, “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明产物”^[26]。作为在落后社会组织起来的先进性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成功实践全面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使古老中国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大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 使古老的东方文明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将致力于解决进入阶级社会以来长期困扰人类社会的历史性难题, 即如何在政治上生成一个真正能代表人民公共利益的公共力量, 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实现共同富裕, 在生态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国家与民族关系上实现世界和平。这些实践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二）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体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概括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基础性制度安排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坚持实现共同富裕、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提供了制度保证。从生产力角度看, 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科学技术应用带来的经济增长, 而现代化在生产关系层面则体现为社会经济制度的现代构建和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资产阶级私有制和私人财产权取代人身性的依附关系, 为劳动力成为商品和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 具有重大进步意义。但与此同时, 这种生产关系也带来贫富差距、劳资对立、阶级分化和社会不公等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 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此后, 伴随着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其结构的不断创新和完善, 中国式现代化得到全面展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根本性质的重要制度;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资源配置方式上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 充分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种制度模式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统一, 使各种社会资源和要素能够更充分地进入社会生产生活中,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蓬勃活力。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现和保证人民主体地位

始终坚持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也是其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根本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 要求更高水平、更为真实的民主政治与之相匹配。建立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领域的本质要求和核心要义。首先, 建立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破解中国式现代化大规模国家治理难题的需要。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基本的特征, 要带动 14 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 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 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27]。民主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也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当代, 以代议制为核心的西方选举民主出现了民主形式与民主实质相脱节、有效治理不足、社会撕裂等诸多问题, 并不是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理想选择, 尤其不适用于规模巨大社会的现代化治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过程性统一实现最

广大人民广泛真实政治参与，调动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主动性，从而有效化解超大规模国家治理难题。支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之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都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组织原则。这就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有序与活力之间维持良好张力。其次，建立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依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国家政治权力的上层建筑结构直接反映并反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在保证全体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最大程度兼顾各个社会层面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诉求，统筹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关系，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长远的根本利益。

（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制度巩固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人们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是现代化最深层的构成维度。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和文化制度，致力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党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长期实践取得的经验原则基础上，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领域制度体系进一步发展完善，形成了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和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制度体系。文化领域的制度建设构建起系统的文化自信自强制度体系，进一步彰显了党的执政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原则。这为中国式现代化夯筑起更为牢固的思想认同根基，助力社会和利益的整合，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制度保障。

（五）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统合秩序与活力

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解决社会秩序与社会活力发展动力的关系问题具有普遍性。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不可少。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关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社会根基、提供坚实助力。经过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的不断探索，我们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力量，包括政府、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在内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治理网格，形成了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制度格局。这一社会治理格局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法治有机统一在基层群众自治实践当中，将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基层民主自治诉求统一起来，使基层社会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互适应，体现出活力与有序。

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核心要求，还体现在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法治保障公平正义等各个方面，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体制机制、法律规范等构成层次之中。要以根本制度的完善发展固根基，以基本制度的创新发展扬优势，以重要制度的创新发展补短板，以体制机制的创新发展增活力，以法律规范体系的建设发展稳预期。高度重视制度建设，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各方面制度，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是我们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要从实践经验和现实需要出发，“突出体制机制改革，突出战略性、全局性重大改革”^{〔1〕66-67}，紧紧围绕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求，进一

步推进各领域制度建设。

三、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求进一步推进制度建设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要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和核心要求继续推进制度建设，把党的二十大关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的战略部署落实于成熟有效的制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扣紧“进一步”的着力点，即“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1] 3}，以更加成熟定型的现代化制度治理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

（一）以更加系统集成的制度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性

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上保持国家的自主性仍是我们各项建设的基本立足点。立足当前要着重处理好整体秩序与社会活力、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发展与安全等诸多关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注重制度间的系统集成，健全已有制度，在新领域新实践中“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1] 65}。

其一，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确保党始终走在现代化前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开拓者和建设者，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先性和决定性。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是新时代我们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最根本原因。新时代以来，我们把党的制度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一体谋划部署，扎实推进党的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新时代以来党内新制定的法律法规“占现有党内法规的比例超过 70%”^{[1] 120}，管党治党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立足当前，尤其是要进一步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着力解决干部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问题；进一步健全政治监督的创新机制，健全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制度新机制，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有效办法，不断加强党自身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同时，以制度建设着力防范党存在的脱离群众的危险，以制度建设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健全干部联系群众的常态化制度机制。

其二，进一步完善政府治理体系，确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建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党政结构，为自主性现代化提供了权力和组织的保障。在新时代探索全面的现代化建设中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了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已发展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原则。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要更好发挥政府主导原则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功能。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政府内部的横向和纵向分工体制，避免行政任务执行中的部门或地域分割，进一步健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体制机制，健全和完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23] 19}。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要求和重要标准，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既“放得活”又能“管得住”的市场环境是推进高质量发展根本要求。要进一步落实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其三，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新形势下，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国家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要进一步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1] 55}。这要求我们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制度保障。进一步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完善国家安全工作责任制，强化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完善国家安全的法治体系和政策体系，完善经济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同时，加强相关机制建设，提高风险研判能力，构建联动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进一步推进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重要领域安全立法工作，弥补安全领域立法和制度的空白点。

（二）以更加有力有效的制度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

坚持人民至上，始终要从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完善制度，这是我们取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当前面对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要更好地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进一步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推进改革，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其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保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和确立的，是党中央立足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需要、以巨大政治勇气主动调整生产关系的制度结晶。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继续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制度原则。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同时，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同时，致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更好地统筹效率与公平，更好地体现和服务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其二，进一步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最为合宜的民主政治形式。《决定》提出“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1] 16}，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充分释放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功能。要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探索创新体制机制，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该制度行使国家权力；健全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制度，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工作机制。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项具体法律法规，深入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实施和监督体系，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环节运行机制的法治化建构，在社会主义法治轨道上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

其三，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确保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的人民性逻辑要求在社会生活领域真正构建起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把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完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放到重要位置。要进一步完善依靠人民群众力量化解社会矛盾

的制度体系。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调节、权益保障通道,凝聚社会共识、整合社会力量,夯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根基。同时,进一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三) 以更具层次功能的制度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长久以来困扰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西方化”的偏见和治理迷思。政党中心、人民主体、人民民主、和平发展等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特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体系的鲜明特征与突出优势。以制度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着眼于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实效,在巩固文明主体性的基础上,将现代化建设与现代性建构统一起来,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和未来发展。

其一,完善保障“两个结合”的体制机制,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两个结合”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根基,也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就具有了坚实的文明自信支撑。文化主体性的巩固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纯思想的问题,而要诉诸国家制度。要进一步创新保障“两个结合”的各项体制机制,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实际制度支持。要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工作体系,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同时,进一步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由文化自觉、自信到自强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国文明型崛起的历史必然。

其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机制,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基础。彰显中国自主性现代化成长之路的世界性意义,需要文化力量的支撑,需要有着强大价值感召力的文明体系来定格。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将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人统合在一起的新型文明塑造过程。一方面,要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健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体制机制,促进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另一方面,要以切实的体制机制改革夯实增强文化自信的制度基础。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

其三,构建支持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体制机制,扩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文明效应。在“两个大局”相交织、“西强中弱”的国际话语环境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已然成为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着力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加强支持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体制机制建设。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拓展话语体系的深度和广度,提升话语质量和国际传播效能。同时,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体制机制建设,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面对世界多元话语失衡的风险,中国式现代化承担着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文明话语体系的历史重任。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话语权建设不是为了争夺话语霸权,而是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世界历史的新前景。

四、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由实践形态到理论形态的发展。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和决定性，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需要进一步以完备成熟的制度形态来承载和保障。《决定》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判断，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重要遵循。《决定》既是举旗定向的宣言书，也是攻坚克难的路线图，凝结着党中央对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原则、总体目标、主攻方向的深刻把握。要坚持制度建设主线，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果。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64．
- [2] 宋才发．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广西社会科学，2024（5）：35-44．
- [3] 罗平汉．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J]．历史研究，2023（6）：26-37．
- [4] 秦宣，秦睿．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革命、建设、改革的关系[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3）：42-48．
- [5] 马雪松．以制度建设引领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人民论坛，2022（17）：46-49．
- [6] 包心鉴．制度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要素[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4（1）：25-35．
- [7] 辛向阳．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1）：19-26．
- [8] 王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和底蕴[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8-18．
- [9] 汪亭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8）：37-47+167-168．
- [10] 刘灿．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J]．当代经济研究，2023（2）：17-19．
- [11] 董树彬．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2）：57-70+156．
- [1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54．
- [13] 何显明．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建构及其治理效能——基于国家意志聚合与实现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22（9）：26-45+204-205．
- [14]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2．
- [15] 何显明．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规定[J]．浙江学刊，2022（2）：4-14．
- [16] 张艳娥．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本位及其团结奋斗逻辑[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3）：1-13．
- [17]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1．

张艳娥. 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及制度建设主线——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52-63.

- [18] 吴晓明. 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4): 15-22.
- [19] 毛泽东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5-16.
- [20] 吴晓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J]. 哲学研究, 2019 (7): 3-10+127.
- [21]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2021年2月20日) [J]. 求是, 2021 (7): 4-11.
- [22]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年6月2日) [J]. 求是, 2023 (17): 4-11.
- [23]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3.
- [24] 唐亚林. 使命型政党: 从概念到理论范式的生成过程 [J]. 开放时代, 2023 (1): 12-23+5.
- [25] 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82.
- [26] 林尚立. 天下国家道理: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4.
- [27]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8.

责任编辑: 龚静阳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

柯增金 侯勇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无锡 214000）

摘 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之一，也是对改革开放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经验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制度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制度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围绕制度建设的领导论、目标论、价值论、体系论、方法论、自信论、执行论展开，深刻回答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怎样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这一重要论述不断夯实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基石，以制度建设巩固全体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础，为凝聚改革共识、汇聚改革力量提供科学制度安排。这一重要论述通过调整制度结构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不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制度支撑。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一重要论述推动创造人类制度文明新形态，为其他国家的制度建设提供有益借鉴，不断开辟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新境界。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建设；改革共识；制度文明

DOI: 10.13946/j.cnki.jcquis.2024.05.006

作者简介：柯增金，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侯勇，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论”（22FKSB028）

引用格式：柯增金，侯勇．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5）：64-77．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5-0064-14

制度是定国安邦之根本, 制度优势也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将“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之一, 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 破立并举、先立后破, 筑牢根本制度, 完善基本制度, 创新重要制度”^[1]。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相比过去, 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2]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 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 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以下简称“这一重要论述”)。这一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怎样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理论和实践问题, 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也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制度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具有“基础”“内容”“价值”三重向度。这一重要论述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优秀成果。这一重要论述围绕制度建设的领导论、目标论、价值论、体系论、方法论、自信论、执行论展开, 是一个逻辑严密、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 有利于为凝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共识提供制度保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引擎和坚强制度支撑。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制度是具有强制性、稳定性的规范体系, 是人们的行为准则、机构的运行程序。制度体系是一个包含制度一体制一机制在内的多层次体系, 涉及政权主体、政治力量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要素的互动关系。一个国家的制度形态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状况, 又反作用于生产力。以往学界对这一主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内容视角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有学者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制度自觉、制度自信和制度创新展开^[3], 从制度认识论、制度建设论、制度执行论、制度自信论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4]; 有学者基于制度哲学的视角, 分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制度建设的思维方式、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5]。从制度评价角度来看, 有学者分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度优势评价重要论述, 认为这一论述阐明了制度评价的价值主体, 揭示了制度评价的基本原则, 提出了制度评价的具体标准, 为中国共产党认识和评价制度提供了科学方法^[6]。从制度自信的角度来看, 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制度自信的来源, 揭示了制度自信的内容, 指明了制度自信的实现途径^[7]。从“分论”视角来看, 学界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某一领域制度建设重要论述展开研究, 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制度建设^[8]、生态文明制度建设^[9]、中国新型政党制度^[10]等重要论述。二是从价值视角研究制度建设在治国理政

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国家制度”“新型政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等重要论断^[11]，这是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制度安排^[12]。有学者提出，制度现代化是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核心要义^[13]。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就是有组织地对系统内部各要素进行调整优化的过程^[14]，蕴含着制度的现代化。制度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为国家治理提供制度保障，以制度建设引领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能够防范化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重大风险、有效应对挑战、赢得战略主动^[15]。

综上所述，制度建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学术界从制度视角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不断丰富，但这些研究需要引入总体框架和系统视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度建设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需要学界进一步加强系统性研究、深化学理性阐释。本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讲话文本为主要依据，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为时代背景，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从制度建设的领导力量、目标任务、价值原则、结构体系、科学方法、精神面貌、关键环节等七个方面分析这一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这一重要论述有助于为凝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共识提供制度保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制度支撑，为人类制度文明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的生成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其生成有着深厚的理论依据、文化渊源、实践根基和主体基础。这一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制度建设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对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个人丰富工作实践与经验积累的升华。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制度建设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怎样进行制度建设做了初步探索，为制度建设理论形成奠定深厚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根基，分析了制度的生成、制度的体系以及制度的变迁等基本问题。一是制度的生成。制度产生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物质生产实践衍生出了家庭制度、氏族制度和国家制度，因此，社会制度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凝结而成的社会关系结构。马克思说：“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16]他认为，制度是人类社会实践和交往的产物，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体现，制度也是生产关系的基本形态。以生产关系为核心形成各种制度，当生产力与原有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由此，社会制度的变化都应从生产力这一“全部历史的基础”来考察。二是制度的体系。制度不是单一的存在物，而是一个体系结构，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部分构成。前者是基础性构成部分，“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17]。经济制度以及派生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等形成了基本制度的框架，基本制度再由具体制度单元构成。此外，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还引申出基本制度—具体制度—运行体制的三维制度结构。三是

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 当原有的制度关系不能满足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时, 代表着新生产关系的新制度便会出现。“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 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 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18] 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是人们的利益需求。马克思提出社会形态理论, 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公正、更科学的社会制度, 但维持社会主义正常运转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制度理论紧紧抓住“绝大多数人”这一关键, 即制度的人民性和公共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制度建设的思想, 为这一重要论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二）文化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制度治理思想

“经国序民, 正其制度。”^[1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和魂,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蕴含着丰富的制度文化和制度治理思想, 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制度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充分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制度治理思想, 是对中华优秀传统制度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凡将立国, 制度不可不察也。”^{[19] 290} 制度治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议题, 在国家治理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多元一体”“天下为公”“民为贵”“和而不同”等价值理念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生成、运转产生了深远影响, 也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提供了文化土壤。“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奠定了中国制度建设的系统性。多民族“大一统”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格局促进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上“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局面, 极大促进了社会的融通互动, 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制度根基和制度保障。“天下为公”思想奠定了中国制度建设的公正性。社会是否公正, 总是与一定的制度联系在一起, 即需要将公正的观念融入制度建设之中。中国的制度建设自古以来就更加注重公利性, 崇正义的价值观对社会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平和正义不断激发着制度的生命力,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体现了中国制度的人民性。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 也是中国制度建设的根基。“敬德保民”“民贵君轻”等尊民、重民主张强调了人民之于国家兴衰成败的重要作用, “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原则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价值追求, 人民性也是中国制度建设的重要方向。“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体现了中国制度的包容性。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和平的民族, 这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 如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等, 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 尊重他国主权领土完整、尊重他国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天下之事, 不难于立法, 而难于法之必行”^[20], 就是要以令行禁止的制度执行力确保制度的生命力。此外,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还孕育出如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等各方面的制度体系, 为新时代制度建设和制度完善提供了文化根基和文明智慧。

（三）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实践的历史进程

“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历史之问, 无数仁人志士为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 但都没有找到答案。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建立起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建立在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制度探索的基础之上, 是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制度建设经验的提炼和总结。

重视和加强制度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时期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形成的重要认识和结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逐步开始了国家制度建设的初步探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对土地制度、党团制度、“三三制”的探索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根本政治制度基础，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地位。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具有优越性，但“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21]。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2]邓小平对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做了区分，以明确“坚持和巩固”以及“完善和发展”制度的具体所指。他强调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邓小平提出了“三十年制度定型论”，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主体框架，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向着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方向发展。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深刻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一个体制创新的问题”^[23]。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发展。此外，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国家的各项制度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各领域具体制度改革深入开展，有机连接的制度体系初步形成。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明确指出：“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4]。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科学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概念，基本经济制度、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

（四）主体基础：习近平总书记个人丰富的工作经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不仅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制度实践根基，也与习近平总书记个人丰富的工作经历紧密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工作经历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制度创新实践构成了这一重要论述的主体基础。

在河北工作期间，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正以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给正定带来巨变。”^[25]他根据正定的实际情况，在全县推出“人才九条”，强调“各单位要逐步建立人才登记制度”“形成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25] 53}。对于改革，习近平指出：“改革戏必须大家唱”“敢于撞击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25] 188}。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从宁德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大胆创新制度，提出“各级领导建立群众接待日制度”^[26]，加强领导干部同基层单位的联系，“办公室实行 24 小时值班，这是个严格的制度”^{[26] 39}；在如何有效防止腐败问题上，习近平强调要建章立制，“建立一整套系统、全面的制度以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使用，这是杜绝腐败的根本性措施”^{[26] 22}，为新时代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提供了思想根基。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及时制定新制度。他强调：“莫把制度当‘稻草人’摆设”^[27]，“除了要不断完善面向全社会的各类社会保障制度外，还要建立面对困难群体的长效帮扶机制”^{[27] 4}，要“健全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28]，这为新时代提出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提供地方实践经验。在上海和中央工作期间，习近平提出要努力找到符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党建工作规律，不断从思想、组织、作风、制度上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为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奠定实践基础。新时代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20] 286}。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建设的历程上, 习近平总书记把我国制度建设进程划分为“前半程”和“后半程”, “前半程”主要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后半程”的主要目标是“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19] 64}。从新时代以来的制度创新来看, 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深化对制度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制度建设经验的深刻把握, 提出制度自信、总体目标、具体目标、任务要求等新时代制度建设的重大命题^[29]。中国共产党系统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13 个方面的显著优势, 将制度建设与治理现代化结合起来, 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也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总目标和新时代制度建设的具体要求以及阶段性要求。国家制度大厦的四梁八柱更加稳固, 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

理论意蕴是一个理论的核心要义和内容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立足于“两个大局”, 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上涉及制度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重要论述围绕着制度建设的方向、目标、重点、价值取向及领导力量等展开, 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制度篇。

(一) 领导论: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党的领导是我们的最大制度优势”^{[20] 131}, 也是制度建设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突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制度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以党的全面领导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质、不变色。《决定》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摆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首位^[1], 不断巩固党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从改革的进程来看, 新时代新征程上,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系统性、集成性特点, 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力量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增强改革的整体效能, 防止和克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的现象。党的全面领导具有政治保障作用, 在制度设计、制度建设、制度执行、制度评价等环节确保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 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从制度体系来看, 一个制度必然要有一个居于统摄地位的管总制度, 而党的领导制度便是起到总揽全局的统领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20] 28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才能确保制度建设的正确前进方向和制度的人民属性。

(二) 目标论: 推进治理的现代化

“治理效能”是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重要论述将制度建设与治理现代化结合起来,更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决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治理现代化。《决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七个聚焦”的分领域改革目标,要求到 2029 年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明确了 2035 年的阶段性改革目标^[1],形成总分结合、系统完备的目标体系和推进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这些总目标和分目标均涵盖了中国共产党对新征程上制度建设的具体部署,以制度建设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评价构件和客观具体指标。从制度效能转化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制度的显著优势只有通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过程的转化,才能让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19] 46}。国家治理体系由先进的治理理念、多元的治理主体、良好的治理制度等构成。“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19] 46},二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9] 46}。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制度”与“治理”的辩证关系,不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实现治理的现代化。

(三) 价值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性”是衡量国家制度的重要原则和基本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一是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制度建设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30]《决定》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定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之一^[1],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1],不断完善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制度安排,健全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二是以人民群众参与为制度发展的动力。《决定》强调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并从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等方面做出部署^[1];不断丰富和拓宽民意表达渠道,不断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使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及时得到关注和回应。这一重要论述始终坚持制度建设“为了人民”的价值指向,为发展和完善制度提供不竭动力。三是以人民群众满意为制度评价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19] 277}制度的好坏、制度的成效应当由人民来检验,人民最有发言权。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作为制度评价的重要指标,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制度建设与制度改革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拥护与支持。

(四) 体系论: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多领域、多层次制度体系构成,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发展和完善了这一制度体系。从横向的制度领域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军队国防等方面。从纵向的制度层级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划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根本制度

具有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其中,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构成了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在政治领域,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在文化领域,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文化制度。在社会领域, 共建共治共享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 从制度上推动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军队领域, 我国在长期实践中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这是我国的根本军事制度。基本制度体现了根本制度的内在规定性, 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探索创立的治国理政的主要制度。在政治领域, 基本制度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决定》提出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健全基层民主制度等, 体现了对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坚持和完善^[1]。在经济领域, 基本制度体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重要制度是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具体化, 具有派生性, 是国家治理顶层和社会生活基层的桥梁纽带。

(五) 方法论: 坚持科学方法注重制度建设成效

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必须坚持科学方法, 提高制度建设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注重制度建设的系统集成, 突出制度建设的重点, 坚持将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一是注重制度建设的系统集成。这是新时代制度建设的突出特点。推进新时代的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靠零敲碎打不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过去, 我们也提出过改革目标, 但大多是从具体领域提的。”^{[19] 58} 这一重要论述注重增强制度的有效供给, 统筹协调处理好“上”与“下”、“点”与“面”、“立”与“破”、“统”与“分”的关系, 不断推进制度创新, 形成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二是突出制度建设重点。“壹引其纲, 万目皆张。”^{[20] 426} 制度建设不仅要注重系统性, 还需要突出重点。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哲学方法, 以重点牵引制度建设全局, 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的重要方法。《决定》强调,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更加注重突出重点”, 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 着力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三是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问题是目标生成的依据, 目标是问题解决的结果设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直面问题。强化问题意识, 突出问题导向, 围绕发展所需, 顺应民心所向, 着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问题、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热点问题、民生方面的难点问题、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各领域的风险问题, 增强改革的针对性、实效性。”^[31] 相较于制度建设的总目标而言, 目前我国制度建设中还存在一些“弱项”和“短板”, 如新旧制度相互缠绕交织、存在脱节现象, 短效制度难以实现向常态化制度转化, 新制度的供给滞缓, 造成新旧制度的抵牾与冲突, 影响改革效能^[14], 这需要将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 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 破解制度建设的存量问题^[32]。

(六) 自信论: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优势, 必须要坚定制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围绕制度自信的基础、制度自信的核心、制度自信的方法展开。一是制度自信何以可能。其一, 深厚的历史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20] 27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植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 中华制度文明的优秀成果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其二，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理论依据。其三，显著的实践优势。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之治”彰显强大治理效能，以巨大的实践成果奠定了中国人民制度自信的实践基础，使制度自信扩展为一种社会心理，形成普遍的制度认同。二是坚定制度自信的核心是坚定政治制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33]从地位作用来看，政治制度对其他方面的制度具有统摄作用；从形成顺序来看，政治制度建立的时间最早；从使命任务来看，政治制度有利于应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政治保障。三是坚定制度自信的实质是完善和发展制度。在守正创新中坚定制度自信，积极推进制度创新是这一重要论述的内涵所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34]，要“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19] 84}。这一重要论述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为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提供更加坚强的制度保障。

（七）执行论：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效能的关键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20] 287}“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19] 278}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善于抓住制度执行这一关键要素，通过提高制度执行力来增强治理效能。一是制度执行在于“管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35]“管用”就是要更加注重制度效能，要考虑实际情况和操作性，不能让制度带来更多“麻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管建立和完善什么制度，都要本着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注重实体性规范和保障性规范的结合和配套，确保针对性、操作性、指导性强。”^{[34] 379}二是制度执行要狠抓“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崇尚实干、狠抓落实”^{[33] 551}，如果“现有制度都没执行好，再搞新的制度，可以预言也会是白搭”，“制定制度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抓落实，九分气力要花在这上面”^{[35] 148}。这一重要论述把提升制度执行力作为关键环节，保障制度效能的充分发挥。三要营造敬畏制度的良好氛围。这一重要论述通过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制度、敬畏制度、执行制度、遵守制度”的良好氛围，使之形成自我约束和互相监督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的人对制度缺乏敬畏，根本不按照制度行事，甚至随意更改制度”^{[20] 287}，“因此，必须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20] 287}。四是抓住党员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35] 10}，以党的制度建设巩固党的其他方面的建设。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35] 217}。五是要用法治保障制度执行。法律制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内容，法治为制度执行保驾护航，德治是制度的重要补充，“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36]。这强调将德治和法治相结合，强化制度落实、制度执行和制度运行。

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现代化进程总是伴随着制度文明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制度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统筹“两个大局”，深刻把握“三个面对”，不仅为凝聚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共识提供坚实制度保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制度支撑, 也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 为凝聚改革共识提供制度保障

改革共识是不同成员因改革引发冲突时所共同坚持的立场、观点与采用的措施^[37], 包括改革的权威共识、领导共识、价值共识、目标共识、方法共识等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凝聚改革共识难度加大, 但不改不行, 改慢了不行, 过于激进也不行。”^[3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为巩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共同的思想基础、形成广泛共识合力做出制度安排。

第一, 以根本制度凝聚改革共识。根本制度在凝聚改革共识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根本领导制度为凝聚改革共识提供坚实的组织领导保障。根本领导制度以中国共产党为坚强领导核心, 推动执政党内部思想认识的团结一致、维护党中央权威, 凝聚党内改革共识。此外, 根本领导制度还有利于凝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权威共识、方法共识, 即全面深化改革由谁来领导、怎么改革等问题。根本政治制度为凝聚改革共识提供根本的政治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在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凝聚改革的价值共识, 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中, 即改革为了“谁”的价值共识。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有效化解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分歧。根本文化制度为凝聚改革共识提供坚实的思想文化保障。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为更好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 为不断巩固全体人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文化基础提供了制度保证。共建共治共享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激发了全体人民投身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参与性和积极性, 扩大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主体的广泛性, 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在参与实践中凝聚改革共识。第二, 以基本制度凝聚改革共识。进入新时代, 一致性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的同时, 社会思想、价值观念、社会阶层、所有制形式更加多元多样, 凝聚改革共识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决定》提出要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1]。人民政协制度、新型政党制度是凝聚各党派各团体和各界人士共识的制度保障, 有利于进一步凝聚全面深化改革共识。利益关系是影响共识的根本因素,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革命, 牵涉到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等, 需要在不同利益诉求、不同意见表达中寻求共同点, 照顾同盟者利益是共产党人的“纳贤”之道, 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精神利益等^[39]。中国共产党通过健全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制度, 完善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引领机制, 充分发挥人才优势、智力优势, 积极为改革建言献策, 形成凝聚改革共识的制度支撑。第三, 以重要制度凝聚改革共识。《决定》强调, 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1]。中国共产党还不断健全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和长效机制, 完善统一战线各类主题教育和政治培训制度、同党外人士联谊交友和谈心谈话制度, 健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政企沟通协商制度^[40]。中国共产党将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等以常态化制度确定下来, 为凝聚改革共识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41]。这一系列制度安排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发挥着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作用, 确保改革事业稳步向前。

(二)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42],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

个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43]。制度建设是现代化的要件元素和重要评价指标,中国式现代化也蕴含着制度现代化的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围绕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突出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制度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各项制度更加完善^[44]。《决定》强调:“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1]。第一,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好相适应,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制度保障。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了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生产力的现代化,还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即制度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根植和发轫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新时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指明道路^[45]。新质生产力呼唤新型生产关系。当前,以体制机制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还不够健全,对新质生产力构成了束缚,需要打通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46]。《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1]。这些制度安排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创新成果向新质生产力的高效转化,形成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生产关系并通过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第二,推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制度建设是更为基础、更为稳固的系统工程,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方面。这一重要论述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发展更好相适应,而国家制度是上层建筑的重要体现。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一系列体制机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制度上层建筑的完善又将作用于其他上层建筑的发展,使其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第三,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2]¹¹²,“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2]¹⁸⁰。从目标与现状来看,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还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需要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弊端,应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挑战,让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成果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让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以制度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风险和挑战,而制度是应对风险挑战的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六个必然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1],用完善的制度体系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以制度现代化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三) 为人类制度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制度文明是制度建设的结果,又通过制度建设及其过程来体现,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推动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19]²⁷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形式提供了有益借鉴,推动世界制度文明的发展呈现新样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代表了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新高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划时

代的伟大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拓展了人类制度文明新形态。中国的制度建设以提高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外交等方面的治理能力为目标, 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政治领域, 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为世界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新范式, 超越了西方“少数人的民主”“一次性的民主”“伪全民性的民主”。新型政党制度强调“政治协商”而非“党派斗争”, 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等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在经济领域, 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47], 为解决世界经济发展难题注入强劲动力。在思想文化领域,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 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做出一系列制度安排。在社会领域,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民生为大的特性, 社会主义制度也体现了民生为大的实践要求^[48],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共同富裕制度安排彰显中国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精准施策,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治理提供制度借鉴和治理经验。在生态文明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20] 174},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等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为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带来发展新动能。在对外开放领域, 《决定》提出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33] 27}, 推动中国规则、标准等“走出去”, 为全球治理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赋予人类制度文明新的价值追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这一重要论述的价值原则, 也深刻体现了中国制度文明形态的核心精髓。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 如以制度约束规范资本运营, 建立反垄断体制机制,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更好规范和引导资本, 让资本更好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为人类制度发展和破解治理难题提供智慧参考。这一重要论述坚持以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制度文明观积极汲取世界各国的先进治理经验, 构成对社会主义国家何以跨越“卡夫丁峡谷”历史之间的制度解答。这一重要论述注重交流互鉴, 不断吸收人类文明的制度成果, 打破了西方制度的话语霸权, 为人类制度文明的发展贡献力量。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无法克服的困境, 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社会撕裂、利益集团斗争频繁, 社会治理失衡, 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文明赤字和发展赤字频发。中国的各项制度建设坚持人民至上, 遵循从普遍到特殊的逻辑, 试点先行、由点到面、推广总结, 坚持将基层实践与顶层设计相结合, 为其他国家制度建设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五、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题中之义。《决定》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等 14 个方面, 围绕着“建立”“健全”“巩固完善”“改革改进”等不

同层次提出了 300 多项制度建设的重要改革举措,涵盖了体制、机制、制度等不同层面,促使已有制度不断健全完善、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制度建设提供方向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体现了坚持制度与完善制度、建立制度与执行制度的辩证统一,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彰显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制度文明新样态,不断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继承—实践—发展”的守正创新逻辑、“借鉴—融合—超越”的内外互动逻辑、“点—线—面—体”的系统联动逻辑,是一个内涵丰富、不断开放的科学体系。新时代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为凝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共识提供制度保障,让全体人民认同改革、拥护改革、参与改革,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进的磅礴伟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为人类制度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2024-07-22(1).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12.
- [3] 秦宣.制度自觉、制度自信和制度创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论述[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3):15-20.
- [4] 任洁.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的辩证思维[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7):38-46.
- [5] 岳凤兰.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思想的哲学逻辑[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52-58.
- [6] 刘志礼,俞光瑞.习近平关于制度优势评价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主要贡献和践行路径[J]. 思想教育研究,2022(10):24-31.
- [7] 阎树群.习近平关于制度自信重要论述的基本内容与理论贡献[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2):21-31+151.
- [8] 肖俊,周仲秋.习近平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J]. 湖湘论坛,2020(4):16-24.
- [9] 郇庆治.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制度维度[J]. 行政论坛,2023(4):5-14.
- [10] 何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6):53-66.
- [11] 林华山,罗振建.新型国家:“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基础与逻辑[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6):18-30.
- [12] 李应瑞.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政治文明意蕴探析——以新型国家制度为中心[J]. 社会主义研究,2022(6):18-25.
- [13] 刘晨光.制度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核心要义[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3(1):5-20+164.
- [14] 蒲清平,马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进路[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1-10.
- [15] 马福运,王瑶.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逻辑[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3(5):17-27.
-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97.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8.
-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3.
- [19] 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73.
- [20]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70.

柯增金, 侯勇.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论述[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5): 64-77.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0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111.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461.
- [23] 江泽民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20.
- [24] 胡锦涛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627.
- [25] 习近平. 知之深 爱之切[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5: 7.
- [26] 习近平. 摆脱贫困[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13.
- [27]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71.
- [28] 习近平.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6: 6.
- [29] 解丽霞, 梁曙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逻辑、实践与经验[J]. 广东社会科学, 2020(3): 14-22.
- [3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97.
- [31] 征求对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意见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N]. 人民日报, 2024-07-20(1).
- [32] 赵凌云. 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J]. 红旗文稿, 2024(14): 19-22.
- [33]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65.
- [3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106.
- [3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118.
- [3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133.
- [37] 赵泽林. 改革共识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19.
-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34.
- [39] 侯勇, 柯增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2): 1-15.
- [40] 石泰峰. 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N]. 人民日报, 2024-08-05(6).
- [41] 潘一坡. 论新时代凝聚价值共识的制度保障[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2): 120-124.
- [4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作总结讲话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N]. 人民日报, 2023-12-13(1).
- [43] 习近平.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J]. 求是, 2023(19): 4-8.
- [44] 江金权. 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N]. 人民日报, 2024-08-14(9).
- [45] 蒲清平, 黄媛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6): 1-11.
- [46] 杨敏, 沈泉鑫.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 时代出场、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4): 1-11.
- [47] 徐政, 江小鹏.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特征、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J/OL].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25[2024-09-05]. <http://1-15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40723.1817.005.html>.
- [48] 杜黎明. 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为大特质研究[J/OL]. 兰州学刊, 1-4[2024-09-05]. <http://111.229.110.46:8085/kcms/detail/62.1015.c.20240809.0943.004.html>.

责任编辑: 卢媛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 历史脉络、辩证联系与实践进路

刘宗灵 张雨桐

（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中国共产党以矢志不渝的改革举措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脉络揭示了改革与现代化建设的深刻联系，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连续接力的改革历程中逐步走向成熟。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出发，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逻辑层面具有紧密相连、互为依托的辩证联系。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竭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旨归，二者密切关联、双向互动并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基于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联系，其实践进路必须从党的全面领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共同富裕、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新质生产力五个方面着手，从而形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合力。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脉络；辩证联系；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5-0078-12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DOI：10.13946/j.cnki.jcqiis.2024.05.007

作者简介：刘宗灵，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张雨桐，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课题“巴蜀文化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的资料收集与研究”（SCJJ24ZD53）

引用格式：刘宗灵，张雨桐.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脉络、辩证联系与实践进路[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5）：78-89.

(以下简称《决定》), 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作用, 坚定了全党全国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决心意志。正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脉络、辩证联系, 有利于深入探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进路,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走向新天地。

当前学界对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二者的共同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以历史叙事展开改革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发展深远意义的脉络历程, 以纵深视野呈现改革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引领作用^[1-3]。二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蓝图为准绳, 探析为什么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明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意义^[4-5]。三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支点, 讨论其如何撬动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 以横切面的多学科视野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不竭动力^[6-9]。综合现有的研究可看出, 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关注到了全面深化改革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并从过往发展、丰富内涵、多维实践等方面探究其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诸多影响。鉴于此, 本文通过呈现宏观层面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脉络、内生机理、相向逻辑, 廓清全面深化改革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关系和共生价值, 从实践层面分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蓝图指向。

一、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脉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 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 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0] 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互动关系, 必须溯其根本、究其源脉。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史, 在改革中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腾飞基础、在改革中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突飞猛进、在改革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逐步成熟。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一书中写到, “发展出题目, 改革做文章”^[11]。改革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史的每一阶段, 对如今乃至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产生着巨大影响。理清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脉络, 是指导当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作。

(一) 筌路蓝缕: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改革实践奠定中国式现代化基础

自近代以来, 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构想一直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投身于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革命道路中,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在思考中国应该走一条怎样的富强之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现代化的认识起源于对工业化的认识, 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 日本强大的工业能力让中国人充分意识到工业化是实现国家强大的必由之路。对此, 毛泽东明确指出: “中国落后的原因, 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 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 它欺辱我们落后。因此, 消灭这种落后, 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12] 在《论联合政府》中, 毛泽东将对工业化重要性的认识转化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建设的蓝图设计, 明确指出要“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实践之下, 1956年党的八大明确提出了“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重大论断, 这反映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实现工业化强国的深刻认识。

但从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工业化”的认识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式现代化中“现代化”的指向意义,而是专指发展大机器工业,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的书信中看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12] 207}而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现代化”属于更广义的现代化范畴,学者罗荣渠认为广义的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14]。这与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是相似的,即全方面的现代化建设。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化概念还停留在前一阶段,即使中国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国转变。这一认识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的改革探索。

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诸多设想与探索。在工业化建设探索中,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问题。刘少奇指出实现工业化的道路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道路:一种是资本主义对内依靠剥削本国工人、农民、小生产者和中等企业主,对外依靠对殖民地掠夺、军事赔款和奴役性的借款与租让来筹集资本开展工业化的道路;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或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即通过各种节约制度逐步筹集起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15]。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又处于冷战背景与国内百废待兴的现实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后一种道路,并在具体实践中采取了“以苏为师”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写明了集中主要力量开展以苏联援助的 156 项工程为核心的重工业项目建设,确立起了我国工业化建设战略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和农业为辅的改革建设开端。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开展,中国共产党人在工业化建设中也逐步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并开始指导改革方针调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章中开始反思重工业为主、轻工业和农业为辅的工业化方针,提倡“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16],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16] 241}。1954 年周恩来具体提出建立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现代化的国防,成为“四个现代化”的源头。这些改革思考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的路途中,逐步认识到自身主体性的决定性影响,并逐步确立起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之路,这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在这一时期的工业化改革指导下,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制度也因此得到巩固。这些开创性成就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步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伟大觉醒：改革开放铸就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17]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关键抉择，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从探索走向腾飞的重大转变，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框架也由此确立。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困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乘着新技术带来的变革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大跨步前进，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作出了改革开放这一深具历史魄力的重大抉择。邓小平谈到，在现代化探索中走弯路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

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18]。在内外交困的关键节点,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挺膺,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改革开放开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航程。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改革开放的先声便是全国上下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此次讨论将现实问题引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强调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思想相区别的显著特征,这种实践性品格成为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后续发展的根本性要求^[19]。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将党和国家事业从“两个凡是”的僵化思维中挣脱出来,摆脱了很长一段时间困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错误倾向的束缚。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主题报告的开篇便指出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强调只有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之上才能“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18] 142}。在思想解放之上一场恢弘磅礴的改革画卷徐徐展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框架逐步形成。邓小平十分重视“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并进一步发展了“四个现代化”内涵,使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框架的基础内容。我们党在1954年就已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邓小平也多次强调“四个现代化”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便已确定的^{[18] 237}。但“四个现代化”的全面展开与落实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将“四个现代化”建设提升到“最大的政治”高度。邓小平强调,当前一段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四个现代化”建设,并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18] 163},自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核心方面。同时,邓小平将现代化建设内容明确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方面的现代化,并将科学技术发展明确作为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要领,强调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发展、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的价值作用。邓小平还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目标与长期规划。他在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前景时,创新使用了“小康社会”这一话语表述,指出“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20]。这一话语建构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正式走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开始构建起中国底色的现代化建设理论体系。党的十三大报告又明确指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三步走”战略,这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切实可行的目标方向,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士气。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框架在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中初具雏形。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四个现代化”为具体方向,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底色,以及循序渐进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框架。此后,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通过改革开放开启并释放潜在增长能力,着力挖掘生产要素潜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跨步发展。有经济学家指出,改革从长期来看可以使“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速度更缓慢一些,维持中高速增长的时间更长一些”^[21],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诞生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踵事增华: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走向成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系统阐释,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建设逐步走向成熟。其主要表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形成了成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经验,制定了环环相扣、全面完善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计划。在70余年的发展建设中,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多个方面的卓越成就,标志着中国式现代

化在理论与实践上走向成熟。中国式现代化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中持续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成果，诠释了社会主义国家走好现代化强国的科学路径，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工业化模式的崭新道路，对发展中国家走好现代化之路具有开创性意义与激励性影响。

世界发展日新月异，时代发展不可阻挡。这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完成时，而是持续发展的进行时，始终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类社会的更高形态努力前进。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新特征、新方向、新前景，随之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回答新问题、迎接新挑战、开辟新蓝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22]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仅致力于解决中国内部的现实问题，而且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世界发展与革新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促进全球格局及治理体系由“霸权主导”向“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演进。在此背景下，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从其五个特征出发，努力朝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推进，进一步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成熟化理论，为世界现代化建设提供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谈到的，“中国共产党愿同各方一道努力，让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汇聚成推动世界繁荣进步的时代洪流，在历史长河中滚滚向前、永续发展”^[23]。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走出中国自身视角，开始迈向全人类治理体系的广阔新天地，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具体载体。

二、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联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并指出：“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24]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立足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锚定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发展的前景目标，强调持续推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意义与具体指向。正确认识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联系，有利于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正确处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现实矛盾，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联结呈现为，一方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实，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二者紧密相关又双向互动，最终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实践之中。

（一）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把准方向、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2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锐意进取、群策群力实现了中国发展的奇迹，也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孕育诞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与瞩目成就。全面深化改革从三个方面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创新理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加快构建。实践的观

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和基本观点,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来源、动力、目的以及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在具体情况中, 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仍在不断积累, 为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新的方向。在持续更新的改革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逐步深化, 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引导下形成更完善、更成熟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一方面, 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实践揭示了现代化发展的科学规律, 为新的理论创新提供现实遵循。另一方面, 全面深化改革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进步, 为现代化建设的更高形式、更多样态提供可能。

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完善。全面深化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在制度层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建设主要从三方面展开。一是以党的自我革命建设引领全面深化改革的全盘深化。通过党的自我革命锻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 带动全面深化改革全局发展。二是国家机构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现实保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环节是政治现代化建设, 在政治现代化建设之下打破固有利益关系, 汇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合力, 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广度深度。三是以法治中国建设为全面深化改革的贯通主线,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确立制度化、规范化保障。将健全法治体系、提升法治意识贯穿全面深化改革的各方面、各环节, 为全面深化改革把稳权力边界、厘清责任清单、扎紧制度笼子, 保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始终由法治引领、靠法治保障。

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社会活力, 促进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要素充分涌流。一切改革的本质即破除阻碍新的生产力发展的枷锁, 打破原有社会分工下的利益布局, 实现社会创造活力的竞相迸发。全面深化改革激发了社会创新活力, 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新质生产力集聚, 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是变革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通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创新机制等改革实践, 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 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 有利于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领域顺畅流动, 吸引更多人才要素、技术要素、知识要素等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集合。把握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关系, 既给予新质生产力充分自由创造的环境空间, 又确保新质生产力在合理边界中良性发展。

(二)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旨归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重要形式与现实呈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进步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 是中国共产党人艰辛奋斗的价值指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切改革实践的归属,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意义便是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永葆生机活力。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方法、结果, 厘清这一认识有利于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自觉与道路自信引领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发展。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 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 并在这个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6] 邓小平一直十分重视生产力发展对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命运的决定性作用, 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执政理念。自改革开放以来, “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论断深深影响并感染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始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体现。伴随社会的发展, 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发展在解决问题的同时, 也会带来发展变化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不协调的现实问题, 这些问题

一旦固化便会导致发展迟滞。因此，通过及时有效的改革逐步解决发展中存在问题，消除相关负面影响，是确保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手段。当然，改革不是独立开展的任务环节，而是服务于某项发展要求的，一切改革都在为发展积蓄力量，离开发展指向的改革没有意义，离开锐意改革的发展将失去动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建设便决定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原则。《决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决定》从七个方面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相关方面与目标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发出号召令，指引着改革的方方面面，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归宿。

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价值，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引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深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般历史过程，是对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变引发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方面的现代化变革的创新发展，具有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结合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具有其特殊性。普遍性是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的，规律性是通过实现形式的多样性呈现出来的，共性是通过个性具体表达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立足一般规律，延展自身特色，是一条行得通、走得稳的强国之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应深入理解其科学性与正确性，树立高度的道路自信，坚定开展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决心，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景设想通过改革实践转化为现实成就，用“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27]的信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新的高度。

（三）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是密切关联、双向互动的实践过程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是密切关联、双向互动的实践过程，最终二者又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归属，二者在实践过程、实践内容上互为抓手、相互依托，在双向互动中迸发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磅礴伟力，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不可分割，二者紧密相关，其在产生背景、发展条件上具有共通性，在能效转化上具有相关性。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都诞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形成于新时代“两个大局”的时代追问中，是新时代现实土壤下孕育壮大的一脉两支。二者的发展条件根源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中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方针目标，寻找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抓手，并将二者结合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效合力。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便没有中国式现代化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条件，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实现先进生产力发展、高效生产关系变革的先驱力量，引领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发展。二者又具有能效转化的相关性，前者是后者的动力源泉，后者是前者的目标指引，在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双向互动中形成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二者的能效转化有利于形成理论创造合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的目标索引、理论基础、模型构建，而全面深化改革则负责将其目标实

刘宗灵, 张雨桐.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 历史脉络、辩证联系与实践进路[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78-89.

现、理论走实、成果脱模, 并继续在实践中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理论生成, 形成新的样板经验,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走出特色化、科学化的长期道路。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能效转化特质, 使其最终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是当前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内容的长远目标,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 即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就是动力, 方向指引行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0] 28} 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模式, 全面深化改革是调整生产关系、促进发展的必要手段, 二者在最终目标上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 具有相契合的目标选择。二者在这一层面同向同行, 共同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高质量、高水平、高速度建成落地, 是在时代洪流变化中赢得历史主动机遇的必然抉择。

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路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逐步完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全民共享。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把握党的全面领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共同富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新质生产力五个方向, 以五个方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进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新突破、开辟新前景。

(一) 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深刻指出权威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意义。他在给保·拉法格的信中写到: “没有权威, 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28]。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艰巨工程中,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保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一致行动的核心力量, 是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与持续推进的根本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实践模式,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据此,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中, 全方位、全过程贯彻党的全面领导是多维进路的第一要义。

中国共产党制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方针, 领导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落实。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 应重点把握党的全面领导的全方面与全过程两方面。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个推进领域都要坚持党的领导,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上到下的实践过程中都要围绕各级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开展改革建设。党的全面领导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当前, 和平与发展仍是国际形势主流, 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前景光明。同时, “两个大局”的时代追问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重点就是要求全体共产党人在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各个方面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的新年贺词中讲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也绝不是一马平川、朝夕之间就能到达的。”^[29]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走进深水区、面临硬骨头，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在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的时候，就越需要发挥党的“定海神针”作用。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由之路上的中心隘口，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思想底蕴

“我们党的历史，是一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历史。”^[30]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多年的实践中实现了双向丰富与改造，中国的改革建设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时代内涵、增添了中国色彩；马克思主义也重塑了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更是指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思想底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基础。新时代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务必把握思想的时代变化、筑牢理论的中国化底色，从坚持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着手，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基础。

首先，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认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探索努力要求改革主体在思想认识上时刻用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武器，立足中国国情与现实要求开展目标设计、内容建设、成效落实等工作环节，在具体的改革领域与细分环节中，将改革工作现实向设计、本土化呈现，最终提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效性、适应性，更好符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次，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内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的理论创新达到新高度。恩格斯曾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1]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前提，马克思主义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往真理的道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势必会面临新环境、遇到新问题，为理论认识提出新概念、新方法。这将极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容，为后续的改革建设提供新的经验案例，确保党和国家事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一脉相承，促进马克思主义持续与时俱进。

（三）共同富裕是本质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32]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长远目标的必要手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推进共同富裕建设是一切改革实践的应有之义，靠近并逐步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纲领。从横向对比来看，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共同富裕建设，应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分配的问题、长期性与阶段性的问题、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问题，以问题为坐标原点推动共同富裕在纵横层面不断深化拓展。首先，正确处理发展与分配问题。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既要不断推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做大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又要在分配机制方法上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实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公平分配，将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合理有效分配。其次，明确共同富裕中长期性与阶

段性问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然会实现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 但必须认识到推进共同富裕是一个不断发展、持续进步的动态历史实现过程, 绝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刻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 正确认识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问题, 促进二者相统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随兴趣使然, 享受更为丰富与充盈的物质与精神世界。这就要求共同富裕根本是要在物质、精神双向层面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达到物质与精神同向同行的共同富裕。

(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践主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3]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政治指征之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庞大的母系统,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便是母系统核心处理器中新增容的子系统, 实现子系统与母系统契合协作的过程便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主轴。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制度化表现, 是凝聚改革合力、合理调配有效资源开展改革的制度建设, 有利于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

结构折射关系, 结构决定功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静态与动态、根本与枝叶的关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指完善并巩固党领导的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规范化, 实现国家治理全局体系的系统协调、高效协同, 强调对相对静态制度体系的科学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在国家治理体系之上实现政府对资源的有效分配与利用, 最终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更好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能力, 具有相对动态的变化过程。从二者的具体含义不难看出, 前者是后者调整发展的基础, 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呈现, 是根与叶的关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 相辅相成, 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 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34]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方向应从三个方面着力, 分别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法治化制度化建设、提升党治国理政的现实能力、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首先, 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制度化建设是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 有利于各方责任体系明确化, 确保国家治理在法制规范的道路上运行。其次,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便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鼓励在基层治理中多元参与、多方共建,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最后, 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关系是贯穿一切治理的主干内容, 一切的治理改革也都围绕着“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展开。据此,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应正确调适三者的关系, 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协调发展。

(五) 新质生产力是发展引擎

新质生产力是指创新起主导作用,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 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35]。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生产力出现的新质态, 是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36], 在实践应用层面联动社会各产业的迭代升级^[37]。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全要素创新, 载体是现代化产业, 目的是高质量发展, 因应其基础性、全局性作用, 而成为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工程的“经络”^[38]。马克思指出: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

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39]新的生产力出现要求生产关系也相应作出调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不断解放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的有效手段，帮助新质生产力持续向好发展，从而提振全社会的经济活力，最终从生产力层面带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40]。从现实指向来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新质生产力的提振效应呈现“先破后立”的实际作用，即破除原有生产关系桎梏，树立新机制保障新质生产力持续发挥强劲动能。

一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原有生产关系桎梏。马克思曾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与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现行的生产关系就会成为新生产力的桎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率先以主动姿态打破传统生产关系的镣铐，解放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活力，疏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动脉，给予新质生产力充分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在“破”的基础上“立”，建立更为科学有效的科技创新机制、高智人才培育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科学化制度化的法治保障，等等，集合各方有利要素孵化培育新质生产力，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跃升进步，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保证新质生产力始终运行发展在制度化空间之内。中国共产党人以“先破后立”的大无畏态度开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破冰破壁道路，以“破”的力量彻底打通经济发展、生产力进步的关键环节，以“立”的能力开辟新质生产力的新高度、新水平、新方向，最终以新质生产力为发展引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梁伟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历程、实践特征及世界意义[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3): 18-27.
- [2] 张神根, 黄晓武. 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2(1): 7-17+202.
- [3] 商志晓, 梁举.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由来与发展进程[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5): 1-13.
- [4] 包心鉴. 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和根本动力[J]. 山东社会科学, 2024(7): 5-16.
- [5] 蒲清平, 马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进路[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 1-10.
- [6] 胡鞍钢. 中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J/OL].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8 [2024-09-2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4558.G.20240801.1635.002.html>.
- [7] 常庆欣, 郑子婕.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的丰富意蕴[J]. 当代经济研究, 2024(8): 5-14.
- [8] 姜伟. 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系论纲[J]. 中国法学, 2014(6): 25-39.
- [9] 张海波. 习近平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重要论述的基本遵循[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 22-28.
- [10]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2.
- [11]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40.
- [12] 毛泽东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146.
- [13]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1081.

刘宗灵, 张雨桐.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 历史脉络、辩证联系与实践进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78-89.

- [14]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17.
- [15]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第2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4-5.
- [16] 毛泽东文集: 第7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5.
- [17] 习近平.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J]. 求是, 2023 (11): 4-7.
- [18]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32.
- [19] 吴忠民. 论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2 (7): 21-38+204.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968.
- [21] 蔡昉, 林毅夫. 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经济发展 [J]. 经济学动态, 2018 (8): 4-17.
- [22]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J]. 党建, 2022 (8): 4-6.
- [23]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2023年3月15日, 北京) [N]. 人民日报, 2023-03-16 (2).
- [24]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2.
- [25] 习近平.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J]. 求是, 2024 (10): 4-15.
- [26]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28.
- [27] 习近平.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 [J]. 求是, 2024 (13): 4-8.
-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72.
- [29] 习近平.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 [J]. 求是, 2023 (11): 4-15.
- [30]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59.
-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9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406.
- [32] 习近平总书记谈共享 [N]. 人民日报, 2016-03-03 (14).
- [33]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11.
- [34] 习近平.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N]. 人民日报, 2014-01-01 (2).
- [35]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J]. 求是, 2024 (11): 4-8.
- [36] 蒲清平, 黄媛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6): 1-11.
- [37] 陈芳, 杨二美. 新质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应然契合、实然逻辑与具体路径——以生产力三要素与共同富裕三维内涵为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3): 62-76.
- [38] 张林, 蒲清平.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 [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6): 137-148.
-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02.
- [40] 韩喜平, 马丽娟. 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J]. 当代经济研究, 2024 (2): 20-29.

责任编辑: 杨稀琴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 “三个更加注重”的思想意蕴与实践要求

樊士博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主要任务，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中国政治的核心议题。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构成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方法论。“三个更加注重”既是作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统一体，也是分别指向改革系统性、结构性和协同性的联系体。坚持“三个更加注重”是用好已有改革经验的必然要求，也是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客观要求，更是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科学指南。科学理解“三个更加注重”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就要从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加以考量。面向未来，应在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支撑、标识等新提法、新论断基础上，坚持“三个更加注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三个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方法论

DOI: 10.13946/j.cnki.jcqi.2024.05.008

作者简介：樊士博，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纪检监察研究院副院长、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专项课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底蕴与实践根基研究”（2024VSJ004）；武汉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课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监督理论的学理阐释及实践证成”（whtz202404）

引用格式：樊士博.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三个更加注重”的思想意蕴与实践要求[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5）：90-103.

中图分类号: D61;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5-0090-14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是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键一招。2024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再次强调坚持“三个更加注重”的科学方法论,深刻揭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要求和目标旨趣。改与变如影随形,革与新一母同胞。改意味着变,革意味着新,改革意味着用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则事半功倍。习近平总书记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就曾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2]既是综合性改革,则必须立足整体、把握重点、聚焦实效。简而言之,改革不是孤立行为,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是那些关涉全局的重点领域改革,必须坚持“三个更加注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的“三个更加注重”,具有深刻的思想依据、政策依据、理论依据。从指导思想发展上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拔锚起航,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注重改革领域的系统集成,注重改革步骤的重点聚焦,注重关键领域的改革实效。此后,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沿着这一思路接续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政策演变上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的历次三中全会及其审议通过的改革文件都强调“系统、重点、成效”三个关键词。从推进改革的理论指导上看,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系统观念、突出重点等。因此,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秉持的系统观点、重点把握等方法,实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运用。较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当前阶段的改革复杂性高、关联度大,亟需在原有经验基础上提炼新方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实现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3]。尽管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取得了重要成绩,但要清醒认识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有鉴于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的“三个更加注重”科学方法论正当其时。

目前,理论界和学术界围绕“三个更加注重”理论意义、方法意义、哲学底蕴进行了初步探索。杨明伟认为,“三个更加注重”的要求,既体现了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又体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原则,是长期改革实践探索的经验总结,深化了党对改革问题的理论认识^[4]。王伟光认为,“三个更加注重”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的方式方法^[5]。赖先进认为,“三个更加注重”既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及其方法论的系统总结,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在方法论上的鲜明特征^[6]。张连起认为,“三个更加注重”体现了“上”与“下”的呼应,“点”与“面”的协调,“变”与“稳”的平衡,“实”与“时”的统筹^[7]。董振华提出在贯彻“三个更加注重”上,应做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实践观点^[8]。张占斌认为,“三个更加注重”集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方法论^[9]。既有研究突出了“三个更加注重”的结构化阐释,强调了“每一个注重”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所在。但是,关于“三个更加注重”的整体研究、系统分析尚未充分展开。学界关于“三个更加注重”指向“三个更好相适应”的思想意蕴研究多为一笔带过,尚未出现专论。基于此,本研究从现实缘由、理论定位、思想指向、行动理路等维度探索“三个更加注重”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方法论意蕴,以期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学理支撑,助力构建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干的自主知识体系。

二、“三个更加注重”的提出缘由

变革基因深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从商鞅变法到北魏孝文帝改革,从王安石变法到维新变法,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因变而强的追求、向变求强的努力。变是世界上的最大不变,强调更加系统集成是为了呼吁人民群众重视改革,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10]“三个更加注重”是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改革实践进行的深刻凝练和系统表达,蕴含着沉甸甸的思想分量和理论含量。

(一) 历史维度: 用好改革经验的内在要求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经验提炼。毛泽东曾指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11]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的改革影响后世,有的改革昙花一现,有的改革招致动乱,无论成败都提供了经验启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12]只有总结好历史经验,才能遇山开路、逢水搭桥,不断开辟改革新前景。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13]越是改革进行到这种程度,越要注重从历史实践中汲取经验。“三个更加注重”所蕴含的经验,对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具有重要启示。

“系统、重点、实效”三个关键词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就是“三个更加注重”不断被用于实践的见证。以城乡改革为例,最先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为城市改革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参照。农业具有基础性,对国计民生的影响至关重要。显然这一改革路径坚持了系统观念,实现了重点突破,最终取得了实效。以改革开放的步骤来看,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港口城市,从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到开放沿江、内陆和沿边地区,均体现了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改革开放趋势。

此外,从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思想史角度也能够看出“三个更加注重”的内涵演变。邓小平强调改革必须坚持全面、系统的观点,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

樊士博.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 “三个更加注重”的思想意蕴与实践要求[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90-103.

各行各业。”^[14]改革是全面的,就意味着改革必须遵循规律,坚持系统观念。江泽民指出:“坚持从实际出发,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避免发生大的社会震荡。”^[15]正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始终坚持渐进性原则,改革成效才能不断突破,而这种渐进性就建立在全面、系统的基础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度、广度增加,实践对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有鉴于此,胡锦涛要求:“我们要着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深刻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继续坚定不移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推进各方面改革创新,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16]可见,注重系统集成、注重突出重点、注重求取得实效是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鲜活经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三个更加注重”的重大论断,是对已有经验的系统提升,必须结合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加以理解。

（二）实践维度：应对重大风险考验的客观要求

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交织的情况下,改革的环境充满复杂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改革不能超然于环境,必须以相对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为条件,否则就是空中楼阁。另一方面,改革就是为了规避复杂环境中的不利因素。邓小平曾深刻指出:“通过改革,要取得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条件。”^[14]¹⁶⁰可见,改革也要创造良好的条件。

从国内来看,新时代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会一帆风顺,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17]这一论述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思维。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只有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才能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才能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才能确保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顺利推进。“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锚定了到2035年要实现的改革目标。高在细致,成在落实。蓝图已经绘制,必须加倍努力。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三个更加注重”,预防系统风险、克服重点领域的风险,才能如期实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目标。

从国际来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着复杂的外部环境。局部冲突和地区动荡成为威胁全球和平与发展的显性关键变量。世界又一次来到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考验着世界政治发展。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因素的增长,也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全新挑战。更重要的是,部分西方国家裹挟狭隘价值观念,秉持非此即彼的心态,对中国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在这种情况下,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进而破坏改革开放的进程。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然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超然于世、一厢情愿的世外桃源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因此,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需要坚持“三个更加注重”,处理好国外与国内的关系、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三）制度维度：释放制度优势的必然要求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是最为成功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18]。改革的

方向是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决定》要求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目的就在于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坚持“三个更加注重”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

其一，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要求坚持“三个更加注重”。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制度创造秩序，制度为国家和民族的稳定发展提供基本保障。人类历史发展表明，制度若要长久发挥作用，必须依赖于体系化建构。在中国共产党建构的制度体系中，中国特色是关键表达，体制机制改革是促进制度释放效能的动力之一。1992 年，邓小平在强调改革时说：“恐怕再有三十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14] 372}建构一整套制度体系的设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系统观念的改革方法论。为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从党的十四大开始，历次党代会报告都对制度建设进行了重点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扎实推进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 512}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此后，中国共产党沿着这一目标，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部署。制度事关全局性、系统性，有效与否是其评价关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已有制度安排基础上，继续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努力。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立足中国发展的整体，坚持“三个更加注重”，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

其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坚持“三个更加注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勇毅前行、踔厉奋发，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增强了社会活力。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改革不能漫无目的，必须有的放矢。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制度框架内促进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约束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三个更加注重”。第一，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框架，实现整个制度体系的最优化，切实做到系统集成。第二，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框架中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制度体系，展现改革示范效应。第三，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不断创新体制机制，使制度更加符合基本国情。上述三点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之内理解“三个更加注重”得出的基本结论。

其三，只有坚持“三个更加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转化为治理效能。制度好坏，贵在看效果，重在察效能。相较于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促进社会发展上显示出极强的优越性。彰显制度优势，关键要通过治理效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既受制度本身科学性的影响，也受制度环境变化的限制。在制度环境中，制度之间的关系是重要因素。追求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最大化，要以制度之间的共识为基础。不同制度各司其职，才能在共识中形成合力，真正发挥协同作用。因此，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必须坚持“三个更加注重”的科学方法，做到整体把握、突出重点。

三、“三个更加注重”的理论定位

“三个更加注重”既指向改革的不同侧面, 也实现了改革理念的融会贯通。“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强调改革的整体性, 要求在全局视野下整体推进改革步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强调改革的结构性和, 要求在渐进变化中把握改革的合理进度。“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强调改革的实践性, 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改革的最大共识。

(一) “三个更加注重”指向改革的不同侧面

“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提出了进一步增强全面深化改革整体性的要求, 指向了对待改革的态度和观念。观念是实践的先导, 正确认识改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和基础。世界始终处在改革的通道中, 当前中国始终处在变革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 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2] 497} 改革是奔着问题去的, 问题是多方面的, 这就决定了改革不是局部修补, 而是要脱胎换骨、全面深化。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期, 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尽管新时代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整体性重塑和历史性成就, 但旧的问题解决了, 新的问题又会出现。新老问题交叠出现, 不仅增加了改革的难度, 也增加了改革的关联度。难度增加的同时, 力度也要加强。不谋全局者, 不足以谋一域。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个部分, 必须坚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

“更加注重突出重点”要求审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结构性和, 指向了改革的过程。全面深化改革决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 整体安排、协调推进是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需要考虑改革的优先性问题, 首先要改的是那些不得不改的、事关大局的领域。囫圇吞枣的改革只能造成“大水漫灌”, 反而会影响改革的科学性, 模糊改革的阶段性。根据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干事创业的环境不同,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也会有所调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 呈现出按步骤、有阶段、依重点的规律。改革的对象是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 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结构和国家关系。随着时代发展, 尤其是在内外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必须分清主次, 优化改革过程。不同时期改革重点任务不同, 多是按问题导向提出的, 如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农村改革、80 年代国企改革和价格改革、90 年代分税制改革、2000 年加入世贸组织, 以及 2013 年以后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9]。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更加注重突出重点, 就是要在改革的过程中发挥重点领域的示范作用, 进而不断优化改革的过程。

“更加注重改革实效”要求中国共产党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协同性。在系统集成和把握重点基础上, 改革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成绩、扎扎实实的效果, 真正做到惠及国计民生。改革既要坚持问题导向, 也要坚持目标导向。目标导向的一重含义就是求取改革的实效。改革的举措好坏、改革的力度如何、改革的步骤是否合理, 最终都要从改革的实效中寻找答案。改革的实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生产进步; 二是国家面貌更新; 三是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实际上, 人民群众评价改革成效的标准也是上述三个方面。可见, 改革成效不仅关涉人民对改革的

评价问题，还关涉国家与社会、政党与公民的和谐互动。评判改革好与坏、成与败的最终标准，就是实际效果，就是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的期待。2013 年至 2022 年，国内生产总值从 59.3 万亿元增长到 121 万亿元，年均增长 6% 以上，稳居世界第二位。10 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 12.3% 上升到 18% 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 30%^[20]。改革成效，跃然纸上。《决定》科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成效，为我们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更加注重成效提供了参照。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必须更加注重改革实效。

（二）“三个更加注重”是理念贯通的统一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在改革开放上决不能有丝毫动摇，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2]⁵⁰⁸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拉开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大幕，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既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路径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法抉择。坚持立足系统改，抓住重点改，盯着成效改，是中国共产党推动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三个更加注重”是一个有机整体，共同作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本体。

其一，“三个更加注重”实现了价值性与工具性的契合。合理性的本质是人在长期社会发展中进化出的能力。有学者基于社会现实，强调了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揭示了目的与方法统一性^[21]。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而言，价值性旨在表达改革是为了什么，工具性昭示改革要依靠什么。“三个更加注重”在坚持系统观念的工具理性基础上，阐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人民理念旨归。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22]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1978 年后的中国共产党坚定选择了改革开放，旨在继续推动社会革命。邓小平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14]¹³⁵改革就是革命，就是为了革除与中国社会不相适应的部分。既然是革除与中国社会不相适应的部分，那改革就必须坚持做到系统集成、突出重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方法的科学认识。更加注重改革实效，突显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指向。2013 年至 2022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6 500 元增加到 36 883 元，形成了超 4 亿人的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20]。改革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兑现了对人民的承诺。综上所述，“三个更加注重”实现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契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深化改革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政策工具箱”的有效扩充。可见，全面深化改革本身也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

其二，“三个更加注重”实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迫切需要”^[3]⁵⁰。可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考量和目标任务之一就是为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重视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变革、社会进步的规律性认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

樊士博.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 “三个更加注重”的思想意蕴与实践要求[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5): 90-103.

泽东指出: “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 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23]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基本原理, 要求我们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三个更加注重”既强调把握关键环节, 也强调系统观念, 体现了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其三, “三个更加注重”实现了继承性与发展性的共生。改革开放事业起步以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重点推进、坚持注重实效。但随着改革的深入, 科学概括原有的改革方法论并在强调程度上更进一步, 是顺应新时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三个更加注重”中的“更加”二字, 彰显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发展的观点, 强调在原有基础上巩固提升。这一点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中的“继续”二字相得益彰。在“继续”改革中突出“更加”, 足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与勇气, 而这也体现了“三个更加注重”的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

(三) “三个更加注重”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发展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步, 改革不断前进也能为发展提供强劲动力。邓小平曾强调: “不要拒绝变, 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14] 73}思想方法决定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注重系统集成, 注重突出重点, 注重改革实效, 是新时代我们党领导改革事业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24]。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改革成就, 清晰地证明这一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有效性, 必须长期坚持并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深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科学总结这一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时, 作出了程度上的强调, 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面, “三个更加注重”是重要思想方法, 阐明了新时代新征程如何认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如何科学处理改革中的复杂关系。时代在发展, 改革不停步。开弓没有回头箭, 改革永在进行时。新时代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三个更加注重”就是从中凝炼而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全面深化改革中尤其重视“系统集成”。2020年12月30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谈到改革组织方式时, 就用了“系统集成”^[25]来表达全面深化改革的现状。党的十八大以来, 坚持把握重点更是铺陈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之中。比如, 他在论述科技改革中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时强调: “面向未来,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 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26]这些论述涉及改革的具体领域, 是推动改革向实践转化的重要思想指南。“三个更加注重”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具体领域改革论述基础上高度凝练的结果, 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方法。

另一方面, “三个更加注重”是重要工作方法, 诠释了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如何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质增效。思想方法转化为工作方法, 体现的就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27]。一语不能践, 万卷徒虚空。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更不可能一劳永逸。“三个更加注重”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过程中, 既要做到综合性改革与领域性改革相统一, 也要做到重点领域改革与总体改革任务相匹配, 还要做到综合效果与长远效果相统一。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作为“三个更加注重”的理论定位, 揭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改革的宏阔历史视野。

四、“三个更加注重”的思想指向

《决定》强调：“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3〕 3-4}。“三个更加注重”指向了“三个更好相适应”，分别从动力、制度与能力层面揭示了理论的逻辑链条。

（一）动力再造：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好相适应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从马克思恩格斯最早的理论阐释来看，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以及生产资料。可见，生产力本身就是一个系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必须注重系统集成、把握重点。马克思恩格斯在认识劳动的基础上，对生产力的作用进行了深刻揭示，他们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28〕}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然包含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容。邓小平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14〕 134}此外，中国共产党推动改革开放，必须满足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就包含“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内容。生产力是一个系统，促进生产力提升同样需要遵循系统观念，而这也是“三个更加注重”的题中之义。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否则就会出现脱节，甚至是冲突，阻碍社会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是自成体系的两个部分，又是有机统一的一个整体。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好相适应，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动力保障。生产力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改革就是为了革除制约生产力的因素。从中国社会的整个系统、改革的重点领域以及成效突破上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推动改革走向深处的重中之重。为促进生产力形态跃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建立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动力再造。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显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决心和信心^{〔29〕}。新质生产力是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决定》要求：“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3〕 10}。显然，这是在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系统论指导下坚持重点突破，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确证。从传统生产力走向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三个更加注重”中促进生产力要素优化组合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好动能储备。

（二）制度保障：推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

“三个更加注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法论，要在遵循系统性基础上，不断推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经济基础是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又决定了法律、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在政党政治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主要面貌体现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联动中，尤其是上层建筑展现出的制度形态、文化价值形态、法律模式等内容构成了世界打量观察本民族发展的窗口。

樊士博.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 “三个更加注重”的思想意蕴与实践要求[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5): 90-103.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 提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 包含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深刻意涵。为了提升效能, 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机互动中, 需要更加注重整体观念, 做到从全局把握, 形成整体观照。

为进一步推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适应,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三个更加注重”为方法导向, 提出了 300 多项改革举措, 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显示出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变革的努力。从上层建筑中的法治层面来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只有法治昌明,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能畅通无阻。为推动全面依法治国, 《决定》进一步打通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 强调“探索区域协同立法”^{[3] 30}。党的十八大以来, 法治建设的进程不断加快, 从上层建筑高度保证了社会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 尤其体现在通过法治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践。这些改革举措坚持从系统出发, 既有重点的把握, 也有实践的延续, 鲜明彰显了“三个更加注重”的科学方法论。从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层面来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进一步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 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政治期待。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在于厚植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基础。《决定》抓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 要求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完善协商民主体系, 加强各种协商渠道协同配合。这些举措体现了上层建筑与社会结构变化相适应的改革, 彰显了“三个更加注重”的理论可贵。从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层面来看, 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更加深入。《决定》要求“必须增强文化自信,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弘扬革命文化,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3] 32}。发展多种形式的文化, 是为了适应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的现实。在日益复杂的社会发展中, 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呈现多样化态势。可见, 立足整个社会大系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共产党应当始终坚持“三个更加注重”的科学方法论。

（三）能力提升：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国家治理是政党能力的体现。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 “三个更加注重”能够积极推动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现象的复杂程度, 因此中国共产党要依靠改革化解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良现象, 进而形成正确的价值引领。选择什么样的改革方法论, 既是改革策略的展示, 也是能力的表现。改革不是政党治国理政的单向决策, 而是政党与社会的双向互动。新时代以来, 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重要目标之一便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体系与制度体系关系密切, 治理能力受社会参与的深刻影响。社会力量充分参与, 才能保证社会稳定。“一个成功的中国将成为一个在保持经济高度增长的同时设法保持了总体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国家。”^[30]改革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发展, 但改革也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 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就势必从治理能力入手。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多元主体。故而, 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三个更加注重”, 将治理放到社会发展的大场景、大视野中予以考虑, 并且应当突出重点, 提升治理效能。

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利于更好推动社会发展。首先从功能上看, 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决定社会面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转型、社会变革提供制度基础。政治整合与国家认同构成了国家建构的两面^[31]。全面深化改革, 要不断释放社会活力, 增强社会各种要素的活跃度, 进而完成社会

的政治整合，最终形成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三个更加注重”要求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及时关注社会实际变化，不断促进重要制度的完善，有助于推动社会更好发展。其次从结构上看，国家治理能够在政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互动中稳定社会结构，满足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建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结构得到优化，社会面貌实现巨大转变。显然，这是在坚持“三个更加注重”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最后从方式上看，在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合作互动中，中国共产党开创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精细化治理新路。社会是一个复杂整体，国家治理更好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必须做到“三个更加注重”。

五、坚持“三个更加注重”的行动理路

坚持“三个更加注重”不是悬于空中的口号，而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选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政治，做出了更加科学的安排，为 2035 年实现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三个更加注重”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场域，要以党的全面领导为主要抓手，要根据国际局势变化主动作为，要坚定不移发扬钉钉子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32]。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促进伟大事业向前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惟其艰巨，所以伟大；惟其艰巨，更显荣光。”^[33]中国式现代化构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3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提出了若干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较之于党的二十大阐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战略性支撑、鲜明标识等方面提出了新表述、新论断。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三个更加注重”，必须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最新发展成果。

其一，坚持“三个更加注重”，有利于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法治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党的十四大作出部署，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共产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认识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积累了物质基础^[35]。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已有实践上，首次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这一论断基础上，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作用。在发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坚持“三个更加注重”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将法治表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发展经济、完善市场、货物流通，都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良法善治的过程中优化营商环境，统筹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正是因为遵循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安排和重点任务，中国共产党人才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问题，这也是坚持“三个更加注重”的表现。

樊士博.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 “三个更加注重”的思想意蕴与实践要求[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5): 90-103.

其二, 坚持“三个更加注重”, 有利于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力量。19 世纪前, 人类技术进步的速度不超过 0.05%, 意味着每 1 500 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但是过去的 200 年, 技术进步率达到 1.5%, 是 19 世纪前的 30 倍, 意味着每 50 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36]。可见,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大提出: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37]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此基础上将教育、科技、人才表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决心和理论升级。在科技革命愈演愈烈的情势下, 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 目的是在协同中找到攻坚克难的方法。在第四次科技革命深入展开的时代,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有利于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智力基础, 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厚植优势。教育、科技、人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 是着眼于整个社会结构中的支撑。

其三, 坚持“三个更加注重”, 有利于擦亮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封闭不得人心, 僵化死路一条。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 至今仍警醒世人。一个民族的发展决不能缺少参照, 更不能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改革开放包括改革与开放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是有机统一, 有助于我国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将国内与国外的互动联系起来, 本身就是“三个更加注重”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是开放中的历史成就。“更加注重系统集成”, 就是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实践中注重系统优化。“更加注重突出重点”, 就是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实践中抓住要点, 实现突破。重点改革, 能够取得重大成效。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 2013 至 2022 年, 我国吸引外资规模以人民币计连续 10 年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 我国吸引外资规模近 5 000 亿元, 处于近 10 年来的高位^[38]。比如, 从中国出口的“老三样”转向中国出口的“新三样”, 就是利用开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现。“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就是要切实发挥出中国式现代化在开放中的实践效能, 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意义。

六、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 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 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39]“三个更加注重”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宝贵历史经验, 反映出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实践观点的深刻哲理, 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共产党要在顶层设计上做好系统性文章, 以关系全局的重要方面和重大问题为提纲, 切实发挥经济改革的牵引作用, 实现重点突破, 进而做到握指成拳、聚沙成塔、效果集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绝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 而是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 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 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切实防止四面出击、分散用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必须把政策落实、求取实效放在关键位置, 用实实在在的成绩、扎扎实实的成效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统工程, 必须在“三个更加注重”方法论原则下作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 进而实现整体性推进。面向未来, 改革仍有很多难啃的

硬骨头，我们必须坚持“三个更加注重”的科学方法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谱写新篇章，保障中华号巍巍巨轮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审议《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N]. 人民日报, 2024-05-01 (1).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509.
- [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2.
- [4] 杨明伟. “三个更加注重”深化了我们党对改革问题的理论认识 [N]. 学习时报, 2024-08-02 (1).
- [5] 王伟光.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J]. 红旗文稿, 2024 (14): 4-8.
- [6] 赖先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做到“三个更加注重” [N]. 学习时报, 2024-05-17 (1).
- [7] 张连起. 从“三个更加注重”中“找准星” [N]. 人民政协报, 2024-05-23 (5).
- [8] 董振华. 坚持“三个更加注重”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4 (6): 26-30.
- [9] 张占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改革推向前进 [N]. 经济日报, 2021-07-24 (10).
- [10] 习近平. 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435.
- [11] 毛泽东文集: 第 8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83.
- [12]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18-01-06 (1).
- [1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738-739.
- [14]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17.
- [15] 江泽民文选: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254.
- [16] 胡锦涛文选: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98.
- [1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784.
- [18] 蔡昉.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1978—2018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6.
- [19]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9.
- [20] 数据见证新时代伟大成就 (新数据 新看点·特别报道) [N]. 人民日报, 2023-12-13 (6).
- [21]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 第 1 卷 [M]. 阎克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144.
- [2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 第 1 卷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1.
- [23]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36.
- [24]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 [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2024: 10.
- [25]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95.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21.
- [27] 李忠杰. 深刻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 [J]. 国家治理, 2024 (11): 3-4.
-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60.

樊士博.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 “三个更加注重”的思想意蕴与实践要求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90-103.

- [29] 刘庆莹, 张莹. 面向共同富裕的新质生产力: 理论演绎与培育路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3): 77-87.
- [30] 李侃如. 治理中国: 从革命到改革 [M]. 胡国成, 赵梅,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352.
- [31] 安德烈亚斯·威默. 国家建构: 聚合与崩溃 [M]. 叶江, 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1.
- [32] 蒲清平, 马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进路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4): 1-10.
- [3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27.
- [34] 谭敏, 吴阳松.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理论谱系与实践进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82-94.
- [35] 朱忆天, 朱浚. 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核心要义及推进路径——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J/OL].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11 [2024-08-04]. <https://kns-cnki-net.proxy.ecnu.edu.cn/kcms/detail/50.1023.c.20240723.1051.002.html>.
- [36] 张维迎. 市场与政府 [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4: 15.
- [37]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7.
- [38] 上半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14.2% (新数据 新看点) [N]. 人民日报, 2024-07-15 (1).
- [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34.

责任编辑: 王京菁



六维驱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动力要素与作用机理

邓海龙¹ 牛宝琨²

(1. 天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2.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历史性成就的取得得益于诸多动力要素的优化组合与有效驱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是由改革源动力、政党领导力、人民推动力、目标导向力、制度执行力、实践创新力等多种动力要素构成的动态系统。其中，改革源动力是指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政党领导力是指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人民推动力是指以人民为中心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立场；目标导向力是指实现强国复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制度执行力是指加强制度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实践创新力是指推动实践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源头活水。这些动力要素相互交织、相互补充，在协同耦合中形成了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竭动力。这一作用过程不仅从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何以实现等微观层面系统揭示了六维动力要素的各自运作逻辑，更在宏观层面上彰显了多种动力要素共同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DOI: 10.13946/j.cnki.jcqi.2024.05.009

作者简介：邓海龙，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大学基地研究员；牛宝琨，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天津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使命及实现机制研究”（2024XMZ-0020）；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科研创新重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2024ZD004）

引用格式：邓海龙，牛宝琨. 六维驱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要素与作用机理[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5）：104-114.

的机理与效果。中国式现代化越向纵深推进, 越需要加强对众多动力要素的系统集成, 提升各动力要素的关联性、互动性、协同性、系统性, 形成各动力要素同向发力、高效运转的动力机制。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动力机制; 全面深化改革; 制度建设; 党的领导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2024)05-0104-11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既遵循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又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 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2024年7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既指明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关键时期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 又针对新时代背景下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系统且全面的重大部署。《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已然成为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主题。为达成这一历史使命, 亟需深入剖析并梳理总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多元动力要素, 通过有效激发各动力要素之间的协同效能, 构建系统、全面的动力机制, 为新时代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是一个构成多元、系统全面、运行有序的复杂综合系统, 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方面的推动力。梳理当前学术界对中国式现代化动力机制的研究现状发现, 既有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现代化发展的某一具体方面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动力展开研究。此类观点认为, 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激发释放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动力^[1],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多元动力^[2],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动力^[3],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强大保障力^[4], 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自身领导能力的强劲动力^[5], 以人民群众作为主体力量凝聚统一战线的广泛动力^[6]等。二是从动力机制的系统构成角度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动力展开研究。此类观点认为,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持续获得历史性进展, 不单是社会发展中某一具体层面的动力所致, 更在于其拥有构成多元、系统全面、运行有序的动力机制支撑。具体而言, 学者们坚持以系统思维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要素, 基于各动力要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定位和作用, 将之分为内源驱动型、效能驱动型、价值驱动型等三类驱动力^[7]; 分为奠基层、运行层和保障层三层动力要件^[8]; 分为根基性、过程性和保障性三层动力结构^[9]; 分为内源型动力因素和外源型动力因素^[10]等。三是从动力机制的运行逻辑和作用机理角度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动力展开研究。此类观点认为, 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其动力机制内部诸要素的有效运行和协同配合。学者们基于对机制本身的运行机理分析, 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激发机制划分为领导主体的动力产生与增强机制、建设主体的动力激活与凝聚机制、外部力量的辅助性动力调动与协调机制^[11], 或分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主导性动力机制、人民群众积极创造的主体性动力机制、党和人民互动配合的协同性动力机制^[12]等。

概言之, 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动力要素、系统构成、机制运行三个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动力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研究, 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内容丰富、详实

有据的数据支撑，但缺乏结合时代要求和基本国情对中国式现代化动力机制的内容细化研究和运行逻辑分析。鉴于此，本文结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从改革源动力、政党领导力、人民推动力、目标导向力、制度执行力、实践创新力六个方面，系统阐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要素，并以此为内容支撑，探索该动力机制的运行逻辑和作用机理。

二、改革源动力：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时代最大的政治，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是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法宝，是破解中国式现代化制约因素的内在要求，是正确处理重大关系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逻辑必然。

（一）党依靠深化改革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和依靠深化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实践过程中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13]改革开放这一重大方针政策的历史出场与现实提出，在新时期成功为中国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和实践伟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接续奋斗，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深化改革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成功在新时代推进并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正如《决定》指出：“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14]坚持深化改革，是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法宝。

（二）破解中国式现代化制约因素必须全面深化改革

新时代，破解中国式现代化制约因素内在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展现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部署的系统性、全面性和协同性。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现代化进程是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化发展过程，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的发展要求。日益多元化的制约因素和发展矛盾随之显现出来。为有效破除一切制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矛盾因素，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15]其中，深入推进改革创新作为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内在要求，是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的关键举措。《决定》首次以“七个聚焦”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方向，反映了党对全方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为有效破解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制约因素，应当坚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措施，不断增强各发展领域之间的关联性和协同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改革源动力。

（三）正确处理重大关系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正确处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关系,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根本动力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逻辑必然。关于如何深刻认识、系统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16], 并列举阐明了六对关系及其处理方针。这一系统论断, 为我们精准把握、有效应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大关系与难点问题, 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多目标达成、多主体参与、多路径实施的复杂系统集成, 其内部的动力结构错综复杂, 各动力要素之间相互交织、相互作用, 形成了差异化、多元化的动力机制。其中, 顶层设计的科学性与实践探索的灵活性如何有机统一, 总体全局的战略考量与具体领域的战略布局如何相辅相成, 深化改革过程中新旧目标如何有效衔接, 都是必须妥善解决的重大关系问题^[17]。因此, 深化改革不仅是正确处理重大关系的“金钥匙”, 更是激发潜能动力的“催化剂”。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才能打破束缚现代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对其动力机制进行系统全面的整合优化, 并推动各项改革举措有效衔接, 从而汇聚起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强大合力。

三、政党领导力: 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并非自然演进的结果, 而是中国共产党以高度历史自觉、坚定不移探索并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体现。在此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不仅带领中国人民主动创新、锐意进取, 展现了主动创造力; 更积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 熔铸自觉引领力, 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保障与强大动力。

(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主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力量

在当代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中, 现代化进程离不开政党的坚强领导。一个政党若能在其领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强大的主导力与执行力, 必将为这一历史进程提供根本保障。自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就坚持带领中国人民主动探索既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又契合时代要求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 我国相继走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征程, 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完善了制度保障; 提出了改革开放与深化改革的战略构想,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不竭的强大动力。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思考与科学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的深刻教训与宝贵经验,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主动创新、锐意进取, 打破了各种限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机制障碍, 成功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纪元。事实表明,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主动发挥其政党领导力, 中国式现代化就无法取得显著成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8]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 不仅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前途命运, 更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正确方向。

(二)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主动创造力

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领导力和执政力, 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 充分发挥了主动创造力, 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党“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 “为人民而生, 因人民而兴, 始终同人民在一起, 为人民利益而奋斗”^[19]。中国式现代化是对马克

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执着坚守，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人民群众接受并践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生动实践，深刻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深切向往与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有机融合^[20]。在此进程中，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拥有的领导能力和统战思维，才能有效激发中国人民的积极性、自主性与创造性，进而以统一战线的方式将人民群众的磅礴伟力汇聚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21]。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主动创造力，以系统观念和整体思维，团结带领人民群众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不断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协调发展，创造了一个既符合现代化建设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三）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熔铸自觉引领力

近代以降，中国人民意识到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囿于制度落后、认知偏差、经验局限等多重因素制约，在选择现代化道路时，只能围绕西方式现代化发展模式艰难抉择。这一抉择历程充满了挑战，间接导致了中国的现代化探索道路举步维艰、屡受挫败。究其根本，正是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来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自觉肩负起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任务，成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强大主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深刻阐明“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22]。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中国共产党便投身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奋斗实践中。在此过程中，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熔铸了自觉引领力。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政治保障、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以意识形态引领力夯实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以强大的政党领导力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保证。

四、人民推动力：以人民为中心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立场

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中国人民自己的事业。其意义深远，在于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其动力源泉，在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性力量；其根本目的，在于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实现人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立场具有丰富的理论表现，就其本质而言，“人的现代化”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价值立场的中心内容和意义呈现。所谓人的现代化，是指作为社会存在的现实的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社会关系、价值判断等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马克思提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现实的人”，指出“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23]。相应地，作为“人的现代化”进程中主体的“现实的人”与现代化发展的关系是前者创造推动了后者，而后者是前者内在规定和主体能力的现实走向和实践确证。因而，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发展的中心内容和意义呈现，实现人的现代化彰显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价值旨归。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把实现人的现代化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24]，并强调“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25]。这一科学论断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

发展方向, 确立了价值立场。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了人民即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现代化, 是依靠人民即以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力量为手段的现代化, 是造福人民即以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人的价值为归宿的现代化。换言之, 实现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得以真正彰显的必然进路。

（二）人民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力量

唯物史观认为, 人民是社会历史的创造主体, 是推动现代化事业发展的主体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历史反复证明,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25]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人民作为立党之本和力量之源, 不仅继承了唯物史观中人民是历史创造主体和社会发展力量的核心观点, 还成功地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实践, 探索出一条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 团结群众、塑造人民, 成功推翻了三座大山, 建立起新的政权架构, 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政治条件, 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学”^[26]。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党依靠人民力量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 改变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发展面貌,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 党基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现实需要, 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战略举措, 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动力源泉。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 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站稳人民立场, 明确提出要“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27]的重要论断。这体现了党对人民主体力量的重要地位与关键作用的认识更新和路径深化。综上,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超越以资本驱动社会发展的西方现代化模式, 关键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力量。

（三）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演进, 《决定》指出: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4]。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 是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和发展逻辑。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社会主要矛盾深刻转变, 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并明确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 在保持经济稳健增长的同时, 如何更有效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样化、高品质需求, 并着力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高质量发展是对这一时代课题的积极回应。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 “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28]。新时代以来, 我国已经迈进了一个由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新阶段。在此基础上, 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首先要把人民摆在社会发展的最高方位, 将增进民生福祉确立为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 其次要紧紧依靠人民, 尊重人民的创造意愿, 激发人民的创造活力,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源泉; 最后要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推动高质量发展向纵深发展, 努力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发展格局, 进而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五、目标导向力: 实现强国复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强国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使命任务, 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目标明确方向, 实践确证目标。强国复兴的宏伟目标为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为强国复兴充盈了持久生命力、淬炼了强大推动力, 现实确证了其目标导向力。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向强国复兴的康庄大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建立近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9〕}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目标使命，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目标引领。一方面，强国建设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目标引领。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全面实现现代化，使中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得到显著提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强国复兴战略目标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实践^{〔30〕}，在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逐步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另一方面，民族复兴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目标引领。民族复兴的使命目标，就是中华民族通过不懈努力，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领域实现全面发展，进而在国际上重新赢得尊严和地位。在民族复兴使命目标的引领下，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共克时艰，推动着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强国复兴充盈持久生命力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思想精髓作为内容支撑，为实现强国复兴充盈持久生命力。从演进历程看，中国式现代化深植于近代中华民族对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愿景与理想追求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辉煌成果。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3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脉，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中国式现代化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日新月异、常变的思想精髓，扬弃和超越以资本驱动社会发展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探索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新道路。这一实践过程是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因素和底层逻辑，不断自我革新、自我超越的生动体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与现代性深度融通的必然产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复兴，就是以其兼具恒常与革新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实现强国复兴的宏伟目标充盈持久生命力，不断使其内涵本质和表现形态得到赋能更新，进一步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久的目标导向力。

（三）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强国复兴淬炼强大推动力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在各领域、各方面的全面现代化转型，既需要物质基础提供的根本保障，又需要精神力量的内在驱动。二者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要素。毛泽东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32〕}任何单方面强调物质基础而忽视精神动力，或是强调精神追求而脱离物质基础的支撑，都将导致现代化事业受阻或偏离。近代以降，列强的侵略战争彻底打破了当时封建统治者所沉浸的“天朝上国”迷梦。在此时代境遇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逐步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百余年的接续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一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探索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它不仅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使命，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员百余年来拼搏奋进、开拓进取的精神基因。这个精神力量和物质保障形成合力，共同成为实现强国复兴伟大事业的强大推动力。

六、制度执行力：制度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加强制度建设既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核心要义，又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把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另一方面，要以制度建设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续航力。

（一）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任何一种现代化模式都需要立足于一定的制度基础与社会体制之上，这是确保现代化目标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同样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33]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条件，决定了我国选择并实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走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随着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转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以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成效实际为客观依据，服务于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34]。进入新时代，日益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等背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也亟需进一步自我发展和完善。

（二）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是相互交织、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体。具体而言，制度优势是发挥治理效能的现实基础与先决条件，治理效能是制度优势转化成效的检验标准。制度执行力作为执行主体完成既定制度建设目标的实际效能，是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35]。一方面，制度优势作为一种蕴藏在制度内部的制度性能，只有借助执行主体的能动力量，才能发挥应有的实际效能。在此过程中，制度性能的发挥程度，既依赖于制度本身的完善情况，也取决于制度执行力。制度的有效执行能够确保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另一方面，国家治理效能作为国家将治理目标转化为治理成果的能力及其所取得的治理效果，是检验制度优势转化成效的重要依据。制度目标的实现程度越高，证明制度执行力越强。可见，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将其内蕴的制度性能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就要充分增强制度执行力，确保各项制度得到有效落实。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要注重制度的科学设计和不断完善，更要加强和巩固制度的执行机制，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制度体系。总之，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须充分发挥制度执行力这一关键环节的重要作用。

（三）以制度执行力激活制度效能

制度效能的激发与释放离不开制度执行力的动力支撑。制度执行力是连接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的桥梁纽带，是检验制度生命力的重要依据，更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关键。《决定》指出“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14]，并将“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14]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这表明，制度建设的目标在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制度建设赋能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制度执行力的动力支撑。具体而言，这表现在“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14]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在综合作用中发挥强大效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制度执行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制度优势能否充分发挥、治理效能能否显著提升。因此，我们必须以制度执行力为抓手，通过完善执行机制、提升执行主体能力、加强社会协同等措施，确保各项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和全面落实。

七、实践创新力：实践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源头活水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它不仅为发展中国家开辟了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更向全世界展现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范式。在这一进程中，实践创新作为不竭的能量场，其力量发挥是释放中国式现代化动力源的关键所在。

（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各国前进发展的必然选择。世界各国在社会关系、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基本国情和发展实际上存在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没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模式。当前，尽管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成功踏上并完成了现代化进程，但其发展模式却无法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照搬套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36]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项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宏伟创举，它摒弃了西方现代化以对外扩张为手段、以资本积累为目标的现代化模式，探索出了一条既遵循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又适合中国基本国情、植根中国历史文化沃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以资本逻辑驱动社会发展、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发展机制，而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主张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和自身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宣告“现代化=西方化”狭隘论调的彻底失败，打破了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解释权和话语霸权。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拓宽了探索现代化的多元路径，更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现代化新路径。可以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不仅为我国进一步实现强国复兴的宏伟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世界现代化进程贡献了中国方案。

（二）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

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与改革实践的产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5]²²这一历史进程深刻诠释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命题，彰显了党领导中国人民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伟大精神。一方面，实践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动力源泉。面对国内国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复杂挑战，我们党坚持从实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在实践中寻找新思路、破解新难题。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先导，每一次实践创新都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另一方面，实践创新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提

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展现了中国实践的理论底蕴。

(三) 从总体部署和具体举措来保障创新路径

实践创新是持续释放和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的动力源。实践创新有助于充分挖掘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潜力。《决定》指出:“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14]创新作为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被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首先,就总体部署而言,要以守正创新为引领,紧密围绕实践发展的实际需要,全面推动理论、实践、制度、文化等各方面创新,形成协同发展的创新思维。其次,就具体举措而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实践创新引领;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实践创新活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障实践创新成果;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动实践创新深度融合;推动数字社会治理,提升实践创新服务效能等。未来,应秉持更为明确的目标导向、更为具体的实践举措、更为开放的国际视野,坚定不移地推进实践创新,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八、结语

从动力发生学的角度探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既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在动力成因上的理性回答,也是对如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实践课题的科学探索。从动力机制的要素构成和作用机理上看,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是处于最深层次的内源性力量,起着扫除障碍、夯基垒台、积厚成势的奠基性作用;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是处于最高层次的政治领导力量,起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人民为中心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立场,是处于主体地位的决定性力量,起着促进团结奋斗、凝聚磅礴伟力的作用;实现强国复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处于引领地位的牵引性力量,起着引领助推、导向激励的作用;加强制度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是处于“主线”地位的主轴性力量,起着管根本、管长远的作用;推动实践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源头活水,是处于基础地位的创新性力量,起着推动先行先试、大胆创新探索的作用。这些动力要素各有内涵、自成系统,又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支撑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中国式现代化越向纵深推进,越需要加强对众多动力要素的系统集成,提升各动力的关联性、互动性、协同性、系统性,形成各动力要素同向发力、高效运转的动力机制。唯有构建要素齐全、功能完备、运行高效的动力机制,我们才能更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 [1] 包心鉴. 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和根本动力[J]. 山东社会科学, 2024 (7): 5-16.
- [2] 张林.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J]. 经济学家, 2024 (3): 15-24.
- [3] 刘海春, 张力一翔.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源、思想动力与价值超越[J]. 求实, 2023 (6): 4-16+107.
- [4] 范晓慧. 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及其文明史意义[J]. 湖湘论坛, 2023 (6): 88-100.
- [5] 张泰.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点与推进机制[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 (2): 12-20.
- [6] 谭敏, 吴阳松.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理论谱系与实践进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82-94.
- [7] 于安龙.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动力论析 [J]. 上海经济研究, 2022 (5): 67-76.
- [8] 胡洪彬.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系统: 内在结构、运行机理与整合优化 [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 10-18.
- [9] 郑志康. 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的动力密码 [J]. 求实, 2023 (3): 4-17+109.
- [10] 邹升平, 程琳.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来源、生成模式与优化路径 [J]. 求实, 2023 (4): 4-16+109.
- [11] 韩喜平, 刘一帆.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理与激发机制 [J]. 河南社会科学, 2024 (1): 11-17.
- [12] 胡洪彬.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生发逻辑、内在机理与成功密码 [J]. 学术界, 2021 (10): 94-104.
- [13]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8 年 12 月 18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4.
- [14]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4-07-22 (1).
- [1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7.
- [16] 习近平.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 [J]. 求是, 2023 (19): 4-8.
- [17] 蒲清平, 马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进路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4): 1-10.
- [18]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8.
- [19]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2021 年 2 月 20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5.
- [20] 臧秀玲, 李政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独特优势与基本经验 [J]. 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3): 1-9+159.
- [21] 张献生. 统战思维: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3-21.
- [22] 习近平.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J]. 求是, 2023 (11): 4-7.
-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
- [24] 习近平. 论“三农”工作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58.
- [25] 习近平.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J]. 求是, 2024 (7): 4-13.
- [26] 汪仕凯. 将人民带回中国政治研究 [J]. 政治学研究, 2023 (2): 129-139+172.
- [27] 习近平.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21 年 2 月 25 日) [N]. 人民日报, 2021-02-26 (2).
- [28] 习近平. 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503.
- [29] 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302.
- [30] 李应瑞. 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强国复兴的团结底色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5): 22-34.
- [31] 罗安宪. 诗经选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19.
- [32] 毛泽东文集: 第 8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21.
- [3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286.
- [34] 马雪松.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政治学阐释 [J]. 理论与改革, 2022 (2): 123-134.
- [35] 秦舒展. 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制度执行力考察 [J]. 河南社会科学, 2024 (7): 41-47.
-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7.

责任编辑: 龚静阳



美国歪曲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 历程、表现与本质

伍俐斌 张骏

（中山大学 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肯定了一个中国原则，是绝大多数国际组织处理所谓台湾参与问题的基本遵循，没有产生过任何争议。美国出于对华全面竞争与对抗的目的，以扩大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为借口，以多种方式歪曲 2758 号决议：一是美国学界和政界无中生有地制造所谓 2758 号决议“争议”；二是推动台湾取得国际组织的“适当”资格，掏空 2758 号决议。从未来动向看，美国妄图迫使联合国大会重新解释 2758 号决议或者通过替代决议。美国歪曲 2758 号决议的本质，是妄图用其“一个中国政策”取代一个中国原则，抢夺台湾问题的主导权；在国际上打造价值观同盟，展开对华意识形态竞争；与“台独”势力合流，妄图遏阻中国统一。美国歪曲 2758 号决议可谓动作频频、来势汹汹。中国应静观其表现、洞察其本质，采取针对性措施，打好打赢这场围绕 2758 号决议的“法律战”。

关键词：台湾问题；2758 号决议；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台湾

中图分类号：D618；D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5-0115-13

DOI：10.13946/j.cnki.jcqis.2024.05.010

作者简介：伍俐斌，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港澳和海外统战工作理论广东研究基地研究员；张骏，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武装冲突法的新发展及对国家反分裂武力行动的适用问题研究”（22BFX166）

引用格式：伍俐斌，张骏．美国歪曲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历程、表现与本质 [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5）：115-127．

一、问题的提出

2024 年 4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马英九时指出：“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同追求和平统一的美好未来，把中华民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2024 年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但美国长期以来不断以各种方式干涉台湾问题，妄图阻碍两岸统一、干扰中国发展进程。近年来，美国学界和政界密集歪曲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企图以“法律战”方式干涉台湾问题。

1971 年 10 月 25 日，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决议，即第 2758 号决议。决议规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1]该决议通过后，联合国系统的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相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在此后的数十年间，2758 号决议从未被质疑，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接受，绝大多数国际组织均参照 2758 号决议对所谓台湾的参与问题进行了处理。2758 号决议肯定了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组织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确立了基本遵循^[2]。

近年来，美国屡次歪曲 2758 号决议。2022 年 3 月，庄婉桦（Jessica Drun）和葛来仪（Bonnie S. Glaser）共同发表《歪曲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限制台湾进入联合国》^[3]的所谓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庄葛报告）。2024 年 4 月 29 日，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又一次发表歪曲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的报告。该份报告由雅克·德莱尔（Jacques deLisle）和葛来仪联署，即《为什么联合国大会 2758 号决议不能确立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基于法律的视角》^[4]（以下简称德莱尔-葛来仪报告）。2024 年 7 月 30 日，主要由美西方反华议员成立的所谓“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年会在台北举行，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歪称，1971 年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原文中，并未提及台湾、更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主权，也并未阻止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未来将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相关国际组织，并且在各国国会推动这项决议。赖清德在会上妄称“大陆‘错误’诠释联大 2758 号决议是为了建构武力‘犯’台的法理依据”^[5]。2758 号决议再度成为近期西方反华政客和台湾当局攻击的对象。

美国是近年来制造和炒作所谓 2758 号决议“争议”的始作俑者。可以预料，在美国操弄下，反华政客和赖清德当局未来仍将拿 2758 号决议做文章。为反制美国、捍卫一个中国原则，有必要对美国执意歪曲 2758 号决议的历程、表现与本质予以深入剖析。

二、美国歪曲 2758 号决议的历程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地区能否参与国际组织应由中国政府决定，不受外国干涉。2758 号决议是绝大多数国际组织处理所谓台湾参与问题的基本遵循。在决议通过后的 50 年间，美国也几乎

未提过质疑。中美建交后, 美国可以与台湾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但美国坚持支持台湾以某种身份参与国际组织, 已经超出了非官方关系的范畴, 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自从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以来, 美国持续加强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 加大力度干涉台湾问题, 以各种方式歪曲形成已久的关于 2758 号决议的国际共识。

(一) 美国歪曲 2758 号决议的伏笔

中美建交后, 美国在台湾主权归属问题上有意保持模糊态度。在所谓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问题上, 美国始终未彻底放弃对台湾当局的支持。

20 世纪 80 年代, 在解决海峡两岸就参与亚洲开发银行和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争议时, 美国始终坚持维系台湾当局以适当身份继续保留亚洲开发银行和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资格。至 20 世纪 90 年代冷战结束, 美国重新调整对台政策, 支持台湾以某种形式参与不以主权国家为身份的国际组织成为其基本立场。1994 年, 美国总统克林顿称, 在适当时机支持台湾加入不限以国家为会员的国际组织, 并设法让台湾在无法加入的国际组织中表达意见, 但对于联合国等政治敏感度较高、以主权国家为成员资格的国际组织, 美国并不支持台湾参与。1998 年 6 月克林顿访问中国时, 公开说出对台“三不”政策, 其中强调: “反对台湾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或是任何以国家名义为会员资格的国际组织”。1998—2000 年, 美国继续明确表示不支持台湾参与必须以主权国家身份活动的国际组织^[6]。

在参与世界卫生组织问题上, 1997 年 5 月台湾在时隔 26 年后首次通过所谓“友邦”提案申请成为世界卫生大会 (WHA) 的“观察员”。美国虽表示支持台湾在 WHA 发挥作用, 但也认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务委员会不是讨论此案的适当场所, 最终在议程表决时投了弃权票^[7]。小布什上台后, 美国多次表态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随后在奥巴马时期, 美国也多次声称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不过, 总体而言, 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时期, 美国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基本停留在政治表态层面, 实质性动作较少^[6]。

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时期发生了一件当时影响力有限、但如今看来很可能成为分水岭的事件。2007 年, 陈水扁操弄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援引 2758 号决议拒绝了台湾当局的申请。潘基文表示, 联合国的会员资格要由会员国来决定, 而且只给予有主权的国家。2758 号决议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且合法代表全中国的政府, 联合国因此认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潘基文的表态刺激了美国。针对潘基文的立场, 美国迅即表达无法接受, 其在《关于台湾地位的非正式文件》中歪称, 联合国大会在 1971 年 10 月 25 日通过的第 2758 号决议, 并未确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省, 该决议仅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并未提及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3-4, 8]。当时, 美国的做法并未对 2758 号决议产生持续性、实质性影响, 但如今看来, 美国的这份非正式文件标志着在台湾所谓“国际地位”问题上, 2758 号决议已经开始引起美国的注意。这为后续美国歪曲 2758 号决议埋下了伏笔。

(二) 美国歪曲 2758 号决议的“升级”

2758 号决议通过后, 世界卫生大会在 1972 年 5 月 10 日通过第 25.1 号决议。该决议重申了 2758 号决议原文, 并决定将“蒋介石的代表”从世界卫生组织驱逐出去^[9]。2008 年马英九上任后, 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 台湾当局自 2009 年起被连续邀请参加世界卫生大会。2016 年蔡英文赢得台湾“大选”, 于当年 5 月 20 日正式就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在 5 月 6 日给台湾当局发出邀请函,

但邀请函明确提及 2758 号决议、世界卫生大会第 25.1 号决议以及上述文件中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10]。换言之，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必须根据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 25.1 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蔡英文上台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陡转直下，台湾当局也自 2017 年起不再被邀请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和国际民航组织（ICAO）大会。

2017 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陡然增加了打“台湾牌”的力度，赤裸裸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在国际场合公开支持台湾当局。蔡英文当局也借机以对美关系为重要依托，推动“倚美抗中谋独”路线，通过提升与美互信及实质关系妄图拓展“国际活动空间”^[11]。这一时期，在美台双方当局的“亲密互动”下，台湾问题被高度利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问题成为中美博弈的重要场域。新冠疫情发生后，蔡英文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伺机鼓噪所谓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议题，企图利用疫情趁火打劫，拓展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2020 年 3 月 26 日，特朗普正式签署所谓《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简称“台北法”）。该法规定，美国政府应适当支持台湾获得所有美国参与、不需要国家身份（statehood）就可以加入的国际组织的会员资格，支持台湾取得其他适当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地位；以适当方式指示美国在以上国际组织的代表，使用发言、投票和影响力去支持台湾获得会员或观察员地位。至此，美国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问题的支持，从政策支持转向立法支持，从口头表态转向实际行动。美国开始亲自下场，以世界卫生组织为突破口，以歪曲 2758 号决议为抓手，为台湾的所谓国际参与摇旗呐喊、四处奔走，导致中美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问题的斗争日渐升温。

三、美国歪曲 2758 号决议的主要表现及动向

多年来，美国虽然以各种方式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扩大“国际空间”，但效果不彰。美国改弦更张，开始从歪曲 2758 号决议入手，妄图推翻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决议中体现的一个中国原则，为台湾所谓国际参与寻求新抓手。

（一）无中生有：蓄意制造 2758 号决议所谓争议

2758 号决议本无争议。该决议通过后，绝大多数国际组织遵照该决议准确地处理台湾地区的国际参与问题，维护了国际关系的稳定。但以庄葛报告为标志，近年来美国学界和政界密集歪曲联大 2758 号决议，妄图生拉硬拽使 2758 号决议从“无争议”变成“有争议”，掀起与中国之间关于联大 2758 号决议的法律战、舆论战。

1. 美国学界蓄意制造了 2758 号决议所谓争议。这起争议源于庄葛报告。庄葛报告“指责”中国政府经常引用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以阻止台湾地区参与联合国及其相关活动。该报告认为，2758 号决议仅处理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并未涉及台湾的代表权或地位问题，声称台湾事实上是一个具有完整“政府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的实体，虽然该实体在国际法上未被普遍承认为“独立国家”，但其应享有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权利。因此，庄葛报告声称台湾应能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至少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以确保台湾 2 300 万人的利益和声音得到体现^[3]。此外，该报告还刻意炒作了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采取的限制措施”，声称中国政府利用国际影响力，施压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限制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事务，批评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联合国的初衷和普遍参与的原则，也不利于国际社会在公共卫生、人权、电信、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合作与交

伍俐斌, 张骏. 美国歪曲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 历程、表现与本质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115-127.

流^[3]。最后, 庄葛报告妄称, 国际社会应重新审视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的实际内涵, 避免被“曲解和滥用”, 要促进和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 以确保全球事务的包容性和多样性^{[3] 38}。

如果说庄葛报告拉开了 2758 号决议所谓争议的序曲、从综合视角曲解决议, 那么“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第二份报告——德莱尔-葛来仪报告则是从更具体、更聚焦的视角深入歪曲 2758 号决议。德莱尔-葛来仪报告将火力对准了 2758 号决议与一个中国原则的关系, 诬称一个中国原则“错误”地将 2758 号决议作为国际法上的依据^{[4] 3}。

2. 美国反华政客跟进歪曲 2758 号决议。除美国学界外, 美国一些政客也频繁歪曲 2758 号决议, 有些甚至更为激进。2023 年 7 月,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无异议通过所谓《台湾国际团结法》, 歪称联合国 1971 年通过的 2758 号决议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的合法代表, 并未涉及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也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地区的关系采取立场, 或包含任何涉及“台湾主权”的声明。所谓《台湾国际团结法》主要是对 2019 年所谓《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进行修改。参议院同年早些时候也跨党推出了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 截至目前该议案仍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审议之中。2023 年 9 月, 鲍勃·梅南德斯 (Bob Menendez) 等多位议员在联大 2758 号决议通过 52 周年之际, 发布声明歪称决议“并未提及台湾的地位”, 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完全符合决议的文字和精神”^[12]。2024 年 1 月, 太平洋岛国瑙鲁援引联大 2758 号决议与台湾“断交”后, 美国在台协会 (AIT) 负责人劳拉·罗森博格 (Laura Rosenberger) 就辩称“联大 2758 号决议没有对台湾的地位作出决定, 也不排除其他国家与台湾当局建立外交关系”^[13]。2024 年 4 月末, 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中国组”负责人蓝墨客 (Mark Baxter Lambert) 在华盛顿的一次智库活动上声称: “第一, 第 2758 号决议未认可, 不等于, 也不反映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该术语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对台湾的立场。第二, 第 2758 号决议与各国在与台湾关系方面的主权选择无关。第三, 在台湾最终政治地位问题上, 第 2758 号决议并不构成联合国体制的立场。第四, 第 2758 号决议并不排除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多边论坛。”^[14] 2024 年 5 月,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里施 (Jim Risch) 透露他与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 (Jeanne Shaheen) 推出了一项决议, 声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美国伙伴的类似政策并不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中国原则, 还歪称“1971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2758 号决议并不意味着世界接受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宣称”^[15]。

未来美国政界和学界将有更多歪曲 2758 号决议的言行。美国妄图以此无中生有地制造一个关于 2758 号决议的所谓争议, 引起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使美国掌控 2758 号决议的解释权, 最终实现美国的战略意图。

(二) 变相否定: 推动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 掏空 2758 号决议

单靠美国学界和政界歪曲 2758 号决议, 实际效果有限。美国开始尝试借助其影响力推动台湾当局以适当身份参与国际组织, 妄图形成台湾当局可以参与国际组织的“新”实践, 取代现行将台湾当局排除在绝大多数国际组织之外的“旧”实践, 从而掏空 2758 号决议。

2020 年, 所谓《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宣称, 美国应适当支持台湾获得所有美国参与、不需要国家身份就可以加入的国际组织的会员资格, 支持台湾取得其他适当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地位。美国《2023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定一项策略, 有效促进台湾“有意义”参与

国际组织，分析最适合台湾参与的国际组织，列出最有利于美国发挥影响力推动台湾参与、不超过 20 个的国际组织清单。

虽然该项策略迄今未公布，但 2024 年 1 月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列出美国帮助台湾当局取得国际组织观察员地位的办法。办法包括三条：一是美国应利用其（在国际组织中的）提案权、投票权和影响力维持台湾目前已享有的正式会员资格或以其他较低身份参与的国际组织中的存在。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要确定台湾在哪些国际组织中拥有正式会员资格或有资格实质性参与其中，评估这些组织更改会员或其他身份的程序，并与这些组织及其成员国政府双边接触，以包括经济手段在内的有效方式，维持台湾的现有地位。二是美国利用其影响力，扶持台湾重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民航组织（ICAO），要求联合国允许台湾居民、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使用台湾颁发的身份证件进入联合国大楼和参加会议。三是美国推动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任何目前被明确禁止参与、但台湾在其中具有“合法利益”并能够为之“作出贡献”的国际组织^{[16] 7}。

传统基金会的报告还分析了台湾取得联合国大会观察员地位的可行性。该报告声称，尽管《联合国宪章》没有专门规定观察员的条款，但联合国大会已建立了一套授予非会员国、组织和其他实体观察员身份的程序。这里的实体既包括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这样的文化、体育组织，也包括政治、宗教性质的实体，如与 100 多个国家有外交关系的马耳他骑士团^{[16] 14}。美国妄图以联合国观察员地位使台湾在国际体系中拥有相当于独立实体的发言权，进而推动其在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获得类似身份，相当于绕过了 2758 号决议。

美国妄想推动台湾以某种实体身份在联合国大会取得观察员地位，因倒行逆施而困难重重。在美国看来，现阶段更加“务实”的做法是在联合国以外的其他国际组织取得进展，从而突破 2758 号决议的防线。近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大背景，美国集中火力对准了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在推动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问题上可谓不遗余力。2021 年 3 月，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南德兹(Bob Menendez)和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殷荷菲（James Inhofe）提出法案，声称要协助台湾重获世界卫生大会（WHA）观察员身份。2021 年 8 月，法案在参议院获得“一致同意”通过；2022 年 4 月，法案在众议院以 425 票赞成、0 票反对获得通过。2022 年 5 月 14 日，拜登签署该法案。至此，美国正式以国内法方式确立了对台湾获得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资格的支持。在 2023 年第 76 届世界卫生大会召开前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官员公开支持台湾参会，并发动美国盟友和国际组织一并助推台湾参会。2023 年，“七国集团”（G7）4 月外长会议及 5 月外长会议两个联合公报，皆明确支持台湾参与 WHA 及 WHO 技术性会议。“英、澳外交暨国防部长（2+2）会谈联合声明”“法、澳外交暨国防部长（2+2）会谈联合声明”“美国及立陶宛外长联合声明”等均声称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与 2022 年情况相同，个别成员国提出的允许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仍旧不被列入正式议程。2024 年 5 月，第 77 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

未来，美国必然变本加厉地操弄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问题。在美国和台湾当局看来，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具有政策延展性的“开端之作”，如举措得逞，将会实质上歪曲 2758 号决议。美国妄图以推动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事件获取“概念验证”机会，直观了解其行动策略

的效力, 试探中国在核心议题上的红线。

(三) 未来动向: 妄图迫使联合国专门解释或修改 2758 号决议

庄葛报告和德莱尔-葛来仪报告倒打一耙, 指责中国所谓歪曲解释 2758 号决议。在 2758 号决议通过之后, 联合国从未对其进行解释。实际上, 2758 号决议的用语是清晰的, 并无歧义, 联合国无须另行解释。可一旦美国在舆论和实践中歪曲 2758 号决议的阴谋得逞, 美国接下来极可能推动联合国专门解释或者修改 2758 号决议, 甚至通过新决议就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问题作出特别规定。

1. 专门解释 2758 号决议。美国使用多种手段强迫联合国专门解释 2758 号决议。其一, 强迫联合国秘书长发表解释性声明。美国纠集盟友并通过其国际影响力, 裹挟联合国秘书长按其要求发表关于 2758 号决议的解释性声明。如美国歪称: “2758 号决议仅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次问题, 未涉及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没有界定台湾地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其二, 迫使联合国大会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 联合国大会可以请求国际法院就特定问题发表咨询意见。未来, 美国可能利用联合国大会的这项职权, 多管齐下在联合国大会求得多数票, 进而迫使联合国大会通过请求国际法院就 2758 决议发表咨询意见的决议。

2. 修改 2758 号决议。美国智库为迫使联合国修改 2758 号决议提供了方案。2021 年, 长期接受民进党当局高额经费资助的美国智库“2049 项目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发表报告声称, 作为向中国全面施压的一部分, 美国今后应该每年都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动议, 推动台湾地区加入联合国, 并声称技术关键在于以“恢复席位”而非“接纳新成员”的名义提出动议。接纳新成员需要联合国安理会推荐, 中国对此具有否决权。与之相较, 美国或选择寻求联合国大会对第 2758 号决议局部修改, 而该修改不直接定义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17]。为不择手段达成目的, 并规避现有规则, 该报告甚至列举了所谓“恢复席位”的表述^[17]¹⁷。“2049 项目研究所”的这份报告进一步提出, 行文并不拘泥, 其他表述也可能适用, 关键在于此类促成决议的目标应是将台湾地区重新纳入联合国, 而同时又不引发关于安理会中国席位或中国主权的争议。该报告声称, 只要联大没有通过类似内容的新决议, 美国就应每年就此议题在联合国开展外交活动, 并妄称华盛顿将借此向北京传达一个信息, 即“中国可能在一场北京认为已赢得的战斗中失去先机”^[17]¹⁷。

3. 通过新决议。所谓通过新决议, 指在 2758 号决议之外, 美国迫使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 专门就台湾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问题作出安排。

以上将 2758 号决议推倒重来的各种企图, 体现出美国的唯我独尊、蔑视现有国际准则, 严重扰乱国际秩序、不得人心, 因此实现难度很大。但这不代表美国会停止动作, 正如前述“2049 项目研究所”报告宣称的, 美国可能每年都在联合国大会提出相关动议, 长此以往, 美国可能占得先机。我国有必要采取相应反制措施。

四、美国歪曲 2758 号决议的本质

推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只是美国此番歪曲 2758 号决议的借口。美国的歪理逻辑包括两个层面: 其一, 2758 号决议没有对台湾的主权归属采取立场, 没有明确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二, 2758 号决议没有解决台湾参与联合国的问题。表面来看, 美国很关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问题, 但实际上

台湾难以参与国际组织的“症结”，并非 2758 号决议，而是台湾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拒绝两岸统一。根据“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两岸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以获得更多的国际参与空间。那么，美国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大张旗鼓地对 2758 号决议做文章呢？其本质如何，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战略意图呢？

（一）干涉中国内政，抢夺台湾问题的主导权

一个中国原则（One China Principle）是中国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立场。虽然在不同时期的表述略有不同，但一个中国原则的核心涵义可概括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绝大多数国际组织都根据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地区的参与问题，绝大多数国家都根据一个中国原则建立和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简言之，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普遍共识。美国官方经常声称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奉行“一个中国政策”（One China Policy），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有明显不同。关于所谓“一个中国政策”，美国自称其建立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对台六项保证”和“与台湾关系法”基础之上。《上海公报》涉及台湾的表述是：“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建交公报》英文版的有关表述是：“美利坚合众国承认（recognize）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认识到（acknowledge）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八一七公报》英文版的有关表述是：“美利坚合众国承认（recognize）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认识到（acknowledge）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见，按照美国的立场，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国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另一方面只是“认识到”而不明确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根本区别在于美国不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美国一贯奉行的台湾主权归属模糊论立场即“台湾地位未定论”^[18]的体现。与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相比较，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可能成为国际共识。

美国长期以来将台湾问题作为牵制和遏制中国大陆的棋子。随着中国大陆的快速发展，大陆牢牢地掌握着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权和主动权，但美国并不甘心放弃台湾这枚棋子。其一，美国歪曲 2758 号决议，使中国在处理涉台问题时面临更高的外交成本和难度，消耗中国的战略资源，妄图遏制中国发展。中国需要在国际场合不断重申和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在背后支持和推动台湾扩大国际参与，使得一些国家在中美之间采取骑墙策略，增加中国外交工作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某些情况下，美国针对特定议题反复施压国际组织或其他国家，为台湾争取更多的所谓国际参与机会。这种行为直接增加了中国与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对抗性和竞争性。其二，美国歪曲 2758 号决议，妄图借机在国际社会推销其“一个中国政策”，迫使一些国家在对待台湾问题上摇摆不定，或有所保留，进而动摇国际社会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普遍共识，弱化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共同认知，挑战和侵蚀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社会基础，妄图使其“一个中国政策”取代一个中国原则。

（二）拼凑价值观联盟，展开对华意识形态竞争

自特朗普时期以来，美国构筑起全政府、全方位、全领域对华战略竞争模式，其中的一个重要

伍俐斌, 张骏. 美国歪曲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 历程、表现与本质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115-127.

政策手段就是突出并强化对华意识形态竞争^[19]。拜登上台后秉承民主党一贯重视意识形态因素的外交政策指导思想, 打造所谓价值观同盟, 以民主价值观为名凝聚对华战略竞争共识, 以价值观外交手段拉拢盟友参与对华战略竞争^[20]。在就职后不久, 拜登政府宣布“战略竞争”(Strategic Competition)为其看待美中关系的基调^[21], 并强调寻求与其盟友开展基于价值观的战略合作, 从而一起应对所谓“来自中国的战略竞争”。这一战略思路是有历史渊源的, 早在奥巴马时期, 美国民主党上层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基本立场: 美国必须致力于维护与盟友间的信任, 使他们理解和认同一种观念——中国是西方必须通过建立强大联盟才能遏制的战略竞争对手^{[22] 351-352}。于是,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北约峰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日韩期间以及拜登访问欧洲前的吹风会等多个场合, 拜登政府一直对盟友强化相关表述。拜登本人亦明确声称: “我们必须共同为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做好准备。”^{[23] 352}虽然俄乌冲突给世界带来了很大冲击, 但是拜登政府坚持认为, 美国的首要战略任务是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与日俱增的“威胁”^[22-23]。美国将台湾地区视为“印太地区”的战略抓手和重要棋子, 并在舆论上反复渲染台湾是“印太地区”潜在的冲突热点区域^[24]。经过美国的系列操作, 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所谓“民主价值”的威胁^[25]。2021年3月, 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恶意诋毁中国新疆人权状况, 以此为幌子, 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 2023年5月, “七国集团”在日本广岛举行峰会, 在《七国集团广岛峰会领导人公报》(G7 Hiroshima Leaders' Communique)中, 声称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并呼吁和平解决台海紧张局势^[26]; 2023年7月, 北约成员国在立陶宛维尔纽斯峰会上发表的公报中宣称, “中国公开的‘野心’和‘胁迫’政策挑战了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 并进一步指责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27]。

美国打造所谓反华价值观同盟, 需要多重抓手拉拢和连结盟友。歪曲 2758 号决议正是美国的重要抓手。美国将此举包装成所谓“民主与威权”的斗争, 制造价值观对立, 借机拉拢盟友, 共同对华施压。美国将台湾地区划入阵营, 吹捧台湾为所谓“华人世界民主的成就”, 声称“美国与台湾是同一个民主大家庭的成员”, 连续邀请台湾参加“世界民主峰会”。2024年5月20日,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大力迎合美国, 声称将推动所谓“价值外交”, 跟全球“民主国家”肩并肩, 形成“和平共同体”。5月30日, 台新任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声称, 将全力推动“价值外交”, 以“民主、和平与繁荣”来深化台湾的“国际连结”, 建立“民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及“经贸共同体”, 借以提升及巩固与所谓“邦交国”的关系, 强化与所谓“无邦交友好国家”的实质关系, 尤其深化与理念相近国家的合作。赖清德当局的“价值外交”主动迎合美国的反华价值观同盟, 预示美台将在国际场合加紧勾连。

(三) “台独”势力与外国干涉势力合流, 妄图遏阻中国统一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项的规定体现了不干涉内政原则: “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不干涉内政原则有利于维护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免受他国的任意干涉, 也有助于国际社会的稳定。该原则是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反对外来干涉、捍卫国家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有力法律武器。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 解决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外国无权干涉。但“台独”分裂势力妄想通过外国干涉实现其拒绝统一、图谋分裂的目的; 个别国家借助干涉台湾问题, 阻挠两

岸统一，妄图遏制中国发展。由此，“台独”分裂势力与外国干涉势力合流。为了给“干涉”找到不违反国际法的理由、伪装合法，干涉势力妄图将台湾问题从内政问题演变成国际问题。歪曲 2758 号决议，正是美国实现此目标的重要抓手。

实际上，歪曲第 2758 号决议并非美国首创。20 世纪 90 年代，李登辉就已有过类似行径，妄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为其后来提出“两国论”铺路。1993 年 8 月，台湾当局策动中美洲 7 个所谓“邦交国”提议在联合国大会第 48 届会议议程列入一个补充项目，声称联大 2758 号决议把所谓“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28]。这是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后首次提出所谓“重返联合国”问题。此后的 1994 年和 1995 年，台湾当局策动其所谓“邦交国”以相同标题连续两年要求在联合国大会会议议程增列补充项目^[29]。

1996—1999 年，台湾当局在操弄“重返联合国”议题时将更多矛盾对准联大 2758 号决议。1996 年 7 月，台所谓“友邦”建议在联合国大会第 51 届会议议程中列入一个项目。该项提案声称，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是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对抗的产物，不再反映过去 25 年来世界和台湾发生的变化和出现的现实，因此，该决议是“不完全、过时和不公正的”，要求大会对 2758 号决议进行审查^[30]。1997 年 9 月，台所谓“友邦”建议在联合国大会第 52 届会议增列项目，该次提案要求撤销 2758 号决议中将台湾当局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这部分决定^[31]。1998 年 7 月，台所谓“友邦”向联合国大会提案的标题与 1997 年相同，但内容有所不同，该提案声称 2758 号决议是阻止台湾当局“参与”联合国的主要障碍，联合国大会应当处理 2758 号决议造成的不公正局面，恢复台湾当局“参与”联合国的合法权利^[32]。

在庄葛报告发表之前，“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在 2021 年 10 月 21 日即联大 2758 号决议通过 50 周年之际，主办了一个名为“联合国第 2758 号决议 50 周年：对台湾的影响”的视频会议。该会议由葛来仪主持，时任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华自强（Rick Waters）、时任台“驻美副代表”王良玉和世界医学会秘书长克罗波尔（Otmar Kloiber）作主旨发言。与会者声称由于联大 2758 号决议并未提及台湾，故其未解决台湾的代表权问题^[33]。该会议是庄葛报告的前奏和铺垫。

可见，美国高调歪曲 2758 号决议，一手操弄所谓 2758 号决议“争议”，并非其发现了 2758 号决议的“漏洞”，而是源自“台独”势力的游说，是“台独”分裂势力与美国反华势力深度勾连的结果。“台独”势力希望通过歪曲 2758 号决议，将台湾问题国际化，方便其获取外国支持、图谋分裂，对抗大陆实现国家统一的努力；美国则是希望为其有朝一日干涉台湾问题、阻碍两岸统一，提前奠定法理基础。

五、结论与对策

美国歪曲 2758 号决议是近年来美国主动挑起与中国的全面竞争及对抗关系在台湾问题上的体现，根本目的是服务和服从于其对华全面竞争与对抗战略。对中国而言，美国歪曲 2758 号决议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是对中国发展进程和国家统一进程的严重妨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面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严重挑衅，我们坚决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展示了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台独’的坚强决心和强大能力，进一步掌握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主动，进一步巩固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格局。”^[34]美国

伍俐斌, 张骏. 美国歪曲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 历程、表现与本质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115-127.

歪曲 2758 号决议可谓动作频频、来势汹汹。中国应静观其表现、洞察其本质, 采取针对性措施, 打好打赢这场围绕 2758 号决议的“法律战”。

一是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牢牢掌握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其一, 保持战略自信。解决台湾问题的时与势始终在主张国家统一的力量这一边。随着两岸力量对比日益悬殊、中美力量差距日渐缩小, 台海格局明显朝着对中国大陆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国歪曲 2758 号决议, 频打“台湾牌”, 就是想干扰大陆发展进程, 也是其丧失战略自信的表现。我们应当对两岸统一前景抱持乐观期待和战略自信, 对“台独”挑衅保持战略定力, 不被外国干涉势力“带节奏”, 按照自己的战略部署扎实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其二, 要在坚持立足于自身发展进步的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统一的关键是大陆自身的发展进步。要保持发展势头, 办好自己事情。只有自身发展强大了, 才能够反制“台独”挑衅和外部干涉, 才能够牢牢掌握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二是支持和鼓励学界深入研究 2758 号决议, 主动发声, 正本清源。若从中国知网数据来看, 关于 2758 号决议的学术论文数量很少, 仅 3 篇学术论文对庄葛报告进行了批驳。显然, 中国学界对 2758 号决议的研究仍有很大空间, 较难满足打好打赢 2758 号决议“法律战”的重大需求。其一, 以我为主, 支持和鼓励学者形成更多更好 2758 号决议研究成果。善用国际法, 加强对 2758 号决议的国际法研究, 不断增强关于 2758 号决议与一个中国原则关系的国际法理论述, 不陷入美国的话语陷阱, 加快形成关于 2758 号决议的自主知识体系。其二, 加大对美国歪曲 2758 号决议的批判力度。组织国际法学者和涉台研究学者深入研究和批判“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两份涉 2758 号决议报告, 分工协作, 产生一批高质量学术成果, 支持和鼓励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相关成果, 发出中国声音。其三, 主办国际学术会议。定期或不定期主办关于 2758 号决议的国际学术会议, 邀请知华友华国际学者参加, 产生国际影响力, 牢牢掌握国际话语权。其四, 支持涉台智库发声。支持国内涉台智库和知华友华国际智库形成关于 2758 号决议的专题报告, 加大国际宣介力度。

三是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 进一步夯实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共识。其一, 在双边外交场合, 邀请友好国家主动发声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将一个中国原则写入有关双边文件。对于尚未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国家, 应加大工作力度, 使这些国家接受和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其二, 在多边外交场合, 牢牢掌握涉及台湾参与问题的主导权主动权, 揭批美国歪曲 2758 号决议的谬误, 邀请和动员友好国家在国际组织为我发声。

参考文献:

- [1] 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大会决议二七五八(二十六).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Resolution 2758-Oct. 25., 1971) [EB/OL]. [2024-08-07]. <https://www.un.org/zh/ga/26/res/ares2758.html>.
- [2] 饶戈平. 联合国大会 2758 号决议与一个中国原则——兼评葛来仪报告 [J]. 台湾研究, 2023 (2): 1-11.
- [3] Jessica Drun, Bonnie S. Glaser. The Distortion of UN Resolution 2758 and Limits on Taiwan's Access to the United Nations [R/OL]. (2022-03) [2024-08-04]. <https://www.gmfus.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3/Drun%26Glaser-distortion-un-resolution-2758-limit-taiwans-access.pdf>.
- [4] Jacques deLisle, Bonnie S. Glaser. Why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Does Not Establish Beijing's "One China" Principle: A Legal Perspective [EB/OL]. (2024-04-29) [2024-06-12]. <https://www.gmfus.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4/Why%20UN%20General%20Assembly%20Resolution%202758%20Does%20Not%20Establish%20Beijing's%20One%20China%20Principle%20A%20Legal%20Perspective.pdf>.

- https://www.gmfus.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4/GMF_UNGA%20Res.%202758_April%202024%20Report.pdf.
- [5] 国台办：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充分反映、郑重确认一个中国原则，其权威不容挑战 [EB/OL]. (2024-07-31) [2024-08-06]. <http://www3.xinhuanet.com/20240731/042bf1e695354b6abf5dfe88169f0f7d/c.html>.
- [6] 杨晶华. 美国在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问题上的立场演变——基于 1949 年至 2022 年的历史考察 [J]. 台湾研究, 2022 (4): 95-110.
- [7] Jaw-ling Joanne Cha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U. S. "Facilitator" Role's [J].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 2010 (3): 133-146.
- [8] 罗福全. 联合国与台湾 [EB/OL]. (2012-12-30) [2024-08-07]. <http://www.taiwanncf.org.tw/ttforum/60/60-12.pdf>.
- [9]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EB/OL]. (1972-05-10) [2024-08-07]. https://iris.who.int/bitstream/handle/10665/91916/WHA25.1_eng.pdf?sequence=1.
- [10] 世界卫生组织已寄发邀请我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第 69 届世界卫生大会之邀请函 [EB/OL]. (2016-05-07) [2024-08-02]. https://www.mac.gov.tw/cn/News_Content.aspx?n=F34D408ACAA86887&sms=8E0A247A631E0960&s=305E58CB4675E640.
- [11]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台美室课题组. 蔡英文主政下的台湾当局涉外关系困境 [J]. 台湾研究, 2020 (2): 12-21.
- [12] Risch, Menendez. U. S. Must Do More to Support Taiwanese Partner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B/OL]. (2023-09-20) [2024-08-06].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press/rep/release/risch-menendez-us-must-do-more-to-support-taiwanese-partners-in-international-community>.
- [13] Ben Blanchard. US decries Nauru's unfortunate ditching of Taiwan, warns on China's promises [EB/OL]. (2024-01-16) [2024-08-07].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naurus-decision-break-ties-with-taiwan-unfortunate-us-official-2024-01-16/>.
- [14] 美参议员推出跨党决议，重申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不等于”世界接受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宣称 [EB/OL]. (2024-05-17) [2024-08-02]. <https://www.voachinese.com/a/risch-shaheen-introduce-resolution-reaffirming-support-of-taiwan-20240516/7615326.html>.
- [15] Risch. Shaheen Introduce Resolution Reaffirming Support of Taiwan [EB/OL]. (2024-05-16) [2024-08-07].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press/rep/release/risch-shaheen-introduce-resolution-reaffirming-support-of-taiwan>.
- [16] Brett Schaefer. The U. S. Is Right to Support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B/OL]. (2024-01-11) [2024-08-03]. <https://www.heritage.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1/BG3808.pdf>.
- [17] Michael Mazza, Gary Schmitt. Righting a Wrong: Taiwa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United States Policy [EB/OL]. (2021-10-25) [2024-08-02]. https://project2049.net/wp-content/uploads/2021/10/P2049_RightingAWrong_MazzaSchmitt_102521.pdf.
- [18] 苏格. “台湾地位未定论”溯源 [J]. 台湾研究, 1997 (2): 49-52.
- [19] 陈积敏. 认识美国对华意识形态竞争的三个视角 [EB/OL]. (2023-04-26) [2024-08-04]. <https://cn.chinausfocus.com/political-social-development/20230426/42827.html>.
- [20] 张茜. 拜登政府价值观同盟问题评析 [J]. 国际研究参考, 2021 (10): 1-7.
- [21] Ned Price. Department Press Briefing Transcripts [EB/OL]. (2021-02-02) [2024-08-10]. <https://>

伍俐斌, 张骏. 美国歪曲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 历程、表现与本质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115-127.

- www.state.gov/briefings/departmentspress-briefing-february-2-2021/.
- [22] Winkler, Stephanie Christine.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US - China relations: A conceptual analysis [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23 (3): 333-356.
- [23] Mirna Galic, Brian Harding, Tamanna Salikuddin, Vikram J. Singh. Amid Ukraine War, U.S. Signals the Indo-Pacific is a Vital Priorit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ees the region as a new center of grav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is reorienting U.S. foreign policy accordingly [EB/OL]. (2022-06-09) [2024-08-10].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2/06/amid-ukraine-war-us-signals-indo-pacific-vital-priority>.
- [24]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Preventing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danger of armed confrontation over Taiwan is growing, raising the spectre of a direct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at would have severe global repercussions. Managing this risk will require the parties to rebuild trust by shoring up decades-old understandings [EB/OL]. (2023-10-27) [2024-10-11]. <https://www.crisisgroup.org/asia/north-east-asia/taiwan-strait-china/333-preventing-war-taiwan-strait>.
- [25] Michael Beckley, Hal Brands. China's Threat to Global Democracy [J]. Journal of Democracy, 2023 (1): 665-679.
- [26] Th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Competing Great Power Coalitions [EB/OL]. (2024-02-27) [2024-08-11]. <http://en.asaninst.org/contents/competing-great-power-coalitions/>.
- [27]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 维尔纽斯峰会公报 [EB/OL]. (2023-07-11) [2024-08-11].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3/7/pdf/230711-Vilnius-Summit-Communique-Chinese.pdf.
- [28] 联合国文件: A/48/191 [EB/OL]. (1993-08-09) [2024-08-11].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71339?v=pdf>.
- [29] 联合国文件: A/49/144/Add. [EB/OL]. (1994-09-13) [2024-08-11].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61674?ln=ar&v=pdf>.
- [30] 联合国文件: A/51/142 [EB/OL]. (1995-07-18) [2024-08-11].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218362?ln=zh_CN&v=pdf.
- [31] 联合国文件: A/52/143/Add.1 [EB/OL]. (1997-09-08) [2024-08-11].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243274?ln=zh_CN&v=pdf.
- [32] 联合国文件: A/53/145/Add.2 [EB/OL]. (1998-08-26) [2024-08-11].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259248?ln=en&v=pdf#files>.
- [33]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UN Resolution 2758 Turns 50: Implications for Taiwan [EB/OL]. (2022) [2024-06-12]. <https://www.youtube>.
- [3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责任编辑: 龚静阳



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档案进场 及其实现：以“迁台记忆”档案为例

郑容坤

（闽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迁台记忆”档案是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也是反对“台独”分子及其历史虚无主义的锐利武器。由迁台、记忆、档案三个要件有机组成的“迁台记忆”档案，真实反映了两岸同胞的血脉亲情和两岸关系的历史变迁，在铸牢台湾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迁台记忆”档案为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精神养料：通过两岸同胞协力编修族谱、推动族谱对接等互动实践，给予台湾同胞身份认同的信息凭证；基于纪实摄影照片、记录片等档案形态，赋予台湾同胞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但从目前来看，“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时空压缩下档案资源基数不足与代际传递的断层压力，档案治理体系与资源利用不全所引致的功能障碍，以及“台独”分子的恶意阻扰等现实挑战。未来应对这些挑战，须从强化政治引领、健全治理体系、推进档案业务、拓展宣介渠道入手，充分发挥“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综合效能，从而消除“台独史观”，彰显反“独”促统作用。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台湾同胞；“迁台记忆”档案；民族认同；集体记忆；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5-0128-13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5.011

作者简介：郑容坤，闽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政治学系主任，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民间信仰赋能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22XSH003）

引用格式：郑容坤. 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档案进场及其实现：以“迁台记忆”档案为例[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5）：128-140.

一、问题的提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的一件大事, 必须贯穿在对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1]。当前台海局势复杂多变, 尤其是“文化台独”及其历史虚无主义谬论甚嚣尘上, 凸显了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长期以来, 台湾的“文化台独”者与“政治台独”力量沆瀣一气, 企图通过篡改教科书、歪曲历史观念、污名化历史人物、破坏历史纪念场所等错误行径, 从多层次多管道解构和重构台湾的历史记忆, 酿成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结构性失忆”, 引致文化上“去中国化”之目的^[2]。“文化台独”势力倒行逆施, 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出现赖清德“洗涤人心”的“文化台独 3.0”版本^[3]。然而, 不管“台独”分子施行何种“文化台独”样态, 真实意图都是以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4]。反制“文化台独”及其历史虚无主义谬论, 引导台湾同胞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民族观和国家观, 构成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2024 年 4 月, 习近平总书记就两岸关系发表重要讲话, 提出两岸同胞要“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强调了台湾同胞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角色功能, 为纠治“文化台独”及其历史虚无主义谬论提供了重要指导与根本遵循。2024 年 7 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 要“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完善港澳台和侨务工作机制”^[6]。这有助于从制度层面为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法治机制保障, 促使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

目前, 学界也关注到海峡两岸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联性议题, 形成了价值阐释与实现路径两个取向的研究成果, 对解决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其一, 价值阐释取向的相关研究剖析铸牢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意义、价值功能和作用机制等^[7-8], 指出铸牢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遏制“台独”分子及其“文化台独”谬论, 对促进祖国完全统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9]。其二, 实现路径取向的相关研究关注铸牢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落实机制, 认为武阵演武等闽南文化是联系两岸人民血脉与情感的媒介^[10], 主张从妈祖信俗文化^[11]、宗教文化与两岸中华文化认同的角度, 构建铸牢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助推策略^[12]。

综而观之, 尽管学界关于海峡两岸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比较丰富, 但这些研究成果多以海峡两岸区域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 关注“台湾同胞”的不多, 专门聚焦“迁台记忆”档案与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联性研究阙如。“迁台记忆”档案印证两岸历史渊源, 承载中华民族记忆, 在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中具有重要功能。鉴于此, 本文立足“台湾同胞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研究对象, 以“迁台记忆”档案为例, 解读“迁台记忆”档案的要件及其意蕴, 探讨运用“迁台记忆”档案促进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价值与面临的现实挑战, 并提出应对策略。

二、“迁台记忆”档案的要件解读与意涵建构

“迁台记忆”档案真实反映了两岸同胞的血脉亲情和两岸关系的历史变迁，是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记忆媒介。“迁台记忆”档案能够唤醒台湾同胞内心深处的集体记忆，并借助对集体记忆的回溯与重构，坚定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成为反对“台独”及其历史虚无主义的锐利武器。在揭示“迁台记忆”档案对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之前，首先需要厘清“迁台记忆”档案要件及其意涵。

（一）“迁台记忆”档案的要件解读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逻辑起点，概念是由部分或要素以一定原则组成的有机整体。“迁台记忆”档案概念可以细分为由“迁台”“记忆”“档案”三个要素所构成的意义性整体。

首先，“迁台”是对空间的指涉，关乎族群及其文化的区域流动。“迁台”表征为一种双向性的空间流动，先由祖国大陆往台湾地区迁移，然后再由台湾地区回流到祖国大陆的互动过程。如果说前者是以生存生活为目的的迁徙行动，那么后者饱含着对祖地乡土的情感回归。这两种流动方式不仅赋予“迁台记忆”档案空间文化意义，而且揭示海峡两岸同宗同祖、同文同种、同根同生的血脉关联。以闽台为例，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早在先秦时期，闽越族已经陆续移居台湾，成为台湾岛的先民^[13]。大陆汉人大规模渡往台湾大致始于唐宋时期，至明末逐渐进入高潮，清领台湾以后则达到鼎盛阶段。1763 年，台湾人口已达 666 040 人，而 1782 年又增加到 912 920 人，平均每年增加 1 万多人。1811 年，台湾人口高达 1 901 833 人，30 年间增加将近 100 万，平均每年增加了 3 万多人。而 1840 年又增长到 250 万人，平均每年新增 2 万人左右^[14]。至清末，台湾全岛人口已在 300 万人以上^[15]。伴随人口的空间流动，来自祖地故土的生活习惯、民间信俗等地方文化也发生区域性流动。这些乡梓文化不仅为早期先民横跨台湾海峡提供精神庇护，而且构成先民们落脚宝岛台湾、维持族群关系等方面的秩序资源，更成为当前台湾同胞溯源寻根的信息凭证。“迁台”不仅是人口的空间流动，而且关乎族群文化延播、在地化与反哺等多元意义，促使“迁台”行动叠加了文化意义，夯实了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事实基础。

其次，“记忆”是对过去的指涉，关乎身份识别与族群认同。记忆是指社会个体或集体对过往事件的印象。从广义上看，记忆除了心理和生理的功能外，还具备社会意义。可以说，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而且作为个体或集体的记忆都是在特定“记忆的社会框架”下发生的，形成于个人与个人、与团体或国家的互动过程之中^[16]。在此，人类的记忆与身份认同紧密相关，成为个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身份认同是对个人与族群关系的认识，蕴含识别和归类两重意义：基于主体视角，回答“我是谁”；基于类别归属视角，回答“我属于哪个群体”。社会个体通过对集体记忆的情感共鸣、意义共享与集体欢腾，容易形成“我群”与“他群”的身份区辩。同时，我群或他群均以共同体的形式存在。中华民族是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所组成的共同体，可以通过共同体成员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加以识别与定位。社会个体通过对共享过去的记忆，能够增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迁台”记忆是对台湾同胞从祖国大陆迁徙台湾地区后又与祖国大陆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记录，不仅呈现个别家族或宗族的记忆，而且是对特定时期国家民族历史变迁的生动注解，可为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动力支持。

最后,“档案”是时空叠加的记忆媒介,是呈现集体记忆的信息载体。日常生活中,档案常常被理解为一种合法性凭证,认为它是对社会个体过往事件的记录文本,而且以静默的方式由专业性的档案管理机构加以保管。其实,档案不仅是拥有凭证属性的文本,而且在建构社会历史、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方面也具有很大作用^[17]。其功能在于为社会群众提供一种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等情感内容^[18]。简言之,档案兼具凭证属性与记忆属性,发挥对族群身份与集体记忆的建构与呈现功能。如果说社会是“记忆的剧场”,那么档案对族群集体记忆的建构则是在“编织记忆”,是在“制作历史剧”,而在这一织密集体记忆的过程中,档案完成了对族群集体记忆建构的触发、描述、证实等功能,促使族群集体记忆得以“昔日重现”^[19]。在这个意义上,档案的凭证属性与记忆属性合二为一,共同致力于族群集体记忆的唤醒、传扬与重构。档案具有的社会功能激发了档案管理机构对“迁台记忆”档案的保护、开发与利用,也吸引了台湾同胞重拾“迁台记忆”档案文献,参与解读“迁台记忆”档案等记忆再现活动。这有利于增进台湾同胞对宗乡族谊、家国情怀、民族命运等共享集体记忆的认同感。

(二) “迁台记忆”档案的意蕴建构

作为一种档案实践现象,“迁台记忆”档案的意蕴建构在于回答其“是何物”与“有何用”两个问题,即内涵结构与功能价值两个方面。

其一,“迁台记忆”档案的内涵结构。结合上述分析,“迁台记忆”档案可以理解为海峡两岸往来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印证两岸历史渊源,体现两岸交流交往,承载中华民族记忆,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这一概念界定是对“迁台”“记忆”“档案”三要素的有机整合,呈现创制主体多元化与类型多样化特点。从创建主体看,“迁台记忆”档案涉及原生主体与派生主体。原生主体为档案文献的真实经历者,比如迁台族群、团体和个人以及迁台群体的眷属等。正是由于两岸先民们的互动往来实践,才赋予了“迁台记忆”档案的集体记忆功能。派生主体意指对原生主体生活实践及其文本记录进行解读的相关群体,涵括档案管理、新闻媒体、研究机构、社会群众等。原生主体与派生主体分别构成“迁台记忆”档案的生产者与再生产者,促使“迁台记忆”档案的真实信息得以重现。从创建形式来看,“迁台记忆”档案形式多样。“迁台记忆”档案涉及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官方历史往来文书、非官方历史往来文书,以及两岸族群、家庭、个人往来的证件书信等三种类型^[20]。而档案管理实践则将“迁台记忆”档案文献细化为往来书信、文件票据、口述记录、报刊文献、影像记录、其他记录等六大类^[21],这几乎涵盖了海峡两岸各民族同胞交流交往交融的各个面向。在诸多类型中,两岸族谱家书、纪实摄影照片、纪录片等档案较为典型,便于从多角度展现两岸交流的历史过程与客观事实。“迁台记忆”档案类型的多样性不仅便于面向两岸同胞征集“迁台记忆”档案,而且有助于唤醒台湾同胞的家国情怀与民族记忆。

其二,“迁台记忆”档案的功能价值。“迁台记忆”档案不仅具有历史、学术、收藏等方面价值,而且更具政治性价值。“迁台记忆”档案不仅以客观凭证的显性方式为台湾同胞提供身份确证,而且还借助蕴藏的信息提供某个时刻或整个时期的群体故事与集体记忆。以闽台族谱对接为例,近年来台湾同胞掀起了一股来闽溯源寻根浪潮。2022年,已在北京工作4年的台湾女孩赖赖,通过社交媒体,在台办、宗亲和网络等多方力量的帮助下,凭借300多年前清朝留下的“赖氏族谱”中记

录的地址“福建省漳州府平和县深田炉溪社”，找到了祖籍地福建漳州平和县坂仔心田村。台湾女孩赖赖激动地说：“今天我带着全家人回来了！”^[22]台湾同胞赖赖认祖归宗事件并非个例，反映了台湾同胞溯源寻根与身份回归的强烈心声。台湾同胞的寻根行动表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共同的民族和文化认同是与生俱来的基因，经得住岁月风霜，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迁台记忆”档案文献刻画了两岸同胞历史往来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以“迁台记忆”档案为载体介质得以存储，一旦触发，便将积淀为两岸同胞增进宗情族谊、家国情怀、民族凝聚等社会资本，构成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认同力量。“迁台记忆”档案对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促进功能，可为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精神文化养料。

三、“迁台记忆”档案为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供给精神养料

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从当前台湾问题视域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探索，旨在促成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切认同。这种认同意识的培育建基于台湾同胞的身份认同与集体记忆。“迁台记忆”档案内嵌的凭证属性与记忆属性，能够回应台湾同胞对于“我是谁”的身份追问与“我属于何群”的记忆反思，继而形成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切认同。

（一）心之所向：“迁台记忆”档案给予台湾同胞身份认同

“迁台记忆”档案的凭证属性给予台湾同胞身份认同信息合法性支持。身份认同是台湾同胞心之所向，而确定性的身份符号促使台湾同胞得以心安。台湾同胞确证身份的过程，有助于厘清“我是谁”的原初追问，纠正“台独”分子对两岸关系叙事的错误导向，引导岛内群众形成对祖国大陆的正确观感和认知。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要树立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身份意识。作为一种信息记载方式，“迁台记忆”档案具有凭证属性，是原始且可信的经过固化沉淀并以合规的方式传承下来的核心部分，可以为台湾同胞的身份认同提供合法性依据^[18]。“迁台记忆”档案表达台湾同胞身份认同的类型多样，其中闽台族谱颇具代表性。闽台族谱是指闽台同宗共祖的血缘群体记载其家族（或宗族）世系繁衍与先人事迹的文献^{[12] 197}。闽台族谱真实反映了闽台先民历史往来的直接资料，是连接海峡两岸血缘关系的文献纽带，成为台湾同胞溯源寻根的信息凭证。不间断的族谱编修、寻根对接等社会实践强化了台湾同胞的身份认同，接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脉络。闽台族谱基于族谱协力编修与族谱寻根两个途径，给予台湾同胞身份确证，为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支撑。闽台两岸先民协力编修族谱，奠定后人溯源寻根的基础；后人的溯源寻根，又接续了族谱编修进程。二者有机互动，共同给予台湾同胞身份认同，推动其从族群网络中定位自我，知其所从来，识其今所在^[23]。

其一，两岸协力编修闽台族谱，构成台湾同胞身份认同信息的重要来源。闽台族谱编修发生于闽台先民的历史过程中，至明清两代，两岸宗亲协力编修族谱渐成为一种民间习俗。比如，《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基于福建泉州地区 70 余部族谱的分析，记载了福建先民迁移台湾者就有 4 000 人之多^[24]。《南靖与台湾》一书显示，仅漳州府南靖一县明清两代至少有 53 个姓氏迁移台湾，累计有 3 645 个迁台人员于谱有载^[25]。台湾地区族谱编修也对迁台人员做出了记载。比如，《台湾区

郑容坤. 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档案进场及其实现: 以“迁台记忆”档案为例[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5): 128-140.

族谱目录》共收编台湾地区族谱 10 617 种, 其中祖籍不明的有 2 756 种, 标明祖籍的 7 861 种族谱中, 祖籍福建者达 4 700 种^[12] 211。闽台族谱编修对迁台姓氏及其情况的记录, 呈现台湾同胞对故乡及祖先的深切思念。诚如一名台湾粘厝庄宗亲的感叹: “我们中国人, 最富伦理精神, 最富民族感情。我要发动扩大祭典, 崇敬祖德, 迢思源远同时亦要否定一句‘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谬论。居住在台湾的所有同胞, 他们的祖先统统来自中国大陆, 就血统、文化、历史、地理及风俗习惯来说, 都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 中华民族的人, 是不容怀疑的。”^[12] 219

其二, 族谱寻根对接互动, 强化台湾同胞身份认同的心理体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台湾同胞回祖籍地寻根溯源成为闽台社会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日益占据媒体叙事的重要位置, 涌现出台北三兄妹林彦辰、林冠廷、林沛莹^[26]与台生林彦辰台胞两兄弟凭借“半张纸族谱寻根”等感人故事^[27]。与此同时, 福建结合台湾同胞族谱寻根诉求, 积极推动闽台族谱对接寻根活动。福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自开馆以来, 先后接待两岸民众族谱查询和对接 1 000 多批次, 不仅建立涉台族谱信息资料数据库, 而且编印《闽台同名村》《闽台同宗同名村》等众多涉台谱牒书册。此外, 对台工作系统也创设若干专题性对台交流平台。2022 年, 福建省台湾同胞联合会先后在漳州市长泰区山重村、平和县埔坪村、心田村设立“海峡两岸民间交流基地(同名同宗村)”。2023 年, 由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指导的“海峡两岸闽籍台湾同胞社团民间交流基地”在福州揭牌。这些对台交流基地平台的主要功能, 包括面向台湾同胞征集“迁台记忆”档案, 服务台湾同胞溯源寻根、文化遗产与民族认同等需求。台湾同胞基于“我是谁”的身份追问, 产生闽台族谱对接意识, 又得益于官方政策的大力支持, 完成族谱对接、溯源寻根等实践体验, 在探寻个体身份来源的同时, 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二) 情之所动: “迁台记忆”档案强化台湾同胞集体记忆

“迁台记忆”档案的记忆属性, 赋予台湾同胞集体记忆, 以形成“我群”与“他群”的记忆区辩, 夯实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基础。“迁台记忆”档案真实记录台湾与祖国大陆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事实, 刻画了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同呼吸共命运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构成区分族群差异的重要指标, 有了共同的集体记忆, 族群成员找到族群共同体给予的安全感与归属感, 促使族群共同体的凝聚力得到强化。纪实摄影照片、纪录片等“迁台记忆”档案对唤醒台湾同胞内心深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具有代表性。台湾同胞纪实摄影照片、专题纪录片等档案题材是“以共同体美学为轴心生发出崭新的创作姿态, 既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实践探索, 也在‘一体多元’的思维框架下实现了民族多元文化的输出与共通的情感故事的书写”^[28]。此类“迁台记忆”档案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岸共同抵御外侮等方面的刻画, 有助于引导台湾同胞树立对祖国的正确观感与认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一, “迁台记忆”纪实摄影档案, 给予台湾同胞现实省思, 为其营造集体记忆烘托氛围。纪实摄影是台湾地区摄影作品的主要风格, 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往往成为台籍摄影师创作的灵感来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不仅为我国各族同胞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提供根基保障^[29], 而且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编织了一条“意义蛛网”,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台籍摄影师深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台湾同胞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重要功能。比如, 作品《回娘家》描述了两回娘家妇女急切赶路, 希望早点见到家人的情景, 凸显了“家”在中国人心

中永恒的归宿。作品《归路》呈现行走午间公路上的孤单姐弟，姐姐背着弟弟，手中打着一把遮阳伞，路面的孤影与失焦的远景，营造出画面中相叠的背影，象征性表达勤俭互助的亲情爱意^[30]。作品《祖父与孙子》中，祖父居于照片中心位置，身边环绕着十多个孙子、孙女，这一张只属于一个家庭的全家福，间接流露了中国传统崇尚“多子多福”文化特色。又如，作品《头社的米真香》将镜头聚焦农民在稻田里弯腰插秧的瞬间，则是对传统伦理价值需要播种深耕的转译，流露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代代相传的理念^[31]。

其二，“迁台记忆”纪实影片档案，推动集体记忆活化展现，激发台湾同胞的内心震动。以两岸同胞抗战事实的专题记录片为例，有研究指出：“站在民族历史的高度看抗战，国共军队在各自的战场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史篇，更是应该发扬传承的中国记忆。”^[32]由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制作的《抗战：和平荣耀·胜利 70 年》纪录片，不仅收录了《苦干》中对抗战西南大后方百姓建立新中国的不屈历程，而且还将《义勇军进行曲》《长城谣》《黄河颂》等抗战时期的歌曲收录其中，整个影片扣人心弦。类似题材的作品还有电影《喋血孤城》《血战台儿庄》《生死地：1937 淞沪抗战实录》等^[33]，均有益于唤醒那些处于和平时代的台湾年轻世代，体悟先辈们团结救亡的国家民族精神，坚定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民族意识。“迁台记忆”档案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涉及两岸同胞历史往来与当下生活，能够为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精神养料。无论哪一种类型的“迁台记忆”档案，均凝聚了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便于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力驳斥“文化台独”及其历史虚无主义谬论。

四、“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挑战

在当前两岸复杂局势的背景下，“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着档案资源动力不足、档案功能彰显乏力、“台独”分子恶意阻扰等亟需解决的现实挑战。

（一）时空压缩下的紧迫性

时空压缩下的转型社会，诱发“迁台记忆”档案留存与传承诸多挑战。这种现实挑战如果处理不当，将造成台湾同胞在社会转型期的“结构性失忆”，使之面临社会融入障碍、认同障碍以及后代寻根困难，导致“迁台记忆”档案助推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松动。

其一，社会变迁诱发档案资源基数不足。随着社会结构转型，“迁台记忆”档案资源或由于保管不力遭受破坏，或因现代性进程而被遗忘，导致档案资源基数变少。《中国档案报》的一篇报道使用“福建泉州‘迁台记忆’档案文献抢救保护显成效”^[34]标题，凸显当前开展“迁台记忆”档案文献保护开发的紧迫现实。类似的新闻报道不是夺人眼球的噱头，而是出于对“迁台记忆”档案保护刻不容缓的呼吁。社会转型是社会物理与社会意识的双层变迁，加剧对“迁台记忆”档案资源保护的壓力。比如，城镇化建设对那些反映两岸共同记忆的祖祠祖庙等场所的存续产生客观影响。其后果之一便是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文物保护政策体系稳定性的质疑，影响了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认同基础。2023 年 6 月 9 日，福建省漳州市档案馆接收了当地台湾同胞珍藏 50 余年的 92 册原版古籍《福建通志》。据考证，这套古籍通志具有确证海峡两岸根脉渊源的重要功能，然而如此珍贵罕见的成套古籍，却曾经屈身于杂乱污秽的破烂堆之中，令人唏嘘^[35]。

其二, 年龄结构失衡引致档案传承后继无人。“迁台记忆”档案文献能够流传至今, 建基于族群代际接力。族群代际接力促使族谱、家书等“迁台记忆”档案能够为后人溯源寻根提供信息确证。一旦族群代际接力出现断裂, 那么档案保管、编修与传承将难以为继。人口年龄结构失衡是酿成该问题的一大因素。以台湾地区为例, “根据台湾地区内部事务主管部门统计, 2022 年台湾地区人口总数为 2 326.46 万人, 比 2021 年减少 11.06 万人; 2022 年台湾地区出生人数为 13.9 万人, 比 2021 年减少 1.48 万人, 创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历史新低; 死亡人数为 20.7 万人, 比 2021 年增加 2.35 万人, 是有统计数据以来死亡人数首次超过 20 万人, 是继 2020 年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后, 连续第三年出生人数低于死亡人数”^[36]。这种现象将导致两岸族谱编修、对接等“迁台记忆”档案代际接续链条的断裂。诚如地方档案馆工作人员所言, 我们正在与时间赛跑, 加紧征集“迁台记忆”档案。这个赛道随时面临台湾同胞长者突然离世的无奈, 让我们觉得这个赛道的时间更加紧张。

(二) 档案功能的彰显乏力

“迁台记忆”档案对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助推功能, 受制于档案治理体系与档案资源利用状况。档案治理体系、档案资源利用通过结构保障与技术支撑, 共同影响“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然而, 档案治理体系不彰与资源利用不全的裹挟, 极易引致“迁台记忆”档案在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功能障碍。

其一, 档案治理体系不彰, 导致“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力量不足。“迁台记忆”档案资源治理体系是差异性行动主体基于档案资源有效开发利用, 采用多元化方式所形成的协同共治格局。当前“迁台记忆”档案治理体系还存在不足之处。有些地区档案馆主动性强, 已先行开展“迁台记忆”文献征集、整理与开发工作, 形成有关反映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列成果, 但苦于专项经费不足, 无法及时向社会宣传推介。有些地区的档案系统对“迁台记忆”档案文献征集、研究与转化工作重视不到位, 尚没有充分认识到“迁台记忆”档案在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政治意义。有些地方虽建有工作机制, 但存在对上级工作布置的简单复制, 以及“迁台记忆”档案征集对象不精准、开发研究不深入等问题。这无疑将阻碍“迁台记忆”档案对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综合效能。

其二, 档案资源利用不全, 引致“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力度不够。“迁台记忆”档案资源利用不充分, 比如信息孤岛化、开发浅显化、叙事碎片化等, 这限制了其对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推动能力。首先, 资源信息缺乏有效整合, 出现“迁台记忆”档案信息孤岛化问题。因整合力度不足导致“迁台记忆”档案资料缺失或与实际脱节, 有关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之间血缘关联的历史记忆也可能随之出现缺失与脱节, 降低“迁台记忆”档案的信息凭证效度与信度。其次, 对“迁台记忆”档案资源的利用片面化, 产生开发浅显化问题。铸牢台湾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建基于客观性的信息凭证与共享性的集体记忆, 而这需经由“迁台记忆”档案资源开发得以实现。然而, 有些地方停留于档案资源的表面展示, 尚未形成专题性、系列性布展效果; 多数档案资源数字化赋能效果不好, 社会影响有限, 尤其没有深入台湾基层民众。最后, 档案叙事主体对档案实体及其整体性背景把握不充分, 诱发叙事碎片化问题。虽然“迁台记忆”档案在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需要处理好真相的全面还原与多重联系的问题。目前多数档案资源开发的叙事主体往往专注于某一档案实体, 而忽视对其当时历

史背景的总体性理解，影响档案叙事的客观性，诱发档案服务台湾同胞溯源寻根信息的证据链条不充分。

（三）“台独”分子的设卡阻扰

目前，“迁台记忆”档案在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还遭受“台独”分子的恶意阻扰。“台独”分子不仅对“迁台记忆”档案资源征集与展示活动百般阻扰，而且妄图从根本上切断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渊源与文化记忆。

其一，添设交流障碍，恣意限制“迁台记忆”档案入岛活动。从“迁台记忆”档案征集情况来看，目前绝大多数捐献者主要是当地台胞台属，而直接来自台湾的档案捐献者较少。比如，截至 2024 年 8 月，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档案局共接受荔城区与台湾社会各界人士捐赠“迁台记忆”档案资料 1 183 件，其中，面向台湾征集档案 69 件，约占不到总件数的 5.8%，数量偏少。究其根源，除了社会媒体宣传不深入外，还与台湾当局的出入境政策存在诸多关联。台湾当局对两岸“迁台记忆”档案展示交流也多加设卡，限制乃至阻止海峡两岸族谱、历史文献等入岛布展。此外，台湾当局对前来祖国大陆参访交流的台湾同胞实施返台传唤审查政策，企图通过政治恐吓、社会舆论等手段压制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向往。有台湾同胞反映，来祖国大陆参加文化交流活动返台后，台湾当局有关部门就要求其到指定地方交代情况，如果没有及时报告的话，将面临政治审查后果。这无形中削弱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文化寻根与民族认同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不利于发挥“迁台记忆”档案对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助推效果。

其二，炮制“文化台独”谬论，妄图撕裂“迁台记忆”档案记忆。2016 年以来，民进党重新上台后，始终拒不接受“九二共识”，拒不放弃“台独”党纲，并与“文化台独”势力媾和，倒行逆施，炮制“台湾主体意识”“台湾民族意识”等“文化台独”谬论^[37]。民进党当局的“文化台独”谬论极力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用错误的历史结论影射和否定现实，妄图解构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成员身份与集体记忆^[3]。比如，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炮制“108 课纲”，完全把“中国史”从历史教科书中抹去，换成“东亚史”，妄图彻底切断台湾地区与祖国的历史联结；同时，“108 课纲”删除遍及先秦时代至近代的 17 篇文言文，这就是在搞文化的“失忆化”^[38]。民进党当局的“文化台独”意图及其错误行径贻害无穷，直接诱发台湾年轻世代对祖国历史文化的无知与无感，造成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结构性失忆”。记忆是身份与民族认同的基础，如果没有了共同的历史记忆，“迁台记忆”档案的功能价值式微，难以为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基础性支撑。

五、“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优化

针对“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未来两岸同胞须加强合作，不断创新机制体制，提升“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综合效能。

（一）强化政治引领：提供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力量

“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明显的政治性特征^[39]。这种政治性特质的形成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其内部存在发展不一的

差异性民族族群,始终面临着如何将多个民族族群整合于一个国家政治体系的问题^[40]。而要推动这种差异性族群凝聚形成一致性的政治归属意识,并整合进国家政治体系之中,则需要一个具有高度威信的使命型政治主体——中国共产党来完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其以强大的组织力与凝聚力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力量。“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能够为“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政治保障、引领发展方向、供给精神力量,从而战胜各种现实挑战,尤其有助于揭露“台独”分子及其历史虚无主义谬论之面目。

其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升制度效能。“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政治性工程,其依赖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提升“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效能。其二,创建话语结构体系,把握叙事主动权。要坚持党对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强领导,加快建构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历史文化、政治制度、民族复兴、社会互动、经济互促等方面的话语体系,并使之与“迁台记忆”档案有机融汇,形成对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指引。

(二) 健全治理体系: 汇聚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合力

“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多元行动主体协力推进的实践,需要通过健全治理体系,厘清多元行动主体的权责关系,汇聚高效运作的协同治理合力。

其一,行政高位推动。要坚持以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为“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方向引领与组织保障。其二,强化业务指导。推进将“迁台记忆”档案与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列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的培训计划。面向涉台、文博等官方或社会团体,开展有关“迁台记忆”档案与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专题性培训。其三,创新工作机制。加快推动“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级议事协调机制、相关政策法规、专项实施方案建设。地方政府加强对“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领导,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健全“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治理体系,便于解决“迁台记忆”档案资源征集难、保管分散、共享滞后、业务不深等现实问题。

(三) 推进档案业务: 夯实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资源基础

“迁台记忆”档案业务事关档案资源的认定、保护与利用,构成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保障。要推进“迁台记忆”档案业务,充分发挥其对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支撑功能。

其一,开展“迁台记忆”档案征集。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题,不断提炼“迁台记忆”档案系列题材征集点,纵深开展家族(宗族)迁移、民俗互动档案等体现家国情怀档案的征集。涉台、文博、档案等官方或社会团体要密切合作,面向返台定居台胞、台属、在闽定居台胞、台商、台生等群体,广泛动员其积极参与“迁台记忆”档案文献征集与研发活动。联系台湾宗亲团体、同乡会、宫庙团体等社会组织,共同开展“迁台记忆”档案双向征集,增强台湾同胞与祖国大

陆交往交流文献历史档案的完整性。借助电视、广播、报刊、网络、小红书、脸书等新闻媒介或社交平台，做好新一代“迁台记忆”档案资料的征集工作，收集涉台婚姻家庭故事和实物，保存两岸居民的幸福记忆。其二，推动“迁台记忆”档案活化利用。支持档案、图书、历史、文博工作及其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专家库，联合开展“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与理论研究。鼓励“迁台记忆”档案捐献者参与解读档案资料，撰写迁台人物和家族亲友感人故事、口述史，通过影音记录及史料典藏，以情促融，营造“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浓厚氛围。制定两岸有关声音、图片、动画影像等“迁台记忆”档案资料的统一格式标准，以利于两岸档案资料长期的保存和交流。推动“迁台记忆”档案馆、博物馆等场馆成为各类各级教育教学基地，服务两岸各族同胞研学交流需要。

（四）拓展宣介渠道：扩大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长尾效应

拓展宣传推介渠道，是“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走深走实的重要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创新涉民族宣传的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拓宽传播渠道，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讲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可靠保障，讲清楚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认同度和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讲清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所具有的明显优越性”^[41]。“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重视宣介工作，拓展宣介方式，开发文创作品，从而丰富“迁台记忆”档案基础性资源。

其一，加强宣介工作。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宣传力度。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要拓展传播渠道，通过新闻报道、开设专栏、发布公益广告等方式，增强社会公众的“迁台记忆”档案保护意识，厚植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档案基础。树立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从娃娃抓起的理念，创建两岸青少年档案文化交流基地和平台，确保“迁台记忆”档案代际接续。支持地方“迁台记忆”档案场所建设，使之成为台湾同胞溯源寻根、追忆民族认同的“记忆之场”。其二，推动数字赋能。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善于运用数字技术，努力克服“迁台记忆”档案在时空方面的传播障碍，给台湾同胞带来更加生动与直观的体验、认知。将“迁台记忆”档案中反映台湾与祖国大陆往来的历史事迹，通过社交媒介加以传播，促进“迁台记忆”档案承载的民族记忆对台湾同胞的可及性。加大“迁台记忆”档案资源整合力度，推动数字化建设，建立“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数据库和共享平台。其三，开发文创作品。要以档案文献展示、专题研发等举措，打造“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品牌。比如，开发“迁台记忆”档案中的台湾抗战题材，在台举办对抗“台独”史观的历史展览，唤起公众对日据时期苦难历史的记忆。鼓励两岸同胞或社会团体联合创作诸如《两岸家书》《台湾·1945》《“迁台记忆”背后的故事》等反映台湾同胞心声的影像作品，用影像纪实作品唤起两岸民众的共同记忆，推动“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故事走进校园、走向社会、走入台湾。

六、结语

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遏制“台独史观”建构直至消除“台独史观”、达成反“独”

郑容坤. 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档案进场及其实现: 以“迁台记忆”档案为例[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5): 128-140.

促统的重要举措。实践中, 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需要借助一定的具象载体。“迁台记忆”档案反映了海峡两岸各民族同胞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录, 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 更呈现政治性意义。运用“迁台记忆”档案服务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有助于台湾同胞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形成反“独”促统的有力武器。未来更好地彰显“迁台记忆”档案对台湾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助推作用, 需要两岸同胞密切合作、审时度势, 进一步提升其综合效能。

参考文献:

- [1] 郝小刚, 任志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两岸关系大局的“四个坚定”重要论述的叙事逻辑与内涵意蕴[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3): 126-137.
- [2] 刘相平. 论历史记忆的重构与台湾的“去华夏化”——兼论“文化台独”者的思维逻辑及路径选择[J]. 台湾研究, 2017(3): 1-12.
- [3] 任冬梅. 警惕赖清德“洗涤人心”打造“文化台独3.0”[J]. 两岸关系, 2024(7): 16-17.
- [4] 邓观鹏, 顾友仁.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样态、危害与治理[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4): 149-164.
- [5] 习近平会见马英九一行 王沪宁蔡奇等参加会见[N]. 人民日报, 2024-04-11(1).
- [6]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29.
- [7] 朱松岭. 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战略考量、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4): 36-46.
- [8] 陈桂清, 吴晓芳. 铸牢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价值与实践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1): 36-43.
- [9] 陈小艳. 在对台工作中深入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J]. 两岸关系, 2024(5): 8-9.
- [10] 黄江林, 郭学松. 闽台同源武阵中的中华民族认同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23(3): 134-139.
- [11] 游红霞, 田兆元. 妈祖信仰铸牢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与实践机制——谱系理论的视角[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3): 142-150.
- [12] 宣朝庆, 高绮悦. 民族地区的文化符号、集体记忆与文化协同——从北川大禹信仰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凝结[J]. 民俗研究, 2024(3): 5-17+157.
- [13] 周雪香. 血浓于水: 闽台血缘[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
- [14] 陈孔立. 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8.
- [15] 杨彦杰. 闽南移民与闽台区域文化[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1): 85-90.
- [16]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J]. 毕然, 郭金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77-80.
- [17] Schwartz, J. M., and T. COOK. Archives, Records, and Power: the Making of Modern Memory[J]. Archival Science, 2002(2): 1-19.
- [18] 特里·库克. 180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C]//国家档案局, 中央档案馆. 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7.
- [19] 丁华东. 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84.

- [20] 苏雨晴, 吴永宁. “迁台记忆”档案的价值和开发路径研究 [J]. 兰台世界, 2023 (11): 42-45.
- [21] 关于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迁台记忆”档案文献的公告 [EB/OL]. (2022-03-31) [2024-08-05]. http://www.fj-archives.org.cn/dazw/bsdt/202203/t20220331_296075.htm.
- [22] 台湾女孩赖赖携全家回漳寻根团圆 [EB/OL]. (2024-02-26) [2024-08-04]. <http://www.zznews.cn/system/2024/02/26/031220841.shtml>.
- [23] 赵静蓉.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30.
- [24] 庄为玠, 王连茂. 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 [G].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4.
- [25] 林嘉书. 南靖与台湾 [M]. 香港: 香港华星出版社, 1993: 7-8.
- [26] 杨苓妍. 同根同源血浓于水——网红歌曲原型台湾兄妹的寻根故事 [J]. 台声, 2022 (7): 90-91.
- [27] 高天鹅, 林彦辰. 台胞两兄弟“半张纸族谱寻根”背后的故事 [J]. 台声, 2021 (18): 92-93.
- [28] 王磊. 从民族性到现代性——韩万峰少数民族电影创作漫谈 [J]. 电影文学, 2023 (7): 114-117.
- [2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236.
- [30] 张照堂. 影像的追寻 [M]. 北京: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17: 501.
- [31] 罗琳, 杨铁男. 港台纪实摄影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1): 174-183.
- [32] 记忆的力量——共同纪念抗战胜利催生两岸关系发展正能量 [EB/OL]. (2015-09-02) [2024-08-12].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02/c_1116451641.htm.
- [33] 台湾民间最新制作抗战纪录片台北首映 [EB/OL]. (2015-08-11) [2024-08-05]. <http://news.cntv.cn/2015/08/11/ARTI1439261640757556.shtml>.
- [34] 福建泉州“迁台记忆”档案文献抢救保护显成效 [EB/OL]. (2024-01-19) [2024-08-09]. https://daj.fuzhou.gov.cn/zz/daxw/yjdt/202401/t20240119_4763853.htm.
- [35] 透过档案 回溯漳台记忆 [EB/OL]. (2023-06-10) [2024-08-11]. http://zzpd.fjsen.com/2023-06/10/content_31335484.htm.
- [36] 陈丽珍. 台湾地区高龄化与少子化的人口结构将何去何从? [EB/OL]. (2023-02-06) [2024-08-10]. <https://www.huaxia.com/c/2023/02/06/1604971.shtml>.
- [37] 钟厚涛. 民进党当局构筑“文化台独”的主要策略及其危害 [J]. 统一论坛, 2023 (1): 42-45.
- [38] 任冬梅. “文化台独”侵蚀台湾社会 [J]. 两岸关系, 2023 (12): 22-23.
- [39] 严庆. 政治认同视角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0 (1): 14-21.
- [40] 周平. 多民族国家国家整合的逻辑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 13-23.
- [4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3-10-29 (1).

责任编辑: 杨稀琴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全球的 “民主”干涉行动及其危害

周文星

（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从表面上看是一家创建于美国境内、行动遍及全球的非政府组织，但从其运作模式尤其是收支状况、人事安排、组织架构、目标手段等四个核心要素来看，该机构实则是以“民主促进”之名、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的美国政府“白手套”，已成为美国巩固、护持与扩张其霸权的关键工具。近年来，NED 的全球“民主”干涉行动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主要包括年度收支与国会拨款持续稳步增长、干涉手段日趋间接、动态调整国别区域项目重点、强化信息战并转向资助美国盟伴国家等。这些新变化是 NED 阶段性调整其工作目标的结果，但深层次反映了国际局势变化背景下美国国家利益与全球战略的动态调整。NED 在全球的“民主”干涉行动产生了一系列危害后果，如塑造虚假“民主”叙事并加剧叙事的二元对立、导致目标国的政治对立与社会动荡、形成错误的“民主”示范效应、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与全球治理的发展与完善。当前，NED 的全球“民主”干涉行动在美国内外遭遇更多挑战，但该机构绝不会因此中断其干涉他国内政行径，反而会以更多元的手段、更灵活的方式继续推进在特定目标国的行动。为更全面有力地遏制 NED 非法干涉我国内政的企图，我国应从制度建设和舆论叙事层面同时发力，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

关键词：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民主”干涉；国家安全；反分裂；反干涉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5.012

作者简介：周文星，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国会立法干涉台湾问题的规律、风险与对策研究（1973—2021）”（21CGJ047）

引用格式：周文星．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全球的“民主”干涉行动及其危害[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5）：141-157．

一、问题的提出

2024 年 7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将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作为健全国家安全体系,进而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1]。2024 年 8 月 9 日,中国外交部发布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所作所为及真实面目》报告,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下文简称 NED)打着“促进民主”的幌子,颠覆他国政权、干涉别国内政、煽动分裂对抗等恶劣做法与非法行径进行了有理有据有力的批驳^[2]。反分裂、反干涉、反“长臂管辖”不仅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党的重要工作任务,而且也是党和国家当前和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

正如报告指出的,NED 的身影几乎无所不在,即使是法国、英国、印度等美国的盟友伙伴国家也长期遭到这家机构的干扰与渗透。成立于冷战时期的 NED 在过去 40 多年里不仅没有日暮途穷,甚至在近年有进一步扩张的势头,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府的背后支持。NED 作为美国政府维持其海外利益的“白手套”^[3],其所宣称及推广的所谓“民主”并非契合目标国实际情况、符合当地民众切身利益的真民主,其充其量只能代表日益广受诟病的美式民主。NED 在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推行的冠以所谓“民主促进”(democracy promotion)的诸多项目,不过是以“民主”之名、行干涉他国之实。显然,这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自二战结束以来自主探索的民主道路判若鸿沟,完全背离各国各地民主多样性发展的规律与趋势。在此背景下,分析、揭露并批驳 NED 在全球各国策动的非法“民主”干涉行动,及时且必要。

国内外学界针对 NED 展开了角度多元的分析,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就国内学界而言,有的学者对 NED 干涉我国新疆事务展开了个案分析,认为该组织充当干涉渗透的“排头兵”,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其干涉手段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4];也有学者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角度,揭露 NED 在美国对缅甸外交和对华战略中的负面角色^[5-6];还有些学者从美国民主援助的视角,批判 NED 在非政府组织外衣的掩护下干涉他国内政,认为该机构紧密服务于美国外交与安全战略^[7]。国外学者也长期关注并深入研究 NED 的相关“民主”实践。例如,有的学者以 NED 为个案,将其输出美式民主的做法视为实现美国霸权“天定命运”的重要抓手^[8];也有学者通过分析 NED 的历史背景、组织结构以及围绕其海外业务的持续争论,探讨该组织对于美国的积极与消极角色^[9];还有美国学者批判 NED 在冷战后对乌克兰进行“民主”干涉的相关实践,认为其相关行为在乌克兰国内引发了一系列危害^[10]。

既有研究为人们理解 NED 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存在两点主要不足:一是研究视角的局限性,目前尚无专文从全局视角分析 NED 在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干涉行动;二是研究时间的滞后性,国内外学者没有考察 NED 的最新发展及其趋势特点。本文以 NED 为分析对象,运用文本分析法并结合对 NED 最新资料的研究,剖析该组织全球“民主”干涉行动的运作模式、趋势特点及危害后果。

二、NED 全球“民主”干涉行动的运作模式

表面上看，NED 是一家创建于美国境内、行动遍及全球的非政府组织，但从其运作模式尤其是组织架构、收支状况、人事安排、目标手段等四个核心要素来看，该机构实则是服务并拓展美国政府海外利益的“白手套”，已成为美国巩固、护持与扩张其霸权的关键工具。

（一）组织架构

NED 自身并非行动机构，而是一个超级捐赠机构，其对全球多个国家与地区进行“民主”干涉行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每年以小额直接捐款的方式，向全球数百个非政府机构提供资助，该机构董事会负责逐案审查、批准或拒绝相关拨款^[11]。二是以间接资助的方式，将每年从国会拨款总额中的约 60%经费转拨给四个核心受让机构，再由这些机构负责审核决定接受赠款的外国团体，为全球范围内的相关组织与个人源源不断地提供活动资金^[12]。这四个受让机构包括“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简称 NDI）、“国际共和党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简称 IRI）、“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简称 SC）和“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简称 CIPE），它们分别代表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和劳工、商会的利益^[13]。这四个代表美国不同利益集团的独立机构，每年通过 NED 获得国会的拨款，使它们在弥合政治左右分歧、消除劳工与大企业对立的氛围下，向全球范围粉饰“民主促进”、展开“民主”干涉，以便巩固、维持和扩张美国霸权。实际上，这种组织架构与行为模式为各方提供了政治分肥的绝佳机会。美国进步主义知名杂志《国家》记者大卫·科恩（David Corn）将 NED 描述成“一群共和党和民主党活动人士、保守的工会和自由市场主义者的‘猪肉桶’（pork barrel）”，认为他们不过是“利用捐赠资金来运营各自的迷你国务院”^[14]。如图 1 所示，NED 通过“一体四翼”的组织架构，从政治、文化、经济、市场等方面多措并举、同时发力，在全球范围展开持续的、大规模的“民主”干涉行动，企图实现美国的霸权护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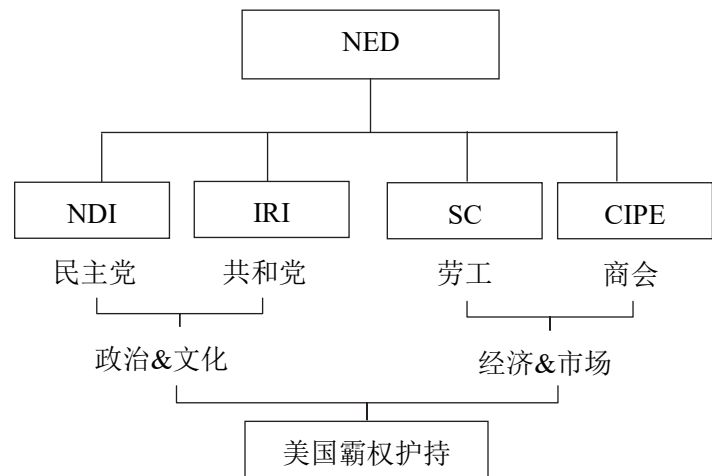


图 1 NED 的组织架构
(来源：笔者自制)

在上述四个核心受让机构中，除了 SC 成立于 1997 年，另外三家机构都与 NED 同时成立于 1983 年。作为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四家机构都有明确的分工。其中，NDI 和 IRI 都自称是无党派非政府组织，但它们分别与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维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侧重于推进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社会多元转型与选举活动、扶植当地政治团体。自成立以来，NDI 已经和 156 个国家和地区的活动团体合作，侧重于“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公民参与、推动选举辩论与治理改革、增进边缘化群体的政治利益”等^[15]。40 多年以来，IRI 领导了全球 100 多个国家的项目，侧重于“各国公民参与政府政治过程、提高所谓政府决策透明度”，尤其通过其“全球影响力中心”在全球进行上千次民意调查，并借助“全球妇女民主网络”和“青年民主网络”等机制，动员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妇女和青年参与政治过程^[16]。总之，NDI 和 IRI 侧重于从政治和文化层面推进全球“民主”干涉行动。

比较而言，SC 和 CIPE 则侧重于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展开相关工作。SC 是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附属机构，因此更关注工会，侧重于推动工会组织、发起工人运动。SC 还多次协助美国政府在全球破坏左翼运动，阻止海外左翼工会的崛起。正如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前主席乔治·米尼（George Meany）等人所指出的，为了避免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资本造成严重威胁，美国将不会允许有阶级意识的劳工运动蓬勃发展^[17]。过去几十年以来，SC 已在全球 60 多个国家开展劳工相关项目，侧重于与目标国家的工会、社区团队等群体组织合作，为当地工人提供培训、研究和法律支持^[18]。CIPE 是美国商会的下属机构，自称系世界唯一一家致力于支持“民主”、加强私营部门利益的机构，以便为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商业界、企业界、智库界创造有利的环境^[19]。该机构代表美国自由主义者的利益，力图通过维护“自由市场”、推动“经济改革”，扩充美国在全球的商业版图。

（二）收支状况

NED 自诩为一家独立、非营利的非政府组织，但从该机构的资金收支可以判定，该机构绝非独立运营的机构，而是美国政府的“官办非政府组织”。NED 在 1983 年成立时，美国国会立法通过了“1984 和 1985 财年国务院授权法”（H. R. 2915）。该法规定在对国务院的年度综合拨款法案中，须明确列出向 NED 拨款的具体拨款金额与资金用途^[20]。根据过去 40 多年以来 NED 的收支统计数据，该机构的年度资金与收入几乎全部依靠美国国会拨款，业务支出也几乎全部用于美国联邦政府项目。

在年度资金收入方面，NED 年度财务报表披露的数据表明，基金会收入的约 99% 源于美国联邦政府的拨款资助，仅有不到总资金 1% 的收入来自社会捐款。NED 的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并服务于美国联邦政府。例如，2023 年的年度总收入约为 3.6328 亿美元，其中 3.6204 亿美元来自美国联邦政府拨款，仅百万美元来自个人与企业捐款。在年度资金支出方面，NED 的绝大部分资金（超过 80%）都是以合同的形式，执行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所委托的相关项目。以“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网”公布的最新数据为例，国务院向 NED 拨付 3.15 亿美元，用于执行其委托的 2023—2028 年的“全球民主人权项目”，以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目标国家实现所谓“民主转型”^[21]。在资金用途方面，NED 年度预算中的至少三分之二经费拨付给四大核心受让机构，且这一占比随着国会对 NED 预算的变化而动态调整（图 2）。

周文星：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全球的“民主”干涉行动及其危害 [J] .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 141-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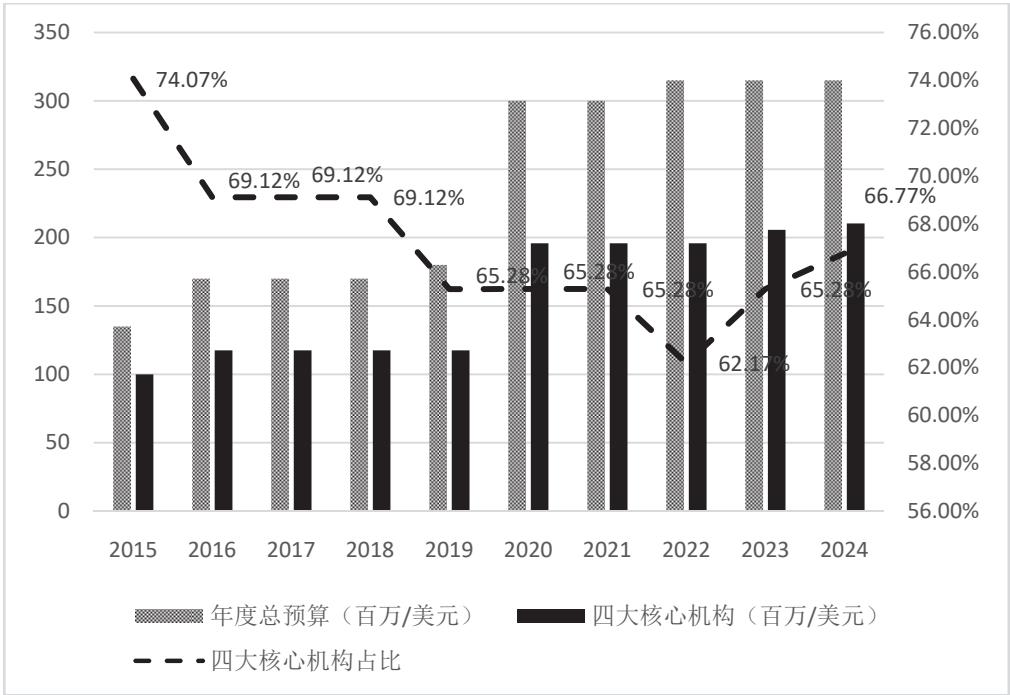


图 2 2015—2024 年美国国会对 NED 年度预算趋势分布

（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国会官网整理，数据截至 2024 年 8 月）

（三）人事安排

人事安排反映了 NED 运作模式与决策行为的重要特征。在 NED 的领导与决策架构中，创始与现任董事会成员对于项目拨款等核心议题具有关键的决定权与话语权。自成立之初，NED 就汇集了多位美国政府从事外交事务的要员。事实上，作为 NED 制度基础的“民主基金会法案”（NED Act），就是时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丹特·法赛尔（Dante Fascell）等国会领袖在 1983 年 11 月推动通过立法的。NED 成立之后，法赛尔短暂地担任基金会的代理董事会主席，之后由前助理国务卿约翰·理查森（John Richardson）担任第一任董事会主席。历届董事会成员多半由美国政界重量级前政府官员组成，包括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弗兰克·法伦科普夫（Frank J. Fahrenkopf Jr.）、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查尔斯·马纳特（Charles T. Manatt）。在 NED 现任 31 位董事会成员中，20 位成员曾在政府任职，其中少数成员为现任国会议员。剩余 11 位成员主要来自美国劳工界、企业、高校和智库。如表 1 所示，董事会成员中有 4 位现任国会议员，且分别来自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以及民主、共和两党，极为鲜明地体现了美国资深媒体人将 NED 描述为利益集团公平瓜分“猪肉桶”的形象。大多数具有行政当局任职经验的董事会成员，曾就职于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开发署等与美国“民主推广”与干涉紧密相关的涉外部门。在管理层面，曾在里根政府出任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使的卡尔·格什曼（Carl Gershman），在 1984—2021 年期间长期担任 NED 总裁，其后由曾任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主任的戴蒙·威尔逊（Damon Wilson）担任 NED 建立以来的第二任总裁。

表 1 具有政府任职经历的现任 NED 董事会成员

序号	姓名	现任职务	政府任职经历
1	戴蒙·威尔逊 (Damon Wilson)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曾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主任，北约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驻华大使馆中国事务官员
2	肯尼斯·沃拉克 (Kenneth Wollack)	主席	曾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美国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民主促进”咨询委员会委员，美国国际开发署咨询委员会委员
3	彼得·罗斯坎 (Peter Roskam)	联合副主席	曾任伊利诺伊州共和党籍众议员
4	大卫斯·卡格斯 (David Skaggs)	联合副主席	曾任科罗拉多州民主党籍众议员，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情报委员会成员
5	詹达伊·弗雷泽 (Jendayi Frazer)	联合副主席兼秘书	曾任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总统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非洲事务高级主任，首位女性驻南非大使
6	莉莉安娜·阿亚德尔 (Liliana Ayalde)	成员	曾任美国南方司令部指挥官，驻巴西大使，西半球事务助理国务卿，美国国际开发署拉美和加勒比局助理署长
7	阿莉萨·艾尔斯 (Alyssa Ayres)	成员	曾任南亚事务助理国务卿
8	斯蒂芬·比根 (Stephen Biegun)	成员	曾任常务副国务卿，对朝事务特别代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幕僚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
9	斯科特·卡彭特 (Scott Carpenter)	成员	曾任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人权与民主事务助理国务卿
10	华金·卡斯特罗 (Joaquin Castro)	成员	现任德克萨斯州民主党籍众议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
11	车维德 (Victor Cha)	成员	现任拜登政府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国防部长顾问，曾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副团长
12	凯丽·克瑞 (Kelley Currie)	成员	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代表，国务院全球刑事司法办公室主任，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
13	丹尼尔·弗里德 (Daniel Fried)	成员	曾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驻波兰大使，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
14	蒂姆·凯恩 (Tim Kaine)	成员	现任弗吉尼亚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
15	雷切尔·克莱因菲尔德 (Rachel Kleinfeld)	成员	曾任国务院外交事务政策委员会委员
16	梅尔·马丁内斯 (Mel Martinez)	成员	曾任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
17	迪娅·沙德罗 (Nadia Schadlow)	成员	曾任副国家安全顾问，国防顾问委员会成员
18	托德·扬 (Todd Young)	成员	现任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金融委员会成员、外交委员会成员
19	胡安·萨拉特 (Juan Zarate)	成员	曾任反恐副国家安全顾问，恐怖主义融资和金融犯罪助理财政部长
20	伊莉斯·斯特凡尼克 (Elise Stefanik)	成员	现任纽约州共和党籍众议员，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成员，情报常设特别委员会成员

(来源：笔者根据 NED 官网数据整理，数据截至 2024 年 8 月)

(四) 目标手段

1. 核心目标

根据其官网介绍，NED 声称“致力于发展和加强世界各地的民主制度”，每年提供 2 000 多笔拨

款，以“支持在 100 多个国家为实现民主目标而努力的海外非政府组织项目”^[22]。然而，这并非 NED 的真实目的。根据美国国务院解密档案显示，时任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在 1983 年 3 月向里根总统建议成立一个专门提供政治培训和资金支持的非政府机构，以便在规避有关美国政府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指控的前提下，公开完成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秘密完成的工作^[23]。作为缓解美国内外各界对 CIA 海外行动不满的替代方案，NED 经里根同意后得以在当年 11 月成立，并随之成为冷战时期配合美国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攻击苏联的重要武器。NED 通过其自诩的非政府组织身份，以去敏感化的方式，充当美国政府拓展其海外利益的“白手套”。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向美国国会提供的外交政策报告指出，NED 的成立代表了一种向当地民间社会组织提供资助的新方式，以支持其他国家自下而上的“民主与人权运动”^[24]。当然，NED 所宣称的“民主”制度并非基于世界各国国情，也不是符合当地民众利益的民主配套机制，而是该机构对外行动的工具。针对 NED 发动“颜色革命”的相关实证研究表明，“正是华盛顿的推动促进官办非政府组织进入推翻政权的战争状态”，即美国强烈的外交谴责、积极主动的行动指导，以及 NED 与目标国家活动人士里应外合的共同推动，最终导致目标国家发生政权更迭^[25]。通过在全球推广美式“民主”，甚至以“民主”之名在各国强推“民主”干涉行动、推动政权更迭，从而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及其在全球的战略利益，才是 NED 真正的核心工作目标。

2. 手段策略

为实现上述核心目标，NED 采取了一系列手段与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挑选、扶植目标国反对派以及相关的非政府组织，作为 NED 干涉该国内政事务的代理人，并资助该国反对派力量和准军事力量发起大规模反政府运动和暴力事件，推动这些国家发生政变。相关调查发现，海地在 2004 年发生的政变就是 NED 通过这种手段造成的结果。2000 年，前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在总统选举中赢得了 92% 的压倒性多数选票，其创建并所属的政党“拉瓦拉斯之家”（Fanmi Lavalas）也赢得了众议院 80% 的多数席位。在阿里斯蒂德赢得大选的几个个月后，NED 迅速渗透并资助成立由 200 个政治组织组成的强大反对派联盟“民主融合”，公然对抗阿里斯蒂德政权，最终造成阿里斯蒂德在执政第二年就被迫下台，导致海地作为拉美首个独立的国家自此陷入持续的动荡和危机^[26]。2024 年 3 月，格鲁吉亚现任议会议长沙尔瓦·帕普阿什维利（Shalva Papuashvili）也指责 NED 在该国的非法行为，认为 NED 企图通过资助与该国内反对派领导人纳蒂亚·梅兹维里什维利（Natia Mezvrishvili）关系紧密的非政府组织干预该国大选，影响该国的政治发展进程^[27]。除了为目标国反对派提供资金支持，NED 还为反对派领导人和组织颁发奖项，将他们打造成“民主斗士”，教唆他们以更大的决心和意志在所在国代理“民主”干涉行动。NED 在 2024 年 6 月就举办了一场颁奖晚会，表彰那些所谓为 NED “民主”项目作出杰出贡献的组织与个人。在这次会上，与委内瑞拉反对派关系甚密的艺术界多个代表被授予 2024 年“特别奖”，甚至邀请委内瑞拉反对党领导人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作为特邀嘉宾在晚会上发表主旨演讲^[28]。

二是通过为目标国的新闻媒体机构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发起舆论战、信息战，以塑造有利于目标国反对派的舆论环境、抢占话语权，进而对目标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为推动政权更迭、实现“民主转型”制造舆论环境与话语基础。据 NED 披露的数据，该机构仅 2022 年一年就投入 5 100 万

美元，用于资助 82 个国家和地区的 430 个新闻媒体项目^[29]。除了资金资助，NED 还从外围塑造和提供舆论环境支持，其中尤其以在美国国会和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资助之下于 2006 年成立的“国际媒体援助中心”为典型。该中心不提供任何形式的资助，而是主要通过发布报告、开展活动等方式，从舆论和话语层面促进和支持所谓全球“独立媒体”的发展^[30]。美国政府高度重视这家新成立机构在动员国际媒体界中的作用。2007 年，美国国会在其大厦为该中心举办“首个新闻自由日”活动，包括时任印第安纳州籍众议员、特朗普时期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等重要官员均出席^[31]。此外，NED 还资助设立一些针对特定目标国的“民主”评价中心及相关研究，为美国干涉相关国家的内政背书。例如，受 NED 资助、成立于伊拉克的“公共政策治理中心”连续 6 年发布伊拉克“民主转型国家指数报告”，该系列报告故意降低伊拉克的民主指数，并将其归类为“部分威权过渡”国家，为美国政府推迟撤军、持续干涉伊拉克内政提供某种政策“合理性”^[32]。

三是以奖学金项目吸引全球多国的知识精英，为他们提供“民主”相关的教育和培训，为 NED 寻找潜在的代理人、干涉他国内政打造精英梯队。目前，NED 主要设置了三个不同的奖学金项目，包括“里根-法赛尔民主研究员计划”“赫福德青年奖学金”以及“潘·肯布林民主论坛奖学金”。这些奖学金研究计划，旨在加深其他国家和美国国内青年尤其是精英对于美式民主的理解，提升他们在推进“民主转型”过程中的能力。其中，“里根-法赛尔民主研究员计划”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知识精英，尤其是拥有博士学位且具备一定工作经验的“民主活动”人士、记者、“公民社会”领袖和学者，到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 NED 总部居住 5 个月，让他们对包括本国在内的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民主”状况进行所谓独立研究^[33]。“赫福德青年奖学金”则为 30 岁以下的青年研究员提供在 NED 3 个月的学习机会，并就某项“民主”议题进行研究、参与相关活动和学术讨论^[34]。“潘·肯布林民主论坛奖学金”主要针对美国国内在国际事务、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方面有 5—10 年专业经验的政府官员、智库专家、媒体工作者、私营部门雇员等参与项目的各国人员提供交流和学习平台^[35]。总之，这些“民主”类奖学金项目虽在形式、对象等方面各有侧重，但都以为 NED 寻找和培养干涉他国内政的潜在代理人为工作目标。

四是聚集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各类“民主”网络与组织，构筑一个全球范围的“民主联盟”，为推动“民主促进”积累更具“代表性”的集体力量、形成更显著的聚合效应。例如，1994 年 4 月，NED 设立“国际民主研究论坛”，定位为一个为世界各地的“民主”团体和机构提供活动方案的信息交流中心。论坛先后启动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项目，即研究和会议项目、“民主资源中心”和《民主杂志》，并不时邀请世界知名学者和“民主运动”人士在论坛进行 3 到 10 个月不等的常驻研究工作^[36]。又如，NED 在 1999 年 2 月牵头与印度的非政府组织在新德里首次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世界民主运动”，邀请来自 80 多个国家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参加，并将“非洲民主论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民主网络”“亚洲民主化世界论坛”“全球地方治理网络”“国际妇女民主网络”“民主研究机构网络”以及“世界青年民主运动”等全球各地的“民主”网络聚集起来^[37]。这个全球性“民主”网络的秘书处设立在 NED，在后者的组织与动员下，该网络截至 2023 年底已举办 11 届世界大会。近年来，NED 在构建全球“民主”网络的最新动向之一，是在 2009 年成立旨在促进和加强对世界各地选举监督的“全球国内选举监督员网络”，目前该网络在全球五大洲的 89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251 个成员组织，在地理分布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38]。

三、NED 全球“民主”干涉行动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NED 的全球“民主”干涉行动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主要包括：年度收支与国会拨款持续稳步增长、干涉手段相对日趋间接、动态调整国别区域项目重点、强化信息战并转向资助美国盟伴国家。这些新的发展趋势表面上看是 NED 阶段性调整其工作目标的结果，但实质上反映了国际局势变化背景下美国国家利益与全球战略的动态调整。

（一）年度收支与国会拨款持续稳步增长

近年来，NED 的年度收入与支出都出现了持续稳步增加的趋势。如图 3 所示，除了 2020 年因新冠疫情负面冲击了 NED 在海外的“民主”干涉行动以外，NED 的总收入、总支出以及政府拨款和政府项目支出在 2021 至 2023 年连续 3 年稳步增长。同时，NED 用于执行政府项目的资金，皆超过基金会总支出的 80%，2021 年甚至超过了 96%，2022 年和 2023 年也都接近 90%。自 2020 财年开始，美国国会大幅增加了对 NED 的年度性拨款预算，从 2015 年度的不到 1.5 亿美元，逐步提升至 2019 年度的 1.8 亿美元，并在 2020 年和 2021 年达到了 3 亿美元，2022 年再度将上限提升至 3.15 亿美元（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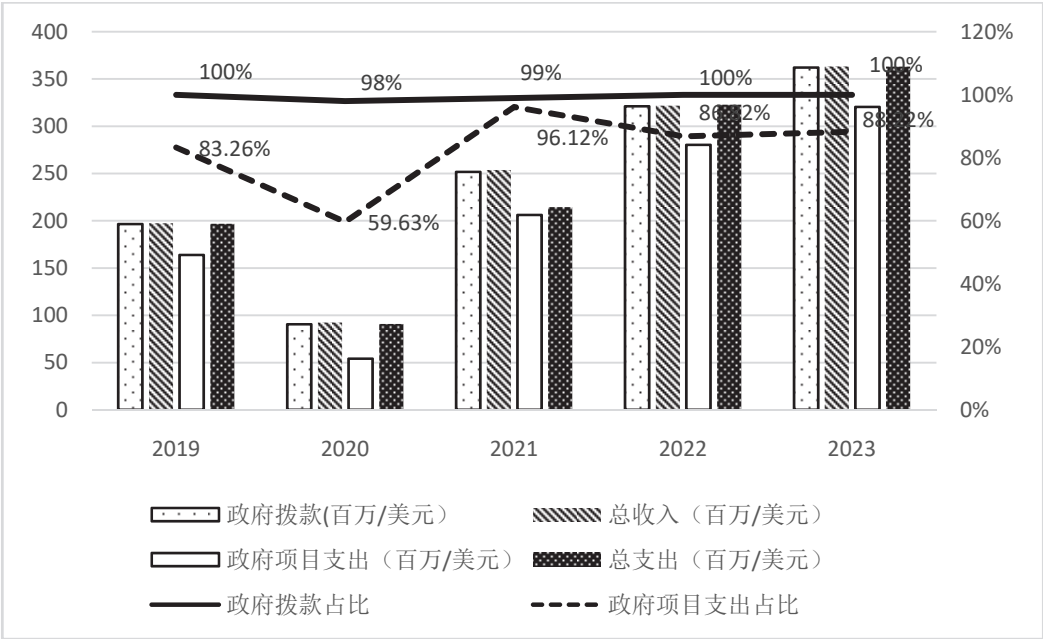


图 3 2019—2023 年 NED 年度收支趋势分布

（来源：笔者根据 NED2019—2023 年财务报表整理，数据截至 2024 年 8 月）

（二）干涉手段日趋间接

NED 设计和推动相关“民主”干涉行动的手段日趋间接，是该机构近年来的另一个主要变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NED 的大部分项目主要通过支持目标国家的异见人士、政党和工会等反对派力量，去颠覆本国政权并扶植新的亲美政权。为了增加项目的成功率，NED 及四个核心受让机构往往会

首先派出一支调研队伍，与目标国的不同“政治活动者”进行一至两周的交谈，然后再精挑细选确定项目合作者。这种传统工作方式在 NED 针对苏东解体后的中东欧与中亚地区国家发起的一系列“颜色革命”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 NED 并没有完全放弃这种传统方式，但近年来更倾向于采取投资项目国技术项目等间接的干涉手段，实现“民主”干涉的工作目的^[39]。

（三）动态调整国别区域项目重点

NED 推进“民主”干涉行动的目标国遍及全球五大洲 100 多个国家，并将项目重点集中于亚洲、中东和北非、非洲、中欧和东欧、欧亚、拉美和加勒比等发展中国家聚集的区域。NED 近年来又随着全球政治局势的变化，动态调整其全球国别区域项目的重点。一是动态调整对特定国别区域的资助力度与项目数量。根据对 NED 年度报告的数据统计，该机构 2019 年对全球 97 个国家共资助了 1 684 个项目，2020 年对 80 多个国家资助了 1 995 个项目，2022 年共资助了 101 个国家的 1 865 个项目。二是在全球国别区域的项目又聚焦于不同的方向，投入比例也略有不同。以 2021 年为例，NED 在全球共投入约 2.6 亿美元项目资助金。其中，资金投入最多的区域为亚洲，约占总资助金的 18%，其次是占比 16% 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见图 4）。具体而言，在亚洲 15 个国家投入的 4 850 万美元，主要用于扶植“自由”媒体、培养新兴领导人、提高“公民社会”的“参政能力”；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18 个国家投入的 4 350 万美元，优先支持目标国推进“民主、法治、问责制和透明度”等倡议；在非洲 34 个国家投入的 4 150 万美元，则重点扶持这些目标国家的民间社会组织和独立媒体，以加速这些国家的“民主转型”。此外，NED 还额外投入 3 730 万美元开设约 100 个全球项目（占比 14%），推动全球项目申请方之间的合作与交流^[40]。总之，对全球国别区域资金投入的多寡和工作的方向，充分体现了 NED 针对全球区域不同目标国家分别量身定做“民主”干涉行动的工作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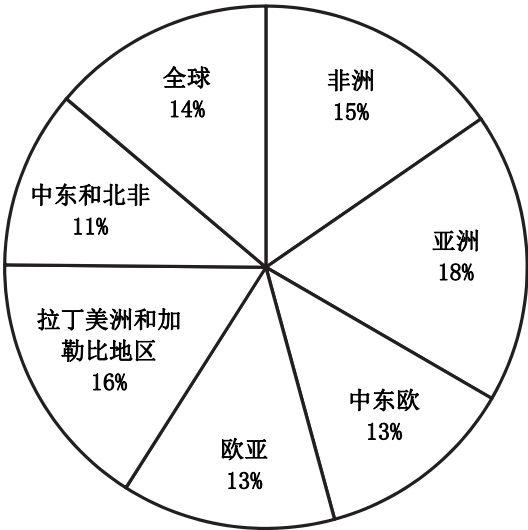


图 4 2021 财年 NED 全球“民主”干涉行动的区域资金分布
（来源：笔者根据 NED2021 年度报告绘制）

（四）强化信息战并转向资助美国盟伴国家

周文星.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全球的“民主”干涉行动及其危害[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5): 141-157.

NED 更加注重加强对信息战的投入, 并将工作对象由所谓“非民主”国家逐步转向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家。近年来, 随着话语在影响民众认知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配合美国赢得信息战成为 NED 的重要目标之一。仅 2022 年一年, NED 在媒体和信息方面就投入了 5 100 万美元, 以资助其他国家的新闻媒体业共同对抗与中国、俄罗斯的竞争^[41]。NED 副总裁克里斯托弗·沃克(Christopher Walker) 在 2023 年 5 月出席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时指出了基金会的战略考量, 认为全球数字媒体的激增已成为新闻媒体行业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关键驱动因素, 美国需将信息领域的竞争作为全球优先事项。NED 资助美国的盟伴国家, 建立全球信息战联盟。例如, 自 2016 年起, NED 对 7 家英国媒体提供高达 260 多万英镑的资助, 包括调查新闻网“贝灵猫”“金融揭秘”“开放民主”“查禁目录”“第 19 条”“媒体法律辩护倡议”、汤森路透基金会等政治法律与媒体组织, 鼓动这些组织利用“独立新闻记者”身份, “揭露”俄罗斯等国家发起的信息战^[42]。

NED 近年来之所以呈现出上述新的发展趋势与特点, 表面上看是该机构对其工作目标阶段性调整的结果, 体现了它在推进项目过程中较高的独立性和自主性。NED 的活动与项目资金虽然主要来自国会拨款且服务于美国国务院的海外“民主”干涉行动, 但其相关活动主要由机构董事会成员决定, 因此比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政府涉外机构更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43]。NED 名义上的非政府组织身份, 使之免受他国多数法律或外交的诸多限制, 也增加了其自主性^[44]。但从更深层次原因来说, NED 作为美国“官办非政府组织”和美国政府“白手套”, 又决定了它必须服务于美国政府的国家利益。NED 近年来全球“民主”干涉行动的持续变化, 实质上反映了国际局势变化背景下美国国家利益与全球战略的动态变化。例如, NED 更倾向于采取日趋间接的“民主”干涉手段, 在很大程度上和美国政府近年来重视运用软实力和重拾更加柔性的“说服”政策密切相关^[45]。

四、NED 全球“民主”干涉行动造成的危害后果

NED 忽视目标国家与地区的国情社情民情, 企图在全球输出和推广美式民主, 为此不惜发动“颜色革命”甚至公开挑起内部矛盾、公然干涉他国内政。NED 粗暴、错误且非法的全球“民主”干涉行动, 势必造成一系列负面冲击与危害后果。

(一) 塑造虚假“民主”叙事并加剧叙事的二元对立

NED 长期以来在全球五大洲、上百个国家力推的所谓“民主”, 并不是契合目标国与地区实际情况、服务本国与地区民众利益的真民主, 充其量只是对美式民主的简单复制和生搬硬套。就此而言, NED 通过各种“民主”项目极力塑造的“民主”叙事脱离目标国的现实基础与事实根基, 对后者而言犹如空中楼阁, 属于错误、虚假和危险的叙事话语。此外, NED 海外“民主”干涉行动还将加剧真假民主之间的二元对立。自 2021 年上台以来, 拜登政府将美国外交政策定义为所谓“专制政权”与民主国家联盟之间的关键战争, 并为推动全球“民主”干涉行动与干涉他国内政投入大量资源^[46]。在此过程中, NED 积极配合拜登政府向全球输出美式民主的战略计划, 并成为塑造虚假“民主”叙事、加剧真假民主叙事对立的关键角色。2023 年 2 月, NED 总裁威尔逊公开赞许拜登有关“民主对抗专制”的观点, 并主张加大研究与项目推进力度^[47]。2024 年 2 月, NED 发布了名为“赢得观点之战”的研究报告, 声称美西方“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正处于意识形态战争之中, 而叙事将作为

一种强有力的、不对称的权力工具决定这场不同制度、观点与意识形态战争的结果，从而可能重塑全球秩序，建议美国等“民主国家”支持正处于“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同时加大力度对抗“非民主国家”^[48]。美国知名民调公司发布的最新调查表明，全球 24 个国家受访者对不同政治制度与治理形式尤其是美式民主与非美式民主的看法较往年更加对立^[49]。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结果归因于拜登政府近年来极力炒作、NED 积极推动的观点与叙事之战。

（二）导致目标国的政治对立与社会动荡

自成立以来，NED 在全球频繁策动“民主”干涉行动、持续介入他国内政，众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深受其害。例如，为配合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NED 近年来通过资助香港的异见分子、反对派党团与非政府组织以及新疆和西藏的分裂势力，日益加大力度干涉我国香港、新疆、西藏等内政事务。少数不法分裂分子在新疆与西藏地区一度诉诸暴力，香港也在 2019 年爆发“修例风波”，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的正常运转、危及百姓的福祉，产生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此类事件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层出不穷，包括古巴、伊朗等国家近年来接连爆发的反政府抗议活动，都与 NED 的运作密切相关^[50-51]。NED 总裁威尔逊对此毫不掩饰，曾在 2023 年缅甸国内局势空前紧张之际公开撰文，声称“缅甸的亲民主势力可以取得胜利”，但关键在于 NED 为缅甸反政府抗议者提供更多资金支持，煽动该国亲美势力继续抗争，推动实现所谓的“民主转型”^[52]。又如，至今尚未完全从暴动中平息孟加拉国，其国内混乱局面也是 NED “民主”干涉行动的结果。根据 2021 年发布的国别报告，NED 对孟加拉国的劳工部门、学生和青年事务等共投入 400 万美元^[53]。2024 年 7 月爆发的大规模抗议和示威活动，主要参与者正是受到 NED 资助的大学生和青年群体。此次暴力事件导致了孟加拉国政权的更替，并造成数千人伤亡，国家下一步发展方向仍属未知数。

（三）形成错误的“民主”示范效应

NED 打着“民主”旗号干涉他国内政，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推动政权更迭，不仅造成相关国家社会动荡、经济衰退，而且严重侵害他国主权与安全利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利于世界和平稳定。更为糟糕的是，随着其全球活动范围的扩大、影响力的增强，NED 已成为一些西方国家效仿的“典范”，纷纷成立类似的机构并在其他国家开展政治活动。例如，英国早在 1992 年就参照 NED 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模式，成立了“威斯敏斯特民主基金会”。该机构通过非政府组织向东欧和前英联邦国家捐助资金，以便开展意识形态宣传工作^[54]。澳大利亚政府也在 1998 年资助成立了“民主制度中心”，主要通过资助亚太地区进行“民主”宣传工作^[55]。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之后，欧盟国家意识到缺乏对邻国发生的事件做出迅速和果断的应对措施，并受 NED 工作模式启发在 2013 年成立了“欧洲民主基金会”，旨在向其他国家的政治活动者尤其是反政府势力提供快速、灵活的活动资金^[56]。随着更多西方国家效仿 NED 成立类似政治机构，并密集展开干涉他国内政的政治活动，势必对全球的安全、经济与发展局势造成更加恶劣的深远影响。

（四）有悖地区和平稳定与全球治理发展完善

NED 的海外“民主”干涉行动遍布全球五大洲，其在某个特定目标国策动的暴乱及其负面后果，往往会牵动并外溢至更广泛的区域，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甚至还可能在全球范围产生连带效应，负面冲击全球治理的发展及其完善。例如，2010 年发生于突尼斯街头的单个自焚事件，却不受控制地演变为一场亲民主游行与暴动的“茉莉花革命”，并迅速蔓延到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等

周文星：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全球的“民主”干涉行动及其危害[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5）：141-157．

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世界引发了一次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阿拉伯之春”的混乱浪潮。NED 主办的《民主杂志》刊发一篇论文指出，“颜色革命”之所以能够在阿拉伯世界快速传播，主要得益于西方国家主导的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及其传播的强有力的“民主”叙事，使得美式民主能够跨越国界，并成功地在中东和北非以极快的速度完成广泛的社会动员^[57]。随着一些国家政权的倒台，另一些深受 NED 及其传播的“民主”叙事影响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反对派组织与民众也蠢蠢欲动，坚信他们通过举行抗议与示威活动等类似方式，同样可以推翻本国长期执政的领导人。这同样也是 NED 持续开展“民主”干涉行动、宣传“民主”叙事的恶果之一。正因如此，NED 在冷战后尤其重视对媒体、信息等相关领域的投入，并通过资助所谓的“独立”新闻从业者与媒体机构，利用他们发布“揭露黑料”的虚假信息，削弱各国政府的信誉，助推反政府势力成功煽动和操弄民意，进而加速政权的更迭。

NED 力推的全球“民主”干涉行动并没有为目标国带去繁荣与发展，反而为地区的和平稳定注入更多不确定性，冲击全球治理的发展与完善。研究发现，在所有发生“颜色革命”、采纳美式民主制度的中东北非国家，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不少国家仍充斥着政治反对运动甚至爆发持久的内战，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发展无望^[58]。“阿拉伯之春”席卷过后的中东北非国家，如今已成为全球难民数量最多的聚集地和输出源，持续增加的难民潮考验中东北非以及欧盟国家的区域发展与治理，对全球治理及其完善提出更大的挑战^[59]。

五、结语

NED 在全球推行的“民主”干涉行动，实质上是以“民主”之名、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是完全错误、粗暴且非法的自私自利行径。近年来，由于日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NED 的全球“民主”干涉行动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同时，NED 的全球“民主”干涉行动在美国内外也面临更多挑战。美国国内持续激化的政党极化与社会分裂，导致 NED 长期以来向目标国灌输的美式民主遭遇空前的“认同危机”，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反思美式民主及其治理模式。同时，NED 在美国各界也引发了争议，包括共和党对 NED 的运作模式以及对“政治分肥”的方式也持有不同看法。此外，随着 NED 全球“民主促进”项目以及干涉他国内政行动全面铺开及其行动力度的加强，越来越多目标国饱受 NED 干涉之苦，更多国家开始警惕、批判和揭露 NED 的“民主”项目及背后美国政府的非法企图。鉴于 NED “民主”干涉行动的错误性、非法性及其危害性，该机构未来将面临更多上述类似挑战。

尽管如此，NED 绝不会中断其全球“民主”干涉行动，而是会手段更多元、方式更灵活地继续推进在特定目标国的行动。对此，我们应从制度建设和舆论叙事两方面同时发力，更全面有力地应对美国和 NED 对我国进行“民主”干涉的非法企图，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

一是从制度建设层面，健全反干涉、反制裁、反“长臂管辖”机制、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过去十年以来，尤其是随着 2017 年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及其日益加剧，美国政府加大反华遏华力度，尤其在涉疆、涉藏、涉港和涉

台等我国内政事务上大做文章，企图以此扰乱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大局。相应地，我国应加大力度反分裂、反干涉，尤其注重健全反干涉机制，从制度层面抵制美国政府和 NED 对我国内政事务的干涉。同时，还应践行、发展和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全面推进依法治疆、治藏、治港，加大反“台独”力度。

二是从话语舆论层面，加大力度宣传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道路，打破美国和 NED 宣传及强加的美式民主话语叙事。世界多数国家的实践表明，各国必须基于自身国情社情民情等实际情况，探索符合本国人民利益的民主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通向幸福的道路不尽相同，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这本身就是人民幸福的应有之义。”^[60]而美国政府以及 NED 漠视各国人民对多样性民主的探求，不仅将民主狭隘定义为“竞争性选举”与政党轮替，而且将其民主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为此甚至不惜干涉别国内政、推动政权更迭。中国基于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全过程运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进而通过民主的促进作用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行稳致远^[61]。我国学界、媒体界等应在话语叙事和舆论层面，加强宣传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概念与实践，打破美国对民主的狭隘与错误定义，鼓励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2024-07-22（1）.
- [2]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所作所为及真实面目[EB/OL].（2024-08-09）[2024-08-10].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xw_new/202408/t20240809_11468602.shtml.
- [3] 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些事实清单[EB/OL].（2022-05-07）[2024-08-09]. https://www.mfa.gov.cn/zyxw/202205/t20220507_10683088.shtml.
- [4] 张威. 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新疆事务的干涉[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4）：145-146.
- [5] 张勇安，刘海丽. 国际非政府组织与美国对缅外交——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中心[J]. 美国研究，2014（2）：21-33.
- [6] 孙海泳. 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角色、作用与前景[J]. 国际展望，2021（5）：89-108.
- [7] 刘国柱. 全国民主基金会与美国民主援助[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27-35.
- [8] Joshua Muravchik. Exporting Democracy: Fulfilling America's Destiny [M]. Washington, D. C.: AEI Press, 1992: 204-220.
- [9] Lindsey A O' Rourk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 Peter Marton et al.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Non-State Actors in East-West Relations [C].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2024: 670-688.
- [10] David Korenke. A High Stakes Gamble: U.S. Assistance for Ukraine's Pro-Democracy Movement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7（1）：187-194.
- [11] Susan B, Epstein, Ian F, etc.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Policy and Funding Issues [R]. Washington, D.C.: Congress Research Service, 1999: 10-15.

周文星.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全球的“民主”干涉行动及其危害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141-157.

- [12] Joshua Muravchik. Exporting Democracy: Fulfilling America's Destiny [M].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1992: 203-204.
- [13] NED. How We Work [EB/OL]. (2000-06-05) [2024-08-13]. <https://www.ned.org/about/how-we-work/>.
- [14] David Corn. Beltway Bandits: Better Dead than N.E.D [J]. The Nation, 1993 (7): 56.
- [15] NDI. About NDI. (2017-01-23) [2024-08-20]. <https://www.ndi.org/about-ndi>.
- [16] IRI. What We Do. (2004-08-23) [2024-08-20]. <https://www.iri.org/what-we-do/>.
- [17] Jeff Schuhrke. Reckoning with the AFL-CIO's Imperialist History [EB/OL]. (2020-01-09) [2024-08-17]. <https://jacobin.com/2020/01/afl-cio-cold-war-imperialism-solidarity>.
- [18] SC. Who We Are. (2000-06-02) [2024-08-20]. <https://www.solidaritycenter.org/who-we-are/>.
- [19] CIPE. Who We Are. (2000-04-05) [2024-8-20]. <https://www.cipe.org/who-we-are/>.
- [20] U.S. Congress. Department of State Authorization Act, Fiscal Years 1984 and 1985 [EB/OL]. (1983-05-05) [2024-08-16]. <https://www.congress.gov/bill/98th-congress/house-bill/2915/text>.
- [21] UASSpending.gov. Project Agency [EB/OL]. (2023-11-29) [2024-08-18]. https://www.usaspending.gov/award/ASST_NON_SAQMIP24GR0005_1900.
- [22] NED. About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EB/OL]. (2000-01-12) [2024-08-22]. <https://www.ned.org/about/>.
- [23]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Haig to President Reagan [EB/OL]. (1982-03-08) [2024-08-21].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81-88v01/d84>.
- [24] Michael Webe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U.S. Foreign Policy: Tools and Considerations for Congress [EB/OL]. (2024-01-04) [2024-08-22].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7890>.
- [25] Sreeram Chaulia. Democratisation, NGOs and “Colour Revolutions” [EB/OL]. (2006-01-19) [2024-08-20].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colour_revolutions_3196jsp/.
- [26] Travis Ross. The NED's Role in Undermining Democracy in Haiti [EB/OL]. (2022-10-26) [2024-08-29]. <https://www.blackagendareport.com/neds-role-undermining-democracy-haiti>.
- [27] Georgian News. Georgian Parliament Speaker Slams NED for “Funding” Party-Affiliated NGOs [EB/OL]. (2024-03-07) [2024-08-29]. <https://sakartvelosambebi.ge/en/news/georgian-parliament-speaker-slams-ned-for-funding-party-affiliated-ngos>.
- [28] NED. The 2024 NED Democracy Awards [EB/OL]. (2024-06-13) [2024-08-29]. <https://www.ned.org/events/the-2024-ned-democracy-awards/>.
- [29] NED Supports Press Freedom around the World [EB/OL]. (2023-05-02) [2024-08-29]. <https://www.ned.org/ned-supports-press-freedom-around-the-world-2023/>.
- [30] NED. 2007 Annual Report [EB/OL]. (2016-03-22) [2024-08-29]. https://www.ned.org/docs/07annual/PDFs/AR_CIMA07.pdf.
- [31] CIMA. World Press Freedom Day 2007 [EB/OL]. (2007-05-02) [2024-08-29]. https://www.cima.ned.org/event/world_press_freedom_day_2007_the_international_role_of_the_media_in_exposing_corruption_and_promoting_good_governance/.
- [32] Bouthaina Shaaban. How Does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 Serve US Interests?

- [EB/OL]. (2024-08-27) [2024-08-29]. <https://english.almayadeen.net/articles/opinion/the-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ned>.
- [33] NED. About the Reagan-Fascell Democracy Fellowship. (2003-05-23) [2024-08-20]. <https://www.ned.org/fellowships/reagan-fascell-democracy-fellows-program/applying-for-a-fellowship/>.
- [34] 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 Hurford Youth Fellows Program: Information Booklet and Application Guidelines [EB/OL]. (2023-05-31) [2024-08-20]. <https://www.movedemocracy.org/wp-content/uploads/2024/06/Hurford-Youth-Fellows-Program-Information-Booklet-and-Application-Guidelines-2025.pdf>.
- [35] Opportunities for Youth. Apply for The Penn Kemble Forum Fellowship [EB/OL]. (2024-06-28) [2024-08-20]. <https://opportunitiesforyouth.org/2024/06/28/penn-kemble-forum-fellowship/>.
- [36] Marc F Plattner and Larry Diamond.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Democratic Studies Established by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J].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1995 (1): 113-115.
- [37] 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 Building the 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 Inaugural World Assembly [EB/OL]. (1999-02-17) [2024-08-14]. https://www.movedemocracy.org/wp-content/uploads/2017/09/About_Founding-Statement_Draft1.pdf.
- [38] NDI. Global Network of Domestic Election Monitors [EB/OL]. (1999-10-12) [2024-08-21]. <https://www.ndi.org/global-network-domestic-election-monitors>.
- [39] Sarah Bush. The Taming of Democracy Assistan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10-116.
- [40] NED. 2021 Annual Report [EB/OL]. (2022-10-17) [2024-08-25]. <https://www.ned.org/annual-report/2021-annual-report-2/#a59d371ac3>.
- [41] NED. Testimony By Christopher Walker Befor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Subcommittee o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Wars: Is the U.S. Winning or Losing?” [EB/OL]. (2023-05-03) [2024-08-14]. <https://www.ned.org/testimony-by-christopher-walker-before-senate-foreign-relations-subcommittee-on-the-global-information-wars-is-the-u-s-winning-or-losing/>.
- [42] Matt Kennard, Mark Curtis. “CIA Sidekick” Gives £2.6M to UK Media Groups [EB/OL]. (2022-01-17) [2024-08-14]. <https://www.declassifieduk.org/cia-sidekick-gives-2-6m-to-uk-media-groups/>.
- [43] Larry Diamond. Promoting Democracy [J]. Foreign Policy, 1992 (87): 25-46.
- [44]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Democracy Promotion: An Objective of U.S. Foreign Assistance [EB/OL]. (2019-01-04) [2024-08-12].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4858>.
- [45] William I. Robinson. Promoting Polyarchy: Globalization, US intervention, and Hegemony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3.
- [46] Lindsey A O’ Rourk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 Peter Marton et al.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Non-State Actors in East-West Relations [C].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2024: 670-688.
- [47] Atlantic Council. Damon Wilson on Selling Democracy Worldwide: It’ ll Take “Voices from Thos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EB/OL]. (2023-02-02)[2024-08-24].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news/>

周文星.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全球的“民主”干涉行动及其危害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141-157.

- transcripts/damon-wilson-on-selling-democracy-worldwide-itll-take-voices-from-those-in-the-developing-world/.
- [48] Joseph Siegle. Winning the Battle of Ideas: Exposing Global Authoritarian Narratives and Revitalizing Democratic Principles [R]. Washington, D.C.: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1-3.
- [49] Richard Wike et al.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Remains a Popular Ideal, but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re Critical of How It's Working [R]. Washington, D.C.:Pew Research Center, 202: 7-10.
- [50] Mark Ginsburg. Economic and Media War against Socialist Societies: The Case of US - Cuban Relat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ban Studies, 2022 (2): 272-308.
- [51] Qamar Bashir. America's White Gloves: Derailing Regimes [EB/OL]. (2024-08-18) [2024-08-25]. <https://tribune.com.pk/story/2488939/americas-white-gloves-derailing-regimes>.
- [52] Damon Wilson. Myanmar's Pro-Democracy Forces Can Win. They Need Our Help to Do So [EB/OL]. (2023-11-13) [2024-08-2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3/11/13/myanmar-junta-democracy-civil-society/>.
- [53] NED. Bangladesh 2021 [EB/OL]. (2022-02-10) [2024-08-23]. <https://www.ned.org/region/asia/bangladesh-2021/>.
- [54] UK Foreign, Commonwealth & Development Office. Westminster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Independent Public Body Review 2023 [EB/OL]. (2024-03-07) [2024-08-14].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westminster-foundation-for-democracy-independent-public-body-review-2023/westminster-foundation-for-democracy-independent-public-body-review-2023>.
- [55] Australian Government. Consultative Group to the Centre fo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nounced [EB/OL]. (1999-12-10) [2024-08-14]. <https://www.dfat.gov.au/news/media/Pages/consultative-group-to-the-centre-for-democratic-institutions-announced>.
- [56] Library of European Parliament. European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Hopes and Expectations [EB/OL]. (2013-04-30) [2024-08-14].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bibliotheque/briefing/2013/130458/LDM_BRI\(2013\)130458_REV1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bibliotheque/briefing/2013/130458/LDM_BRI(2013)130458_REV1_EN.pdf).
- [57] Philip N, Howard, Muzammil M, etc. The Upheavals in Egypt and Tunisia: The Role of Digital Media [J]. Journal of Democracy, 2011 (3): 35-48.
- [58] Kali Robinson, Will Merrow. The Arab Spring at Ten Years: What's the Legacy of the Uprisings? [EB/OL]. (2020-12-03) [2024-08-24]. <https://www.cfr.org/article/arab-spring-ten-years-whats-legacy-uprisings>.
- [59] Britannica. Arab Spring [EB/OL]. (2024-08-20) [2024-08-28].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Arab-Spring>.
- [6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426.
- [61] 刘远亮. 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机理探赜 [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 52-62.

责任编辑: 卢媛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 基本样态、内在逻辑与应对策略

郑志康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以释放历史诠释权为名放逐客观性告诫的虚假意识形态，用带有强烈唯我论色彩的历史叙事集中指向庄严厚重的“四史”，试图从领导力量到具体内容的总体性虚无中歪曲中共党史，聚焦失误与细节的选择性虚无中抹黑新中国史，攻讦前后“两个时期”的对比性虚无中质疑改革开放史，从理论到未来的动态性虚无中否定社会主义发展史。其内在机理在于依循解构—颠覆—重构的逻辑，以从整体到真相的全面解构为逻辑起点，以从认知到价值的全面颠覆为逻辑展开，以利用特定的理论与方法实现彻底重构为逻辑旨归，进而实现全面虚无“四史”的意图。为此，必须立足唯物史观的原则高度，从理论与实践、方法与策略等多维向度出发，坚持深化研究，实现理论祛蔽；加强“四史”学习，强化历史认知；掌握批判武器，夯实应对力量；树立科学思维，破除方法谬误，进而彻底廓清“四史”的虚无迷障，使历史的本真面貌在无蔽状态中与我们现实照面。

关键词：历史虚无主义；四史；基本样态；内在逻辑；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5-0158-13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5.013

作者简介：郑志康，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研究”（23CXSJ14）；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基本科研业务“历史虚无主义的演进趋势及应对研究”（2023GN03）

引用格式：郑志康.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基本样态、内在逻辑与应对策略[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5）：158-170.

一、问题的提出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以下简称“四史”）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集中彰显，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更是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和精神瑰宝。“‘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深刻指出，要“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2]。这意味着，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问题尤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关注。

国内学者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起步较早并取得了丰富成果，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性研究。主要围绕其出场逻辑、叙事逻辑、运行机理、主要表现、现实危害以及应对策略等角度展开。学者们认为，历史虚无主义从萌芽、衍生到蔓延，是现实历史环境的影响、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文化多元化的侵扰、主体自身利益的驱动等多重因素相互耦合、共同助推的结果^[3]；其囿于割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依附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形而上学思维的方法逻辑^[4]，致力于娱乐恶搞歪曲历史事实、主观偏颇美化历史断面、颠倒黑白评议历史人物、断章取义拼凑历史真相^[5]，并依循着“‘潜隐-吸引’‘消费-触动’‘询唤-异化’的生发机制”^[6]肆意传播，企图实现“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党的领导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7]的目的。为此，必须要“继续发扬斗争精神，凝心聚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建立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长效协同机制”^[8]。二是间接性研究。在展开直接性研究的同时，也有不少学者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不断改头换面的传播新趋势和新特征，从多角度、多视域出发展开更加广泛的研究。具体而言，学者们从大历史观^[9]、“两个大局”背景^[10]、数智化叙事^[11]、资本逻辑批判^[1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3]、社会化转向^[14]等角度展开研究，进一步拓宽和延展了研究论域。

学术界虽已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批判性研究，但大都聚焦于模糊性的整体性探讨，而针对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具体性研究相对较少，对其系统考察则更显不足。因此，依循“是什么—怎么样—如何做”的内在逻辑，系统阐释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样态表征，揭示其内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恰当的应对举措显得十分必要。

二、从歪曲到否定：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基本样态

“四史”在时间上相互叠加、内容上相互关联、过程上相互贯通，是一个彼此间密切联系、接续传承、融会贯通的有机整体，集中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有利于我们坚定历史自信，夯实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思想基础。而历史虚无主义具有盲目否定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甚至否定历史文化，否定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精神，否定一切的历史观点和思想倾向。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在于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此，“四史”自然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针对目标。

（一）歪曲中共党史：从领导力量到具体内容的总体性虚无

中共党史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幼稚到成熟整个发展过程的全部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15]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却将矛头直指中共党史，特别是把重点聚焦于作为党史重要组成部分的革命史，企图在丑化党的领导、恶搞党史人物和颠覆党史史实的过程中彻底虚无党的历史。

其一，质疑执政能力，否定党的领导地位。挑战党执政的合法性、必然性与科学性，进而彻底颠覆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党史的重要手段。在历史层面，历史虚无主义者不顾历史背景，不论前因后果，不讲实事求是，肆意宣扬叫卖“革命制造论”“革命原罪论”“革命破坏论”等迷惑性论调，以此公开质疑、否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和中国革命的正义性与进步意义；同时不看主流、大势，只抓支流、末节，不断放大党史上的曲折和失误，故意抹杀党带领人民所取得的成就，试图以此达到其否定党执政地位的目的。在现实层面，历史虚无主义经常打着“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旗号，以轻佻的态度谩议党的章程、原则、制度，肆意夸大党内的腐败现象，把少数腐败分子当成党的“代言人”，并据此给党“画像”，污蔑党组织是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以此贬低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可以说，无论是历史层面否定党的领导作用，还是现实层面贬低质疑党的执政能力，其最终指向就是要彻底消解、颠覆党执政的正当性和党在人民心中的“主心骨”地位。

其二，惯用多种手段，解构党史人物形象。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从价值中立的“抽象人性论”出发，利用片面性的历史叙事颠覆性评价党史人物，对革命领袖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办法无限放大其缺点和错误，进而以“错误论”来全盘否定其功绩，以“阴谋论”来取代其辉煌成就；对于反面人物则运用“重新包装”“制造错觉”等手法进行美化，尤其是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地“找优点”“建人设”，极力凸显其“柔情”和“正义”一面，试图为汉奸“翻案”、为反革命者“平反”、为叛徒“正名”，以此颠覆党史人物固有的历史形象。例如，历史虚无主义以其主观想象臆造出汪精卫“为人诚实、不贪钱财、不近女色的革命老英雄形象”，企图为其翻案和做辩护，试图以此掩盖其卖国的卑劣行径。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采取娱乐化手法，以娱乐段子、搞笑视频以及微电影等形式戏谑、恶搞英雄人物，进而消解其正面形象，瓦解其意义承载。如近年曾经流行的抗日“神剧”中，就充斥着“八路军住别墅、女战士穿丝袜、手撕鬼子、秒躲子弹”^[16]等大量雷人情节和恶搞片段，致使英雄人物正面的崇高形象遭到严重解构。

其三，诋毁正统共识，颠覆党史史实。历史虚无主义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和求知欲望，采取断章取义、穿凿附会的“拼凑”伎俩对一些历史细节和史料“碎片”进行随意排列组合和二度加工，炮制以野史轶事、权谋争斗为内容的热点话题和极具误导性的伪命题博取受众眼球，以期实现挑战历史正统的目的。例如，历史虚无主义将毫无关联的历史碎片进行切割重组，肆意制造“共产党游而不击”“窃取抗战胜利果实”等热点话题和伪命题引人关注，实际上就是要挑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正统地位。此外，历史虚无主义还善于借“理性反思”的名义对历史共识提出质疑，并运用伪造的数据和史料进行“佐证”，从而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如“前有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某否定南京大屠杀事实、质疑死难者人数的言论在网上发酵；后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某替法西斯洗白，在网络上制造‘南京大屠杀是误杀、错不在日本’等错误言论”^[7]。事实上，这些看似

有理有据的反思性“新论”，绝不是符合历史史实的“真论”，而是故意改写历史、颠覆定论，用心极为险恶。

（二）抹黑新中国史：聚焦争议与细节的选择性虚无

新中国史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简言之，就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为达到虚无意图尤其注重在新中国史上大作文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1] 79

其一，聚焦历史争议，否定历史成就。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打着“还原真相”的旗号对“大跃进”“整风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进行歪曲解读和负面化渲染，极力放大这些事件的消极意义，并以此为基础无限放大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失误，声称新中国的历史一团漆黑，只不过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和堆积而已。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高举“反思历史”的标语，不顾历史发展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规律，对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外交破冰、逐步推进国防现代化等重大成就轻描淡写和选择性忽略，“对于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奠定中国现代化基础的社会主义建设予以全盘否定”^[17]，妄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从根本上说不过是“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如此“过度反思”历史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虚无、否定新中国的成长史和奋斗史，虚无、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其二，放大历史细节，质疑历史定论。历史虚无主义标榜“价值中立”的立场，奉“如实还原、秉笔直书”为“金科玉律”，并冠以“细节考证”的名目，以所谓“超然的客观主义的态度”，不遗余力地寻找和挖掘所谓“崭新史料”，特别是惯于从“演义”和“私人回忆录”一类极具主观性的非主流、非正统文本中寻找碎片化的史料支撑，企图用这些看似崭新且未经考证的“历史细节”来挑战定论，质疑新中国史。例如，别有用心之人从外国档案的“故纸堆”里搜罗“证据”，以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不向外国输出资本”等历史细节为由，牵强附会地指证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闭关锁国”政策，进而否定中国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助的方针政策。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家并没有闭关自守，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导致我们国家同西方国家没有多少贸易往来。历史虚无主义不顾帝国主义对新中国严密封锁的事实，一味叫嚣“闭关锁国”，俨然是对历史史实的歪曲和历史定论的颠覆。

其三，强化主观判断，臧否历史人物。历史虚无主义往往会脱域于具体的时空场景，故意带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滤镜”，误导人们用带有“偏见”的标准和“失真”的眼光分析评判历史人物。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滤镜”要么用无中生有、凭空杜撰的“历史证据”，拐弯抹角地贬损污蔑领袖、丑化抹黑英雄；要么本末倒置、颠倒黑白，在对历史人物的历史性建树和成绩选择性“失明、失聪”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放大历史人物身上的瑕疵、缺点，夸大其失误，从而在颠倒主要的和次要的、本质的和非本质的关系中极尽所能地贬低和颠覆历史人物原本正面积极的形象。例如，在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上，历史虚无主义者置历史事实和定论于不顾，刻意回避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的成就，任意夸大其某些失误，诱导人们得出一个“反传统”“反主流”的历

史判断。这种本末倒置、混淆黑白的做法在根本上就是试图通过否定毛泽东来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而全面否定新中国史。

（三）质疑改革开放史：攻讦前后“两个时期”的对比性虚无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更是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一次伟大创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中国的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18]历史虚无主义无视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断放大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问题，并肆意制造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对立，试图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的正当性和有效性。

其一，散布改革开放“倒退论”。历史虚无主义在忽视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突破和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有意放大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妄称改革开放致使少数官僚商人进入“天堂”，大多数普通民众陷入“深渊”，是“导致贫富差距、贪污腐败、自然生态破坏等现象的‘元凶’”^[7]；声称这与社会主义本质中“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公平正义、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存在不可逾越的距离。这种思潮由此判定所谓“改革开放在真正意义上并没有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反而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这种虚无论调混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以故意混淆黑白的选择性姿态罔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取得的显著性成就，“片面将特权、贪腐、贫富等人类普遍性问题同‘主义’与‘道路’挂钩，……以此把所有问题归咎为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与改革开放”^[13]，企图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改革开放的正确认知。

其二，散播改革开放“变质论”。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愈发猖獗地叫嚣改革开放“变质论”。他们以“国家的经济实力虽然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改善了，但三大改造中已消灭的私有制又复活了，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了”^[19]为由，公开诬称“改革开放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经叛道”，叫嚣“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邪路”，炒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演变为‘新官僚资本主义’‘威权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论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1]⁷⁶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论调不以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道路为评判标准，而是抓住一些表面现象或某些局部问题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和发展妄下结论，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迷惑性，极易误导受众。

其三，叫嚣改革开放“断裂论”。历史虚无主义者忽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内在联系，将二者外在地割裂和对立起来，或是用改革开放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就来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声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是“黑暗失败”的历史；或是极力放大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歪曲改革开放的性质，声称改革开放引入了资本的运作方式，是背离社会主义的立场与原则走“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是对改革开放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改弦更张。殊不知，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1]⁷⁸，“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

（四）否定社会主义发展史：从理论到未来的动态性虚无

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为人类社会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对人类社会产生产生了前所未

有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0]。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已有 500 年时间，从这个很长历史过程来考察，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脉络，更加充分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21]然而，历史虚无主义以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思维看待社会主义发展史，试图从理论到实践再到未来的动态性虚无中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发展史。

其一，在理论层面，制造由“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到“虚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论调。历史虚无主义为了达到否定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目的，不仅极尽所能诋毁、反诬马克思主义，肆意炮制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无用了”“落后了”等错误论调^[22]，而且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基督教的历史图式等同，声称马克思主义脱离启蒙的思想路线陷入了“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些错误论调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严重扭曲马克思主义的本真面相，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近年来，面对露骨直陈、明火执仗虚无马克思主义做法遭到全面揭穿和严厉批判的现实境况，历史虚无主义更是将矛头转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他们将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个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协调问题归结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悖论和困境，污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大众化进程，以此“否定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大众化意义”^[23]。

其二，在实践层面，由虚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到虚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历史虚无主义最早将目光聚焦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尤其善于从抹黑、诋毁领袖人物的档案入手来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历史虚无主义打着“解密”的旗号，将“大量说明列宁、斯大林时期成就的档案搁置一旁，而专挑个别失误掐头去尾、碎片化地放大”^[24]，造谣“列宁是德国间谍”，把斯大林描绘成“历史的罪人”，宣扬“列宁和列宁主义把俄国社会引上一条错误道路”，“苏联剧变的原因主要在于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25]。与此同时，历史虚无主义还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为圭臬，声称十月革命是历史的“早产儿”，苏联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苏联解体后，历史虚无主义趁势而上，不仅到处散布社会主义事业不能胜利的谬论，而且开始转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抹黑和诋毁。历史虚无主义炮制出社会主义改造“跨越阶段论”、“突然袭击论”、社会主义建设“搞砸论”等论调，声称中国并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生产力条件，过早地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是“揠苗助长”和“人工催熟”。这些错误论调实际上就是“忽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否定苏联十月革命发生合理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唯生产力论’和‘唯条件论’在中国的理论翻版”^[26]。

其三，在未来层面，炒作由“共产主义的虚无主义”到“共产主义渺茫论”的言论。在西方，自马克思主义真正出场以来，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就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和“幽灵”，不遗余力地攻击之、污蔑之。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就曾提出“共产主义的虚无主义”命题来质疑共产主义，声称“共产主义具有比资本主义更大的破坏性，原因在于它的主体是解放的自我，又没有任何限制性”^[27]。随着这种共产主义破坏性论调被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就所证伪，近年来，更是有部分历史虚无主义者开始四处散播“共产主义渺茫论”，声称共产主义是“头脑的激情”的产物，它“遥不可及”，是无法触及的“水中月”“镜中花”，只能存在于现实彼岸的空中楼阁之中。这种错误论调有意忽略了马克思所提出的“两个决不会”论断，混淆了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运动

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关系。其实质在于否定“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理论，影响人们对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三、从解构到重构：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内在逻辑

历史虚无主义虽然以极其隐晦的方式虚无“四史”，但不是漫无目的的随意虚无，而是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和线索理路，带有明确的政治意图。这就是依循“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线索和“解构—颠覆—重构”的逻辑理路展开，企图最终达到从根基处彻底重建“四史”，进而全面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

（一）解构“四史”：从整体到真相

从整体到真相的全面解构，是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逻辑起点。

其一，片面地看待历史，解构“四史”的整体性。“整体是由部分构成，部分从属于整体，因此我们在一切活动中都应该有全局观念或整体观念。”^[28]历史本身是由不同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等要素组成的完整版图。只有从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视域出发审视和考量历史，才能真正领会和把握历史的核心要义和整体面貌，进而避免陷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和“以偏概全”的误区。然而，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四史”本身的整体性，拒绝从宏观和整体上把握“四史”，而是从局部出发，在碎片化的历史片段上大做文章，并企图用这些历史的细枝末节颠覆原有的历史全貌。例如在研究抗战史时，历史虚无主义者极力挖掘国民党抗战的史实和细节，放大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并通过未经过推敲的某些“惊人数字”来加以佐证，回避和抹杀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事实，“企图淡化甚至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29]。

其二，主观地想象历史，解构“四史”的客观性。历史是由作为主体的人创造的，“但历史一经创造出来，就由主体的活动变成客观事实。历史是尝然而不是未然，是既成事实而不是等待书写的文本。历史不可选择、不可假设、不可改变”^[30]。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31]这意味着，客观性构成历史事实的最本然属性，研究历史必须“以历史事实具有客观性为立足点”^[30]和前提。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解构“四史”的关键手法恰恰就在于拒绝从实际情况出发、详细地占有历史材料、凭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得出经得起推敲的结论，而是以“我想”“我认为”“我看”为借口，随意排列、组合历史事实，甚至炮制、臆造“史实”。譬如，历史虚无主义刻意渲染和放大刘胡兰的情感经历，以其在前线经常为连长王本固做饭、敷药为由，臆造出刘胡兰当连长“小三”历史情节，试图以此解构刘胡兰是革命英雄的客观史实，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其三，孤立地审视历史，解构“四史”的有机性。“四史”虽然包含诸多阶段和部分，但它们之间并不是彼此毫无关联的独立板块式存在，而是彼此相互关联、有机融通、不可分割的。历史虚无主义却固守孤立的形而上学思维，从宏观上否定“四史”之间的有机关联，营造出一种彼此毫无关联的假象，并刻意制造彼此之间的对立，误导人们的历史认知。历史虚无主义从中观上无视“四史”本身的连续性和发展性，刻意将特定的历史阶段从前后关联着的历史之流中人为抽取出来加以

抽象研究,并以此为根据得出所谓“新证据”“新发现”来颠覆固有的历史传统。例如在研究改革开放史时,历史虚无主义就选择性地无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将彼此视为两段分离的历史加以外在分析,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历史史实的歪曲。历史虚无主义从微观上拒绝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置于历史有机体的坐标中加以定位,而是将其从历史进程中孤立出来加以审视。如此一来,历史虚无主义就把历史本身的有机性“过滤”掉了,从而使原本活生生的历史被缩减为一堆缺乏内在关联的僵死之物的堆积品。

(二) 颠覆“四史”：从认知到价值

如果说从整体到真相的全面解构是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逻辑起点,那么从认知到价值的全面颠覆则是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逻辑展开。在具体的逻辑展开上,历史虚无主义由外到内、由浅入深,从基础层次的感性认知到核心层次的情感认同再到根本层次的价值信仰,层层递进、缓缓上升,企图最终实现对“四史”的彻底颠覆。

首先,在感性认知即“认知—解释”层面通过任意解读导致认知混乱。“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认识解释逻辑,只有说清楚讲明白,才能确定下一步举措,区别就在于各个意识形态的知识论前提科学与否。”^[32]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同样具有自己的认知解释逻辑,只不过作为其前提的知识论基础乃是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相对立的抽象主观认识论。在最基础的层面上,历史虚无主义恰恰就是运用这种主观抽象的认知思维诱导受众产生对“四史”的认知混乱。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发生的偶然现象上下功夫、做文章,“特别是喜欢通过所谓的人之常识、常理、常情来审视和看待历史,结果必然造成历史现象与本质、常识与真知的混淆,进而造成人们历史认知的混乱”^[33]。例如,历史虚无主义从个人纯粹生理本能的视角对邱少云提出质疑,声称邱少云在烈火中被灼烧时,神经元难以控制,不可能一动不动,尤其是难以忍受剧烈灼烧感和疼痛感而不断翻滚乃是情理之中的事,试图以此颠覆人们对邱少云英雄形象的固有认知。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超越具体时空和脱域于具体语境,以重新“描绘”和“认识”历史为名,主观地“假设”“虚构”“捏造”历史,用故意“选择”的所谓历史事实推演真实发展的历史过程,试图以此重现历史真貌。然而,在这种抽象“想象”与“凭空捏造”中建构的“美好与真实”与原真性的历史本身已然大相径庭。比如,历史虚无主义故意以革命史为突破口,提出“假设不向苏联学习而向英美学习”“假设当年不出兵抗美援朝”等观点,然后以此为基础抛出提前包装好的私货,进而诱导受众动摇对历史史实的原有认知。

其次,在情感认同即“情感—心理”方面通过情感心理共鸣颠覆固有认知。作为意识的一种基本形式,情感是主体本身的客观心理活动,其内在机制由内在感触、情境评价与反应选择构成,它是人类活动不可缺少的内在动力,如果没有人的情感也就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34]。这意味着,感性认识只有通过情感体验或情感认同,才能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的真正力量。历史虚无主义深谙此理,他们不但通过极力凸显反动人物的柔情和感性一面来调动起受众的情感因子,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和心理共振,以美化反动人物,消解其负面形象,而且善于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和怀疑心理,将其意在表达的思想观点置于话语字面信息之外,尤其是将涉及立场、定性和历史观的内容全部设置为“留白”,然后设置诱导性线索和暗示性话语,引导受众在解读字面信息的语意时“顺其自然”地读出看似“自发”和“独立思考”实则事先预定的结论。比如,在对狼牙山五壮士英勇事迹的描

述中，历史虚无主义就通过设置“溜下来”“窜下来”等暗示性话语，引导受众得出“他们表面英雄实则贪生怕死”的虚假信息，企图以此“合乎情理”地解构革命英雄主义。

最后，在理性信仰即“反思—价值”层面，通过扭曲价值引发思想混乱。历史虚无主义妄图由浅入深在理性信仰层面彻底颠覆人们对“四史”的认知。一方面，在理性反思层面，历史虚无主义利用人们习惯驻足感性直观而难以达及理性反思的思维惯性，以“反思历史”为名，打着“学术探讨、学理争鸣”的旗号，极尽所能地搜集和挖掘“新史料”和“新证据”以质疑历史定论、挑战正统说法，并主张以这些新的史料为支撑，企图补写中共党史、改写新中国史、续写改革开放史、重写社会主义发展史，从而彻底颠覆“四史”。缺乏一定反思的受众极易被这些表面上“证据凿凿”的史料所迷惑。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打着“价值中立”的旗号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进行“反思”，实则有着明确价值立场和价值指向，那就是固守“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以西方价值和文化为唯一标尺来裁决中华文化和“四史”本身的价值。比如，历史虚无主义以所谓政治上没有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经济上也没有形成完全市场化的私有经济为由否定改革开放，实则就是用西方的价值观和标准来裁决改革开放史。

（三）重构“四史”：从理论到范式

解构和颠覆“四史”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终极目的，在解构和颠覆“四史”的基础上以一种“新的历史意义”重构“四史”才是其根本意图。质言之，利用特定的理论与方法来重构“四史”，是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逻辑旨归。

一方面，在理论上借用史学理论“重写四史”。其一，运用微观史学重写历史。微观史学又被称为日常生活史学，其根本要义在于将目光从整体性的涵盖地域辽阔、长时间段和关键人物的宏观过程转向局部性的历史细节和普通个别人物的研究，宣称要通过这种聚焦化的具体分析让历史更加“真实”。其仅仅关注历史细节和局部史实而较少关注历史的整体性，不可避免地存在碎片化和肢解历史的风险和企图。历史虚无主义正是利用微观史学的基本理论和特点，打着让历史更真实、更生动的标语，从普通的历史人物着眼，从历史的细节处入手重新书写历史，并将这些历史细节当作真实的历史本身。例如，在研究新中国史时，历史虚无主义就不讲前后的历史关联，不看历史的前因后果，从普通人曾经经历短暂忍饥挨饿的细节出发，无视整体上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逐步走上正轨的事实，武断地将新中国初期描绘成“苦不堪言”的年代、“饥饿”的年代。其二，征用实证史学补写历史。实证史学是一种西方实证学和传统考据学内在交融中形成的一种新考据学，其“以史料搜集、整理、考订、辨伪等工作为中心”^[35]，力图达到对历史的客观解释。历史虚无主义套用实证史学的理论，以“如实还原、秉笔直书”为“至理名言”，竭尽所能地致力于史料挖掘和史实考证，试图用个案研究、证据研究取代综合、客观的历史研究，用“史料证据”支撑所谓“创新”观点，并以此为根据补写续写“四史”。如此“实证研究”看似客观可信，“实际却是以预设的结论和目的为依据，……得出的研究成果必然是以主观代替客观、以细节代替整体、以臆想代替史实”^[36]。比如，在研究社会主义发展史过程中，历史虚无主义就通过考证所谓的“秘史档案”，得出“斯大林大清洗杀死了几百万甚至 3 000 万直至 5 000 万人”^[24]的结论，并以此为依据污蔑斯大林是“俄国的暴君”“苏联的新沙皇”，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本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25]。然而，根据俄罗斯图书馆现有藏书《俄罗斯大百科全书》中的资料，这些耸人听闻的数字是蓄意编造、恶意夸大的。

另一方面,在操作上实现范式转化“重构四史”。历史虚无主义往往借助“范式”的基本规定,通过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制造伪命题,设置“理论陷阱”,以实现对其历史的重构。其一,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历史虚无主义无视革命与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将二者外在地分割与对立,声称“现代化才是近代史的主题,革命则是一种能量的消耗,不但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而且破坏社会稳定、制造社会动荡,极大地阻碍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因此,必须用“现代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来重新叙述历史。应该说,“现代化范式”为近代史研究打开了一个研究的可能性空间,但“把现代化作为唯一的主题,视革命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消极力量,这就违背了历史的实际,违背了实事求是的要求”^[37],离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越来越远。比如,有人就“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说成是‘只起破坏作用’,认为党史和新中国史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38]。这种论调显然是违背中国历史事实的,是一种基于“范式转换”的“理论陷阱”。其二,用“后现代主义范式”取代“现代史学范式”。后现代史学的现实出场对于反思现代史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内具的相对主义和反实在论特点也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武器。在历史虚无主义看来,现代史学的整体视角、线性发展观和宏大叙事遮蔽了历史本身的真实性,只有从“现代化史学范式”走向“后现代主义范式”,解构宏大叙事,把研究投向边缘细节的探讨,把历史意义还原为“原始在场”与“后续诠释”的有机融合,从史料累积转向具有开放性、透明性和生成性的“意义在场”的文本,才能呈现历史的真实面貌。殊不知,一旦用“后现代主义范式”彻底取消“现代史学范式”所强调的历史客观性和整体性,那么,历史本身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庄严性和真实意义将完全被消解。

四、从理论到实践：应对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基本策略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手段灵活、方法多样,如果任由其大行其道势必会产生雾霾般的毒害性效果,直接威胁意识形态安全。为此,必须要立足唯物史观的原则高度,从理论与实践、方法与策略等多维向度出发,形成廓清“四史”虚无迷障的合力。

其一,要深化理论研究,廓除虚无迷障。既要主动深化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重点、难点、争议点以及敏感点问题研究,及时回应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关切,解决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疑惑和问题,也要在研究过程中及时产出通俗易懂的高质量学术成果,有针对性地厘清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错误论调和观点,从而改变被动应对的局面,牢牢掌握主动权。既要打破“视域前见”和“学科壁垒”,学会采用哲学、诠释学、心理学等多重新的视角全面审视“四史”,也要善于运用计量史学、口述史学、心理史学、比较史学等新的方法研究“四史”,从而铲除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谬论。

其二,加强“四史”学习,强化历史认知。要全面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带着问题“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39],从而在整体的高度上深刻理解把握“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深刻认识我们国家和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40]。同时,在学习“四史”的过程中,要勤

于思考、善于思考、深入思考，深刻领悟，认真反思，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结合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认清自己在理论素养、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在查缺补漏、寻找差距中，不断提升理论思辨能力，增强历史意识和历史自觉，学会运用“四史”的知识分析、研究问题，特别是要敢于运用所学所知积极投身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实践中去，让思想的伟力化作现实的力量。

其三，掌握批判武器，夯实应对力量。一方面，淬炼“批判的武器”，发挥理论威力。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领会和把握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的本真精神，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武器，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和记述历史，用唯物辩证法客观全面地分析历史，“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析中国具体实际的历史进程、现实路径、未来图景”^[41]，从而在准确把握历史进程、正确分析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中有效识别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各种错误观点。另一方面，强化“武器的批判”，聚合主体力量。党员干部作为领导性主体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发挥“头雁效应”，以“惊涛骇浪从容度，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带头打好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主动仗。同时，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善于聆听民众需求，回应民众关切，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群众首创精神，从而不断汇聚起人民群众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磅礴伟力。

其四，树立科学思维，破除方法谬误。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围绕着解构“四史”花招迭出、反复激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部分民众缺乏科学的思维方法，从而助长了其偏颇乃至错误认知。为此，要树立科学思维，破除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方法谬误。一方面，树立整体思维，认识到“四史”在时间上相叠加、内容上相关联是一个接续传承、融会贯通的有机整体，既不能忽视“四史”间的内在联系，对其进行外在的分裂与切割，也不能过分放大作为部分的历史，以其中的“一史”代替其他“三史”，而要善于将作为部分的历史置放于作为整体的“四史”中加以考量和把握。另一方面，要树立辩证思维，分清历史的主流和支流、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在此基础上，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此外，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历史事物，从而形成对“四史”的科学认知。

五、结语

历史虚无主义沿着“解构—颠覆—重构”的内在逻辑理路，用带有强烈唯我论色彩的历史叙事虚无“四史”，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极大的破坏力，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稀释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冲击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消解人们对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心。为此，唯有立足唯物史观的整体性视域，形成理论批判与实践纠治的治理合力，才能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唯心主义实质进行彻底批判，进而遏制其扩散蔓延。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存在仍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不会在短期内彻底消除，并且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乔装打扮、变换花样，以更加隐蔽性、诱惑性、狡诈性的形式展开对“四史”的虚无。在新征程上，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主动的历史自觉，下好防范化解历史虚无主义的“先手棋”，打好应对历

郑志康.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基本样态、内在逻辑与应对策略[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5): 158-170.

史虚无主义的“主动仗”。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79.
-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2024-07-22（1）.
- [3] 赵军魁. 历史虚无主义的表征、根源及防范化解研究[J/OL].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6 [2024-08-26].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40715.001>.
- [4] 竞辉.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批判[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3（9）：112-119.
- [5] 张博, 孙兆阳. 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态、危害及应对策略[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2（4）：71-79.
- [6] 罗红杰. 历史虚无主义软性叙事：内生机制与应对策略[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4（2）：85-93.
- [7] 洪晓楠, 宗欣怡.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与经验[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6）：89-99.
- [8] 陈甜. 十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演变的理性审思[J]. 史学理论研究, 2023（4）：48-55.
- [9] 高炳亮. 大历史观视阈中历史虚无主义批判[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4（6）：111-121.
- [10] 刘和健. “两个大局”背景下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变化与应对策略[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15-26.
- [11] 董敏, 张士海. 论历史虚无主义的数智化叙事转向及应对路向[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8）：63-68.
- [12] 左路平. 历史虚无主义的资本逻辑批判[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3（7）：104-110.
- [13] 邓观鹏, 顾友仁.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样态、危害与治理[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4）：149-164.
- [14] 胡大平, 周邵年.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社会化”转向及解决路径[J]. 河南社会科学, 2024（8）：39-46.
- [15]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0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3.
- [16] 马明冲.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路径探析[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4（7）：118-125.
- [17] 潘莉, 梅荣政.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特点及其危害[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24-29.
- [18] 习近平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N]. 人民日报，2024-03-28（1）.
- [19] 郭文亮, 孙小禹. 驳改革开放评价中的历史虚无主义[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9（2）：9-17.
- [20] 鞠俊俊.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史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鲜明特征与实践要求[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3（5）：53-61.
- [2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9.
- [22] 卢成观, 代金平.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明性破解[J]. 社会主义研究, 2022（1）：8-15.
- [23] 王玉鹏, 孟献丽. 警惕历史虚无主义荼毒新媒体网络空间[J]. 红旗文稿, 2016（5）：8-11.
- [24] 李慎明, 陈之骅, 吴恩远, 等. 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2（1）：54-74.

- [25] 汪亭友, 吴深林. 苏联剧变三十年来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观点及思考[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2(1): 78-88.
- [26] 许洪位. 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早产论”的批判[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2(2): 61-67.
- [27] 张有奎, 白锡能. “共产主义的虚无主义”及其批判[J]. 现代哲学, 2016(3): 1-6.
- [28] 杨全海. 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与危害[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8(6): 84-87.
- [29] 关锋. 当前我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发展态势和有效应对[J]. 理论与评论, 2018(5): 63-73.
- [30] 陈先达. 论历史的客观性[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 1-9.
- [31] 习近平. 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2014年7月7日)[N]. 人民日报, 2014-07-08(2).
- [32] 刘亚男, 王振波. 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和人民“四个选择”的全面解构及其治理路向[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1): 88-93.
- [33] 郑志康. 当代中国软性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四维逻辑透视[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0(6): 192-199.
- [34] 列维·斯特劳斯. 图腾制度[M]. 渠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72.
- [35] 卓立. 实证史学概念辨异与观念考源[J]. 江海学刊, 2019(1): 190-196.
- [36] 张博, 秦振燕. 历史虚无主义的新近演化态势与特征[J]. 社会科学战线, 2022(4): 247-253.
- [37] 徐玉明. 历史虚无主义理论基础批判[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6(1): 54-58.
- [38] 张国义, 郭斌. “四史”学习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J]. 思想理论教育, 2021(6): 38-43.
- [39]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14.
- [40]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9: 8-9.
- [41] 张瑜.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破除文化虚无主义: 文化逻辑、理路遵循、践行方式[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17-34.

责任编辑: 杨稀琴



美国政党政治结构转型 及其对 2024 年大选的影响

李奕昕¹ 王浩^{1, 2}

(1.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上海与美国地方交流中心, 上海 200020;

2.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 要: 自 2016 年美国大选以来, 美国政党政治开启并持续经历着复杂的结构转型。虽然这一转型目前尚未完成, 但已在两党政治、共和党及民主党内政治三重结构性维度取得不同程度进展并渐趋清晰地预示着未来方向, 为我们观察 2024 年美国大选提供了分析框架。就两党政治结构而言, 传统极化视角已无法勾勒其全貌, 极化、钙化与部落化“三化”叠加成为理解这一转型的关键。就共和党内政治结构而言, “让美国再次伟大”从理念到派系的重塑效应推动该党基本完成了从“里根共和党”到“特朗普共和党”的转型。就民主党内政治结构而言, 进步派、温和派与中右派的博弈成为近年来该党转型面临的主要障碍, 而随着拜登退选和哈里斯崛起, 进步派及其理念将可能引领民主党的转型方向。上述结构转型逻辑驱动 2024 年美国大选在政党胜选联盟构建、选举议题塑造及政治力量重组等方面表现出新特点。以此为背景, 美国对华政策也将在安全、经济和社会人文等领域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如何进一步落实“旧金山愿景”将是 2024 年美国大选后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所在。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5.014

作者简介: 李奕昕,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上海与美国地方交流中心主任、助理研究员; 王浩,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美国国内政治大变局及其对中美战略博弈的影响研究”(22JJD810005)

引用格式: 李奕昕, 王浩. 美国政党政治结构转型及其对 2024 年大选的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171-183.

关键词：政党政治；美国政治；共和党；民主党；特朗普；哈里斯；2024 年大选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5-0171-13

2024 年 7 月 21 日，81 岁的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迫于一系列内外压力正式宣布退出 2024 年美国大选，同时表示全力支持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1]。尽管哈里斯在短时间内即获得大多数民主党精英背书并迅速进入竞选状态，但围绕拜登退选的民主党内部分裂一时暴露无遗^[2]。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前仅仅三天，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获得该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发表了时长超过 90 分钟的演讲，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回顾他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竞选集会期间所遭遇的枪击经历，并借此宣扬其个人英雄主义，引发了共和党代表的一致赞誉和支持，这就充分表明特朗普及其代表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政治理念与“MAGA 派”政治力量已完全占据共和党内主导地位，成为重塑和团结该党的决定性力量^[3]。在 2024 年美国大选的特殊背景下，民主、共和两党内部政治生态的上述特征表明，结构转型的差异化程度与方向将对政党内部整合产生重大影响，进而作用于美国的政党政治博弈^[4]。除政党内部结构变化外，美国两党之间的政治结构也在同步发生着重要变化。一方面，政党极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强调的“否决政治（veto politics）”日益成为常态^[5]。另一方面，极化本身已不足以概括美国两党政治结构的全貌。例如，当前民主、共和两党各自所构建的政治联盟基本盘变得更为稳固、选举摇摆州数量进一步减少，联盟转换的难度持续加大、极少数摇摆州对于政治选举的意义被前所未有地放大，从而推动两党政治结构的“钙化”特征日趋明显，选民投票倾向与政治阵营变换的整体流动性大幅下降。又如，两党政治极化的加剧导致党派斗争越来越超越传统的议题层面、上升到观念甚至情感层面，进而形成所谓“部落化”结构。其中，两大政党及其基本盘都将对方视为类似于部落战争中的敌人和对手，进而认为每次大选都将是对未来国家发展方向的决定性选择^[6]。

美国政党政治近年来出现的上述变化引发了学界广泛关注。除福山提出的“否决政治”概念外，对于民主、共和两党极化不断加深的原因，有美国学者提出了“情感极化”的视角，表明两党的对立已陷入某种非理性情绪中^[7]。此外，关于美国政党政治极化催生出了“两个美国（two Americas）”的观点也产生了广泛影响^[8]。然而，既有研究仍主要聚焦两党政治极化这一结构性问题，没有更加全面地审视美国两党政治结构出现的其他重大变化。就政党内部结构变化而言，共和党的“特朗普化”现象得到了较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表明围绕共和党转型方向的讨论具有较强的学术共识。另一方面，民主党近年来经历的转型阵痛问题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该党究竟应该维持其“多元平衡”的角色、最大限度在传统白人蓝领与新兴少数族裔及外来移民两大选民群体之间左右逢源，还是拥抱新的“多元主义”角色、以更为强有力的身份政治纽带打造顺应现实变化的政治联盟，成为争论的焦点。

基于此，美国政党政治正在经历的上述三重结构转型将从根本上重塑美国政治的形态，进而对当前和未来中长期美国政治的发展演变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上述三重结构转型亦非各自独立进行，而是彼此紧密联系和相互塑造的。鉴于国内外学界尚未系统梳理和探讨上述问题，本文将从政党政治结构转型这一视角出发，结合美国两党政治、共和党及民主党内政治转型的不同趋势与程度梳理

李奕昕, 王浩. 美国政党政治结构转型及其对 2024 年大选的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171-183.

从美国政治最新动态的逻辑线索, 并以此为背景探讨 2024 年美国大选在政党胜选联盟构建、选举议题塑造及政治生态演变三个方面出现的逻辑变化, 加深我们对当前美国政治的理解。

一、美国两党政治结构转型：从极化到钙化、部落化

当前美国政党政治所经历的结构转型首先体现在宏观的民主、共和两党政治层面。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党派极化 (partisan polarization)” 便已成为美国政党政治结构演变的主要趋势, 并且在冷战后进一步加剧^[9]。在实践中, 极化主要是指民主、共和两党在政策立场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 难以取得妥协和共识^[10]。结果是, 围绕公共政策制定的博弈完全沦为了以党派划线的激烈政治斗争的工具, 致使美国国家治理的效能以及内政外交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不断下降, 甚至频频出现政府关门危机, 最终引发美国式政治民主的异化和衰落。当然, 党派极化在美国历史上并非新鲜事物。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和社会贫富分化的急剧增加便催生出了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极化, 只不过随着 1929—1933 年“大萧条”的出现和美国经济周期的变化, 政党政治周期同步地从极化步入以合作为主流的新政时代。然而近年来, 美国政党政治结构演变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 政治周期的运行已经脱离了此前经济周期变化所带来的决定性影响, 因此传统的极化逻辑越来越无法展现美国政党政治的全貌。例如, 无论是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还是 2020 年新冠疫情危机带来的巨大经济、社会冲击, 都没有改变美国政党政治结构朝着极化方向运行的轨迹。在笔者看来, 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美国的两党政治结构正在经历从过去单一的以经济-阶级矛盾为主要动力的极化到以文化-身份矛盾为新的主要动力、并与传统的经济-阶级矛盾复杂交织的极化、钙化 (calcification) 以及部落化 (tribalization) 三化叠加的重要转型。

其一, 钙化作为美国政党政治结构转型的新趋势, 集中反映为近年来从总统选举到国会选举中美国民众的“分裂投票 (split vote)”持续创出历史新低。这就意味着政党一选民联盟开始不断趋于固化、政治流动性日益下降。分裂投票一般指的是选民在美国以单一选区制为特点的选举制度下, 将选票投给不同政党的候选人的行为。例如, 相当数量的选民可能在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同时进行的背景下, 将总统票投给某一党, 将国会票投给另一党; 也有可能是在国会选举单独进行时, 将所在州的两名参议员席位分别投给两个政党。一方面, 这种行为模式反映出历史上美国的政党一选民联盟并非铁板一块, 而是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和灵活性, 即选民在某些议题领域可能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但在另外一些议题领域又可能倾向于支持共和党。另一方面, 这种行为也反映出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两种政治诉求: 一是希望共和党确保美国的自由和安全, 二是希望民主党确保美国的社会保障和实现公正、平等^[11]。然而近年来, 分裂投票现象在美国的政治选举中变得越来越稀有, 随着“红州”和“蓝州”在经济-阶级特别是文化-身份意义上的鸿沟的增加和政治对立的不断强化, 来自两大政党的政治精英, 无论是总统还是国会议员, 几乎在州一级选举中清一色地归属于同一党派, 摇摆州的数量持续下降并日益集中于某一两个区域中的少数州, 进而推动两党纷纷在这些地方投入了不成比例的选举资源, 尤其是大量竞选资金, 最终使这些州发挥了远远超过其人口占比的政治、社会影响。此外, 政党一选民联盟流动性的下降还鲜明地体现在国会选举中两党的议席转换数量大幅下降。在 2022 年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 尽管拜登政府在选前面临民调支持率异常低迷和政绩

乏善可陈（尤其是通货膨胀高企引发民众不满）等诸多不利因素，但在野的共和党也仅以十分微弱的多数席位取得了国会众议院的优势地位，众议院议席转换数量创下近百年来的新低，远低于大多数观察家在选前的普遍预期。在这次选举中，民主党保持并略微扩大了在国会参议院的多数席位，与共和党形成了 51：49 的格局；共和党则取得了在国会众议院的微弱多数席位，与民主党形成了 222：213 的格局。按照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统计和研究，从国会两院席位的得失数量来看，此次中期选举是 88 年以来总统第一任期内执政党表现最好的一次中期选举。这就表明在日趋钙化的政党政治结构下，美国政党一选民联盟的流动性正变得越来越差，这是仅靠极化视角无法阐释的新现象。

其二，以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国会山骚乱事件和特朗普刑事案为代表，党派斗争产生的分裂性影响揭示出美国的政党政治结构正在变得日益部落化。不同的政治、社会群体在几乎所有重大的内政、外交议题上往往依据自身的身份认同和价值理念形成政党归属，使得政治博弈成为类似于部落战争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报复性政治随之成为美国政治生态中比否决政治更为极端的新常态。在实践中，上述部落化趋势呈现两大特点。首先，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精英同各自支持群体之间越来越以身份政治和价值观认同为纽带，而非传统的经济、社会政策理念，这就形成了对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政客的分裂性政治认知。支持者近乎无条件支持、反对者近乎无条件反对，而社交媒体的兴起和民粹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例如，在特朗普被指控案发生后，不仅大量特朗普的支持者在法庭外进行抗议示威，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也不降反升。更有甚者，在特朗普“预告被诉”后三天内，其竞选团队还是能够持续地筹集到大量捐款。由此可见，部落化趋势的发展和共识缺失已使美国政党政治进入“后真相时代”，其中是非对错本身远不及价值认同重要。其次，部落化趋势催生出的报复性政治进一步恶化了美国的政治生态，致使党争到达一个新的高度，出现了司法问题政治化和武器化的现象。以 2022 年特朗普海湖庄园搜查事件为例，有美国学者指出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让美国成为执政党利用政府权力和司法问题攻击政治对手的国家，引发了学界对于美国的政治民主是否正在走向威权化的广泛探讨^[12]。毕竟，美国历史上的确还没有任何一位司法部长签署过对前总统住所的搜查令。如果这种做法成为一种新常态，那么美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将会发生重大变化。例如，未来共和党执政下的司法部同样可能去突击搜查拜登等民主党要。一旦美国国内形成这样一种党派斗争的模式，其政治制度将会被进一步破坏，政治极化和党派分裂也将进一步加深，甚至可能引发美国的宪政危机乃至爆发某种形式的内战。实际上，2020 年美国大选后的国会山骚乱事件就是这种新的报复性政治的鲜明体现。此外，一些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司法事件的政治化和武器化也是美国政党政治结构部落化的体现，将会进一步加剧党派之间的恶斗。例如，2022 年 6 月美国最高法院对旨在保护女性堕胎权的罗诉韦德案的推翻，就被视为是主导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滥用自身司法权力以谋求政治利益的产物。随着以“报复性政治”为新特征的党争白热化态势持续发酵，美国政党政治将在精英和大众两个层面同步加剧分裂和对抗^[13]。显然，这一部落化的政党政治结构同样超越了既有的极化视角。

总之，极化、钙化与部落化“三化”叠加的趋势性特征成为理解当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治结构转型的关键，而在其背后，推动美国政党政治演变的核心因素正在从传统的经济-阶级变量发展为更加极端也更为复杂的文化-身份变量，表明美国的两大政党正在从过去的阶级型政党朝着新兴的观念型政党持续转型。美国两党政治结构的这种转型一方面延续和进一步深化了既有的党派极化问

李奕昕, 王浩. 美国政党政治结构转型及其对 2024 年大选的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171-183.

题, 另一方面则衍生出政党—选民联盟本身及其与政治对立阵营之间日趋钙化和部落化等新的发展趋势, 这就意味着未来美国政党政治的结构性矛盾将更为突出和难解。

二、共和党政治结构转型：从“里根共和党”到“特朗普共和党”

美国两党政治结构正在经历的上述转型为我们理解未来美国政治的走向提供了宏观观察视角, 但对这一转型深层逻辑的进一步挖掘离不开对两党各自内部转型的微观分析。2016 年以来, 发端于共和党内部的结构转型一方面持续冲击着既有的两党政治结构, 另一方面也作为外力不断推动着民主党内部力量的分化、重组与整合。因此, 对于共和党政治结构转型的理解是观察美国政党政治结构转型的重要基础。

自 2016 年大选开始, 美国政治中出现的“特朗普革命”以及共和党的“特朗普化”成为学界广泛探讨的重要现象和问题^[14-16]。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建制/反精英主义、民粹主义以及本土主义力量正在对共和党进行深刻重构。结果是, 共和党内精英层虽然仍存在不少反特朗普的力量, 但经过其执政四年的党内较量与整合, 党内反对派正在被大幅边缘化。这一态势在特朗普离开白宫后得以延续甚至强化。例如, 早在 2021 年 2 月的共和党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 刚刚卸任总统的特朗普便誓言要帮助共和党人在 2022 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夺回国会多数席位, 同时还暗示自己可能会参加 2024 年的总统大选。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 此次大会表明特朗普仍然是共和党内无法取代的核心人物, 共和党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特朗普的政党”^[17]。在 2022 年美国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内初选阶段, 获得特朗普背书的候选人更是有超过 80% 的比例获得了党内提名。然而, 这些候选人在中期选举中不及预期的表现让共和党人近乎一致地将矛头指向了特朗普。就在中期选举结束后的第二天, 美国主流媒体《华尔街日报》就以《特朗普：中期选举的最大输家》为醒目标题发文, 称特朗普应该为共和党的选举失利负责^[18]。此外, 当时包括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内的一些共和党精英纷纷表示, 共和党应该推选出取代特朗普的新鲜面孔参加总统选举^[19]。

尽管特朗普及其政治理念对于共和党的重塑过程经历了一系列起伏波折, 但 2024 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强势回归、特别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最新通过的党纲表明, 特朗普及其代表的“MAGA”政治理念与“MAGA 派”政治力量已完全占据了共和党内主导地位, 成为重塑和团结该党的决定性力量。具体而言, 2024 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及新版党纲所传递出的结构转型信号有两个。第一, “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已成为该党最重要的目标愿景和一切政策理念的灵魂, 这就意味着从理念结构看, 共和党已经转型为特朗普理念党。第二, 在特朗普及其“MAGA 派”的强势影响下, 传统建制派在共和党内的生存空间日益狭小, 他们或是选择倒向特朗普(如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妮基·黑利), 或是选择靠边站(如前副总统迈克·彭斯), 这就意味着从力量结构看, 共和党已经转型为特朗普及其“MAGA 派”控制的政党。上述两个信号表明, 共和党已经基本完成从传统的“里根共和党”到新兴的“特朗普共和党”的转型。这一转型可以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政策理念以及社会文化观念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 在政治意识形态上, “特朗普共和党”的民粹保守主义对“里根共和党”的新保守主义进行了超越, 在主张回归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同时强调人民(主要指工人阶级)的利益, 具有鲜明的

反精英、反建制色彩。正如特朗普在 2024 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提名演讲中指出的,“MAGA 运动”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运动,致力于重新找回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式生活方式、服务美国人民的利益,因此不仅共和党要进一步团结在“MAGA 运动”周围,而且他本人也要做全体美国人的总统而非一半美国人的总统,号召美国人民团结起来^[20]。由此可以看出,特朗普所主导的“MAGA 运动”已经从美国政党政治的边缘地带走向舞台中央,其目标相应地从 8 年前甚至 4 年前的“重塑共和党”进一步发展为“重塑整个美国”。因此,民粹保守主义下一阶段的核心政策理念是推动特朗普所发起的“MAGA 运动”进一步扩大化和可持续,吸引更多的美国人加入其中。这也是特朗普在此次演讲中反复强调团结的根本原因。为此,民粹保守主义将以处理美国内政问题为压倒性优先方向,通过“MAGA 运动”解决当下美国面临的一系列国内挑战,重建安全、繁荣和团结的美国。在特朗普的提名演讲中,绝大部分内容涉及美国国内问题,强调民主党政府以及华盛顿腐败的建制派精英力量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使整个国家处于衰落甚至危机状态中,尤其是边境被非法移民入侵、经济遭遇通胀危机、社会被激进意识形态绑架,以及司法武器化破坏美国政治生态。为此,共和党最新版党纲试图彻底改变现行政策,使美国更加安全、繁荣和团结,实现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根本目标。

其次,在经济政策理念上,“特朗普共和党”一方面继承和延续了“里根共和党”的小政府、减税等理念,另一方面则在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等领域对后者进行了彻底颠覆,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理念转型为强调“美国优先”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理念。为了重建安全、繁荣和团结的美国并落实以内政为压倒性优先方向的政策理念原则,共和党最新版党纲和特朗普提名演讲都始终突出了经济议题尤其是控制通胀、减税和贸易等的重要性。尽管党纲和党代会并未提出具体的施政路线图,但特朗普已经表明了目标态度,即迅速降低国内通胀水平、启动大幅减税计划、开展大规模基建计划以及复兴传统能源计划。此外,在“MAGA 运动”的影响下,美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正日益紧密地与其国内议程结合起来,成为兼具内政、外交双重意义和影响的重大交叉性政策议题。无论是共和党最新版党纲还是特朗普提名演讲,都将其第一任期内提出的“美国优先”理念视为贸易政策领域的指导原则,其本质是通过进一步强化保护主义重振美国制造业,使之成为党纲中宣称的“制造业超级大国”。在“MAGA 派”看来,这是保护美国工人利益和实现其执政愿景的必然选择。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在此次党代会提名演讲中进一步突出了所谓“以关税补减税”的政策思路,一方面推动国内减税以增强经济活力、降低经济成本和通胀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对外加征关税减轻因国内减税而带来的财政税收压力。由此可见,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特朗普共和党”的重要经济政策指南,这一重大转型与传统“里根共和党”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尤其是其中的自由贸易和资本全球化形成了鲜明对比。

再次,在社会文化观念上,“特朗普共和党”彻底改变了“里根共和党”在种族和移民等问题上传统隐晦的“狗哨政治”做法,将白人至上主义和本土主义理念公开化。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社会文化领域的影响力日益上升,其核心是反对白人“瓦斯普”文化一直以来在美国社会中的绝对支配地位,强调少数族裔和社会边缘群体的独特文化传统,主张通过在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政策中对这类群体进行平等甚至特殊的对待,对过去的“不正义”进行弥补。在他们看来,美国文明是欧洲、非洲和美洲多文明交汇碰撞的结果,因此白人的主导地位并不合理,其他多种文明在这一“大熔炉”中理应存在自己的一席之地,并在此基础上争取相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李奕昕, 王浩. 美国政党政治结构转型及其对 2024 年大选的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171-183.

权利^[21-22]。这一理念无疑对“瓦斯普”文化在美国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挑战,甚至随着政治正确在实践的发展中催生出弱势文化强势化、主流文化边缘化的现象。结果是,美国的白人群体日益感到遭遇了所谓“逆向歧视”。20 世纪 80 年代起,“里根共和党”便逐渐开始在种族和移民等问题上发起对主流政治正确理念的反击,通过隐晦的“狗哨政治”——用尽量模糊的、不触及政治正确红线的言论向白人尤其是其中的保守主义群体传递政治信息,推动社会文化领域的保守主义运动。然而自 2017 年特朗普政府执政起,共和党隐晦的“狗哨政治”彻底转变为公开的白人至上主义和本土主义,标志着“特朗普共和党”在社会文化观念领域的重要转型,将带来共和党在一系列社会政策尤其是移民政策领域的大幅右转。在特朗普的提名演讲和共和党最新党纲中,大规模移民驱逐行动被列入其社会政策核心议程之中。

总之,“特朗普共和党”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政策理念以及社会文化观念等主要领域都形成了以“MAGA”为核心信条的“特朗普化”的施政纲领,意味着共和党自 2016 年开始的内部结构转型无论在理念维度还是派系维度均已基本完成,在政党转型整合方面走在了前列。其发展前景将主要取决于“MAGA 运动”能否真正实现进一步扩大化的目标,从而克服政治基本盘偏小的局限。更重要的是,共和党内部转型的完成和“特朗普共和党”的成型,尤其是该党以全新的“MAGA”信条为底色的转型,突显了包括民粹保守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本土主义等一系列更为极端的价值理念的作用,在美国两党政治结构的极化、钙化和部落化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推动者角色。

三、民主党政治结构转型：三大派系的博弈与进步主义力量的崛起

在美国两党政治中,与共和党自 2016 年开始所经历的急风骤雨般的“特朗普化”转型不同,民主党内部始终存在三大派系之间的激烈博弈,这一点成为其转型力度与速度均落后于共和党的直接原因。从更深层逻辑看,这种博弈反映出民主党在如何构建执政多数联盟方面始终面临来自现实和传统两种选择之间的巨大张力。从现实出发,随着冷战后美国人口结构的加速变化,少数族裔已经取代白人蓝领成为民主党的最大票仓和政治基本盘^[23]。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 2020 年度所进行的每十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的最新统计结果,在全美 3.28 亿人口中,白人所占比重为 60.4%,拉丁裔为 18.3%;然而就在 2010 年,上述两个数据分别为 70.9%和 10%。这意味着在短短 10 年时间里,白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骤降超 10%,拉丁裔则上升逾 8%,其余少数族裔如非洲裔和亚裔等占全美人口的比重同样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从政党政治特别是选举利益出发,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由此不可避免地日益朝着有利于少数族裔等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政治正确方向发展,最终与共和党的“特朗普化”转型方向一样,成为以独特价值观为纽带的观念型政党。然而这种转型方向的风险甚至重大代价是民主党会日益疏远其传统基本盘——白人蓝领群体,因为后者与少数族裔及外来移民之间存在广泛的经济和价值观矛盾甚至冲突,这就涉及到上文提到的来自第二个方面的张力,即民主党构建执政多数联盟的历史传统。自 20 世纪 30 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开始,民主党一直试图打造多元化的广泛政治联盟,即后来为人所熟知的所谓“新政联合体(the New-deal Coalition)”。这一联盟在内部构成上呈现出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族裔等的多样性特征,其中既包括自由派知识分

子和白人蓝领群体，也包括妇女、少数族裔和南方郊区白人，而在这一多样性背后，新政联盟内部具有一个最大的共性，那就是他们都属于美国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及以下群体。因此，“经济优先”议程成为这一庞大政治联盟的最大公约数和纽带，而一旦民主党开始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正确等“文化战争”议题，这一联盟就将难以维系。

面对 2016 年大选的失利尤其是传统白人蓝领群体倒向共和党和特朗普带来的巨大挑战，民主党内精英进行了长达 4 年的反思与调整，但仍未真正达成有效共识。在 2020 年大选的民主党内初选阶段，哈里斯以及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等民主党内左翼进步派一直在移民、医保、税收和教育等核心议题上与拜登持不同立场，并且双方的政策主张也存在明显差距。具体而言，在移民问题上，围绕如何对待非法移民、其中哪些群体应该被遣返、哪些群体应该予以合法身份以及这种合法化的路径等问题，民主党内温和派和进步派的观点存在较大分歧。又如，在医保问题上，早在民主党初选辩论期间，进步派便提出旨在取代奥巴马医改的“全民医改计划”，抨击了保险行业的盈利动机，认为医保是一项人权而非谋利的领域。然而，拜登却坚称应采取改革而非取代的办法解决奥巴马医改遗留的问题，因此反对进步派的激进主张^[24]。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在此期间曾多次公开宣称自己是“过渡性人物”，其使命是战胜共和党右翼民粹主义并包围美国民主，哈里斯代表的新生代力量才是民主党的未来。那么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一个更趋激进、更具多元文化主义以及进步色彩的民主党势必将与白人蓝领群体渐行渐远。正如《大西洋月刊》在 2020 年美国大选期间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的，哈里斯的崛起意味着民主党未来转型趋势的显现：在多元文化主义价值理念的持续推动下，新世代民主党及其代表的转型联盟（coalition of transformation）将与罗斯福新政所缔造的传统民主党分道扬镳^[25]。

总体来看，民主党的上述内部分歧在 2020 年大选期间被“击败特朗普”这一共同目标暂时掩盖，党内精英最终为拜登及其代表的温和派路线背书。这一方面是反思民主党何以失去白人蓝领群体的结果，认为回归罗斯福新政以降的温和派路线、抑制左翼进步主义路线能够最大限度扩大民主党基本盘、夺回白人蓝领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党内左右两个阵营——进步派和中右派（又被称为“第三条道路”派，崛起于克林顿政府时期）妥协折中之后的权宜之计。事实证明这一选择取得了成功，正如拜登在其胜选演说中强调的，民主党在中西部“铁锈地带”重建了“蓝墙”。然而，民主党内围绕 2020 年大选产生的团结在拜登政府执政后迅速瓦解，左、中、右三派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围绕经济和社会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明显的内部龃龉。

首先是拜登与民主党内左翼进步派矛盾凸显，其核心是左翼进步派对拜登政府以经济议题为优先的温和派路线特别是搁置“文化战争”的做法不满，认为是对共和党的让步^[26]。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民主党内左翼进步派对拜登的不满进一步加剧，这也成为后者被迫对该裁决结果表态并在社会文化战线反击共和党的一股内部压力。其次，同样在社会文化领域，左翼进步派主张非法移民去罪化和减少对警察的财政支持力度，这一点被民主党内中右派指责为“纵容犯罪”^[26]。此外，左翼进步派对拜登政府的经济改革方案同样心存芥蒂，认为其太过保守，呼吁运用总统行政令减免学生贷款，使美国进一步朝着福利国家的方向改革。再次，与左翼进步派聚焦社会文化议题不同，民主党内以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乔·曼钦为代表的中右派，则指责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过于突出“大政府”的作用、太过激进，从而引发了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其中，中右派

李奕昕, 王浩. 美国政党政治结构转型及其对 2024 年大选的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171-183.

对《重建更好未来法案》中儿童保育和医保补贴等累计超过 3 000 亿美元的支持中产阶级家庭的预算支出不满, 认为这是“大政府”的体现, 因此使得该法案在国会陷入民主党内僵局, 这也是民主党内极化和分裂的直接体现^[27]。此外, 如上文所述, 中右派在社会文化领域对左翼感到不满, 双方尤其在移民和犯罪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显著。民主党内的极化和分裂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拜登政府的执政困境。拜登本想通过政治中间主义左右逢源, 尽可能团结党内各派并扩大民主党的执政基础, 结果事与愿违, 陷入左右为难的巨大执政困境。

民主党面临的上述转型困境在 2024 年美国大选的背景下被进一步激化, 尤其是共和党彻底转型为“特朗普共和党”并坚定拥抱右翼民粹主义路线、拜登所代表的民主党内温和派路线遭遇越来越大的挑战(包括拜登本人的高龄和认知能力下降等具体问题)。双重因素刺激的结果是, 拜登最终迫于内外压力宣布退出大选, 同时全力支持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这意味着民主党内温和中间主义路线的终结以及左翼进步主义的强势兴起。作为女性、少数族裔和具有鲜明进步主义色彩的民主党人, 哈里斯及其“转型联盟”将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民主党的进步主义转型、更好地平衡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利益诉求, 将是未来该党内部整合的关键。截至目前, 从哈里斯在包括移民、女性堕胎和少数族裔权利等问题上的左翼立场, 以及其选择具有同样鲜明左翼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等做法看, 民主党的内部整合与转型正在加速。如果上述转型方向得以确立, 那么未来美国两党政治结构以文化-身份为底色的极化、钙化和部落化发展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剧。

四、政党政治结构转型背景下的 2024 年美国大选

在美国两党政治、共和党与民主党内政治经历三重结构转型的复杂背景下, 2024 年美国大选在实践中的最显著特征即党争白热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包括司法问题政治化带来的报复性政治泛滥、外交问题内政化引发的阿拉伯裔选民等关键少数群体对选举的影响显著上升, 移民、堕胎等社会问题“文化战争”化导致美国内部认同进一步撕裂等。这些现象一方面与本文提出的三重结构转型存在密切关联, 将是 2024 年美国大选的关注焦点, 另一方面反映出 2024 年美国大选将在以下三个维度出现新的逻辑变化。这些新变化将成为未来美国政治走向的重要观察窗口。

首先, 在美国政党政治三重结构转型的背景下, 民主、共和两党在 2024 年美国大选中构建胜选联盟的逻辑出现了重要变化。传统上, 围绕美国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研究存在一套经典理论——“唐斯定律”, 即在一个两党竞争的选举政治结构下, 政治立场越靠近中间的候选人胜算越大。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 温和派的人数往往最多, 所以越靠近中间立场就越能覆盖尽可能多的选民群体, 结果是, 两个主要政党在政策立场上总会趋同^[28]。这一定律较好地解释了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在历史上所表现出的中间主义倾向。然而近年来, 民主、共和两党构建胜选联盟的思路正在出现根本变化, 即不再依赖传统“唐斯定律”所界定的中间主义施政路线获取政治上的多数党地位, 转而寻求通过动员归属于本党“政治部落”内的选民基本盘, 尤其是政治参与度和活跃度极高的左翼进步派和右翼民粹派, 实现选举获胜的政治目标。在这一过程中, 两大以差异化观念塑造的政党之间必然产生远比历史上的党派竞争更为激烈的政治博弈。这种博弈很难通过物质利益交换实现政治妥协,

而是一种“你输我赢”甚至“你死我活”式的零和博弈，代表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政治路线、国家发展方向甚至文化认同。从 2016 年大选到 2020 年大选，共和党和特朗普的胜选联盟构建思路就是最大限度动员右翼民粹主义基本盘并使之进一步扩大化。在此思路指引下，2024 年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出现了“特朗普-万斯”这样的右翼民粹主义组合。就民主党而言，直到 2020 年大选，其胜选联盟构建的主流思路仍然符合“唐斯定律”指出的吸引中间选民、扩大选民基数的逻辑，但随着左翼进步派党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以及“文化战争”议程重要性的上升，民主党也正在朝着左翼进步主义政党的方向加速演化，其胜选联盟构建思路同步地转为最大限度动员左翼进步主义基本盘（尤其是非洲裔、拉美裔、女性和年轻选民群体）。这一点在 2024 年大选中哈里斯取代拜登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体现得尤为明显^[30]。同样重要的是，哈里斯选择的副手沃尔兹在意识形态上也属于典型的进步派，在移民、种族和社会文化议题上坚定支持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权利，甚至允许娱乐性大麻合法化。毫无疑问，政党政治结构转型所推动的民主、共和两党构建胜选联盟逻辑的上述变化，将会显著影响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尤其是其政治生态的演化。

其次，在美国政党政治三重结构转型的背景下，2024 年大选的核心议题已经超越了过往由经济议题主导的既有形态，移民、堕胎等“文化战争”议题成为新的重大楔子议题，导致民主、共和两党选举议题塑造的逻辑出现重大变化。回顾历史，与经济要素相关的税收、就业和社会福利等议题长期占据着美国选举政治议题的中心，来自两个政党的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几乎可以说是“得经济者得天下”。其中 1992 年大选中作为民主党政治新秀的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以其“是经济，傻瓜！（It's economy, stupid!）”的著名竞选口号击败了在任总统、资深政治人物老布什。然而在 2024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两党在竞选阶段的最大焦点性议题已不再是税收、就业和福利等传统经济领域的议题，而是带有十分强烈的“文化战争”色彩的移民、控枪、族群冲突、气候变化和社会公正。对此，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移民和族群冲突问题在美国选民中的受关注度超过了经济不平等约 3 个百分点，这在历史上属于首次^[29]。实际上早在 2024 年美国大选的共和党内初选阶段，各个候选人最大的争论焦点（也是其个人“政治卖点”）就不再围绕经济-阶级议题展开，而是关注移民、教育、族群和边境安全等一系列“文化战争”议题^[30]。同样重要的是，就执政阶段的政党议题偏好博弈而言，在近年来民主、共和两党各自党内的激进派和极端派日益发挥不成比例的重要政治影响的背景下，党内温和派与建制派越来越被边缘化，进而导致政党执政阶段的议题偏好正在发生从经济-阶级维度朝着文化-身份维度转移的趋势。这一点在前述拜登政府执政后围绕“经济优先”与“文化战争”两大核心议题的党内博弈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作为民主党内建制派与温和派的代表，拜登试图恢复经济议题在美国政党政治中的优先地位，并以此为杠杆重塑政治中间主义的主流地位。然而，无论是民主党内的左翼进步派部落还是共和党（尤其是其中的右翼民粹派部落），都对拜登政府的上述努力形成了重要掣肘。这就表明与文化-身份要素相关的“文化战争”议题已经成为从选举到执政阶段美国政党政治博弈的首要楔子议题，并与传统的占据核心地位的经济议题存在日益显著的巨大张力。随着美国政党政治结构转型的加速，文化-身份议题正在前所未有地走向美国国内政治舞台的中心。

最后，在美国政党政治三重结构转型的背景下，政党政治力量的重组方向将是 2024 年大选的重要看点，也是影响未来中长期美国政党政治格局的关键变量之一。自 2016 年大选开始，位于美国中

李奕昕, 王浩. 美国政党政治结构转型及其对 2024 年大选的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171-183.

西部“铁锈地带”的三个制造业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便呈现出了政党政治力量重组的态势, 改变了此前长期偏向民主党的立场, 变成了极为典型的摇摆州。它们先是在 2016 年大选中全部倒向了共和党与特朗普, 后又在 2020 年大选中全部倒向了民主党和拜登。上述三州在 2024 年大选中的选举人票归属不仅将会对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还会带来更为清晰地研判未来美国政党政治力量重组方向的重要线索, 尤其是“特朗普共和党”的右翼民粹主义路线能否获得白人蓝领群体更为稳定的支持。除上述区域外, 2024 年美国大选值得关注的另一大影响未来政党政治格局的区域即位于南方“阳光地带”的四个州——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内华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与“铁锈地带”相反, 上述区域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长期偏向于支持共和党, 然而在人口结构变化的背景下 (主要是族裔多元化和年轻化), 这一区域正在日益具有选举政治中的摇摆特性, 尤其是亚利桑那州和佐治亚州在 2020 年大选中创纪录地选择了民主党。在哈里斯-沃尔兹这一更具进步主义色彩的民主党正副总统候选人组合出现的背景下, “阳光地带”建立在族裔和年龄基础上的偏好民主党的政治力量重组能否演变为中长期的稳定发展趋势, 也将是 2024 年大选的重要观察点之一。

五、结语

本文从美国政党政治正在经历的重重结构转型这一独特视角出发, 探讨美国政党政治的最新动向和演变逻辑, 并以此对 2024 年美国大选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可以发现, 当前美国政党政治结构转型的复杂性前所未有, 其在政治尤其是选举实践中产生的影响同样史无前例。在此特殊背景下, 无论 2024 年美国大选结果如何, 它都已经并将继续创造历史。一方面, 拜登总统不仅创下了在任总统竞选连任期间最晚退选的纪录, 而且他由于党内分裂而被迫退选的事实在美国历史上也属首次。另一方面, 无论哈里斯还是特朗普竞选成功, 都将成为美国政治史上的“百年变局”: 如果哈里斯胜选, 则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 如果特朗普胜选, 则将成为百余年来首位两届任期非连续的总统。这些创纪录式的事态表明美国政治仍处于动荡不确定的转型阶段。

基于此, 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国内政治变化的冲击和影响。就安全领域而言, 哈里斯和特朗普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以及印太安全等问题上的立场存在明显差异, 这无疑会对中国的安全环境形成不同的外部塑造性力量。就经济领域而言, 尽管美国两党都将经济竞争视为对华竞争的关键, 但其重点领域和打法策略均有着来自党派和国内政治利益的不同底色, 大选结果也将对美国的对华经济战略带来影响。就社会人文领域而言, 中美社会人文交流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受到较大冲击, 社会间脱钩成为中美关系发展面临的重大风险。拜登政府执政期间, 中美社会人文交流有所恢复, 对于两国关系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其力度和速度均有待加强。面对 2024 年美国大选结果的不确定性, 中美社会人文交流如何更大限度地避免来自美国政治层面的干扰甚至破坏, 将是对其韧性的重要考验。在这方面, 两国可以通过加强地方交流合作、厚植民间友好基础、构建稳定对话机制对冲政治和战略层面的不确定性, 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可预期发展提供安全阀。在 2024 年美国大选后, 中美双方如何进一步落实两国元首 2023 年峰会所达成的“旧金山愿景”, 将成为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参考文献:

- [1] Michael Williams, Biden will not seek reelection; endorses Harris [EB/OL]. (2024-07-21) [2024-08-06]. <https://edition.cnn.com/2024/07/21/politics/joe-biden-drops-out-election/index.html>.
- [2] How the Pressure Grew for Biden to Drop Out [EB/OL]. (2024-07-21) [2024-08-06].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4/us/elections/biden-drop-out-democrats.html>.
- [3] Read the Transcript of Donald J. Trump's Convention Speech [EB/OL]. (2024-07-19) [2024-08-07]. <https://www.nytimes.com/2024/07/19/us/politics/trump-rnc-speech-transcript.html>.
- [4] 王浩. 结构、议程与整合困境: 2022 年中期选举后美国的政党政治走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1): 118-129.
- [5]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 [6] 王浩. 从周期到认同: 美国政党政治研究的范式创新与议程重置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4.
- [7] Thomas Rudolph and Marc Hetherington.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Political and Nonpolitical Setting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21 (3): 591-606.
- [8] Morris P. Fiorina et al. Culture War? The Myth of a Polarized America [M].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5.
- [9] 王浩. 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 动因、走向与影响 [J]. 美国问题研究, 2020 (2): 170-203.
- [10] Keith T.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The Polariz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984 (4): 1061-1079.
- [11] 周琪.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34.
- [12] FBI search of Donald Trump's home 'would make third-world dictator blush' [EB/OL]. (2022-08-10) [2024-08-07]. <https://news.sky.com/story/fbi-search-of-donald-trumps-home-would-make-third-world-dictator-blush-12669590>.
- [13] 王浩. 美国政治生态新变化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2 (10): 45-51+62.
- [14] 刁大明. 试析美国共和党的“特朗普化” [J]. 现代国际关系, 2018 (10): 38-45.
- [15] 刁大明. 美国政治的“特朗普化”及其影响 [J]. 探索与争鸣, 2021 (2): 51-59.
- [16] 王浩. 美国政治的“特朗普革命”: 内涵、动因与影响 [J]. 当代美国评论, 2021 (2): 81-98.
- [17] Lisa Lerer, CPAC and the New Republicanism [EB/OL]. (2021-02-27) [2024-08-07]. <https://www.nytimes.com/2021/02/27/us/politics/cpac-trump-republicans.html>.
- [18] Trump Is the Republican Party's Biggest Loser [EB/OL]. (2022-11-09) [2024-08-08]. <https://www.wsj.com/articles/donald-trump-is-the-gops-biggest-loser-midterm-elections-senate-house-congress-republicans-11668034869>.
- [19] Pompeo tweaks Trump, says GOP 'tired of losing' [EB/OL]. (2022-11-18) [2024-08-08]. <https://thehill.com/homenews/campaign/3742000-pompeo-tweaks-trump-says-gop-tired-of-losing/>.
- [20] Jonathan J. Cooper et al. Trump urges unity after assassination attempt while proposing sweepin

李奕昕, 王浩. 美国政党政治结构转型及其对 2024 年大选的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171-183.

- g populist agenda in RNC finale [EB/OL]. (2024-07-19) [2024-08-07]. <https://apnews.com/article/trump-republican-national-convention-nomination-assassination-attempt-5f1f337ac39477e9d1c53d3e027edda3>.
- [21] Horace M. Kallen.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 Arno Press, 1970: 11.
- [22] 王希. 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 [J]. 美国研究, 2000 (2): 44-80.
- [23] 强舸. “奥巴马选民” VS “特朗普选民”: 关键性选举与美国政党选民联盟重组 [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1): 155-167.
- [24] 王浩. 2020 年大选后美国的政党政治走向及其影响 [J]. 美国问题研究, 2021 (1): 47-60+213-214.
- [25] Ronald Brownstein, Kamala Harris' s Nomination Is a Turning Point for Democrats [EB/OL]. (2020-08-21) [2024-08-07].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0/08/kamala-harris-and-new-democratic-party-coalition/615187/>.
- [26] Ronald Brownstein, The Democrats' Midterm Identity Crisis [EB/OL]. (2022-05-11) [2024-08-09].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2/05/biden-democrats-midterm-elections-2022-strategy/629817/>.
- [27] 王浩. 走出周期: 美国政党政治研究的范式转换与议程重置 [J]. 美国研究, 2022 (4): 47-72.
- [28] 安东尼·唐斯. 民主的经济理论 [M]. 姚洋, 邢予青, 赖平耀,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126.
- [29] Pew Research Center, Cultural Issues in the 2024 Election [EB/OL]. (2024-06-06) [2024-08-17].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4/06/06/cultural-issues-and-the-2024-election/>.
- [30] Steven Shephard, The 2024 GOP field: How they win, how they lose [EB/OL]. (2023-09-12) [2024-08-07]. <https://www.politico.com/interactives/2023/republican-candidates-2024-gop-presidential-hopefuls-list/>.

责任编辑: 卢媛



“莫迪 3.0”时代印度政党政治走势的成因及影响

戴永红¹ 刘知乐² 韩瑞萌³

(1. 深圳大学 外国语学院/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院, 广东 深圳 518000;

2. 深圳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00;

3. 深圳大学 传播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00)

摘 要: 2024 年印度大选是印度政党政治走势的关键节点。相较于国大党执政和印人党执政时期, “莫迪 3.0”时代的政党政治发生了新变化, 主要表现在: 政治生态上, 从印人党一党独大到政党联盟回归; 政治参与上, 从政客崇拜到理性选择; 意识形态上, 进一步强化印度教民族主义; 选举策略上, 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全方位介入。背后的原因既有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结构失衡的矛盾, 也有大国崛起叙事与国内群体割裂的矛盾, 还有对外扩张雄心与国家实力不足的矛盾, 以及政治“宗教化”与多元文化传统的矛盾。这些新变化不仅使印度的联盟政治回归、莫迪光环褪色, 民粹情绪升温、政治极化加剧, 还会促使印度紧跟“印太战略”、维持“倚美制华”, 将在多个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与合作。印度政党政治走势反

DOI: 10.13946/j.cnki.jcqi.2024.05.015

作者简介: 戴永红,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刘知乐, 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韩瑞萌,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环孟加拉湾地区局势对我‘东数西算’工程的安全影响研究”(22ZDA181); 深圳大学高水平大学三期建设人文社会科学高层次团队卓越计划项目“我国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研究”(ZYD2308); 深圳大学研究生自主创新成果培育项目“英国媒体涉华基础设施报道的策略性叙事研究”(868-000002020266)

引用格式: 戴永红, 刘知乐, 韩瑞萌. “莫迪 3.0”时代印度政党政治走势的成因及影响[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5): 184-196.

戴永红, 刘知乐, 韩瑞萌. “莫迪 3.0”时代印度政党政治走势的成因及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184-196.

映出, 以不同的方式执掌、参与和影响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社会发展状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符合国情的政党政治制度, 彰显出巨大的国家治理效能优势。我国要坚持制度自信, 汲取人类政党政治文明成果, 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关键词: 政党政治; 政党制度; 印度; 莫迪连任; 印度大选

中图分类号: D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5-0184-13

一、问题的提出

2024 年印度大选对于印度政党政治演进来说影响重大。在历时 44 天“马拉松式”的选举后, 印度大选结果于当地时间 6 月 5 日揭晓, 现任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 (以下简称“印人党”) 继续保持印度人民院第一大党地位。当地时间 6 月 9 日, 已持续执政 10 年的莫迪正式开启他的第三个总理任期, 追平首任总理尼赫鲁的任期纪录。虽然莫迪所在印人党获得了人民院多数席位, 但其赢得的席位相较此前两次大选却大幅缩水, 且未达到 272 席的半数, 意味着需要与盟友携手组阁。在此背景下, “莫迪光环不再”“印人党虽胜犹败”的说法开始在舆论中流行, 并受到全球关注。

我国历来重视政党作用和加强政党交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讲话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加强政党交流合作, 携手共行天下大道。我们愿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深化交往, 不断扩大理念契合点、利益汇合点, 以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助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以夯实完善全球政党伙伴关系助力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1] 印度是中国毗邻的发展中大国, 也是当今世界上政党和政党政治最活跃的国家之一。近年来, 伴随印度综合国力和战略地位的提升, 其政党政治走势愈发引起广泛关注。

传统的印度政党政治研究通常关注国大党的兴衰、印人党的崛起、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复兴、印度社会激进政治和左翼政党发展、印度社会结构对其政党政治的影响、印度种姓政治发展等议题^[2]。随着印度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其政党的兴替,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于印度政党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印度政党特点和政治生态变迁相关研究。这部分研究大多基于宏观视角, 结合历史经验分析印度当前政党政治实践对其内政外交的影响, 研究其未来发展趋势。有研究认为新冠疫情以来印度政党格局呈现出印人党势头强劲、地方政党借机壮大、国大党加速衰退的新变化^[3]。还有研究指出, “一党独大”的印人党有助于突破印度经济发展困境, 巩固民族团结, 但也可能损害印度的民主机制, 影响印度多元化宗教, 凸显个人崇拜^[4]。有研究进一步提出, 印度国内政党政治变化推动印度“硬”外交走向前台, 包括维护所谓南亚霸权强度增加、放弃不结盟传统, 转而借助美国实现“印度大国梦”, 在多边外交中谋求主导权, 推动“印度制造”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等^[5]。二是印度政党执政策略相关研究。这部分研究大多从具体案例出发, 聚焦印度执政党如何开展政治动员并影响选民决策, 进而对这些策略进行评估。有研究关注印人党政权合法性的话语建构, 提出相较于国大党, 印人党在竞选时往往擅用修辞将主观和对立概念合理化, 造成大众强烈幻象, 影响选民基本判断, 进而获得选举胜利^[6]。也有研究者提出印人党的选举获胜得益于其抓住了印度政治的特性, 成功构建了一种“民粹型”政党—选民关系^[7]。还有学者提出, 在财政转移中, 莫迪政府的“国族建构运动”通过强化“他者”与“我们”的区别, 实现了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统一身份认同

的塑造，使地方居民超越狭隘身份认同，并主动支持印人党^[8]。此外，也有研究立足新兴技术对政党的影响，提出印人党在数字化工具使用中逐渐增强了政党适应性与竞争力^[9]，为理解印度政党政治提供了参考。

综合前述文献来看，现有成果较为丰富，但仍存在两点不足。一方面，大多研究着眼于莫迪前两个任期，尚未系统性梳理莫迪第三个任期政党政治方面的新变化和对华影响。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多关注印度政党政治动向这一个案，较少用比较视角考量印度政党政治走势的镜鉴意义。鉴于此，本文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以印度最新政党政治走势为研究对象，在梳理印度政党政治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阐释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政党政治的变化、成因、影响与走向，以及对世界各国政党政治和国家治理的镜鉴。

二、“莫迪 3.0”时代印度政党政治的全新变化

印度作为全球政党和政党政治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其政治舞台上活跃着超过 400 个登记在册的党派及上千个没有注册的在野党。有学者形象地使用“博物馆”“千藤树”“万花筒”来形容种类齐全、错综复杂、变幻无常的印度政党^[10]。随着莫迪总理第三个任期的帷幕拉开，印度政党政治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这些变化不仅重塑了政治生态的格局，还深刻影响了政治参与的模式、意识形态的交锋以及选举策略的革新，为印度政治的未来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一）政治生态：从印人党“一党独大”到“联盟政治”回归

一国的选举结果可以体现出国家内部的力量对比及本国的政治生态。从主要政党议席数量上来看，在莫迪的前两个任期内，印人党以绝对优势掌控政权。印人党于 2014 年和 2019 年分别获得 282 席和 303 席，拥有单独组建政府的能力，彰显了印人党在印度政坛的强势统治地位。然而，2024 年实际大选结果显示，印人党仅获得 240 个席位。依据印度宪法规定，这一数字仅构成简单多数，未能达到单独组阁所需的半数席位门槛，更是失去了早先预想的强力执政的可能性。国大党于 2014 年和 2019 年分别获得 44 席和 52 席。在印度人民院，一个政党要成为反对党领袖，必须获得超过 10% 的议席。由于这两次选举国大党均未达到此标准，在人民院连反对党领袖都没有当上，士气受到了沉重打击。而本次大选国大党和其竞选联盟所获席位均有了大幅增加，国大党单独收获 99 个议席，其影响力有所恢复，重新拥有了在“莫迪 3.0”时代威胁印人党执政地位的能力。

从政党联盟获得的议席数量来看，莫迪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D.A）仅赢取 293 席，较 2014 年收获的 336 席和 2019 年收获的 353 席有所减少，这标志着全国民主联盟在人民院的掌控力正在减弱。而以国大党为首的反对党联盟“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I.N.D.I.A）则收获 231 个议席，远超多数出口民调预估的 150 席以下，较前两次大选国大党领导的反对党联盟“团结进步联盟”所获议席（2014 年获得 63 席、2019 年获得 95 席）有了较大的提高。这表明，反对党议席正在集中，印度国内针对印人党执政集团的反对力量正逐渐团结一致，印度反对党联盟在政坛的影响力正逐步回升，“莫迪 3.0”时代印人党政府将面临更多掣肘。“一定程度上，印人党遭到国大党为主的政党联盟的挑战，反对党联合取得了一定效果。”^[11]

根据本次大选结果和印度宪法规定，印人党此次不能单独组阁建立政府，必须寻求至少三个联

戴永红, 刘知乐, 韩瑞萌. “莫迪 3.0”时代印度政党政治走势的成因及影响[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184-196.

盟伙伴的支持, 以共同组成新一届政府。这标志着自 2014 年以来印人党单一政党主导印度政治格局的终结, 也预示着“莫迪 3.0”时代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挑战, 即印度政治生态将重返联盟政治的时代, 打破了此前印人党“一党独大”的局面, 开启了政治力量重新整合与平衡的新阶段。

(二) 政治参与: 从政客崇拜到理性选择

在长达十年的执政历程中, 莫迪凭借其草根背景、个人魅力和高效施政的特点, 被塑造为能够变革现状的“救世主”形象, 深受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青睐, 已成为其对抗世俗主义力量的重要工具。这一现象被学术界广泛称为“莫迪魔法”与“莫迪效应”^[12]。莫迪的支持群体展现出一种近乎无条件的信任, 视其为应对国内错综复杂的结构性问题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即便面对印度内政外交领域的重重挑战与不确定性, 莫迪的支持者依然保持乐观信念, 相信其能够引领国家克服艰难险阻, 实现国家发展目标。这种情感纽带不仅强化了选民的身份认同与政治参与感, 还显著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广泛共鸣。不仅如此, 莫迪的个人影响力已超越党派忠诚的传统范畴, 促使选民在选举投票时更多地基于对其个人的信任与支持, 而非单纯依据党派归属。这一现象在“如果莫迪是国大党的候选人, 我将投票给国大党”的言论中得到了直观体现, 揭示了选民对莫迪个人魅力的认可。在此背景下, 莫迪的个人影响力成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 即形成了围绕其个人展开的忠诚投票倾向。

然而, 个人魅力难以长期掩盖治理成效的不足。莫迪在 2024 年大选中虽以“莫迪的保证”为竞选口号, 强调只有莫迪的施政才能维系涵盖住房、燃气、创业等各个领域的福利计划, 但选举结果并未充分验证这一“保证”。实际票数与民调预期存在差距, 尤其是印人党在传统优势地区的失利, 如北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席位大幅减少, 南部邦如卡纳塔克邦的选举结果变化, 以及莫迪本人亲自坐镇的瓦拉纳西选区的险胜, 均表明民众对莫迪政府的满意度有所下降。这些现象揭示了印度民众政治态度的转变, 意味着印度民众的政治参与已逐渐从政客崇拜回归理性选择。

(三) 意识形态: 进一步强化印度教民族主义

在十年的执政生涯中, 莫迪积极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 旨在将其确立为印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如今印度教民族主义已经深刻嵌入社会肌理中。正如有学者将印人党追求的最终政治目标归纳为“将印度变成一个以印度教为基础、更加中央集权的国家”^[13]。然而, 在大选期间, 因急于彰显此政治目标, 莫迪不慎触发了反对党联盟的强烈反应, 原本因内部纷争而分散的反对力量因此团结一致, 共同抵制印人党。反对党联盟将选举竞争框架化为“民主与集权”“印度教民族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对立, 对印人党构成极大制约。

值得注意的是, 不仅印人党强调印度教民族主义, 各参选政党也普遍向印度教民族主义靠拢, 以争取选民支持。例如, 曾将世俗主义写进宪法的印度国大党不再旗帜鲜明地坚持世俗主义, 在本次选举中同样采取了更为亲印度教的立场。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在选举中借亲印度教主张提升支持度, 被媒体贴上“软印度教特性 (Soft Hindutva)”标签^[14], 反映出世俗主义立场的微妙变化。同时,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不再局限于意识形态的辩论, 转而寻求在宪法框架内调整“世俗主义”原则, 如印人党盟友湿婆神军党 (印度右翼民族主义政党) 呼吁修改宪法序言, 删除“社会主义”与“世俗主义”表述^[15]。这预示着“莫迪 3.0”时代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化趋势不可逆转。

（四）选举策略：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全方位介入

近年来，部分西方国家的政治选举与智能技术相互交织，国际社交媒体上个性化拉票、名人代言、政治对手恶搞及已故政治家“复活”代言等形式的选举策略层出不穷，深刻影响了选举进程。在印度，不同于过往依赖广播、电视及报纸等传统媒体的竞选模式，此次大选适时搭乘了智能技术发展之东风，出现了多个政党对智能技术的创新应用，展现出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对政党政治的全方位介入。

2024 年印度大选作为 AI 技术在大规模选举中应用的最新实践案例，见证了多个政党对 AI 技术的积极采纳与创新应用。印人党作为技术应用的先行者，不仅利用全息投影技术增强领导人影响力，还通过日产万段 AI 视频、发布社交平台互动等多种方式拉票助威。一段莫迪跟随孟加拉语流行音乐起舞的 AI 合成视频在网络上的播放量超千万，由此引发了印度网民以及媒体的广泛热议。工作人员充分利用社交平台，向特定选民群体定向发送个性化虚拟人物视频。这些“AI 政客”以生动形象的方式介绍政府福利政策，并直接呼吁选民投票支持。同时，竞选团队还部署了 AI 聊天机器人技术，模拟莫迪的声音与口吻，通过电话渠道与选民进行互动，以此增强亲近感并寻求选民的支持与认同。这一策略依托 AI 技术实现大规模、精准化的竞选信息投放与数据分析，不仅进一步增强了选举互动性与针对性，而且有效追踪了选民的实时反馈。同时，AI 也被用于抹黑对手，如发布反对党领导人的深伪视频。反对党亦不甘示弱，通过 AI 视频进行反击，展现了双方在新技术应用上的激烈竞争。

然而，这一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引发了关于信息真实性与选举公正性的广泛担忧。为应对这一挑战，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于 2024 年 3 月向国际科技公司提出要求，确保其在发布可能影响选举完整性的 AI 工具前获得政府批准^[16]。AI 技术的滥用可能导致虚假信息泛滥，使得选民难以辨别信息真伪，进而侵蚀政府公信力与公众知情权。尽管印度选举委员会已发布相关警示与规定，要求各政党及时删除 AI 生成的误导性内容，但监管措施并未能完全遏制 AI 在选举中的滥用。因此，如何在利用 AI 技术提升选举效率的同时，确保其不被滥用以维护选举的公正性与透明度，成为印度政党政治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三、“莫迪 3.0”时代印度政党政治变化的多维成因

步入“莫迪 3.0”时代后，印度政党政治展现出的诸多变化植根于莫迪前两个任期所累积并激化的四组核心矛盾之中，经由量变引起质变，使得印人党的国内支持率呈现下降趋势。这些矛盾不仅是政治生态内部张力的集中体现，也是驱动印度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等领域发生深刻转型的关键性因素。

（一）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结构失衡的矛盾

自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国内经济展现出稳步发展的态势，国内生产总值自 2014 年起维持年均 5% 以上的增长率，从 2014 至 2023 年，印度 GDP 由 2.04 万亿美元扩张至 3.55 万亿美元，人均 GDP 亦从 1 559.8 美元提升至 2 484.8 美元。然而，这一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印度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失衡问题却日益凸显，且在过去十年间未获有效解决。据《世界不平等报告（2022）》分析，2012 至 2020 年间，印度社会财富分配极端化加剧，最富裕前 10% 与 1% 的人群的财富分别占国民总收入的 57%

戴永红,刘知乐,韩瑞萌.“莫迪3.0”时代印度政党政治走势的成因及影响[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5):184-196.

和22%,而底部50%人群的财富占比则下降至13%,反映了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的趋势^[17]。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进一步指出,印度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庞大的人口基数中,有高达7.8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仅掌握社会总财富的4.8%,绝对贫困人口数量更是居全球之首,达到2.28亿^[18]。

收入分配领域的失衡同样严峻,印度收入最低的50%人群与收入最高的10%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超过20倍。前者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较低,仅占不到13%,而后者则掌控了接近60%的国民收入。此外,印度中产阶级虽被视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但其平均财富水平仅为73万卢比(约0.89万美元),占社会总财富的比例亦不足三成^[18],显示出中产阶级财富积累的有限性。

就业市场方面,莫迪政府曾雄心勃勃地承诺每年创造2000万个就业岗位,以缓解就业压力,但这一承诺未得到有效兑现。印度经济监测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印度失业率在2023年呈现上升趋势,从3月的7.4%攀升至4月的8.1%,远高于新冠疫情前约6%的水平,凸显了就业市场的严峻挑战。

整体来看,印人党执政期间所标榜的经济发展成就与社会结构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鸿沟。莫迪政府未能有效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未能兑现其关于“印度制造”和扩大就业的关键承诺,导致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社会结构的深刻失衡并存,成为影响“莫迪3.0”时代印度政党政治格局的深层次国内因素之一。

(二) 大国崛起叙事与国内群体割裂的矛盾

自印度独立以来,其政治精英普遍秉持将印度塑造成国际舞台重要力量的雄心壮志。例如首任总理尼赫鲁曾明确表示:“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19],这一理念也成为印度历届政府不懈追求的目标。然而,这一宏大叙事与国内根深蒂固的宗教、族群及区域割裂问题形成了鲜明对比,构成了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显著矛盾。

第一,宗教层面,印度教与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尤为突出。印度宗教问题的历史根源可追溯至印巴分治之前。2002年古吉拉特暴乱事件不仅加剧了这一裂痕,更在莫迪及印人党执政后,通过一系列具有印度教特性色彩的法律法规,如禁止屠牛令、《反改宗法》及《公民身份修正法案》等,进一步强化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制度基础。这些政策不仅削弱了印度多元文化的传统,还加剧了宗教少数群体的边缘化,激化了宗教对立,使得宗教割裂现象愈发严重^[20]。

第二,族群分裂不容忽视。印度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出现了多轮次的人群迁徙与深度融合,形成了高度多元化的族群结构。其中以印度斯坦族(占46.3%)为主体,其他主要族裔包括泰卢固族、孟加拉族等及众多少数民族,这一多元结构孕育了复杂的族群矛盾。2012年阿萨姆邦的暴力事件即为此缩影,穆斯林移民与土著间的冲突蔓延至全国多地。2023年曼尼普尔邦的冲突再次凸显该问题,因资源争夺引发的暴力导致数十人丧生,数万人流离失所^[21]。这类事件被广泛视为印度身份认同构建与少数民族权益保护斗争的缩影,反映出印度教民族主义抬头背景下,少数民族的权益面临更大范围的威胁,进而导致了民族间的信任危机逐步加深^[22]。

第三,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印度内部矛盾的重要体现。整体来看,印度南方地区经济较为发达,而北方则相对落后。正如有分析所称:“尽管北方各邦人口众多,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南方各邦整体上更为繁荣,民众受教育程度也更高。”^[23]近年莫迪政府推行的“印地语优先”政策进一步

激化了南北矛盾，南部非印地语区对此深感不满，而北部民众则在期待发展红利未果中滋生不满情绪。农业法案等改革措施的推行，更是直接触动了北印度农民的利益，削弱了他们对政府大国崛起叙事的认同。

更为严峻的是，印度政府与政党在追求大国地位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国内实际存在的分裂问题，导致大国崛起叙事逐渐沦为空洞的口号，难以凝聚国民共识。民粹情绪的蔓延与政治环境的极化，使得民众在表达政治倾向时顾虑重重，民调结果的失真反映了民众对政治现实的复杂态度与策略性选择。

（三）对外扩张雄心与国家实力不足的矛盾

印度在南亚地区长期被视为主导力量，其外交政策往往将南亚视为自身势力范围，对任何触及此领域的外部行为持高度敏感态度。莫迪政府上台后，确立了“邻国优先”的外交战略，加速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等邻国的互联互通，旨在增强区域影响力与控制力，同时在国内构建“印度崛起”的宏大叙事。针对巴基斯坦，莫迪领导的印人党政府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通过“降格处理”方式凸显印巴实力差距与关系不对等，迎合国内民族主义情绪^[24]。然而，这一策略并未获得南亚所有国家的认可，多国爆发的“印度滚出”运动，特别是马尔代夫对印度驻军的明确反对，揭示了印度在南亚影响力的复杂性与局限性。

印度与中、巴两国的边界争端尤为突出。中印边界东段地区存在领土争议，印度长期非法占据中国领土并设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同时，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冲突历史深远，停火线两侧冲突频发，彰显了印度在边界管理上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军事实力虽在南亚地区相对突出，但高度依赖外部武器进口，这限制了其在复杂冲突中的应变能力。包括与巴基斯坦交火在内的边境冲突中的多次失利，以及面对国内反政府武装的持续挑战，均暴露出印度军事力量的不足。

整体来看，印度虽在南亚地区表现出一定的扩张意图，但其军事实力与国家综合实力尚不足以支撑全面的对外扩张战略。印人党在国内塑造的“大国形象”与其在南亚及边境地区的实际表现存在显著差距，这种反差成为影响印度国内政党政治动态的重要因素。

（四）政治“宗教化”与多元传统的矛盾

印度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根植于广袤的地理疆域与丰富的历史变迁之中。自古以来，印度次大陆便是多元文明、宗教、语言及文化的熔炉，每一次外来文化的融入都为其多元性增添了新的维度。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曙光初现，到吠陀、孔雀、笈多等王朝的兴衰更迭，直至伊斯兰教的传入与英国的殖民统治，这些历史进程共同塑造了印度社会显著的多元性特征。尽管统一性的追求始终存在，但多元主义已成为印度文化身份与国家凝聚力的核心要素。

印度宪法明确规定了世俗主义原则，旨在维护其多民族、多文化的传统。然而，自印人党执政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抬头，倡导构建“印度教社会”，旨在强化国族认同。此举虽增强了印度教教徒的团结，却不可避免地触动了少数族裔及其他宗教信仰群体的利益，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裂与冲突。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对少数族裔的忽视，导致了宗教间暴力事件频发，尤其是印度教教徒对穆斯林平民的单方面攻击，严重破坏了社会和谐，扩大了族群间的裂痕。

更为严峻的是，印人党政府对此类暴力行为的纵容态度以及对世俗主义原则的背离，引发了广

戴永红,刘知乐,韩瑞萌.“莫迪 3.0”时代印度政党政治走势的成因及影响[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5):184-196.

泛的社会不满。在大选期间,各政党为争取选票,纷纷向印度教民族主义靠拢,这与印度固有的多元化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加剧了政治“宗教化”与多元传统之间的矛盾^[25]。莫迪及印人党试图将印度社会统一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却遭遇了来自少数族裔、非印度教教徒及非印地语使用者的强烈抵制。

值得注意的是,反对党联盟巧妙利用印人党政府的负面事件,如国大党等反对党成员的遭遇,成功塑造了自身作为“民主捍卫者”的形象,将选举议题从宗教冲突转向民主与独裁的较量,有效吸引了原本持观望态度的选民。这一转变表明,在印度社会多元传统的背景下,民众对于政治“宗教化”及单一化的国族认同议程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更加珍视和维护社会的多元与包容。

四、“莫迪 3.0”时代印度政党政治的影响与走向

新的政党政治变化能对新的政策选择与走向产生影响。鉴于印度在政治、经济及安全领域已被莫迪政府深刻塑造并高度绑定,尽管面临联盟政治复归的挑战,印人党在国内仍将保持其主导性与支配性地位。莫迪的个人魅力虽曾显赫,但已呈现褪色之势。印度政党政治表现出民粹及政治极化的倾向,印度将延续“倚美制华”的战略考量,同时将在多个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与合作,致使中印关系趋于复杂化。

(一) 联盟政治回归,莫迪光环褪色

长期以来,印度政党经历了曲折复杂、聚散离合的变迁过程。无论是印度人民抗击英国殖民统治并取得民族独立,还是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并跃居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这背后都凸显了印度政党在国家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长期以来,印度政治精英与广大民众深受大国自尊情结与民族复兴愿景的驱动,这一集体意识构成了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与民族全面发展的不竭精神源泉^[26]。然而,随着2024 大选的全新变化及其带来的政治版图重构,这一深植于民族心理结构中的传统动力机制正面临新的挑战与变数。

由本次大选选情来看,“莫迪 3.0”时代印人党无法单独组阁,需要与盟友党派联合组阁,联盟政治由此重新回归印度政坛。对于印度政坛来说,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国大党在印度执政环境恶化后,联盟政治便时常现身印度政治舞台。1977 年国大党失去执政地位,标志着印度政坛步入多党交替执政及联盟政治时期,其间由国大党或人民党领导的政党联盟执政成为主流,各大党派在历次大选中所获议席的差距并非十分显著,一党独大的情形较为少见。

此次大选中,虽然人民党仍拿下 240 个议席,莫迪也成功连任,然而所获议席数量与此前的预测存在较大差距,印人党在后续任期内需要与盟党共同组阁,其在人民院与内阁中的稳固地位已开始有所松动。从本次大选结果和莫迪“光环”的逐渐褪色中可以看出,此次联盟政治在印度的回归大致可以归因于三个方面。第一,印度民众在审视印人党一党独大执政十年后表现出对莫迪及印人党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对印人党通过控制政权压制排挤反对声音的恐惧。印人党庞大的党员群体形成的严密外围组织使印度民众在选举时产生担忧,从而导致民调结果与实际相差较大的情况。第二,印度民众尤其是印人党传统票仓民众对印人党及其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产生“审美疲劳”^[27],被疫情及失业问题困扰的印度民众逐渐将关注点转向实际的施政效果,印度教特性对选票的吸引力正在

逐步下降。第三，莫迪个人魅力及印人党“造神运动”失效后，莫迪及印人党采取了一系列策略，试图将莫迪塑造成“国家救星”的形象，意图以此作为赢得选票和巩固执政地位的手段。然而，经过两届任期，莫迪及印人党并没有完全兑现其竞选时的承诺。这导致莫迪的“光环”开始褪色，其个人形象与印人党对印度民众的吸引力正在逐渐减弱。

为保持新政府的稳定，莫迪与印人党必须充分考量诸如泰卢固之乡党、人民党（联合派）等关键盟党的不同政治诉求与主张甚至是对自身政策的反对意见，平衡印人党与盟党之间的利益冲突。比如，泰卢固之乡党要求莫迪政府在芯片、智能手机等制造业领域加大对其所在的安得拉邦的政策倾斜和投资，人民党（联合派）则要求莫迪政府加大对其所在的比哈尔邦农业和农民的政策倾斜，一众盟党对莫迪政府此前的撤资国有企业政策、推动“一国一选”和“人民院选区划界”计划持反对意见。

联盟政治的复兴预示着权力格局的重塑，对印人党构成了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泰卢固之乡党、人民党（联合派）等联盟成员可能凭借其在联盟中的关键地位，对印人党提出更高要求。然而，从现有的部长任命情况分析，印人党的盟友并未在核心权力分配上展现出过多分歧，可以预见的是，盟党更为关注除内阁部长实权之外的其他核心利益。因此，在“莫迪 3.0”时代印度回归联盟政治的进程中，印人党的执政将面临多方掣肘，印度政治体系可能再次陷入“悬浮议会，议而不决”的治理困境^[28]。

（二）民粹情绪升温，政治极化加剧

有学者提出，莫迪政府凭借其灵活的政治策略与雄厚的资源基础，有效主导了主流舆论走向，塑造出一种印度教民族主义被广泛接纳的政治氛围^[27]。这一过程伴随着世俗主义的边缘化，尤其在大选背景下，多数政党均摒弃了世俗立场，转而拥抱印度教民族主义。在此背景下，民粹主义情绪在印度社会急剧升温，加之民众尤其是底层群体对政治参与的热情持续高涨，共同推动了政治生态向更为极化方向发展。莫迪政府长期推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其前期实施的一系列具有排他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对穆斯林等少数族裔信仰群体构成了实际利益损害，加剧了社会分裂。目前，印度国内已存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暴力压制反对言论的情况。2021 年，印度国大党高层、前外交部长库尔希德在出版的书籍中批评约吉·阿迪亚纳特等人以及印人党错误理解和传播了印度教，并将“印度教特性”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相提并论。该书出版后，印人党等对该书进行猛烈批评。一伙暴徒甚至手持印人党旗帜，闯入库尔希德的住所肆意开火，试图杀死库尔希德^[29]。考虑到印人党长期执政所带来的政治环境，若缺乏适当的制约与政策调控，在“莫迪 3.0”时代可能触发强烈的宗教情绪反弹，有导致类似 1992 年巴布里清真寺拆毁事件及 2002 年古吉拉特邦骚乱等极端冲突的风险。

就政府治理而言，执政力量为巩固选民基础，倾向于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选择。莫迪政府及其所属印人党面临兑现竞选承诺的压力。鉴于过往两届政府在此方面表现未达预期，如 2014 年提出的年度创造 2 000 万就业岗位的目标未能充分实现，选民信任度有所下降。当前选举结果与联盟政治动态反映出民众信任度的下滑趋势。为扭转局势，莫迪政府及印人党或将采取更为极端的政策措施与策略，如推进修改宪法、制定《统一民法典》，进一步把印度教特性与国家政治捆绑。这将进一步加剧国内民粹主义的势头，推动决策过程朝着极端化方向倾斜。此外，印度民粹主义与政治极化

戴永红,刘知乐,韩瑞萌.“莫迪 3.0”时代印度政党政治走势的成因及影响[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5):184-196.

已然有借印度教民族主义延伸到敌视周边国家的趋势:“印度民粹主义虽然没有极端排外的主张,但是对本土穆斯林的仇视,延伸到对巴基斯坦以及中国的敌视,民粹主义的负面舆论对印巴关系、中印关系、南亚区域合作带来不利影响。”^[30]

(三) 紧跟“印太战略”,维持“倚美制华”

自莫迪执政以来,面对中国的崛起和美西方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印度与美国的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甚至可以说抛弃了长期以来的“不结盟”立场^[24]。印度利用美国的“印太战略”,试图引入外部力量来平衡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在国家关系方面,不仅大力发展与美国的友好关系,营造出印美关系紧密的氛围,莫迪更是成为首位两次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印度领导人。印度外长苏杰生评价称:“没有任何一位印度总理在美国国会发表过两次演讲,在世界各地,也只有少数人这样做过……包括丘吉尔、曼德拉。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重要。”^[31]在经济与科技上,印度抓住美西方与中国“脱钩”的发展机遇攫取空出的产业红利,旨在促进自身的科技与经济发展。2023年1月31日,印美签署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并在2024年5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以提升和扩展两国在政府、商业和学术机构之间的战略技术伙伴关系和国防工业合作。此外,在地缘政治及传统安全方面,印度积极参加美国领导的多个战略对话机制,如四方安全对话(QUAD)、“2+2”部长级对话、印美国土安全对话等,加深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将美印在印太地区的利益更牢固地捆绑在一起。

“莫迪政府主张摆脱传统的‘道义政治’,熟练运用实用主义准则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32]在国际关系方面,印度发展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其目的首先是向世界各国展示印度“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形象,建构印度与西方“民主世界”的共同利益;其次是向印度国内民众及周边国家展示印度大国外交的成就,在国内呼应其大国崛起叙事以获得更高支持率,在周边国家突出印度国家实力,压制反印浪潮,稳固势力范围;最后是在“印太地区”制衡中国,以印美关系的发展增加在中印问题上的筹码。在经济和国家实力方面,印度试图抓住美国及其盟友与中国的“贸易战”“脱钩”的机遇,致力于推动全球产业链向本国转移、尽快实现“印度制造”,促进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快速提升。

这一举措并非简单的“联美抗华”,而是印度基于自身战略考量的选择。一方面,印度担忧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增长可能威胁其地区主导地位。在自身实力不足以抗衡中国的情况下,印度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加强制衡。另一方面,印度对美国这一外部力量保持警惕,担心过度依赖美国可能导致自身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受损。印人党前总书记拉姆·马达夫指出:“美国应首先理解和尊重印度在印度洋事务上的主导地位,印度才会涉入其在太平洋事务的当务之急。”^[33]印度希望在与美西方合作的同时,保持战略独立性,维护其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主导权。此外,印度与美西方也不是铁板一块,如印度情报机构在加拿大暗杀锡克教宗教领袖尼贾尔一事,引发了美西方的强烈反响,客观上造成了印度与美西方的关系裂痕。尽管如此,预计在“莫迪 3.0”时代,印度将继续有选择地跟随美国的“印太战略”,利用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制衡中国,获取在中印关系和相关问题上的优势地位,同时维持在南亚地区的主导权。

(四) 采用多元战略,与中国展开竞争与合作

尽管莫迪成功连任,但结果并非莫迪及印人党所期望的最优结局。莫迪及印人党如何维护自身

形象、谋求更长久的执政周期，成为亟待关注的问题。印人党的持续执政虽会延续部分固有立场和一贯做法，然而鉴于政党联盟的回归以及政府内部结构的变动，印度将同中国展开竞争与合作。

在经济方面，印度急需改善社会结构失衡局面，增加较多就业岗位。据估计，中印紧张关系已经给印度电子产品制造商造成了 150 亿美元的生产损失，在过去 4 年中印度流失了 10 万个工作岗位。虽然印度政府提出了“印度制造”计划，但是该政策尚未帮助印度显著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由于印度国内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及劳动力素质等方面不及中国，印度需要中国的资金、技术及人才，“莫迪 3.0”时代很可能在有关经济、科技、人才等领域对华放宽限制。据印度《经济时报》6 月 16 日报道，印官员表示，莫迪政府即将推出面向“行业所需的中国技术人员”的签证审批标准操作程序（SOP）^[34]。《印度快报》8 月 8 日报道，印官员 8 月 7 日表示，印官方已启用面向中国技术人员的短期商务签证审批网站^[35]。印度在大选结束后释放诸多信号以缓和与中国的矛盾，目的是吸引中国资金技术人才进入印度，促进印度发展本国经济和相关行业，扩大就业以改善社会结构失衡的现状。

在边界、宗教及地缘政治等关键议题上，印度很可能仍然对中国保持强硬立场。长期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刻意将中印两国历史遗留问题意识形态化。自莫迪上台以来，中印边界地区接连发生多次对峙乃至冲突事件，如 2017 年洞朗对峙、2020 年加勒万河谷事件等。截至 2024 年 8 月，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WMCC）已举行 30 次会议，中印军长级会谈已举行 21 轮，推动两军在加勒万河谷、班公湖、温泉、加南达坂等对峙点脱离接触^[36]。尽管印度与中国在边境地区建立了对话机制，双方外交部长保持沟通，且印度领导人如莫迪和苏杰生表达了缓和的立场，但这些行为可能仅是莫迪及印人党攫取选票、维持执政地位的一种策略性选择。莫迪还可能会利用边境争端等议题，进一步激发印度国内对中国的敌对情绪，以弥补其在国内政治中的不足。

五、结语

2024 印度大选不仅关乎印度国内政治生态，也为其他国家在政党政治内部结构、运行轨道、具体实践方面提供了反思案例。进入“莫迪 3.0”时代，印度政党政治在政治生态、政治参与、意识形态、选举策略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些新变化使莫迪光环褪色、印度民粹情绪升温、政治极化加剧，促使印度紧跟“印太战略”，维持“倚美制华”，在多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合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符合国情的政党政治制度，彰显出巨大的国家治理效能优势。我国要坚持制度自信，汲取人类政党政治文明成果，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23 年 3 月 15 日，北京）[N]．人民日报，2023-03-16（1）．
- [2] 陈金英．社会结构与政党制度：印度独大型政党制度的演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9．
- [3] 杨路．新冠疫情以来印度政党格局的变化与趋势[J]．南亚研究季刊，2023（3）：100-117+159．
- [4] 李涛，邓桢蕾．印度人民党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实质剖析[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4）：150-

戴永红, 刘知乐, 韩瑞萌. “莫迪 3.0”时代印度政党政治走势的成因及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184-196.

164.

- [5] 周帅, 张耀军. 印度政治生态变化对外交的影响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2 (2): 46-53.
- [6] 陈利君, 卢森. 作为公共关系的竞选: 印人党获取政权合法性的话语建构 [J]. 南亚东南亚研究, 2024 (1): 1-29+152.
- [7] 童宇韬, 陈利君. 印度人民党何以成功: 从侍从主义到民粹主义 [J]. 云南社会科学, 2023 (2): 44-53.
- [8] 张倩雨. 财政转移、国族建构与政党认同——央地关系视角下的印度政党格局演变 [J]. 南亚研究, 2022 (1): 105-132+158-159.
- [9] 周帅. 数字化工具对印度人民党的效用研究 [J]. 南亚研究, 2020 (2): 32-52+152-153.
- [10] 曹小冰. 印度特色的政党和政党政治 [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5: 3.
- [11] 周帅. 印度国内政治生态新特点、成因及内外影响 [J].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24 (3): 25-44+152-153.
- [12] 陈金英. “世俗主义”变迁与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国家 [J]. 南亚研究, 2021 (1): 51-70+156-157.
- [13] 刘宗义. 莫迪组建新政府, 正式开启第三任期 [J]. 世界知识, 2024 (13): 31-33.
- [14] Anand Patel. Before Crucial 2nd Phase in Assam, Rahul Gandhi's Soft Hindutva Push to Help Congress [EB/OL]. (2021-04-01) [2024-03-07]. <https://www.indiatoday.in/elections/assam-assembly-polls-2021/story/before-crucial-2nd-phase-in-assam-rahul-gandhi-s-soft-hindutva-push-to-help-congress-1785781-2021-03-31>.
- [15] 陈金英. “世俗主义”变迁与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国家 [J]. 南亚研究, 2021 (1): 51-70+156-157.
- [16] 魏益帆. 建设数字大国: 印度国家人工智能战略论析 [J].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24 (3): 132-151+156.
- [17] 世界不平等实验室. 2022 世界不平等报告 [R]. 世界不平等实验室, 2022: 197-198.
- [18] 张锐. 贫富鸿沟背后的印度社会制度与经济结构 [EB/OL]. (2022-11-25) [2024-08-12]. <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740087.html>.
- [19]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印度的发现 [M]. 向哲濬, 朱彬元, 杨寿林,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40.
- [20] 王凯.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及影响 [J]. 南亚东南亚研究, 2023 (1): 16-29+152-153.
- [21] Rhea Mogul. Why has a state in India's northeast exploded in ethnic unrest? [EB/OL]. (2023-05-09) [2024-08-11]. <https://edition.cnn.com/2023/05/08/india/india-manipur-violence-ethnic-explainer-hnt1-hnk/index.html>.
- [22] Soutik Biswas. India Election Results 2019: Narendra Modi Secures Landslide Win [EB/OL]. (2019-05-23) [2024-08-13].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48347081>.
- [23] 王世达. 印度人民党、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教国家”的构建 [J]. 当代世界, 2024 (7): 58-63.
- [24] 毛克疾, 石雅凤. 梳理“莫迪十年”与“三连”之间逻辑暗线 [EB/OL]. (2024-06-10) [2024-08-10].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247573>.
- [25] Anand Patel. Before Crucial 2nd Phase in Assam, Rahul Gandhi's Soft Hindutva Push to Help Congress [EB/OL]. (2021-04-01) [2024-08-10]. <https://www.indiatoday.in/elections/assam-assembly-polls-2021/story/before-crucial-2nd-phase-in-assam-rahul-gandhi-s-soft-hindutva-push-to-h>

- elp-congress-1785781-2021-04-01.
- [26] 孟庆龙. 南亚国家现代化进程再审视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 13-18.
- [27] 张书剑. 莫迪的政治光环褪色了? [J]. 世界知识, 2024 (12): 14-16.
- [28] 印度大选莫迪“虽胜犹败”, 这些问题下一步值得关注 [EB/OL]. (2024-06-05) [2024-08-14].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244910>.
- [29] 王世达. 作为印度主流意识形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及其影响 [J]. 世界宗教文化, 2023 (6): 28-34.
- [30] 冯立冰. 莫迪时期印度民粹主义复兴的根源分析 [J]. 世界民族, 2023 (5): 117-126.
- [31] 印度总理莫迪今天启程访美, 美高官: 中国肯定是此次访问战略话题 [EB/OL]. (2023-06-21) [2024-08-14]. <https://oversea.huanqiu.com/article/4D0cBse60Vt>.
- [32] 胡可怡, 曹德军. 莫迪政府“领导型大国”战略与外交政策调整分析 [J]. 南亚研究季刊, 2024 (2): 42-62+157.
- [33] 谢超. 印度“印太”愿景的演变、特点及制约因素 [J]. 南亚研究, 2023 (4): 25-57+153-155.
- [34] 印拟放宽中国技术人员赴印签证! [EB/OL]. (2024-06-18) [2024-08-16]. <https://mp.weixin.qq.com/s/JnUe16KmtP5EJFZUFYp8EA>.
- [35] 熬不住了, 印重启针对中国技工的电子签网站 [EB/OL]. (2024-08-09) [2024-08-15]. <https://mp.weixin.qq.com/s/VEX9n28-NUJ7CrHDaC3PEQ>.
- [36] 观察 | 中印关系悄然冰释前嫌? [EB/OL]. (2024-07-31) [2024-08-10].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245584.

责任编辑: 王京菁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根据《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 B/T 1—2006)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的规定,本刊对稿件的文后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作出如下要求,请向本刊投稿的作者按照本细则著录。

一、基本要求

稿件中所有引文和引用观点的文献出处,做到凡引必注,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集中列于正文末尾,序号用带方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序号标注。参考文献请注明主要责任者,题名(专著名、文章名),出版地,出版社名或期刊名,出版时间(版别、期数),页码。多次引用同一出处的参考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参考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方括号外标注引文页码。

二、著录格式

(一) 专著

适用于普通图书、会议录、汇编、学位论文、报告等。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任选). 版本项(任选).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9.

[2] 哈里森, 沃尔德伦. 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 谢远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35-236.

[3] 贾东琴, 柯文. 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C]//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年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45-52.

[4] 袁洪权. “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0.

[5] 吴云芳.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D/OL]. 北京: 北京大学, 2003 [2013-10-14]. <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type=Reader&DocGroupID=4&DocID=6328>.

(二) 期刊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期刊名, 年(期): 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袁训来, 陈哲, 肖书海, 等. 蓝田生物群: 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新窗口[J]. 科学通报, 2012(34): 3219-3227.

[2] CAPLAN P. Cataloging Internet resource[J]. The public access computer systems review, 1993, 4(2): 61-66.

[3] 李炳穆. 韩国图书馆法[J/OL]. 图书情报工作, 2008(6): 6-12 [2013-10-15]. <http://www.docin.com/p-400265742.html>.

(三) 报纸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报纸名, 出版日期(版次)[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 人民日报, 1998-12-25(10).

[2] 余建斌. 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 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N/OL]. 人民日报, 2013-01-12(2) [2013-03-20].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1/12/nw.D110000renmrb_20130112_5-02.htm.

(四) 电子资源

凡属电子专著、电子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的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分别按上述有关规则处理。除此而外的电子资源根据如下规则著录。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R/OL]. (2012-01-16) [2013-03-26]. <http://www.cnnic.net.cn/hlwfyj/hlwzbg/201201/P020120709345264469680.pdf>.

[2] 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EB/OL]. (2009-04-22) [2013-03-27]. <http://archive.ifla.org/IV/ifla64/138-161e.htm>.

三、文献类型和文献载体标识代码

(一) 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普通图书, C——会议录, G——汇编, N——报纸, J——期刊, D——学位论文, R——报告, S——标准, P——专利, Z——其他。

(二) 以网络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OL——网络图书, J/OL——网络期刊, N/OL——网络报纸, D/OL——学位论文, EB/OL——电子资源(不包括网络图书、网络期刊、网络报纸、学位论文)。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4年第5期 总第47期 第8卷

双月刊 2024年9月20日出版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主 编：王 鸿

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140号

邮 编：400064

电话/传真：023-62874725

电子信箱：ysyxb@vip.163.com

采编平台：<http://cqsh.cbpt.cnki.net>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局集团重庆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78-128

印刷单位：重庆巍承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向海涛

广告许可：渝工商第023053号



微信公众号

ISSN 2096-3378

CN 50-1215/C

定价：20.00 元